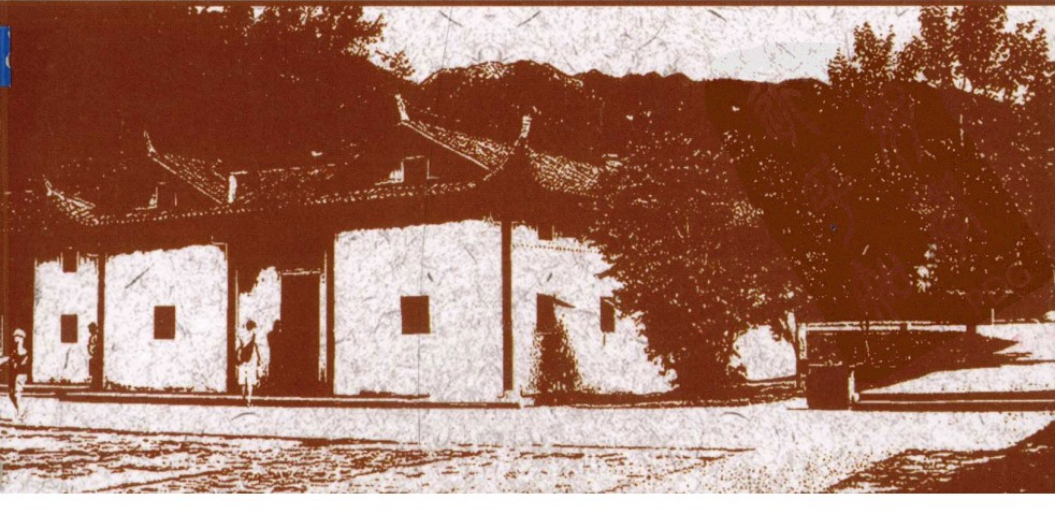
中央苏区研究丛书
主　编：田延光
副主编：张玉龙

中央苏区军事史

凌步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苏区研究丛书

中央苏区军事史

凌步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苏区军事史／凌步机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
（中央苏区研究丛书／田延光主编）
ISBN 978－7－5004－8029－7

Ⅰ．中… Ⅱ．凌… Ⅲ．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史
Ⅳ．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051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王玉兰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9.875 插 页 2
字 数 479 千字
定 价 5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央苏区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问 石仲泉　余伯流　林多贤

主任 田延光

委员 王太钧　何　明　孙弘安　曾泽鑫　陈　新
胡龙华　范小林　邱小云　周建新　谢庐明
林晓平　邹永华　张文标　张　挚　肖桃芳
黎章春　曾耀荣　钟昌火

总序一

苏 荣

赣南，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指挥中枢，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她是新中国的雏形和基石。2001年10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这片红土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毛泽东同志关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依托，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关于在农村根据地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红军建设和红军战

略战术原则，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等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都是在这里初步形成的。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光辉篇章。

这片红土地也是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摇篮。1929 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时只有 3600 余人，到 1933 年 6 月已发展壮大到 12.7 万余人；从单一的步兵发展到有步兵、炮兵、工程兵、通讯兵等兵种，军事指挥体系建立健全，作战能力迅速提高。更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红军战略战术思想。

这片红土地更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赣南苏区人口共 240 万，参加红军的有 33 万余人，参加支前作战的有 60 余万人。1934 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约有 8.7 万人，其中赣南籍子弟达 5 万余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在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 10.8 万人，占江西全省革命烈士总数的 43%，占全国烈士总数的 1/16。我为老区人民这种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精神所深深震撼。这也充分证明了，只要我们共产党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也就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与支持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

中央苏区前后存有 6 年左右的时间，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段极其光辉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由广大苏区军民共同创造的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奉公、争创第一、无私奉献”为基本特征的苏区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其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沃土，又融合中国革

命战争时代特征、共产党人革命风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宝贵精神财富。

鉴往知来，温故知新。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的这套《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共十种），涉及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思想、新闻出版发行、社会变迁和社会动员等内容，史料丰富，原创性强，对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真实了解中央苏区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以及研究和弘扬伟大的苏区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应赣南师范学院之邀，让我为此丛书作序，我欣然应允。也借写序之际，深切表达我对为新中国诞生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之情！

愿苏区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是为序。

2009年7月20日

总序二

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振兴中华的奋斗史。在走过88个春秋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占了28年。在这28年，中央苏区时期占了近四分之一的6年左右。这是一段内涵丰富、地位独特、意义奇重的历史。还在8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央苏区红土地时，就听说江西人民为中国革命打造了“三个摇篮”：即八一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依托中央苏区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摇篮。这个说法也许不那么周严，但它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江西人民、中央苏区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非常特殊的巨大贡献。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首脑机关都在这里。大革命失败后，暴动起义，如火如荼；工农割据，星光闪耀。80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领导广大军民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异常艰苦探索；以他为政府主席的临时中央革命政权开展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国家管理和党的建设诸多方面的创新实践，积累了丰

富的治国、治党、治军经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和骨干力量；在思想理论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初步形成了凝聚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步；同时还铸就了凝结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中国人民坚强性格和中华民族革命传统的苏区精神，书写了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

正因为如此，8 年前，当我从广昌进入中央苏区赶往瑞金参加“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时，伫立在这片广袤的红土地上，就油然生发出一种无限敬仰的情怀。这片红土地，对于共和国言，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就的。这片红土地，一方面使我对中央苏区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将中央苏区史的研究纳入个人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也使我对如何深入研究党史、写活党史有了新的思考。那次理论研讨会后对一些县市的实地考察，我逐渐萌生“走走党史”的理念。此后，每年都来“走走党史”，对原中央苏区所属的赣南闽西各县市区作了考察，对一些重要党史事件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有了实际具体、形象生动的感性认知，从而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由于每年都来参加这边的一些学术理论研讨活动，因而对中央苏区的研究状况也有一些了解。

在我看来，这些年的中央苏区问题研究是党的民主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亮点。

一是自新世纪以来，年年都有大型的理论学术研讨活动，聚集全国不少知名的党史军史专家就中央苏区的若干重大专题进行深入研讨。就我所知道的，除上述 2001 年 11 月在瑞金召开的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理论研讨会外，还有 2003 年

11月在寻乌召开的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理论研讨会，2004年10月在于都召开的纪念红军出发长征70周年理论研讨会，2005年10月在兴国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兴国调查75周年暨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和在宁化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座谈会，2006年7月在广昌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暨第五次反“围剿”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2008年8月在福建建宁召开的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论坛和11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等。其他还有与中央苏区相关部门工作相联系的若干专题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门问题的探讨，推动了中央苏区史的深入研究。在全国有苏区的13个省、市、自治区，像对中央苏区问题这样频繁地连年开会研讨，是十分罕见的。

二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出版一批党史资料和县市人民革命史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相当不少有影响的研究论著。就综合性的比较全面研究中央苏区史的论著言，1999年出版了三部：一部是林多贤主编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包括《中央苏区简史》、《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央苏区教育简论》、《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研究》、《中央苏区体育史研究》、《中央苏区美术史研究》和《长征起始阶段研究》8种。另一部是蒋伯英主编的《中央苏区历史研究》，也是丛书，共6种，由《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和《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组成。再一部是舒龙、凌步机合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2001年又出版了余伯流、凌步机合著的《中央苏区史》，该书荣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其他还有10多部专题性研究论著。在报刊媒体发

表的研究论文，据称多达千篇以上。这些论文涉猎领域广泛，内容丰富，不少为具有开创性精品佳作。这些著述使中央苏区问题研究开始展现百花争艳局面。

三是成立了专门推进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工作部门。在多年大力开展中央苏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2007 年 7 月在中央苏区红土地上唯一的高等学府——赣南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它是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全国高校唯一以中央苏区历史为专门课题开展研究的学科基地。2008 年 11 月，以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为依托又成立了江西省苏区精神研究会，肩负着深入研究并宣传弘扬苏区精神的重任。这两个单位不仅使研究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有了实际载体，而且对于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将研究与宣传互推动，能更好地协调运作。这两个单位的任务，既独具特色，又富创新意义。在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它们分别组织编写了丛书。除这里由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共 10 种）外，苏区精神研究会还组织编写了《人民共和国摇篮》红色经典丛书（共 9 种）。这两套丛书是向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上的厚礼。

这两套丛书的篇幅很大，字数在 300 万左右。尽管顾不上仔细拜读，但它们的框架结构、基本内容、主导思想等略知一二。这两套丛书应当积 20 世纪以来研究中央苏区成果之大成，是 10 多年来不断挖掘这一红色资源的新收获；同时又应当是进一步推进中央苏区的史和论的研究的新起点，打响中央苏区研究将迎来新的高潮的锣鼓。

从这些年接触到的一些情况看，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著述，尽管林林总总，华章上千，但发展很不平衡，上乘佳作还不很多；不少著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多为“浅表性”的重复研究，

或缺乏亮眼的独特视角，或缺乏剥笋似的一层又一层的深入分析，或缺乏对新出版史料的发掘运用等。因此，将中央苏区的史和论研究推向新高潮有着广阔天地，献身于这一事业的研究者大有作为。

第一，加强薄弱专题研究，逐渐使中央苏区史研究成为更加完整均衡的学科体系。从10年前的两套丛书和新编写的上述两套丛书来看，在总体上，后两套丛书是前两套丛书的接续和延伸，开拓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这四套丛书基本上比较全景地展现了中央苏区那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使中央苏区史研究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具有了坚实基础。但毋庸讳言，有的专题研究比较充分或有相当深度，但有的专题研究还待进一步充实资料，或应加强理论的分析与提炼；有的专题研究还较为薄弱，如从社会学角度来对中央苏区这个存在6年左右的特殊形态的社会作较为深入的解析，特别是与当时周边的白区社会作赤白对峙的两个形态比较研究，目前有的专题虽已涉及但未能展开。再如苏区精神的研究，在这套《中央苏区研究丛书》中有这个内容，很好。这是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还可在理论分析方面再下些工夫。看到这几套丛书，我对中央苏区研究成为更加完整均衡的学科体系，充满信心。

第二，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掘文献资料，加强多维度的综合比较研究。这些年，尽管专门出版的以中央苏区为主题的文献资料很少，但从其他方面的文献资料中涉及中央苏区这段历史的资料则不少。比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资料丛书，以及其他前苏联解密档案，辗转流入大陆的台湾“国史馆”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的相关档案，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的回忆录，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及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还有一些县市的地方志和民国时代

报刊等。创新研究不是一句空话，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勤于和善于挖掘和利用散见各种文献中的资料。比如，前些时比较受媒体关注的《苦难辉煌》一书，主要就是反映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土地革命战争这段历史的著作。它除了文笔流畅之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和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有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的史料，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就比过去客观，更加实在，因而有突破旧识陈见的新论。

第三，加强理论学养，进一步提高驾驭史料的分析综合能力。赣南师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有的专著搜索的资料非常多，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学术成果如同工业产品一样，如果是加工能力不强，粗加工就只能是低端产品；精加工就能成为高端产品。历史研究的加工能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分析能力。过去常说，“著书立说”，即“著书”与“立说”是不可分的。现在图书市场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不少大部头著作，只“著书”不“立说”（资料性的书籍不在此列）。即是说，旁征博引的资料很丰富，自己立一个什么观点则不明确或没有。史学研究，毫无疑问，掌握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乃基础的基础。但学问要做大，仅此是不够的。比如，我熟悉的胡绳同志，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曾是作为教科书的近代史名著。这本书并没有运用多少新史料，主要是以理论分析取胜，提出了自己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观点。尽管学界对这些观点有异议，但他代表了一个学派的看法。目前，中央苏区史的研究要创新，上新台阶，这也是一条重要途径。

第四，多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努力拓展研究视野。这可以说是创新研究的又一条途径。我认识一位日本学者村田忠禧，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国一直很友好，几乎每年都来华访问，

进行学术交流。他擅长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变化走向，先后发表过《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以政治报告为素材》、《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字词变化和中国的政治变动》和《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等论文。第一、三两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和2002年第3期上。今年3月来华，我们再次进行学术交流，他又向我讲了通过计量分析研究十七大报告的一些看法。我们国内也有不乏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但大多停留在计量说明上。村田的计量分析不一样，能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变化，发现中国学者没能注意的若干问题。听他讲后，觉得有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也能用于研究中央苏区历史呢？比如对当年国民党报纸关于“围剿”红军的消息等作计量分析，能否对“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态势得出一些新的看法呢？试试看，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收获。

总之，中央苏区史的研究有了数十年的积累，有了目前以《中央苏区研究丛书》为代表的一批学术著作这样厚实的基础，我相信，这个领域的研究一定会展现新的喜人局面。

2009年8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引论 …… (1)

第一章　赣西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 …… (11)

第一节　赣西南、闽西的自然环境及大革命前后经济社会状况 …… (11)

第二节　赣西南、闽西共产党组织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兴起 …… (22)

第三节　赣西南农民武装暴动 …… (31)

第四节　闽西农民武装暴动 …… (48)

第五节　赣西南和闽西地方红军的创建 …… (52)

第二章　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 …… (61)

第一节　红四军出击赣南，进军闽西 …… (61)

第二节　红五军井冈山突围游击赣南与红四军会合 …… (78)

第三章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 (94)

第一节　红四军第二次入闽 …… (94)

第二节　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 …… (101)

第三节　红四军粉碎国民党军“三省会剿” …… (118)

第四节 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与出击东江 …… (123)
第五节 红四军党的“九大”胜利召开 …… (127)

第四章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组建 …… (139)
第一节 红四军离闽入赣 …… (139)
第二节 红六军的组建与红军赣南“三月分兵” …… (143)
第三节 红二十、二十二、三十五军的组建与八打吉安、五打赣州 …… (153)
第四节 闽西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与红九、二十、二十一军的组建 …… (160)
第五节 红四军第三次入闽与红一军团成立 …… (163)
第六节 红五军开辟湘鄂赣边红色区域与红三军团成立 …… (170)

第五章 红一方面军成立与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 (173)
第一节 红一军团向南昌推进 …… (173)
第二节 红三军团攻克长沙 …… (175)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的组建 …… (178)
第四节 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 …… (180)
第五节 红一军团攻占吉安与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 (187)

第六章 中央苏区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 (192)
第一节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 (192)
第二节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 (216)
第三节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 (230)
第四节 中央苏区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意义 …… (242)

第五节　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闽粤赣苏区的军事斗争 …… (246)

第七章　中央苏区红军巩固发展苏区的斗争 …… (249)
第一节　红军消灭苏区内的反动“土围”“白点” …… (249)
第二节　宁都起义诞生红五军团 …… (253)
第三节　攻打赣州 …… (265)
第四节　红军东路军获漳州大捷 …… (277)
第五节　红军西路军进军赣南西河地区 …… (281)
第六节　水口战役 …… (283)

第八章　乐宜战役与宁都会议 …… (290)
第一节　水口战役后红军军事决策机制的改变 …… (290)
第二节　乐宜战役 …… (296)
第三节　宁都会议召开 …… (300)

第九章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 (316)
第一节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开始第四次军事“围剿” …… (316)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发起建黎泰、金资战役 …… (317)
第三节　周恩来果断决策撤围南丰 …… (321)
第四节　黄陂、草台冈大捷 …… (326)
第五节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 (329)

第十章　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体制及武装部队建设 …… (335)
第一节　中央苏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 (335)

第二节 中央苏区所辖各省军区 …… (342)
第三节 中央苏区主力红军 …… (348)
第四节 中央苏区地方红军 …… (368)
第五节 中央苏区地方群众武装 …… (371)

第十一章 中央苏区红军党的建设与政治工作 …… (377)
第一节 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 …… (377)
第二节 中央苏区红军党的组织系统 …… (379)
第三节 中央苏区红军党员队伍与基层党支部建设 … (388)
第四节 中央苏区红军青年工作 …… (393)
第五节 中央苏区红军干部教育 …… (395)
第六节 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工作 …… (400)
第七节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 (403)

第十二章 中央苏区的战争动员工作 …… (405)
第一节 战争动员体制与法规建设 …… (405)
第二节 政治动员与兵员动员 …… (410)
第三节 财经商贸动员 …… (418)
第四节 交通与邮电通信动员 …… (429)
第五节 军工建设与防空建设 …… (434)
第六节 支前保障 …… (440)

第十三章 “左”倾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的推行 …… (460)
第一节 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转移至红都瑞金 …… (460)
第二节 “左”倾领导者“分离作战”错误方针的提出…… (462)
第三节 东方军入闽东征 …… (466)
第四节 红军中央军在抚赣地区日趋被动 …… (470)

第十四章　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473)
第一节　第五次反"围剿"前的敌我态势 …… (473)
第二节　红军反"围剿"错误方针的推行和李德的到来
…… (478)
第三节　红军反"围剿"开局失主动 …… (482)
第四节　"福建事变"发生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
不同处置 …… (487)
第五节　博古、李德推行节节抵抗消极防御方针和
"短促突击"战术 …… (500)
第六节　广昌会战失败和筠门岭、建宁失守 …… (507)

第十五章　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 (512)
第一节　战略转移的决策与秘密准备 …… (512)
第二节　战略转移前的直接准备工作 …… (524)
第三节　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集结于都河流域 …… (530)
第四节　红军野战军踏上长征路 …… (540)

第十六章　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 (546)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 …… (546)
第二节　中央苏区各省和中央直属县初期的游击
斗争 …… (562)
第三节　中央分局领导机关和留守红军"九路突围" … (571)
第四节　赣粤边、闽西南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 (579)
第五节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 (588)

结语 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历史地位 …… (596)

主要参考文献 …… (611)
后记 …… (615)

引　论

一

中央苏区全称为中央苏维埃区域，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创建的全国最大的一块苏维埃区域。1931 年 11 月，在中央苏区中心地区——江西瑞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领导机关，都先后设在瑞金，因此中央苏区又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位于江西省的东南部和福建省的西北部，以江西省瑞金县（现为瑞金市）为中心。其较为稳固的区域，西界赣江，北接赣抚平原，南邻赣粤边之九连山脉，东达闽南九龙江畔。区域范围因战争形势发展变化而变化，先后包括现江西省的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县、上犹、崇义、吉安、吉水、泰和、万安、峡江、新干、永丰、广昌、南丰、南城、宜黄、乐安、黎川、金溪、资溪、铅山、贵溪、上饶、广丰和福建省的长汀、龙岩（今新

罗区）上杭、永定、连城、武平、平和、漳平、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泰宁、建宁、崇安（今武夷山市）、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将乐、沙县、建瓯、政和、松溪，广东省的南雄、平远、蕉岭、大埔等59县（市）。1933年秋其疆域鼎盛时期，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时称500万）。长期（或较长时间）占有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广昌、黎川、长汀、龙岩（今新罗区）、上杭、永定、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泰宁、建宁等县城。

二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这两个主要敌人都异常强大。这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②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建立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形式，主要的是革命武装斗争。可以说，中央苏区十年革命斗争史，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年革命武装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635页。

②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斗争史。

中央苏区斗争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南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前后历时十年，大致经过奠基开创、初步形成、正式建立、鼎盛发展、最终丧失、游击战争等六个阶段。

中央苏区十年武装斗争，伴随着中央苏区斗争所历经的六个历史阶段而展开，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历史的全过程，波澜壮阔，艰难曲折。

（一）奠基开创阶段（1927年8月至1929年12月）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序幕，接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汉口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始。在南昌起义鼓舞和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赣西、赣南的中共组织，先后领导万安县、吉安县东固和延福、泰和县三十都、南康县潭口、赣县大埠、信丰县、于都县、寻乌县、兴国县崇贤等地贫苦农民，举行革命武装暴动；闽西中共组织也先后领导举行了龙岩县后田、上杭县蛟洋和平和县、永定县等地农民武装暴动。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后，都建立了大小不等的红色地方武装，初创了吉安县东固、于都县桥头、寻乌县阳天嶂、永定县溪南里等小块红色割据区域，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开辟、创建奠定了根基。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突围，转战赣南、闽西，3月20日在福建长汀县城辛耕别墅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

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①] 的重大决策，揭开了通过革命武装斗争开辟、创建中央苏维埃区域的序幕。

随后，在毛泽东、朱德等人和赣西南、闽西党组织领导下，经过红军和广大工农群众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先后建立了东固和于都、兴国、宁都、永定、龙岩、上杭等县红色政权。1929 年 8 月至 9 月，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攻克上杭县城，粉碎了闽、粤、赣国民党军队对闽西红色区域发动的第一次“三省会剿”，保卫了闽西红色区域。特别是毛泽东在经历了红四军党的“七大”风波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重新回到中共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通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统一了红四军党内认识，确定了红军建军纲领。中央苏区的创建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二）初步形成阶段（1930 年 1 月至 1930 年 10 月）

1930 年初，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著名党内通信后，为粉碎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的第二次“三省会剿”，与朱德一起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返回赣西南地区游击，帮助建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还在吉安水南、施家边歼灭进攻东固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第十六旅。闽西苏维埃政府也于同年 3 月成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经过红四、五、六军从 1930 年 3 月至 6 月的三个月分兵游

---

①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20 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6 页。

击活动，赣、闽、粤三省边境梅花式红色区域逐步连成一片。1930年六七月间，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由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相继成立。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克长沙。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县永和镇胜利会师，合编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全军近四万人。随后，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二次攻打长沙战役，受挫后撤回江西，10月4日攻克吉安城。10月7日，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吉安宣告成立。赣西南苏区地跨赣江两岸，横断江西半壁。与此同时，以湖南平江、江西修水为中心的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和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建立。

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以江西赣西南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为基础，发展建立“苏区的中央根据地”，亦即中央苏维埃区域，或称“中央苏区”、“中央区”，并规定即将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都设在中央苏维埃区域内。至此，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三）正式建立阶段（1930年11月至1931年11月）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迅猛发展，令蒋介石十分恐惧和仇视。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进攻江西苏区和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从以游击战为主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采用“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术，将国民党军引诱进赣南苏区腹地，从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五天内先后在永丰县龙冈和宁都县东韶两战两捷，歼敌逾万，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

“围剿”胜利。

1931年3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调集二十万重兵，再次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继续采用“诱敌深入”战略战术，隐蔽集结在东固地区二十余天，捕捉战机，自5月16日至5月31日，从东固富田由西向东横扫，十六天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以三十万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从8月7日至9月15日，又在兴国县莲塘、良村、宁都县黄陂及泰和县老营盘、兴国县高兴、方石岭等地，六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获得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

在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军事“围剿”的同时，闽西苏区军民也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

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不仅歼敌七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斗志；而且锻炼了红军，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战略思想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舞台；还使赣南苏区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的召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随后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建立。

（四）鼎盛发展阶段（1931 年 12 月至 1933 年 8 月）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发展阶段。中央红军主力用三个月时间拔除了苏区内部由地主豪绅占据的白色据点，使得苏区进一步巩固。1931 年 12 月 14 日，驻宁都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该部中共地下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

1932 年 2 月上旬至 3 月上旬，中革军委迫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压力，指挥中央苏区红军发起攻打国民党军坚固防御的赣州城，历时月余，不仅未克坚城，红军反而遭受重大损失。赣州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主力先后进行了龙岩漳州、南雄水口、宜乐、建黎泰等战役，拓展了苏区，初步贯通了与闽浙赣（原赣东北）苏区的联系。

1933 年 2 月开始，蒋介石以四十万优势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此时，毛泽东虽被“左”倾错误执行者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被排斥出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与中革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一起，坚决排除来自后方“左”倾领导者的干扰，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于 1933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21 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宜黄县黄陂、草台冈两役，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 年 4 月下旬，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新设闽赣省，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8 月，又新设立粤赣省。至此，中央苏区已建立 4 个省级和 60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部队发展到有一、三、五、七军团等共十二万余人，党员人数超过十三万人。这期间，虽然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但苏区人民在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苏区政权、武装、群团、法制、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大规模的、红红火火的建设活动中，取得了重大成绩。中央苏区的疆域面积、军事和经济力量等，都发展到鼎盛时期。

（五）最终丧失阶段（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 10 月）

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的危害日益严重，特别是军事上由于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共中央领导者博古等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来到瑞金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一意孤行，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强制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敌人堡垒对堡垒和阵地对阵地拼消耗、步步抵御、消极防守、“短促突击”、“六路分兵”等错误战略战术，同时推行“关门主义”政策，错误处置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坐失打破国民党军“围剿”良机。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经过一年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934 年 10 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等领导机关，被迫率领红军主力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

（六）游击战争阶段（1934 年 10 月至 1937 年 10 月）

中共中央等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长征后，留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项英和原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等一批干部以及一万六千余人的红军部队，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领导根据

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

1935 年春，中央苏区各省红军游击斗争相继失败。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直接领导的红军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亦被国民党军围困在于都县南部狭小山区。1935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项英、陈毅等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指示精神，指挥被围困的红军部队分成九路，从于都南部山区出发，分散突围。突围中，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阮啸仙、贺昌、梁柏台、周以栗等一大批重要干部壮烈牺牲，大部分红军部队被打散，损失严重，仅一部分人员突围转移到赣粤边、闽西南、闽赣边和湘赣边。项英、陈毅亦安全突围转移到赣粤边地区。各地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和蔡会文、张鼎丞、邓子恢、陈潭秋等领导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人，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

1937 年全国抗战开始后，各地红军游击队根据党的指示，与国民党当局在大余、赣州、南昌、龙岩、瑞金等地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取得成功。随后，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军事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使中国工农红军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第三，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规律和人民军队建设在探索中获得了宝贵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框架雏形。

第四，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创建和保卫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和以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固的前进阵地。

第五，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治政、治国的领导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领导骨干。

第六，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培育形成了伟大的苏区革命精神。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史，是中央苏区斗争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史，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艰辛历史，揭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军事斗争中初步形成的光辉历程，铭记中央苏区军民为创建、保卫苏区英勇斗争的辉煌业绩，激励人们大力弘扬苏区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念，增强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战胜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巨大冲击，加强我国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繁荣强盛而努力奋斗。

第一章

赣西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

第一节　赣西南、闽西的自然环境及大革命前后经济社会状况

一　赣西南、闽西的自然环境

中国江南地区有两大南北走向山脉：一为江西、湖南两省之交的罗霄山脉，一为江西、福建两省之交的武夷山脉。两大山脉中段和南段之间夹着一个广阔的空间，就是江西省的赣西南、赣东南地区；而武夷山脉南麓，则是闽西地区。赣西南、赣东南和闽西这一相互连接的广阔地区，横跨赣、闽、湘、粤四省边界。境内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密布的河溪间有众多小块盆地，地形复杂，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境内有两大水系：赣西南属赣江水系，闽西属汀江水系。

赣江上游有两条支流：一为发源于罗霄山脉南端诸广山的章江，一为发源于武夷山脉南端西麓的贡江。赣南所辖18个县、市、区中有17个县、市、区属章、贡二江流域，各县、市、区间可通航运沟通联系。章、贡二江汇合于赣州形成赣江，奔腾北流，经赣西吉安和赣北南昌、九江，入长江，归东海，使偏僻闭塞的赣南和赣西有便利的水运交通与外部世界联系。古时，赣南的章江可通航至赣粤边界的大庾（今大余）县城，唐朝宰相张

九龄凿通大庾岭梅关驿道，沟通了赣、粤之间的陆路交通，赣南成为中原地区连接南粤的重要通道，赣州也成为这一通道中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重镇。

闽西的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段东麓的长汀县西北，经上杭、永定二县南入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与粤东的梅江汇合为韩江至潮汕流入东海。韩江与汀江可通木船至长汀县城，而长汀县城与赣江水系的瑞金县城仅一山之隔。赣西南、闽西这一险峻、优越的山川地貌，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中央苏区，提供了天然屏障和发展空间。

这一广阔区域属中亚热带南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境内崇山连绵林木茂密，不少地方有原始森林，虎豹出没无常。境内生产稻谷、甘蔗、烟叶、白莲、木竹、茶油、香菇、土纸等产品，地表下还蕴藏着丰富的钨、锡、煤、铁、稀土、石灰石等百余种矿藏。尤其是赣南的钨，蕴藏量极为丰富，有“世界钨都”之称，自20世纪初即已大规模开采，产品远销世界各地。这一地区较强的自供自给能力，无疑为中国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足够的经济给养和物质保障。

二 赣西南、闽西的经济文化状况

尽管赣西南、闽西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一地区同全国一样，在封建统治下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陷于迟缓的状态之中。

农业方面，这个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耕作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作物产量很低。特别是偏僻山区，生产条件更加恶劣，有的甚至仍处于刀耕火种时代。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十分牢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量的

土地集中在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中。据毛泽东1930年5月和同年10月先后作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统计，寻乌县土地，地主占30%，公田（实为地主、富农把持）占40%，农民只占30%；而该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富农仅占人口总数的7.445%，中农和贫农却占人口总数的88.255%。就是说占人口总数88%以上的贫农、中农只占有全县30%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7.4%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县70%的土地。[①] 兴国县第十区（永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6%，却占有全区80%的土地（其中地主占有40%，公堂占有10%，富农占有30%，公堂占有的土地实为地主、富农所共有）；而中农、贫农占人口总数的80%，他们只占有全区20%的土地[②]。闽西地区，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记载："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③]

因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农民缺少赖以生存的土地，必然被迫向地主豪绅和公堂租地耕种，承受着地租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沉重的地租，逼得贫苦农民"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记载说："'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抚地主。禾打过了，买上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② 同上书，第199—200页。

③ 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一点油盐，春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嘴’。”① 除实物地租外，贫苦农民还要承担劳役地租，就是无偿地帮地主做工；此外还要承受高利贷剥削。

工业方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和外国商品的输入，一方面使赣西南、闽西原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不少传统手工业破产，另一方面又促使这一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地萌芽。境内一些较大的城镇如赣州、吉安、龙岩、汀州等地，也办起一些机器生产的小工厂，如碾米厂、纺织厂、发电厂等。赣南的西华山、仁风山、丰田等地钨矿，也大量开采。这就使雇佣工人和手工业作坊工人逐渐增多。据赣州总工会 1926 年底统计，仅赣州城和赣州郊区，雇佣工人和手工业者（含店员在内）就达一万八千余人。赣南几个钨矿采矿的民工总计约达万人。但由于缺乏资本、技术等原因，各地的工厂、作坊规模都很小，机器设备也较为落后。直到 20 世纪初，在赣西南、闽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产业工人仍未产生。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萌芽、初始状态，赣西南、闽西的雇佣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劳动条件极差，每天劳动 12 小时甚至 16 小时以上，而收入却异常微薄，最低的每月只有 30 斤大米，多的也不过 1 石左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尤其是钨矿矿工的命运更为悲惨。山上的矿井都是手工开凿，又低又窄，通风、光照条件极差，经常倒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更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开采出的矿石全靠肩挑背驮运出井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7—138 页。

外，送到选场。选矿也是手工淘汰，又累又慢，效率极低。当时的矿场都是民窿开采，盘踞矿场的山霸、包工与外国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包棚场、收零砂、放恶债、压砂价等手段，残酷剥削工人，榨取工人血汗。不管哪个行业，工人职业都毫无保障。资本家可任意克扣工人工资，还可以任意辞退工人。有些人被辞退后，生活无着，度日艰难。洋货大量输入后，当地传统的手工业产品受到严重冲击，“洋布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卷烟打倒了条烟”。在1930年8月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闽西特委报告说：“烟厂倒闭，刨烟工人失业，他们跑到南洋去，南洋又不是个去路，跑到漳、厦、潮、汕大城市去，而漳、厦、潮、汕又消受不下，他们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去当土匪，所以闽西首先有土匪的就是永定，因为永定产烟最多。”又说：“纸没有销路，纸业工人失业，于是长汀、连城的土匪也出来了。”“在长汀的河田，从前有五百多间商店，现在倒闭得只剩下二三十间了，所以影响沿途靠着担夫旅客吃饭的最少也有三万元（人），这些人那里去了，只得又去当土匪。”①

农村中的雇农即为雇佣工人，亦称长工。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无所有，专门给地主、富农干活。据1931年底统计，赣南的兴国全县共有雇农2162人；赣县仅7个区，就有雇农1027人。② 南康县的龙回乡，有的大地主一家雇工30余人。雇农们长年累月为地主干活，吃的是残汤剩菜，过的是牛马般的生活。有首描绘雇农生活的民谣写道：“五更起，半夜眠；风雨来，霜雪奔；无粮食，糠充饥；‘豆角衫’，洞满身；无腰带，

① 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279页。

② 《全总苏区执行局报告》（1932年3月17日），江西省总工会、江西省档案馆《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70页。

捆箩绳；烂布块，当脸巾；睡秆堆，盖蓑衣；水当镜，柴当枕。”许多雇农穷得一辈子打光棍，没有家室。

赣西南、闽西的商业，由于资源物产的丰富和水运的便利，在明、清时期还算活跃，但商品流通基本上被豪绅地主资本家控制。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控制金融、粮食、布匹、油盐、杂货、药材等主要行业，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夏秋收获季节压价收购农民粮食，来年青黄不接时再高价抛出，牟取暴利。他们还霸占市场，强买强卖，利用各种手段非法聚敛钱财。有些地主从商业剥削中获得暴利后，一部分用于扩大商业资本，一部分用于在农村购置田产。在闽西，“收租土地中城市商业资本占的成数极大，龙岩连城及永定的丰田区均占到全额土地百分之五十，长汀百分之三十，上杭百分之二十五，武平百分之二十。商业资本土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城市资本家赚了钱进乡购买土地。龙岩、连城、永定商资土地之多，就是因为除本县商家购买土地外，还有一大批往南洋经商的华侨发了财拿钱回来购买土地。一种是乡村地主的商人化。他们一面在乡村是地主，一面却把剥来的孽钱投入城市经商”①。赣西南地区则是乡村地主商人化居多。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大特征，特别是层层剥皮的厘金税制度更为厉害。赣西南、闽西同样如此，到处税卡林立。如会昌县从筠门岭到西江 180 里路，就设有 9 道厘金卡，每道关卡均要抽税。此道是兴国、于都、宁都、瑞金与闽粤沿海通商的主要通道，过往商贩受尽关卡盘剥之苦，因而严重阻碍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弄得百业萧条，民怨沸腾。

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赣西南和闽西的社会经济如此凋敝

---

① 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0 页。

衰败，文化教育之落后可想而知。赣州城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大革命前仅办有两所中学、两所师范学堂，在校学生不满千人[①]。曾长期作为南安府治所在的大余县城，仅有一所中学148名学生，其中地富子弟91名，资本家子弟48名，工农子弟仅9名[②]。而许多县城甚至连一所中学也没有，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小学校。如瑞金县至1920年全县只办有10余所小学校，学生不满千人[③]。吉安城的教育比赣州发达，亦只办有1所师范学校和4所中学。无论赣西南还是闽西，民众90%以上都是文盲。至于科学技术的普及与运用，更无从谈起。赣南丰富的钨矿资源，还是德国传教士邬礼亨于1882年率先在大余县西华山发现的。直到邬礼亨非法盗采大量钨砂运回国后，当地人才知道，这种蕴藏丰富的乌黑“石头”竟是值钱的宝贝。

三　赣西南、闽西政治状况和社会组织

赣西南、闽西虽地处偏僻，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赣西南地区，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以后，这块神奇、秀丽的土地才逐渐开发。自秦开始，先后在赣南设“南壄”县，在赣西设庐陵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赣南的南壄县又分设为南壄、雩都、赣县三县。此后，赣南、赣西便成为历朝统治者治理的重要区域之一。闽西的开发虽然比赣西南晚，也有近两千年历史，长汀在汉代始置县，唐代

---

① 赣州市地方志编委会：《赣州市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4、821页。

②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③ 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公室：《瑞金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即已成为州治所在。

赣西南、闽西古时有少数土著居民。赣南最早的土著居民称“赣巨人”，生活在春秋战国前期。史载秦始皇为统一中国，曾派出大军征伐南越，并派军在赣南梅关筑城戍守。这些远征将士中有些人后来留居赣南。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时，又派出大批人员前来赣西南砍伐良木，不少伐木客亦留居下来。这些人后来成为开发赣西南的先锋。

从公元5世纪前后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及南宋时期，中原战乱频繁，黄河流域大批居民为避战乱，不断举家南徙。其中许多人渡过长江，进入鄱阳湖区，然后顺赣江溯江而上，逐渐南迁至赣南，辟荒定居，建立家园，繁衍后代。据考，赣南的宁都县，是这些南迁居民最早的落脚地、聚居地和繁衍地之一。这些来自中原的南迁居民，不论是秦汉时期的军卒、木客，还是后来为避战乱南迁入赣者，全部被称为“客家人”。这些客家人随着后代繁衍不息，人口日渐增多，为寻辟新的家园，又继续南迁赣南和粤东北各地，还经过赣南石城县和福建宁化县等地向东南发展到闽粤沿海。明清时期，由于沿海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大批居住在闽、粤沿海的客家居民又纷纷北返至赣南及闽、粤、赣边境地区。还有不少人为谋生计，南下向南洋、海外发展。这样就使赣南（包括赣西部分地区）、闽西、粤东北（主要是梅州地区）这一广阔地区成为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这一地区的居民，80%以上为客家民系。赣南又被称为“客家摇篮”。

中原居民南迁入赣成为客家居民后，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带到赣西南、闽西和粤东北，与这里丰富的资源和适宜的气候结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他们在避乱南迁、开辟家园的过程中，不仅要战胜和适应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环境，还要解决好

和赣、闽、粤土著居民的关系。为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一般都聚族而居，保持着较为紧密的族群关系。在与大自然和当地恶劣环境的长期斗争中，磨砺和形成了客家人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和认同宗亲、团结对外的传统。由于聚族而居，又使客家人较好地保留和发扬了中原祖先注重文化教育、崇尚尊老爱幼、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和光宗耀祖等传统，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文化生活习俗，诸如客家民居文化、客家饮食文化、客家服饰文化，等等。客家人的这些特点和优秀品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同属客家人的毛泽东、朱德等在这一地区领导开辟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便利条件。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 客家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也是由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所组成。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客家人中的少数人成为封建统治者和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而多数客家劳动人民则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剥削，因此客家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样十分尖锐。另一方面，由于客家人惯于聚族而居，宗族姓氏观念强烈，封建宗族统治尤为厉害。族长利用手中的族权和严厉的族规族法，对本村本乡同姓同胞施以严密控制和盘剥。到处可见的飞檐翘角，威严壮观的宗族祠堂，是宗族权力的象征。而能充任族长、掌握族权的，基本上都是有钱有势的封建官僚和豪绅地主。这就使封建政权与封建族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许多事情，封建政权机关必须利用族权的威严才能办到。这也就形成了这一地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250页。

各县往往由各大姓豪绅操纵本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的奇特现象。如宁都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就分别操纵在温、李、蔡、卢四姓豪绅手里。各姓豪绅表面上是代表本姓本族共同利益，实质上是代表本阶级即豪绅地主的利益。各姓豪绅地主之间既勾心斗角，又相互利用，共同欺压劳动人民。瑞金县的大小豪绅，就组织了“廉义社”，社里有“三虎、六豹、十二狼”，掌握着全县的公产、税收、诉讼，控制着全县政治、经济，压迫勒索劳动人民。由于宗族观念严重，各姓豪绅地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经常制造姓氏、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挑起械斗。械斗结果，无一不是豪绅地主从中得利，而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都是普通百姓。各姓氏豪绅地主为准备械斗和对付打劫的土匪，还组织修建了大小不一但却比较坚固的土围、山寨，购买武器，组织民团。这些土围、山寨和民团，后来都被土豪劣绅所利用，成为对付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据点和工具。红军在这一地区开辟割据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剧烈的赤白拉锯斗争，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之所以要花费大量精力在根据地内打“土围”、拔“白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赣、闽、粤边客家人聚居地区，绿林、帮会组织众多。影响较大的是洪门“三点会”。该组织起源于清初台湾和福建沿海，其宗旨初始是“反清复明”，政治色彩浓厚。后来，该组织发展到长江流域各省及海外，并分化瓦解为“清”、“洪”、“理”三支。在闽、粤、赣边地区仍称“洪门”或称“三点会”。清末明初，这一组织不再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已演变为“杀富济贫”、“互帮互助”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绿林组织，经济和互助色彩浓厚。该组织在闽粤赣边区散布有多股。每股内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各股三点会之间无隶属关系，但有密语、暗号内部联络。不管何股三点会会员，只要能用密语、暗号对答

无误，则视为兄弟，热情帮照。兴国、于都、永丰、瑞金、会昌、安远及闽西各县都有这种三点会组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永丰县的段起凤（段月泉），兴国、于都边境的曾老四等。无论何股三点会，其成员多数都是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仇恨豪绅地主。他们所谓“杀富济贫”，所杀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民愤较大的豪绅地主。所以这些三点会成员后来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引导和红军的帮助下，都成为土地革命初期各地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这也是赣、闽、粤边客家人聚居地区能迅速成为红色割据区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教会势力逐渐侵入赣西南和闽西地区。至19世纪20年代初，赣西南和闽西各县都有外国教会势力活动，许多县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在两三千人以上。那些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和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育婴堂、养老院等所谓“慈善”事业为幌子，大量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其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服务。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人民的反抗，包揽诉讼，干预行政，倾销鸦片。不少教堂还霸占土地，收租纳粮，剥削人民。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自从1913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江西李烈钧湖口讨袁失败后，北洋军阀势力乘机控制了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此后，赣西南和闽西便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北洋军阀与江西、福建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对人民实行野蛮统治，并且穷兵黩武，兵燹不绝。福建的北洋军阀势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和统治，不断地收编本地杂牌军和民团势力，使福建形成长期“官匪合一”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江西、福建人民都深受军阀统治之害。

总之，20世纪初叶，赣西南、闽西与全国各地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

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状况与毛泽东的分析完全一致。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矛盾的存在，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人民大众，曾自发地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展开过英勇不屈的斗争。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在这个地区得到热烈响应，太平军曾在这个地区纵横驰骋，占领了赣南、闽西大部分地区。兴国等地在太平军支持下还组织过共耕共享的"农民公社"和"太平仓"。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广大人民群众也进行了多次激烈反抗。整个赣西南、闽西地区，已是四处布满干柴，只要有革命火种，很快就将燃起熊熊烈火。

第二节 赣西南、闽西共产党组织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兴起

一 马克思主义在赣西南、闽西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赣西南的传播，始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在吉安，自1919年冬起，《响导》、《新青年》、《新俄游记》等进步刊物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万安县的进步青年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青年学会，创办《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秋到1924年春，吉安的进步学生罗石冰、刘九峰、曾延生等先后考入以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主开办的上海大学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会学系学习。由于受到共产党人瞿秋白、恽代英等的教诲，罗石冰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他们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寄回吉安，供同学和亲朋好友阅读，使吉安七师宋大勋等一批进步学生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1924 年春，宋大勋倡导成立了吉安青年学会等团体，创办了《吉光》和《吉安青年》等刊物，还开办了吉光书店和平民夜校。

在赣州，五四运动后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使广大青年增长了知识，活跃了思想。许多青年不满足于在本地求学，纷纷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等地求学，有些还设法赴外国留学。这些外出求学的青年，在外地很快接受了先进思想，不少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兴国县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陈奇涵、胡灿、鄢日新、肖以佐等，于都县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邱倜和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李英，赣县在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学习的谢学琅，寻乌县在北京、上海、广东梅州等地学习的刘维锷、邝才诚、古柏等。他们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纷纷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寄回本地，广为传播。寻乌的刘维锷等人还在北京创办《寻乌》杂志，针砭时弊，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腐败。宁都县的连政公等人在上海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回县创办《孤灯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较早在赣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邓子恢。他是福建龙岩县人，曾到日本留学一年半，因家境不济辍学回国，1918 年冬来到赣南崇义县杰坝墟其堂兄开设的庆昌和商号当店员学徒。他后来回忆说："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我看了《新思潮》、《新青年》，思想才逐步前进……一直到 1920 年底 1921 年初看到了共产党宣言，我感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中国只有走这条路

才行，这就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①] 此后，他用自己的工钱买回《响导》等许多进步书刊，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积极介绍给别的青年阅读。1922年他曾给陈独秀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得回音。他并未因此失去信心。1926年12月，他终于在崇义县经陈赞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在闽西的传播始于1921年春。在赣南崇义县当学徒的邓子恢，将自己购买的进步书刊带回家乡龙岩，与陈明等人在龙岩县白土组织奇山书社，发展两百多名进步师生为成员。《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在书社成员中广泛传阅。书社还出版《岩声》月刊宣传革命思想，发行六七百份，遍及闽、赣、粤边35个县。1925年9月至同年冬，上杭县进步青年罗大准、郭尚屏、雷三明、邱天锦等人在上杭城关组织读书会；在广州求学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武平县青年谢秉琼、长汀县青年胡轶寰（胡轶环）和吴炳若等人，筹建汀雷社，1926年3月25日出版了《汀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在此时期，进步青年卢肇西、陈正、曾牧春等编辑的《钟声》，陈国华、张旭高、谢宝萱等创办的《到民间去》和《新龙岩季刊》，谢鸣珂主编的《署汀》，黄亚光等人创办的《长汀月刊》，李修森、罗玉章编辑的《莲钟月刊》，上杭县出版的《突击》、《虹痕》、《奋斗》、《上杭评论》，永定县出版的《雷鸣》、《赤花》，龙岩县出版的《改进》等刊物，都为马克思主义在闽西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一些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的进步学生利用暑假回乡机会，在家乡举办平民学校，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等也在家乡

① 邓子恢：《崇义初期革命斗争的回忆》，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苏区风云录》，1991年，第11页。

创办平民学校。这些平民学校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二　赣西南、闽西党组织的建立

赣西最早的共产党员，是吉安青年知识分子刘九峰、罗石冰和曾延生。他们于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广泛在吉安知识界传播马列主义，为吉安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1924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派万安籍青年团员曾宏毅到吉安发展团员，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5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1926年1月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发展到56人，其中一部分团的骨干，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吉安小组。同年3月，中共党员发展到30余人。3月24日在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吉安地委的同时，正式成立了中共吉安特别支部，隶属于中共江西地委领导，先后由郭化非、罗石冰任特支书记。中共吉安特别支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组织党员分赴赣西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至1926年底，全赣西共有吉安、永丰、万安、泰和、莲花、永新、吉水、安福8个县建立起23个中共支部和4个中共小组。1927年初，中共吉安特别支部升格为中共吉安地委，受中共江西区委领导。至1927年7月，赣西除峡江县外，其余各县都建立了中共组织，共有吉安、万安、安福3个正式县委和永新临时县委，吉水、宁冈2个区委，1个特别支部，44个支部，3个小组。②

---

①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10页。

②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0页。

赣南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兴国县（一说泰和县）的袁玉冰。他是192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1924年至1926年，兴国县的陈奇涵、鄢日新，信丰县的肖凤鸣，南康县的朱由铿、陈赞贤，寻乌县的古柏等40余人在广州黄埔军校及在北京、武汉、南昌、梅县等地读书的先进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为迎接北伐军进军江西，中共江西地委派朱由铿和万安籍共产党员曾天宇到赣州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半个月后，他们的活动被盘踞赣南的北洋军阀发现，曾天宇在赣州被逮捕入狱（后被营救获释），朱由铿被迫避往广东南雄县，与南雄县总工会委员长、南康籍共产党员陈赞贤会合。经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同意，陈赞贤于8月间和朱由铿一起返回赣州，与在上海入党后奉命回乡开展革命活动的赣县籍青年学生谢学琅取得联系。3人在赣州城大新开路黄家祠开会，成立了中共赣州支部，朱由铿任支部书记，陈赞贤、谢学琅分任组织、宣传干事，隶属于中共江西地委领导。中共赣州支部成立后，很快发展赣州青年学生朱如红、谢家禧等人入党。9月初，北伐军第十四军进占赣州。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兴国籍共产党员陈奇涵、胡灿、肖以佐等及赣县籍共产党员钟友钎、吉安籍共产党员萧韶等14名共产党员，随军抵达赣州，与中共赣州支部党员会合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活动。陈赞贤被派回南康县任行政委员长（县长），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南康支部；陈奇涵等回到兴国县，成立了中共兴国支部。10月上旬，正式成立了中共赣州特支，陈赞贤任特支书记。同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后派回江西工作的邱倜、舒国藩、谢汉昌等23名共产党员，途径赣州时被中共赣州特支留下，分派到于都、信丰、上犹、大余、崇义等县，发展共产党员，帮助建立革命组织。中共赣州特支举办了赣南农工运动骨干训练班，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

员。至1926年底，赣南的南康、兴国、信丰、大余、崇义、上犹、于都7县，都建立了中共支部；宁都、安远两县建立了中共小组；中共在瑞金、石城、龙南等县也开展了革命活动。1927年1月，中共赣州特支升格为中共赣州地委，下辖7个支部、1个特支、1个中心支部，党员发展到200多人。①

闽西的陈明、罗大准、谢秉琼、郭滴人、张鼎丞、阮山等人，都在外地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子恢也于1926年冬在赣南的崇义县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中多数人后来都返回家乡，同工农群众结合，建立革命团体，秘密发展党员。1926年夏初，阮山、林心尧等从厦门返回家乡永定湖雷乡，在湖雷乡羊头村的万源楼，与赖实秋等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又称中共湖雷支部）。同年11月，从厦门集美学校回乡的陈正等人，与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回乡的胡永东一起，建立了中共永定金丰支部。1926年12月，上杭、平和两县也分别建立了中共支部。龙岩县于1926年11月成立中共小组，1927年1月成立中共支部。长汀、武平、连城等县也于1927年冬建立了党的组织。闽西各县党组织建立后，都隶属于中共闽南特委领导。②

三　赣西南、闽西工农革命运动的初兴

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都是在迎接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一建立，就肩负起动员广大工农群众迎接和支援北伐军，开展工、农、商、学革命运动的重任。

---

① 中共赣州地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江西省赣州地区组织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3页。

② 中共福建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9页。

赣南党组织建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和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商民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和商民协会等革命团体方面。1926 年 11 月初，在中共赣州特支领导下，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赣州总工会，陈赞贤当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赣州城及郊区 1.8 万余名工人和手工业者组织在 54 个行业工会组织内，各县也先后建立了工会组织。在赣州总工会统一领导下，赣州钱业工会会员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待遇，维护自身权益，率先开展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赣州多数行业都通过和平谈判，劳资双方签订了合同，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在赣南农民运动委员会指导下，赣南多数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以“二五减租”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赣南各中等学校都成立了学生会，还成立了赣州学生联合会，并且成立了共青团赣州特支及其外围组织赣州青年干社。赣州城和各县商民协会也纷纷成立。①

吉安总工会在 1925 年 9 月 20 日即已秘密成立，1926 年 9 月 24 日北伐军进占吉安城后开始公开活动，下辖有十余个行业工会，工会会员一万余人。吉安总工会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提出“反对做夜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各县县城工人在本县总工会带领下，也纷纷向资方老板提出一些合理要求。工人的斗争获得了胜利。吉安的农民运动始于 1925 年秋冬间。1926 年 9 月，中共吉安特支秘密成立吉安农民协会筹备处，北伐军攻占吉安后农协筹备处转为公开活动，随后各县农民协会纷纷成立，遂川、宁冈、莲花、安福等县农民协会还建

①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24 页。

立了农民自卫军，其中遂川县农民协会有枪一百一十余支，宁冈县农民协会有枪六十余支，莲花县农民协会有枪六十余支，安福县农民协会有枪二百余支。吉安、安福、吉水、莲花等县农民组织清算委员会或财产清理委员会，对土豪劣绅把持的公共财产进行清算，追缴被他们贪污侵吞的公共财产。有的县组织平粜所，按农协规定统一粮价，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保护农民利益。①

北伐军入闽后，闽西的工农革命运动也开展起来。各县在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帮助下，培训了一批工农运动骨干。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的闽西籍学员回到闽西后，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1927 年 2 月初，龙岩县农民协会在龙岩文庙成立。上杭县于 1927 年初成立县临时农民协会。武平县有八个乡建立农民协会，十个乡着手筹备。永定县农民运动发展更快，至 1927 年初已有四十余个乡建立农民协会，县农协筹备处也已成立。长汀县也已建立了一些农协小组。各县农民协会成立后，都开展了以“二五减租”为主要内容的反对豪绅地主剥削农民的斗争。与此同时，闽西各县的工人运动也开展起来。1927 年初，上杭、龙岩、永定等县已分别成立了县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②

四　蒋介石背叛革命，赣西南和闽西党组织遭到破坏

正当北伐军胜利向前推进、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却背叛革命，大肆镇压工农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骨干。

---

①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25 页。

② 同上书，第 25—26 页。

第一个被国民党右派杀害的共产党员，是原任中共赣州特支书记、后任赣州总工会委员长的陈赞贤。陈赞贤于1926年11月上旬担任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后，与共产党员萧韶、钟友钎等一起，领导赣州工人开展了以“增资减时”、改善工人政治生活待遇为内容的工人斗争，并取得了初步胜利。蒋介石为扑灭赣南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指使国民党右派、驻赣州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等人，于1927年3月6日深夜诱捕陈赞贤至赣县县政府。陈赞贤身中十八枪，壮烈就义。杀害陈赞贤后，蒋介石更是凶相毕露，从赣州沿江而下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到上海，无数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1927年5月，蒋介石又命令国民革命军钱大钧第二十师进驻赣南“清党”。“清党军”到赣南后，按照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电令，于6月21日成立了“国民党赣南特别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国民党“赣南清党委员会”。赣南各县也成立了“清党”机构。“清党军”和“清党委员会”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骨干，封闭革命团体。1927年春后任中共赣州地委书记的张世瞻、朱由铿，都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中共赣州地委于1927年7月间被迫停止活动。兴国、于都、上犹、崇义、大余、龙南、赣县、南康、信丰、宁都等县党组织，有的停止了活动，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或农村，分散隐蔽。①

在赣西，“清党军”也进驻各县，整个赣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8月6日，国民党吉安警备司令朱世贵杀害了共产党员、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封闭了吉安的革命团体。共产员李文林、赖经邦、曾炳春等，都分别撤离吉安，转移

①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3页。

到东固、延福等农村山区，开展秘密活动。①

闽西的土著军阀郭凤鸣、陈国辉等，反革命气焰同样甚嚣尘上，先后在龙岩、上杭制造了“四一五”和“五七”反革命事变，逮捕杀害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左派骨干，下令通缉郭滴人、邓子恢等人。

第三节　赣西南农民武装暴动

一　南昌起义对赣西南革命斗争的积极影响

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和血腥的屠杀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人上了极为深刻的一课。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党的领导者不仅认清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真实面目，而且也认识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党内许多同志已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应保存武力，提出要组织农民武装“上山”。

1927 年 7 月中旬，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等提出组织南昌暴动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批准。1927 年 8 月 1 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人民军队的艰难历程。

为保存起义军力量，同时为在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8 月 3 日，南昌起义部队按照预定计划撤离南昌，经抚州、广昌等地，8 月 22 日进抵赣南的石城、宁都，25 日在瑞金壬田击退国

---

①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2 页。

民党军钱大钧部。26日，周恩来等率前敌委员会等领导机关进驻瑞金县城。30日，起义军集中主力在会昌城外与钱大钧部激战，歼敌六千余人，占领会昌县城。鉴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已南撤至会昌筠门岭一线布防，起义军途经筠门岭入粤计划受阻，起义军北返瑞金停留一星期后，于9月2日离开瑞金东进入闽，9月中旬进入广东境内。

南昌起义的枪声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赣西南党组织以极大的鼓舞。起义军南下广东途经赣南期间，沿途开展革命宣传，镇压了一批反动豪绅地主，打击了当地反动武装，给所经各县革命斗争以直接的影响。10月中旬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余部从广东大埔撤离西进，在赣南的安远县天心圩整顿队伍，在信丰县整顿纪律，在大余县城对部队进行整编，在崇义县文英、上堡进行整训（史称“赣南四整”），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南昌起义军革命火种，而且给赣南各县革命斗争以积极的影响。

二 八七会议精神在江西的贯彻和中共江西省委武装割据赣西南计划的提出

中共中央在决定举行南昌暴动的同时，还决定在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争取建立乡村农民政权，并训令湘粤鄂赣四省应迅即发动和组织农民秋收暴动。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中央关于湘粤鄂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对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行动计划和方针政策提出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要求。8月7日，中共中央又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中共江西省委于1927年8月下旬得悉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

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省委立即对全省农民秋收暴动作出了计划，同时还制定了《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和《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由于此时江西全省党组织从省委到各县委都很不健全，有许多党组织还处于分散隐蔽状态，尚未恢复活动，所以省委制订的秋收暴动计划未能实现。9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陈潭秋抵江西接任省委书记。为了更好地创造条件发动秋收暴动，省委加紧调整和恢复各地党的组织，10月底将全省改划为东西南北四区，分别成立中共特委。10月，中共赣西特委和中共赣南特委分别在万安县罗塘圩和赣州城成立。

但是，因各地党组织尤其是几个特委建立较迟，除万安等少数几县外，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省委制订的秋收暴动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引起中共中央的不满。于是，江西省委重新研究了全省的形势，于1927年11月30日重新制订了一个全省武装割据计划，提出“赣西南准备于最近造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赣东北与赣东联络一会［气］亦形成一个割据局面”①。这个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支持。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为配合广州暴动，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14日发出第23号通告，要求湘鄂赣三省迅速暴动，“农民割据的局面要立即开始”；要求“在江西应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的局面”，特别要求“赣南湘南须立即发动”，以便“直接声援广东”②。

---

① 《江西省委致中央信——目前军阀混战下江西工作的情形与最近的策略》（1927年11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48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71页。

为执行中央指示，实现赣西南武装割据计划，1928 年 1 月 10 日，江西省委召开常委临时会议，专门讨论武装割据赣西南问题，作出了《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决定取消原已成立的中共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另外成立统一领导赣西南武装割据斗争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并派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王为宪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王为宪于 1928 年 2 月上旬赴中央汇报工作后，江西省委又派宛希俨到赣州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在中共中央的催促下，江西省委还重新制订了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暴动区：（1）西南区；（2）西北区；（3）东北区；（4）赣东区；（5）南浔路区。西南区包括吉安、万安、遂川、泰和、永新、宁冈、安福、吉水、永丰、乐安、新余、兴国、赣州、南康、崇义、于都、信丰等县。西南区为全省总暴动的爆发点，东北、西北两区继续响应，再次为赣东区的暴动。对赣西南的暴动程序和暴动后革命斗争的发展方向，江西省委在工作计划中都作了详尽规定。

三 赣西农民武装暴动

（一）万安暴动

赣西南最先爆发的农民武装暴动是万安暴动。

万安县地处江西省西南部。该县在 1926 年 7 月就建立了中共支部，1927 年 6 月成立中共万安县委，至 1927 年 10 月，全县已建立五个中共区委，有共产党员五百余人。大革命时期，该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至武装暴动时全县有四分之三的地区实际已为农协势力占据。大革命失败后，万安县委一度与江西省委失去联系。南昌起义后，万安县委负责人曾天宇和张世熙派人去南昌寻找省委并汇报工作。1927 年 9 月中旬，派去南昌的同志带回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文件和省委制订的秋收暴动计划。县委立即在

罗塘至善小学召开全县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研究决定举行武装暴动，攻打万安县城。会后不久，中共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以及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省委代表汪群、团省委书记吴季冰等，都来到万安，指导暴动。10月，在罗塘村召开的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组成了以曾天宇为书记，以张世熙、刘光万、陈正人、余球、汪群、曾延生等为成员的“万安行动委员会”，作为暴动的总指挥机关；并且决定由曾天宇、张世熙、肖素民三人组成参谋部，负责策划指挥攻城战斗。会后，行动委员会一方面加紧进行暴动的各项准备；一方面将全县青壮农协会员统一编组为万安工农革命军，下辖五个纵队，共一万四千余人。从1927年11月19日至12月31日，万安县委率领全县工农革命军曾先后三次攻打万安县城，但皆因武器简陋敌强我弱而受挫。

万安县工农革命军三次攻打万安城受挫的消息传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应万安县委请求，于1928年1月5日指挥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占遂川县城。遂川城守敌一个工兵连向万安县城逃窜途中遭到万安工农革命军伏击，损失惨重，残敌逃入万安城内。万安县委决定集中全县工农革命军四万余人分成四路，于1928年1月9日向万安县城发起第四次攻击。因这次攻城组织严密，行动一致，声势浩大，城内守敌惧怕被歼，慌忙弃城，分水陆两路逃向赣州。万安暴动获得胜利，全县欢呼。1928年1月11日，在万安县城东湖洲召开五千多人群众大会，庆祝暴动胜利，宣布成立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万安县工农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县苏维埃政府），选举雇农出身的刘光万为县人民委员会主席。

万安暴动的胜利，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开创了“江西革命最光荣的一个新纪元”，“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

个新的局面——苏维埃革命的局面”[①]，也为实现江西省委武装割据赣西南的计划打响了第一炮。万安工农革命军在数次攻打县城及与国民党军斗争中创造和形成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②] 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后来，毛泽东、朱德将它应用到井冈山斗争中，并发展和概括为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为红军游击战术的形成构筑了思想框架。

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府十分惊恐。1928 年 1 月，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派出第八十一团和第七十九团 1 个营，向万安县城进攻。驻赣州国民党军方鼎英师亦派出两团兵力向万安进攻。为保存革命力量，1928 年 1 月 23 日，万安工农革命军和县苏维埃政府从县城撤退，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国民党军占领万安后，疯狂报复，全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六百余人遭杀害。万安暴动领导人曾天宇在率部突围转移时，于 1928 年 3 月 5 日被一个营敌军包围，开枪自尽，壮烈牺牲。同年 9 月，康克清等八十余名农军在刘光万、游必安带领下，跟随前来接应的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

（二）东固暴动

东固位于吉安县（今属吉安市青源区）南部，与泰和、兴国、吉水、永丰四县交界，是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是开展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

① 《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万安暴动的胜利》（1928 年 1 月到 3 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 5 辑，1988 年，第 35 页。

② 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 1927 年 10 月至 1928 年 3 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 年 7 月 12 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 5 辑，1988 年，第 71 页。

东固有一批青年学生大革命时期在吉安城读书，并先后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成为吉安革命斗争的火种。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吉安县教育局任督学的共产党员赖经邦、吉安县总工会秘书长曾炳春、吉安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高克念、吉安县农民协会招待委员汪安国等先后潜回家乡东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9月下旬，赖经邦在本村敖上村秘密召集曾炳春、高克念、刘经化、汪安国等12名党员开会，成立了中共东龙（东固和南龙）支部，选举赖经邦任书记；同时决定重建东固农民协会，收集原九区农协的9支枪，建立东龙游击队，赖经邦为队长。会议决定积极做好准备，实行武装暴动。会后，赖经邦通过亲戚关系，很快争取到永丰县芹菜坑三点会绿林武装段起凤（段月泉）部30余人、14支枪参加游击队，段起凤任游击队副队长。赖经邦领导党员和游击队员又夺取了南龙土豪的11支枪，加上赖经邦原有的两支短枪，至10月底游击队发展到有近100人和36支长短枪。

1927年11月12日，东龙党支部乘吉安城国民党军调防兵力空虚之机，举行武装暴动。当日，赖经邦、段起凤率领东龙游击队六十余名队员和一百余名农协骨干，出击邻近的吉安县富田区，捉拿大土豪王初曦。不料王初曦已闻风而逃，只抓获其弟王良照，缴获长枪六支、子弹数十发。王家财产被没收，粮食衣物就地分给贫苦群众。11月13日，游击队和暴动队员又开赴与吉安城仅一江之隔的永和圩打土豪，筹得现款上万银元。11月18日，再次出击吉水县水南圩反动自卫军，缴枪16支。19日，游击队和暴动队伍返回富田，筹集军需物资，制作军服数百套。当月下旬，游击队和暴动队伍返回东固。

东固暴动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吉安县东南地区以王初曦为首的土豪劣绅反动势力，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吉安及其邻近几县

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在暴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的东龙游击队，成为赣西南革命武装割据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泰和三十都暴动

三十都地处泰和县赣江东边山区，与兴国、万安县交界，有十余个自然村、三百余户人家，属泰和县第五区。1927 年 8 月，共产党员康纯前往广州，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得到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随后回到泰和县三十都，于 10 月初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三十都地区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会议召开当晚，便派人烧毁心田大土豪刘训年的油槽，点燃了革命烈火。随后，加紧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泰和第五区秘密农协，成立第五区农民自卫大队，肖拔群任大队长，开展打土豪和抗租税债抗粮斗争。至 11 月底，农民自卫大队发展到千余人。11 月 26 日，经中共赣西特委和中共泰和区委周密部署，康纯、肖拔群指挥三十都农民自卫军，会同曾天宇、肖玉成等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装扮成国民党军队，联合一举攻入泰和县城，缴获泰和县靖卫团与公安局枪支七十余支，子弹六箱，冲锋刀八十余把，捕捉城内土豪劣绅数十人，打开监狱救出革命同志和无辜百姓百余人。国民党泰和县县长高本初一行狼狈逃出城外。为防反动派反扑，农军连夜撤出县城。第二天，康纯率农军一部复入城内，又缴获手枪一支，国民党县政府铜印一枚和一批银元，将县政府的钱粮账册和所有契约付之一炬，并将缴获的银元分发给入城的贫苦农民和城内贫民。当日，攻城农民与前来反扑的国民党军两个连及靖卫团两百余人战斗数小时后，顺利撤回河东。

泰和县反动派不甘失败，勾结驻吉安的国民党军以重兵向泰万边界地区数次发起进攻。五区农民自卫军与敌军激战数次，终因弹药耗尽，伤亡日增，只好将队伍暂时解散隐蔽。暴动领导人

康纯、翁德阶、肖拔群、胡运椿等在隐蔽期间，不幸被敌人杀害。

（四）吉安延福暴动

延福地区位于吉安县北部，赣江西岸，与吉水、安福、峡江、新余、分宜等县交界，地势险峻偏僻，远离吉安和邻近中心县城。

1927 年 9 月，延福地区油田的共产党员李锦云、曾椿萱、彭万生等先后从外地秘密回到家乡；原在湖南工作的郭承禄、郭家庆等也返回到延福活动。他们迅速成立了中共延福支部，并准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在此时，一位被裁减下来的北伐军连长李育青，带领 20 余人、19 支枪，流落延福北部的九龙山活动。李锦云获悉后，立即与该部联络。经耐心宣传教育，李育青决心率部参加革命。10 月，中共延福支部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在油田乡七里村成立油田游击队，李育青任队长。同月，中共塘东支部购得 14 支枪，成立塘东游击队。不久，塘东游击队缴获贩卖鸦片的国民党军 27 支枪，罚得现洋 1.4 万元。游击队用这笔罚款及打土豪的筹款，陆续购回 100 余支枪。1927 年 12 月，中共延福区委成立，郭承禄任书记。区委下辖 18 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 100 余人。各村农民协会也陆续建立，游击队和农协力量大增。区委根据中共赣西特委指示，于 1927 年 12 月间将油田、塘东两支游击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纵队长李育青，党代表金万邦，参谋长刘泽民。全纵队共有 200 余人，160 余支枪，下辖 3 个中队。

1928 年 1 月，第九纵队在中共延福区委领导下，公开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发动部分农民，首先捣毁塘东枧口钱粮局，捕杀其头目曹植清。接着，于 1 月 30 日一举攻克邻近的吉水县埠田圩，全歼驻圩内的靖卫团一个排，缴枪 32 支。随后，第九纵队

又乘胜向附近的反动势力出击，先在分宜县上山寺角战斗中俘获一个排守敌，缴枪十余支；继而于2月间攻打安福县城，俘敌保安队十余人，缴枪数十支，筹款400元。

延福暴动的胜利，为吉安县北部赤色区域的建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战斗中成长的第九纵队，成为赣西南革命武装割据斗争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五）永丰、吉安等地暴动

永丰县在1926年10月建立了中共永丰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永丰支部转入县境南部藤田山区活动。1927年10月，共产党员袁振亚受中共赣西特委派遣，返回家乡永丰县开展革命活动。11月，他与原中共永丰区委委员吴江、严如玉等取得联系，成立中共永丰区委，袁振亚任书记。区委决定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2月，在藤田成立由原县工人纠察队队员八十余人组成的永丰县工农革命军，有枪近六十支。1928年1月22日，工农革命军会合藤田附近农民三百余人攻打县城，未克。工农革命军退至潭头，与吉水县游击队汇合，合编组成永吉游击队，匡新民任队长，吴江任指导员。全队一百一十余人、六十余支枪。从1928年2月到6月，中共永丰区委又先后领导永丰县南部的芹溪、沙溪、藤田、石马等地农民暴动，建立了芹溪赤卫队（后发展为潭头游击队）、沙溪赤卫队、田心赤卫队。在这些地区暴动的基础上，1928年6月13日公开成立了永丰县革命委员会。

吉安县西部有个官田村，1926年建立了中共支部。1927年秋，中共吉安县委派曾山到这里组织发动农民暴动。曾山与从武汉学兵团回来的共产党员肖世梅、肖志锋取得联系，恢复党的活动，成立党支部。至1928年2月，先后建立党支部16个。曾山等人组织共产党员和农协骨干以学拳术为名培训暴动骨干，并积

极筹集武器。1928 年 5 月 27 日（农历四月初九），曾山、肖世梅等得悉有十余名国民党兵携带六支步枪、一支短枪在下罗村抢劫，便立即组织暴动骨干和革命群众七百余人前往围攻，夺取枪支。经过激战，缴获步枪四支，活捉国民党兵四名。战斗胜利后，曾山等又因势利导，指挥暴动农民前往大地主刘玉山家打土豪，得手后即召开庆祝暴动胜利大会。大会结束后，因组织不严密，暴动队伍陆续解散，暴动领导人遂转移到其他地方开展活动。

四　赣南农民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后，曾参加起义的一些赣南籍共产党人，如于都县的丘倜、李英、朱学玖、钟声楼，信丰县的肖凤鸣，南康县的钟肇尧，兴国县的陈奇涵、胡灿等，都陆续返回本县，与当地隐蔽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迅速恢复了这些县党的组织活动。

为更好地领导赣南各县的农民武装暴动，中共江西省委于 1927 年 10 月派汪群等到赣州，建立了中共赣南特委，汪群任书记。特委成立后，立即在赣州城南门外柴火坪农民王华荣家中召开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议。同时，特委派出特委委员萧韶、丘倜、丛允中等，到于都、南康、信丰、赣县等县，协助这些县党组织向广大党员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发动，按照江西省委武装割据赣西南计划和江西总暴动计划，赣南各地农民武装暴动于 1928 年 2 月中旬起陆续爆发。

（一）南康潭口暴动

南康县潭口镇位于赣州与南康县城之间，距赣州仅 20 公里。南康县共产党员廖贵潭、兰广孚、陈铁生、易有珍、罗贵波等在这里开展了较长时间的革命活动。1927 年 10 月中共南康临时县

委成立后，在潭口与凤岗、龙回等地建立党支部，秘密发展党员百余人，农协会员千余人。1927 年 12 月，中共赣南特委派丛允中向南康临时县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西省委关于武装割据赣西南的计划，要求临时县委加紧做好武装暴动准备工作。临时县委决定率先在条件较为具备的潭口镇发动暴动。于是，成立了由廖贵潭、罗贵波、兰广孚、钟肇尧等七人组成的潭口工农武装暴动委员会；组织了用四支步枪、一支短枪和梭镖、大刀、土枪、土炮等装备起来的一百余人的暴动队伍。1928 年 2 月 16 日深夜，廖贵潭、罗贵波等率领暴动武装，一举击溃潭口警察队，打死打伤国民党警察各一名，缴枪两支，占领了潭口镇，宣布成立潭口工农革命委员会。2 月 17 日上午，暴动队伍将潭口镇几家土豪的财物没收分配给贫苦群众。下午，新成立的潭口工农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正当大会召开之时，驻赣州的国民党军出动一个营兵力向潭口进攻。暴动领导人立即率领暴动队掩护群众撤退疏散，来不及转移的部分暴动骨干和群众被国民党军捉去，遭严刑拷打，一些同志被敌人杀害。当晚，暴动委员会决定暴动队伍暂时分散隐蔽，已暴露身份的暴动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隐蔽，待局势缓和后再图发展。

（二）赣县大埠暴动

大埠位于赣州东南方，距赣州城约 40 公里。1927 年初，大埠在赣州读书的青年学生朱如红、赖传珠等，在赣州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1927 年 10 月下旬中共赣南特委成立后不久，又成立了中共赣州县委，曾延生任书记，专门领导赣县农村斗争。赣州县委适时向全县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特委关于武装暴动的部署。大埠地区的共产党员按照县委、特委要求，选择峰山的崆峒小学为活动据点，成立招生委员会，以招生办学为名，向山下四周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

会。至1928年2月，在大埠地区先后建立起四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一百余人，秘密农协会员九百余人。为准备武装暴动，党组织设法购买、筹集到九支步枪。暴动前，中共赣南特委和赣州县委派了两名八一起义部队留在赣南的军事干部（一名刘传雅，共产党员；一名向汉城），对暴动骨干进行军事训练。中共赣州县委书记曾延生主持召开了两次第三区党的负责人扩大会议，对暴动作出周密、具体部署。2月18日，赖传珠、钟正泉、谢家禧、朱如红、刘传雅等指挥两千余名暴动农民，分两路攻打大埠附近的赖村和彭屋两个地主堡垒，获得胜利，没收了土豪的财物分给农民。当天，在大埠圩召开大会，成立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推选黄世秦为主席，赖传珠等六人为委员。为巩固暴动胜利，工农革命委员会建立了一支七十多人的常备暴动武装。

3月22日，暴动武装按预定计划向荷村、云洲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发起攻击。暴动武装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终因敌强我弱，装备较差，遭受重大损失，许多暴动队员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暴动领导人赖传珠、钟正泉、谢家禧等突出重围后，化装前往赣州寻找赣南特委和赣州县委。因特委、县委机关已经被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破坏，赖传珠辗转湖南，寻找毛泽东部上了井冈山，谢家禧等则返回赣县坚持斗争。因暴动失败，大埠地区被杀害群众达九百余人。

（三）信丰暴动

信丰县至1927年9月，已建立中共支部12个，有党员七十多人，还成立了中共信丰特区委，建立农协二十余个，农协会员有八千余人。1927年10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在信丰县活动时，信丰区委与朱德、陈毅部取得了联系，得到起义军的支持。11月，曾参加南昌起义的南昌《贯彻日报》编辑部副主任肖凤鸣回到信丰县，加强了党组织领导力量。1928

年初，成立中共信丰县委，肖凤鸣任书记。此时，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西省委、赣南特委关于武装暴动的计划已经传达到信丰县党组织。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年关斗争，攻打九渡、大小窝等地的国民党厘金卡，缴获十几支步枪；还捕杀了在黄泥排收税的四名税警，缴枪四支，为全县农民暴动筹集了一批武器。

1928年2月初，中共赣西南特委派丛允中到信丰，向县委传达了特委要求立即暴动的命令。2月18日，县委书记肖凤鸣主持召开县委全体会议，对暴动作出部署。2月21日晚，县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对暴动作出具体部署，并决定成立信丰县暴动总指挥部，由郭一清任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丛允中、肖凤鸣任党代表；同时成立信丰县工农革命委员会，黄维汉为主席，郭同薪、曾人超等19人为委员。2月22日晚，信丰县四乡的二十余个村庄，锣声四起，火把通明。暴动农民听到锣声，在各乡农协领导人率领下，迅速集合，分头捕杀土豪劣绅，焚烧各种契据，没收土豪财产。23日凌晨，各地暴动农民一万余人，开始分四路攻打信丰县城。暴动总指挥组织敢死队员裹着浸湿的棉被，冒着敌人的弹雨攀登城墙；用装满炸药的“棺材炮”爆破城墙。终因城墙高厚，守城敌军火力猛烈，而未能攻入城内。攻城战斗前后持续十天。

3月4日，被围困在信丰城内的国民党县长李枝萱、县保安队长王廷骥和正在城内祭拜祖庙的小河民团团总王覃勋一起策划，派人趁暗出城，向小河、大塘、安息、古陂等乡土豪劣绅送信求救。这些地方的土豪劣绅们纠集反动武装和地痞流氓三千余人，打着“保城”旗号，从背后向攻城的暴动队伍发起进攻，并乘乱从东门入城增援。城内敌人势力大增，即向城外攻城农民反击。攻城的暴动农民与敌人反复拉锯厮杀四天。3月8日，驻赣州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派出一个营进入信丰，向暴动农民进

攻。城内敌人乘机倾巢反扑。在腹背受敌的紧急时刻，暴动总指挥部下令撤退。参加暴动攻城的农民除小部分队伍随暴动总指挥郭一清等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外，其余返回各乡分散隐蔽。

（四）于都暴动

信丰暴动农民正在大举攻城之时，声势浩大的于都农民武装暴动也爆发了。

1927 年 11 月，中共赣南特委派特委委员萧韶到于都，向从南昌回来的原省农协常务委员丘倜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特委文件，宣布特委指定丘倜为中共于都中心支部书记。随后，于都中心支部连续召开几次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统一思想认识，作出了举行全县农民暴动的决议，开展了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两个月后，南乡里仁、西乡步前、罗坳和北乡桥头等乡村，建立十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百人，并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中共于都中心支部于 1928 年 1 月间发展为中共于都临时县委。为使暴动成功更有把握，暴动后能更好地坚持斗争，临时县委领导人丘倜、李英秘密前往赣南崇义县和湖南等地，寻找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以便获得枪支。为扩大暴动力量，丘倜还前往本县西乡，与当地三点会“龙头”接洽，动员三点会成员参加暴动队伍。

1928 年 2 月下旬，中共赣南特委向于都临时县委下达了“立即暴动”命令，要求暴动后立即向县城进发，夺取县城，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和工农革命军。临时县委立即在南乡里仁的水镜村寨子脑召开了西、南两处及城郊党支部书记和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对全县暴动作出部署，成立于都暴动总指挥部，由萧韶、丘倜和李英组成，同时分片指派专人负责指挥。2 月 29 日晚，于都南乡四千多名暴动农民在暴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分头向土豪劣绅家中进发，捕杀了大土豪陈洪礼、刘伯纯等人。土豪财产

全部没收，田契债约全部被焚。西乡暴动于3月2日凌晨分罗坳、步前、柑子下三片同时举行。参加暴动的两千余农民，捕杀了罗坳大土豪赖洪周、熊梦兰等人，没收了十几家土豪的财产。在里仁、罗坳、步前暴动胜利的基础上，暴动总指挥部随即组织西、南两乡暴动农民六千余人，分西、南两路围攻于都县城。城内驻有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两营兵力。暴动队员们勇猛冲锋，每次都被城内敌军击退。暴动农民牺牲十余人，两三百间房屋被出城反击的敌人烧毁。攻城战斗被迫停止，暴动受挫。

西、南两乡农民暴动受挫后，暴动领导人萧韶、丘倜、李骏、李晓峰、肖大鹏等，又相继转移到于都县北部的桥头乡，与钟声楼、朱学玖一起，领导桥头农民千余人，于3月23日举行暴动，前往攻打邻近的马安乡土豪劣绅把持的上宝土围。东固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应中共于都临时县委之请，专程前来协助暴动。暴动队伍久攻土围不克，只好大部转移到马安圩开展武装宣传。第三天，桥头土豪钟朝珍从于都县城搬来国民党军队一个营，向正在马安圩开展武装宣传的暴动队伍进攻。暴动领导人丘倜、钟声楼、朱学玖等率部分暴动队员转移至兴国县樟木山，第七纵队也返回东固。国民党军和土豪劣绅在桥头纵火焚毁农民房屋数十栋，劫走农民大批财物，还用毒烟熏死躲入桥头石山洞内的暴动农民十余人。

（五）寻乌暴动

寻乌县位于江西省最南端，与广东省平远、兴宁两县接壤。1927年秋冬，寻乌县在外地读书加入共产党的古柏、刘维卢、刘维锷等十余人陆续返回家乡，成立中共寻乌支部。他们创办了中山学校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将招收入校读书的学员作为革命骨干进行培养，并建立了革命组织“中山社”，还与遍布全县的三点会组织建立了联系。党支部在这两种组织中物色对象，

发展农协会员一万余人，在十余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党组织也迅速发展，1928年初成立了中共寻乌特区委，潘丽任书记。特区委根据江西省委和赣南特委暴动计划，紧张地进行全县农民大暴动的发动准备工作。

1928年3月25日，寻乌全县五万余农民在中共寻乌特区委领导下，分为县城、留车、南桥（牛斗光）、皇乡（菖莆）、龙图（中和）、城东（吉潭）六路，分别由刘维卢、刘维锣、古柏、钟锡球、潘叶煌、潘丽指挥，同时暴动。潘叶煌、古柏指挥的县城一路暴动队伍，攻占了县城，赶跑了国民党县长，捣毁了国民党县政府机关，打开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无辜百姓，还捕杀了县电报局局长顾仁轩。暴动当天，召开庆祝暴动胜利大会，宣布成立寻乌县革命委员会，推选刘维卢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其他五路暴动队伍，也分别在当地打土豪，分浮财。暴动农民占据县城三天后，逃出城外的国民党县长谢寅，在澄江请来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营长胡会汉率领的两个连，并纠集各区土豪劣绅武装及叶子崇的土匪武装潘满山部，向寻乌县城反扑。城内暴动武装不敌，被迫撤出县城，13名暴动骨干惨遭杀害。由于敌人反扑，各路暴动队伍原定到县城会合的计划无法实现，很快解散。古柏、刘维卢等召开紧急会议，安排暴动领导人和骨干分五路转移到外地隐蔽。刘维卢、刘维锣等暴动领导人在转移途中遇难牺牲。

（六）兴国崇贤暴动

八一南昌起义后，兴国籍共产党员陈奇涵、胡灿、肖以佐等回到兴国。1927年10月，他们联络在县内的共产党员黄家煌等召开羊山会议，决定在全县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租、抗债、抗税、抗捐、抗息）斗争。会后，还派出共产党员胡灿等打入地主豪绅的靖卫团，控制靖卫团武装；同时加紧争取三点会

武装力量。1928 年 4 月，中共兴国区委在长冈乡的冰心洞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举行武装暴动的有关事宜。5 月 11 日，在东固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协助下，共产党员谢云龙等领导农民揭竿而起，在靠近吉安、永丰两县边界地区的崇贤圩举行暴动，镇压了崇贤靖卫团总曾文绚和恶霸地主罗爵高、罗廉扬，没收了地主邹瑞槐家产，缴获邹家 15 支步枪、1 支短枪，当天宣布成立崇贤农民协会。同年 10 月 25 日，兴国县鼎龙靖卫团二十余人在共产党员张汉超等领导下也举行起义，镇压了当地土豪劣绅，给贫苦农民分了谷物。

赣南除上述农民武装暴动外，安远县茶梓圩贫苦农民在中共茶梓支部领导下，也于 1928 年夏举行武装暴动，镇压了当地的土豪劣绅。

赣西南农民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历时经年，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割据赣西南斗争的序幕。

第四节 闽西农民武装暴动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于 1927 年秋冬间传达到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及其所辖各县党组织。1927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福建各县党的负责人在漳州召开联席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会上决定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迅速发动和组织全省农民举行武装暴动。闽西各县党组织按照福建临时省委的要求，加紧了农民武装暴动的宣传发动和准备工作。

一 龙岩后田暴动

后田村位于龙岩县城南 10 公里，有 181 户居民。大革命失败后，龙岩县的农民运动，在邓子恢、郭滴人等领导下，不仅没

有停止，反而处于高涨状态，全县参加农协的农民发展到十万人。1927 年 11 月，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在后田村成立，不久又成立了中共后田支部。后田村农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日趋猛烈地开展起来。

1928 年春节后，后田村农民协会为平抑暴涨的粮价，采取行动，禁止地主富农多余的米谷出口。同年 3 月 4 日，村中土劣唆使走狗陈北瑞打死农民二人，还阴谋杀害农协负责人，激起农民公愤。当日黄昏，村党支部书记陈锦辉带领几个农协会员埋伏于后田店仔角边，一枪打死从地主家中出来的陈北瑞，后田农民暴动由此爆发。农协及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地主的阴谋和陈北瑞的罪行，限令全村地主当场将田契债据交出烧毁，并宣布废租废债，没收地主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农协还收缴了村中地主的武装，缴获步枪四支，鸟铳十余支和一批刀矛。3 月 5 日，暴动农民劈开地主粮仓，将粮食分给农民。3 月 7 日晚，龙岩临时县委决定扩大暴动规模，以后田农协名义召集白土乡农民四百多人举行联欢会，庆祝后田农民暴动胜利，推动全乡农民参加斗争。

受到打击的土豪劣绅不甘心失败，凑钱到龙岩县城请来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第一旅陈国辉部一个团兵力。3 月 9 日凌晨，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后田发起进攻。中共龙岩临时县委书记罗怀盛、县委军事部长陈品三率领一百多名农军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农军因武器简陋，兵力不足，抵抗不住进攻之敌，只得撤退上山开展游击斗争。国民党军占领后田后，全村六十余名暴动骨干和农民惨遭杀害。

二　平和暴动

闽南的平和县与广东省饶平、大埔两县接壤。1926 年 10 月，朱积垒在平和县长乐建立中共组织和农民协会，1927 年秋

成立了中共平和临时县委，下辖五个中共支部，有一千余农户加入农民协会。192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区农民代表二百余人前往平和县城开会成立区农协时，受到国民党县政府破坏，五位农民代表被捕入狱。中共平和临时县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乘此举行农民武装暴动，攻打县城。会上，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并决定成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还联系广东饶平、大埔农军前来支援暴动。

平和全县农民暴动于同年 3 月 8 日爆发。当日凌晨，千余名暴动农民在朱积垒率领下冒雨从长乐乡出发，浩浩荡荡向县城开进，早晨 6 时许向县城北门、西门同时发起进攻，一举攻入城内。城内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和反动武装慌忙从南门逃走。不久，负责攻打东门、南门的农军亦已赶到。各路农军入城后，打开县监狱，救出被捕农友二十余人。县公署和几家豪绅房屋被农军烧毁。逃至城外山上的敌军发现暴动农军入城后秩序混乱，战斗力不强，遂向县城猛烈反扑。暴动总指挥朱积垒因攻城时负伤，不能指挥农军应敌，加上农军火药大多被雨淋湿失效，城内农军抵挡了一阵之后撤出县城，回到各乡。驻漳州的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应平和国民党县长方日中之请，派出营长陈织率一个营兵力前往镇压暴动。长乐乡农民百余人与进攻之敌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撤退上山。敌军在长乐乡大肆烧杀抢掠，暴动农民遭受重大损失。暴动失败后，朱积垒率领部分暴动骨干与广东饶平、大埔农军会合，在平和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三　上杭蛟洋暴动

蛟洋位于上杭县东北部，是一个有五百余户、两千余人口的大乡村。该乡有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傅柏翠，早年

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代理常委。1927 年 9 月，傅柏翠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上杭县北四区（即蛟洋所在区）支部书记。他积极在家乡蛟洋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1928 年 3 月龙岩后田暴动失败后调到上杭县委任宣传部长的邓子恢也来到蛟洋，与傅柏翠一起领导农民斗争。傅柏翠带头从自己家开始减租减息，迫使其他地主也跟着减租减息，被豪绅地主把持的公堂财产也得到清算。农协还筹集资金购买单响步枪百余支，建立了农民武装。

1928 年 3 月间，闽西土著军阀郭凤鸣要蛟洋农民交纳数千元军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坚决抵制。郭凤鸣恼羞成怒，于 6 月 25 日派出驻上杭县城的钟铭清团两个营和驻连城县的罗藻补充团，围攻蛟洋。面对来势汹汹之敌，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慕亮和傅柏翠指挥蛟洋农民武装奋起抵抗。他们埋伏在敌军来路的山上，待敌近前时突然开火，给敌人以杀伤。但因农民武装用的都是单响枪和其他简陋武器，最终不敌敌军进攻，只得撤退上山。当日，郭凤鸣部占领蛟洋，随后烧杀抢掠三天。

蛟洋农民暴动失败后，中共上杭县委和傅柏翠等组织暴动农民一百多人，上山开展游击斗争。

四　永定暴动

永定县在 1926 年夏建立中共组织，1927 年 10 月 25 日成立中共永定县委，罗秋天任县委书记，张鼎丞等为委员。1928 年 3 月全县党员发展到两百余人。广大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协会和铁血团，与豪绅地主对抗。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永定县反动政府和豪绅地主的恐慌。他们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清乡委员会，策划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部署，中共永定县委决定举行全县暴动，推举

张鼎丞任暴动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为副总指挥。

1928年6月29日，暴动首先从湖雷乡发起。暴动队伍五百余人在乡间收缴民团武装，镇压地主豪绅十一人，焚毁田契债据。接着，暴动队伍开赴附近各乡。30日，在金砂赤竹坳店边集合的暴动队伍四千余人，肩抗土枪、土炮、梭镖、鸟铳，分三路前往攻打永定县城。7月1日清晨，县城被农军攻下，暴动农民涌入城内，直捣县衙和监狱。城内敌军凭着精良武器与暴动农民对抗。暴动农民无法打败敌军，激战几小时后，撤出城外，继续围困县城，拉锯三天未果，暴动农民方撤回各乡村。这次暴动虽未攻占县城，但极大地鼓舞了永定及邻县广大农民斗志，为溪南区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赣西南和闽西地方红军的创建

一 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的组建与活动

东固暴动胜利后，赖经邦等率领暴动队伍于1927年11月下旬由富田返回东固。附近的几支绿林武装纷纷前来投奔游击队。1928年2月，中共赣西特委决定将东龙游击队与永吉游击队合编，同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县部分工农青年，组建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纵队长吴江，党代表兼参谋长赖经邦。随后不久，纵队长改由段起凤担任，党代表詹天龙，秘书长曾炳春、柏金梧，参谋长赖经邦，军需长邓浩春、钟昌艾。全纵队共一百五十余人、八十余支枪，除纵队部四十八人外，下分四个区队：第一区队长梁人杰，指导员朱继武；第二区队长肖大鹏，指导员郭枚；第三区队暂缺；第四区队长杨金芳，指导员邓知非。

第七纵队成立后，以东固养军山为中心，积极向外开展游击活动，并与吉安县北部延福地区的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南北呼应，互相配合，打击反动势力。1928 年 3 月至 4 月间，“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已形成割据”①。

同年 5 月，江西省委为加强对赣西南革命斗争领导，决定在东固设立赣西南行动委员会，刘士奇任书记，萧韶、丘倜、詹天龙、赖经邦等为委员。同时赣西特委调第九纵队东渡赣江到东固，与第七纵队配合作战，随后成立了七、九纵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叶天雷，以加强对七、九纵队军事行动的统一指挥。② 6 月 30 日，第七纵队向兴国县枫边靖卫团进攻时，赖经邦不幸牺牲。

1928 年 7 月间，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等县靖卫团武装联合向东固根据地发动“五县会剿”。中共东龙区委和七纵队领导认真分析敌我形势，决定以敌进我退战术，组织七纵队和革命群众隐蔽在养军山上，使敌军找不到目标，然后寻机歼敌。敌军侵占东固后，四处骚扰二十多天，始终不见七纵队踪影，放出风声说要“招抚”七纵队下山。七纵队领导人将计就计，在东固圩给列队“欢迎七纵队”下山“受编”的敌军以猛烈的突然袭击。敌军措手不及，被打得四处溃逃。指挥“会剿”的敌军头目除吉安县县长邹松和吉水县靖卫团长郭子高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七纵队乘粉碎敌军“五县会剿”之势，积极向外扩展割据区域。

1928 年 8 月，东固第七纵队奉中共赣西特委命令西渡赣江，

---

① 《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朱毛红军发展情况》（1928 年 4 月 25 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 4 辑，1987 年，第 142 页。

② 丘倜：《于都农民暴动始末记》，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 4 辑，1987 年，第 213 页。于都县委党史办公室：《丘倜回忆录》（未刊稿）。

前往吉安县北部延福地区，与第九纵队一起联合行动，游击分宜、安福、新余各县。9月，中共赣西特委命七、九纵队开赴吉水阜田进行短期休整。为适应武装斗争需要，便于统一指挥，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奉命主持将七、九纵队合编，正式成立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段起凤任副团长，刘泽民任团参谋长，曾炳春任团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队队长。全团三百多人、一百六十余支枪，下设四个连、一个宣传队。

红二团成立后不久，驻吉安城的国民党军就向红二团发起进攻。红二团避实就虚，留下小部兵力在延福、阜田一带与当地农民武装坚持斗争，主力东渡赣江，12月10日攻占乐安县城，缴枪57支，毙敌6名，俘敌17名。随后经宁都、黄陂等地，抵达兴国县东村，与于都桥头的红十五纵队会合。在兴国县党组织密切配合下，红二团与红十五纵队联合作战，采用里应外合战术，于12月20日凌晨突然攻占兴国县城，俘敌三十多人，缴枪一百一十余支，逮捕了大批反动分子，释放了一百余名被关押的革命群众。此战胜利后，红二团发展到有枪四百余支。

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的成立，使赣西革命武装建设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以东固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区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割据经验后来被毛泽东介绍给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东固根据地的斗争模式被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并将其与“朱毛式”、“贺龙式”、“方志敏式”之根据地模式相提并论。

二 赣南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六纵队的创建及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的成立

1928年3月于都县桥头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暴动领导人朱学玖、钟声楼率领部分暴动农民转移到兴国县樟木山活动。随

后中共于都临时县委书记丘倜主持召开暴动领导人会议，总结暴动失败教训，对创建于都县的工农革命武装作出了部署。

同年4月初，朱学玖、钟声楼等人将桥头暴动农民组织起来，在兴国县党组织负责人黄家煌的指导配合下，在兴国县樟木山成立了桥头游击队。游击队设法向当地三点会租来14支枪，又动员兴国县东村三点会首领管开炳带领部属及13支枪参加游击队；还动员活跃在兴国、于都两县边界的三点会武装曾老四、李周宾、邱老七、宋开炳部加入游击队。5月，于都县西乡、南乡暴动领导人李骏、张文焕也分别带领西乡、南乡部分暴动队员转移到兴国县樟木山。6月，以桥头游击队为基础，正式组建成立了赣南第一支正规工农革命武装——赣南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不久后改称赣南红军第十五纵队），由管开炳任纵队长，朱学玖任纵队党代表，钟声楼任纵队参谋长。全纵队有二百余人和三十支枪。为适应斗争需要，1928年8月初，在桥头木鱼塘成立了中共于北特区委，雷振东（李骏）为书记；同时在桥头盘螺石成立了于北特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谢芳圣为主席；还成立了于北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钟声楼任主席。

在中共于北特区委和于北特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红十五纵队以桥头为中心据点，活跃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边界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和地主武装，扩大割据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使桥头红色割据区域发展到兴国、于都、宁都、瑞金、会昌五县边界地区。

1928年12月中旬，红十五纵队在兴国县东村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会合，20日配合红二团一举攻占兴国城。五天后，红十五纵队与红二团又在桥头的黄田脑、固石坑、琵琶垅等地，击溃分三路向桥头“进剿”的敌人，缴枪28支，保卫了桥头红色区域。

1929年1月8日，中共于北特区委以红十五纵队缴获的28支枪为基础，在兴国县磜脑成立以桥头农民为主体的赣南红军第十六纵队。钟先桐任纵队长，张文焕任党代表。兴国县党组织动员东村三点会头领曾老四带领部属加入红十六纵队后，由曾老四任纵队长，钟先桐改任参谋长，张文焕仍为党代表。全纵队约七八十人，枪六十余支。与此同时，兴国县崇贤、城冈、东村、莲塘等地，也先后组建起小规模游击队。

1929年2月上旬，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再次攻占兴国县城。2月12日，红二团与红十五、十六纵队在兴国县东村会合。2月13日，中共于北特区委书记李骏和红二团团长兼党代表李文林，共同主持三支红军部队和兴桥边界党员活动分子会议，讨论部队合编问题。2月15日，在红二团帮助下，红十五纵队、红十六纵队以及桥头、东村、城冈、莲塘等地游击队，合编成立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红十五纵队编为第一连，红十六纵队编为第二连，兴国县城冈游击队编为第三连，桥头、东村、坝子上的部分游击队编为第四连。红二团调出一百多名骨干充实红四团。全团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红四团团长段起凤，党代表金万邦，政治部主任鄢日新，参谋长刘泽民，士兵委员会主席黄志道。

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是在桥头红色割据区域组建的红军部队。它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一起，成为赣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地方红军主力部队，后来被毛泽东、朱德称赞为“钢军”，是中国人民军队早期的著名部队之一。乘红四团成立声威，桥头红色区域不断扩大，不久与东固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从桥头到东固约200里左右尽系赤色区域”[①]。

---

① 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167页。

除赣南红军第十五纵队、第十六纵队和红四团之外，从1928年秋到1929年初，赣南创建的地方红军部队还有赣南红军第十九纵队、第二十一纵队、第二十六纵队。

红十九纵队成立于1928年下半年。这年春天赣南各县农民武装暴动受挫后，安远县成为赣南东南部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罗贵波、廖贵潭、郭一清、兰广孚等共产党员，都曾到安远领导革命活动，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1928年下半年，安远版石的赤卫队员和信丰金鸡、新田的赤卫队员联合组建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十九纵队（后改称赣南红军第十九纵队）。纵队长兰广孚。1929年初在新田的一次战斗中，兰广孚壮烈牺牲，红十九纵队被打散。

红二十一纵队成立于1928年9月。寻乌县“三二五”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领导暴动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活动。在古柏等领导下，1928年7月间组织起一支短枪游击小组，由朱家珍任组长，邝任农任副组长。9月间，在寻乌县黄沙西云庵正式成立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十一纵队（后改称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钟锡球任纵队长，古柏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受中共寻乌县委领导。全纵队共三十七人，有单响枪十七支、短枪十支。纵队下设两个班和一个短枪小组。红二十一纵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队伍不断壮大，还配合广东东江红军刘光夏部攻打罗浮，缴获敌枪七支、子弹七八十发。至同年11月，二十一纵队发展到八十余人、四五十支枪，扩建为三个排，每排两个班，每班七至九人，另设有一个短枪队。1929年2月初红四军游击赣南途经寻乌，在吉潭战斗中陈俊等四位红军战士与部队失去联系后，也加入红二十一纵队。红二十一纵队开辟创建了寻乌县南部以阳天嶂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区域。1929年11月，该纵队编入广东东江红军总指挥部所辖之红五十团。

红二十六纵队成立于1928年11月。这年2月信丰县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暴动领导人郭一清、从允中、黄达等率领一部分暴动农民，转移到信（丰）、安（远）、定（南）三县边界的龙塘、鹤子山区。这一带居民郭姓居多。郭一清利用郭姓身份开展活动，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7月，郭一清领导建立龙塘游击队和鹤子游击队，分别有队员一百余人和六十余人。两支游击队都筹措到一些经费和一批枪弹。11月，根据中共赣南临时特委指示，郭一清从龙塘游击队和鹤子游击队分别抽调一批骨干，加上信丰县一部分暴动武装，在定南县龙塘墟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六纵队，郭一清任纵队长，黄达任纵队党代表。下辖两个中队，每中队各有六十余人、枪。红二十六纵队组建后，在信、安、定三县边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建立了三县边界红色割据区域。1929年1月底红四军游击赣南至龙塘时，与红二十六纵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红二十六纵队的帮助。

三 闽西永定红军营和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的建立

1928年7月4日，永定县溪南里参加暴动攻打县城的农军回到金砂后，中共永定县委从参加暴动的队伍中挑选二百余人，在金砂金谷寺成立了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营党代表。下设三个连。这是闽西最早建立的地方红军部队。永定县委还将溪南里各乡18岁至45岁男性青壮年贫苦农民编成13个赤卫队，共三百余人。永定县上湖雷和金丰等地参加暴动的部分农民武装二百余人，在中共金丰区委领导下，也整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永定农民自卫队，由熊振声任队长，卢肇西任党代表，江德贤任政治部主任。永定红军营和赤卫队积极开展活动，抗击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对暴动地区的进攻和报复，保护暴动农民生命

财产安全。

永定暴动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加强了对闽西革命斗争的领导。1928 年 7 月 15 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特派员王海萍，在永定县金砂古木督崇德楼主持召开了上杭、永定、平和、龙岩四县县委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郭慕亮任书记，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同时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王海萍任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任副总指挥。会议决定将上杭、永定、龙岩的暴动武装整编，成立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下辖三个团：龙岩白土和上杭蛟洋的暴动武装编为第五十五团，团长傅柏翠，党代表陈锦辉；永定金丰、上湖雷的武装编为第五十六团，团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永定溪南里的武装编为第五十七团，团长张鼎丞，党代表邓子恢。

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成立后，立即向四周的白色据点发起进攻。红五十五团由傅柏翠率领开赴永定坎市、高陂、培丰等地，帮助举行太平里农民武装暴动，8 月 5 日又帮助举行龙岩白土暴动。8 月 6 日，杭永岩边三县暴动武装六百余人由王海萍、傅柏翠指挥分两路进攻龙岩城，攻城受挫后于 8 月 8 日转向进攻驻坎市的国民党军陈国辉部，再次受挫，伤亡甚多，余部只得撤回永定金砂与张鼎丞、邓子恢部汇合。随后，张鼎丞、傅柏翠率红五十五团、五十七团开赴丰稔一带，帮助当地农民举行暴动。8 月下旬，第五十六团、五十七团由张鼎丞、熊振声、卢肇西率领，攻打了古竹、岐岭、下洋等地反动民团，还向平和县五坎地区出击，开展革命宣传。但是，由于敌军不断向暴动地区“清乡”，红军集中行动又缺乏军事指挥人才和武器弹药，难以抵御敌军的进攻；红军成员又都是初次组织起来的农民队伍，恋家心切，不愿远离行动。根据这些实际困难，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决定暂时采取退却策略，停止大规模武装斗争，各县队伍开回本地坚

持斗争。红军第十九师虽暂时解散，但其队伍后来成为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的骨干力量。

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武装的组建和革命武装斗争的初步开展，为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揭开了序幕，也为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维埃区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章

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

第一节　红四军出击赣南，进军闽西

一　红四军出击赣南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出击赣南，不仅使赣西南和闽西的武装割据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果断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到罗霄山脉中段，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又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军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军党代表、王尔琢为军参谋长、陈毅为军士兵委员会主任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同年11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中共前敌委员会和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成立。12月10日，平江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四、五两个纵队，在军长彭德怀、军党代表滕代远率领下，也来到宁冈县新城，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力量迅速壮大，发展到六千余人。

1928年12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政府调集重兵18个团约三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此时，井冈山根据地除四面被敌军重兵包围外，又遭冰雪封冻，给养困难，弹药缺乏，经费告罄。为粉碎敌军“会剿”，解决给养困难，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采用“围魏救赵”战术，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出击，吸引“会剿”敌军至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围；另由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及边界各县地方武装，坚持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并从红四军中抽调出一批在边界军民中有一定威信的军事、政治干部如张子清、何长工、陈毅安、徐彦刚、李克如、游雪程、陈伯钧等留在边界领导斗争。

出击赣南的红四军主力有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军独立营、特务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一千五百余支枪。鉴于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尖锐，为有利于坚守和保卫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决定将原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原中共宁冈县委书记刘辉霄调任前委秘书长，随红四军出发赣南，另任命何长工任红三十二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随红四军行动的边界前委，改为中共红四军前委，为红四军最高领导机关。前委设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指导出击赣南途经各地的工农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陈毅主持起草印制了通俗易懂的四字文体《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共产党宣言》，供沿途张贴散发，宣传阐述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

1929年1月13日，准备出击赣南的红四军各部在茨坪小行洲集结。14日凌晨，全军从小行洲出发，顺着通往遂川县大汾的羊肠小道，冒风踏雪，攀藤附葛，艰难地突围前进。15日午后3时许，在大汾击溃遂川保安团阻击，部队折向赣南，1月17

日到达上犹县营前圩。当晚，毛泽东和朱德在象牙村陈屋召集上犹县党员开会，了解情况。18 日，全军进抵崇义县城，打开县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工农群众。当晚，毛泽东与朱德一起在县城张家祠召集崇义部分党员和师训所进步青年座谈，讨论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问题。20 日，军部工农运动委员会在崇义县城城隍庙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演讲，号召群众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政权。

二　大余城受挫

1 月 21 日，红四军离开崇义，按预定计划经崇义县铅厂、义安，23 日顺利进占大余县城。入城后，红四军前委和军部机关驻县城老城天主堂内；二十八团布置在城东北金莲山下，警戒赣州方向敌人；三十一团占据城西高山监视崇义方向来的敌人；军独立营、特务营驻城内保卫军部机关。当天上午，前委在老城西街吕屋召开全军排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工作任务；下午在县城中山桥下游章江南岸的河坝上举行军民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当晚，红四军前委在老城天主堂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决定在大余、信丰、南康一带与追赶而来的国民党军作战，以消灭敌人，实现“围魏救赵”计划。与会者对应敌方案发表了很多意见。深夜举手表决，大家同意在大余应敌。但是，毛泽东和朱德对大家的意见未作最后决策，只作一般布置，便宣布散会。

其实，红四军从茨坪出发向赣南出击当天，敌人即已发现红四军主力行踪。敌“会剿”总指挥部急令进到遂川县城的第一路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并指挥驻赣州的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原独立第七师改编）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和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第六十八团，追击红四军主力；命令第五路军先头部队

第五十五旅，由湖南资兴直插桂东桥头进行截击和追击；并电请粤军出兵大余堵击。敌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曾在遂川与红军交战中获胜，敌旅长李文彬骄横狡诈，得令后率全旅抄近路向赣南追赶，1月23日即已进至大余县新城、池江一线，当晚其先头部队悄然占据大余城东北的制高点天柱山、惜母岭，准备次日一早向城内红军发起突然袭击。

负责警戒赣州方向敌军的红二十八团团长林彪，23日晚散会后未执行军部命令，向赣州方向的池江、新城一线派出警戒部队。待24日晨红二十八团集合开早饭时，早已在天柱山、惜母岭制高点架起机枪的敌军，突然向驻守金莲山的红二十八团三营十一连猛烈扫射。该连连长一边指挥部队抵抗，一边派人向林彪报告敌情。林彪断定进攻之敌是李文彬第二十一旅，组织红一连抵抗了一阵，发现敌人兵力数倍于己，火力强大，便命红十一连继续抵抗，自己返回团部，与党代表何挺颖商议，要组织全团撤退。何挺颖深知此战关系重大，坚决反对擅自撤退，亲自带领部队向敌军发起猛烈反击，刚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就身负重伤，被几个战士抬了下来。部队一时失去指挥，纷纷后退。身为团长的林彪此时不仅未指挥部队反击，竟然跟着溃退的部队往后撤。

此时，红四军军部工农运动委员会成员和部分部队已分头出发，到城内街巷和城外西华山钨矿做群众工作，陈毅已去到街巷中，朱德已前往三十一团阵地。刚起床的毛泽东和陈毅听到东城外枪声激烈，立即前往了解情况，严厉批评并阻止了林彪擅自后撤的行为。危急时刻，朱德军长从三十一团赶回军部，立即组织军独立营赶赴东门外向天柱山上的敌军反击。三十一团团长伍中豪也带领部队迅速控制县城东面制高点，掩护军部和辎重队伍向城南撤退。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与敌激战至下午，虽未将敌打退，但为集合做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时间。战斗中，独立营营长张

威牺牲。在三十一团掩护下，军部和二十八团撤出城外，各部向预先指定的集合地点广东省南雄县乌迳镇转移。仓促慌乱中，军部工作人员跟随三十一团机炮连及二十八团被打散部队行动；毛泽东、朱德与前委机关及军部机关已失去联系，只得随三十一团撤退；三十一团与二十八团也失去联系。当晚转移途中，三十一团主力在南雄县平顶坳遭到追赶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十五旅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袭击，营长周舫牺牲，重伤在身的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坠马牺牲，在大余县筹得的一万余元现洋也丢失了。

1月25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在南雄县乌迳与军部机关及二十八团取得联络。可是当晚在乌迳宿营时，乌迳民团和国民党军第十五旅又追赶而至。半夜时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部队紧急突围。突围时，军参谋长袁文才和前委秘书长刘辉霄等人竟不辞而别。后来袁文才一行返回井冈山。

乌迳突围后，红四军踏着积雪摸黑沿赣粤边境向信丰县方向前进，饿着肚子连续行军作战十几个小时，1月26日抵达信丰县崇仙，击退当地民团，停下休息。在此，前委得悉安远、定南、信丰三县边境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27日凌晨，部队遂经龙南县东坑向这一地区前进。沿途所经之地到处是地主豪绅的土围（当地人称之为“围龙屋”）和民团。红军不断遭到袭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寒冷彻骨，薄衣单衫，赤脚行军，鲜血淌地，到了最为困难的境地，却没有人叫苦脱逃，大家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毛泽东、朱德与大家一样饿着肚子行军，他们的坐骑都让给伤病员骑乘。1月29日，红四军到达定南县月子岗，后卫部队与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十五旅先头部队激战，掩护主力于30日赶到定南县龙塘圩，与在这一带活动的赣南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取得了联系。通过与红二十六纵队纵队长郭一清和纵队党代表黄达交谈，毛泽东、朱德初步了

解到当地情况。为使疲惫至极的红军部队得到休息补充，以振军威，毛泽东、朱德决定攻打安远县城。红二十六纵队奉命牵制敌军，红四军当日向安远城方向前进，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去信中共安远县委书记罗贵波，要求县委立即组织群众武装暴动，配合红军攻城。

罗贵波接到毛泽东的指示信后，连夜召开县委会议研究部署。县委一面派出人员将所有能组织的群众都武装起来，组成暴动队，一面派县委领导人魏宗周前往迎接红四军。魏宗周赶到安远县南部孔田圩时，得悉敌军几个团与当地地主民团已准备在孔田北面的太平圩夹击红四军。他立即找到红四军军部，将情况向毛泽东、朱德报告。红四军军部只得改变计划，由红二十六纵队党代表黄达带路，改道向寻乌县方向前进。

三　圳下村溃败

1929年1月31日，红四军抵达寻乌县菖莆圩，与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兼红二十一纵队党代表古柏取得联系。古柏等向毛泽东和朱德汇报寻乌和赣南革命斗争情况，建议红四军转向寻乌县项山罗福嶂，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中找一个落脚点。根据古柏建议，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直奔罗福嶂，经留车、青龙、双茶亭，当夜宿营于吉潭圳下村。毛泽东与前委机关住在村中围上大屋，朱德与军部住在村中文昌阁，前卫红三十一团与后卫红二十八团相距约四公里。

2月2日凌晨，前卫红三十一团已经出发。因后卫红二十八团团长林彪违反规定，不等军部开拔就已撤哨，开始移动，导致尾追而来的敌刘士毅第十五旅先头部队，突然向驻在圳下村中的红四军军部发起攻击。毛泽东和前委机关人员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毛泽东与贺子珍、谭震林、陈毅等一起，指挥部队冲出村

子，方脱离险境。

住在村中文昌阁的朱德军长，也提着冲锋枪与警卫排一起，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来。跟随朱德一起突围的军长夫人伍若兰，腿部中弹，负伤倒地，不幸被俘，后被押解至赣州。她坚贞不屈，2月12日在赣州城卫府里被国民党军杀害。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宣传科长毛泽覃，也身负重伤，幸而突围。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听到后面枪声紧密，赶紧回头接应。此次遇袭，使红四军至当日中午仍溃不成军。毛泽东和朱德只好和三十一团、军特务营和独立营部队，按预定目标，前往项山罗福嶂。

从大余受挫到圳下溃败，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途中饥疲困顿，损兵折将，全军“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去联络）”①，十分狼狈，原定“围魏救赵”计划亦无法实现。诚如毛泽东是年3月20日给中央报告所言：“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②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红四军在大余县城时对敌情了解不够，前委对应敌部署不周密果断；二是二十八团团长林彪连续两次失职疏忽，难辞其咎。

四　罗福嶂应变

红四军圳下突围后，当日深夜才在罗福嶂聚首，相互取得联络。

面对红四军所处困境，2月3日，毛泽东在罗福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全军向吉

---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8页。

② 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安东固前进，设法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联系，先休整补充，再寻机打回井冈山。（二）为便于机动应对局势，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建制，原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分别改为第一、三纵队，军独立营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三）鉴于眼下局势严峻，部队随时有被敌打散的可能，决定军部领导人分别随三个纵队行动，分工是：陈毅与林彪带一纵队行动，朱德随二纵队行动，毛泽东随三纵队行动；行军时三个纵队分头行动，以便互相照应。（四）确定了应付最困难局面的办法，就是万一部队被打散了，可以回大城市彼此用化名登报联系，并确定毛泽东化名为“杨子任”，朱德化名为“王楷”，其他领导人也都各自确定了自己的化名。（五）为减少层次，便于机断，决定撤销红四军军委，将一切权利集中于前委。毛泽东在会上一再强调，全军前进方向是经瑞金、宁都到吉安东固，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实行分兵行动计划。①

五 大柏地鏖战

前委罗福嶂会议将近结束时，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匆匆赶来报告：国民党军队已从四面合围过来。毛泽东和军部决定全军按此次会议决定立即向东固前进。由于敌情紧迫，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部队整编和各纵队分兵行动计划，来不及实行。2月4日部队从罗福嶂出发时，全军仍按原编制、番号统一行动。

红四军离开罗福嶂后，沿着赣闽边界崎岖山道前进。当晚，在寻乌县罗塘再遇国民党军刘士毅第十五旅阻击，遂折向福建武平县东留、太阳桥，然后转入会昌县东部的河头、半迳。2月7日红四军抵达瑞金县拔英、武阳一带，渡过绵江。2月8

① 《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内刊稿），1971年10月下旬。

日下午，据守瑞金城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第二旅郭凤鸣部一个营闻风而逃，红二十八团绕过县城进抵瑞金县北大柏地，红三十一团进占瑞金城，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和独立营、特务营在瑞金城外击退追赶而来的敌军后，宿营于黄柏圩。当晚毛泽东从贺子珍与张宗逊带领部队从瑞金城内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中查明，追赶而来的敌军系国民党军第十五旅刘士毅部第二十九、三十两团。

2月9日，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和独立营、特务营进至大柏地王家祠宿营，红三十一团为右路从瑞金城出发绕道进抵大柏地王家祠北边为前卫，红二十八团宿营大柏地麻子坳为后卫。2月10日，正是农历除夕。按军部命令，当天全军应从大柏地出发向宁都县城方向前进。清晨，被敌人追得疲惫不堪的前卫红三十一团正要出发时，不料该团三营党代表和营长陈明代表全营向军部请战，誓与追敌刘士毅部“决一死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军情变故，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商研对策。朱德已仔细观察过大柏地地形，发现大柏地麻子坳狭长10华里，两边峰峦叠嶂山林茂密，仅沟底一条小路向北可通宁都，是打伏击的好战场。毛泽东亦认为，追敌刘士毅第十五旅是红军的老对手，兵骄将傲，却不经打。红四军自下山以来被这股敌人追得筋疲力尽，将士们对该敌恨得咬牙切齿，求战心切，斗志高昂，士气可用。于是，会议果断作出决定：誓死打好这一仗，以振军威。会上当即部署，兵分三路：三十一团及军特务营占领麻子坳东侧山头设伏；二十八团三营在麻子坳西侧制高点占领阵地，一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二营在敌来路上诱敌进入伏击圈，并占领有利阵地，阻击敌人前进，掩护主力展开；军独立营和直属队为预备队，随军部行动。

当日上午，各部分头行动。此时，大柏地村中的老百姓因对

红军不了解，已逃避一空。部队已经一天未吃饭，饥饿难耐。有人建议让部队先动用村中百姓的粮食和食品，算清价钱，留下欠条，待以后如数归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部队吃了一顿饱饭，精神抖擞。

2月10日下午2时许，追敌刘士毅部第十五旅先头部队与红二十八团二营接触，战斗打响。二营营长萧克和营党代表胡世俭，命令部队故意将行李摆放路头，与敌人打一阵，退一阵，佯装败退，将敌人大部队诱入预设伏击圈。随后，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顶住敌人前进。战斗中，营党代表胡世俭负重伤牺牲。当晚，红军与刘士毅部在大柏地对峙。

2月11日，正值大年初一。上午9时许，敌人全部进入红军口袋。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大柏地十里狭谷枪声大作，杀声震天。红军将士们向敌人猛烈冲击，展开肉搏，朱德和毛泽东亲自率部与敌搏斗，战斗之激烈前所未有。陈毅后来描绘这次战斗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① 战斗至中午胜利结束。清点战果，追敌两个团全部被歼。红军共毙、伤敌三百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敌军两团长肖致平、钟桓亦被俘，只是他们混在俘虏中未被认出获释而脱逃。敌第十五旅残部狼狈逃回赣州。另一部追敌李文彬第二十一旅闻讯惧歼，龟缩于会昌、于都一线，不敢再追。红军打扫战场，将缴获的好枪留下，坏枪统统丢入小河深潭中。

---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报告（一）》（1929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55页。

大柏地战斗获胜，彻底扭转了红四军自井冈下山转战赣南一个多月来的失败情绪，重振了四军雄风，扩大了红军影响。这次战斗的壮烈情景更让毛泽东难以忘怀。1933 年 6 月，毛泽东尽管受到王明“左”倾领导者排斥打击，心情郁闷，可他从宁都开完中央局会议返回瑞金停宿大柏地时，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吟出《菩萨蛮·大柏地》词一首：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大柏地战斗前红军借用群众的粮食、食品留下的欠条，也在 1929 年 5 月中旬红四军东进入闽重返该处时全部如数兑还给群众。大柏地群众无不称赞红军严明的军纪。

红四军在大柏地欢度新年后，1929 年 2 月 12 日经宁都县对坊、长胜北进，13 日上午进占宁都县城。驻守宁都城的地方军阀赖世琮团早已闻风而逃。中共宁都区委负责人王俊等获悉红军已入县境，火速从乡下入城，带领县城各界代表赶往县城南面的石榴排村迎接红军。红四军入城后，在宁都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筹得现洋五六千元，草鞋、袜子七千余双，棉布三百余疋。红军还派人到城外打土豪，筹集了一批粮食。

六 东固山会师

1929年2月14日，红四军经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2月16日到达永丰县南部的龙冈圩。

1929年2月17日，李文林引导红四军进抵东固的南垄宿营。18日上午，红四军在南垄河边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了纪律，下午移师东固圩，受到东固根据地人民热烈欢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也已赶到东固螺坑。2月20日[①]下午，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螺坑的石古丘河坝上举行盛大的会师大会。李文林向红二、四团官兵逐一介绍红四军领导人，红二、四团官兵鸣号举枪致敬。毛泽东、朱德先后登上用四张八仙桌拼成的讲台，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们从井冈山出发，天天讲要到东固去见红二团。过去我们四军有同志还不相信有红二团呢，现在见到了，没有吹牛吧！"[②] 他称赞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朱德对红二、四团官兵说："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了'朱毛'了！"陈毅为庆贺两军会师，即兴赋诗一首：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会师后，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一批银元和弹药；红四军向红二、四团赠送了两挺机枪、一门迫击炮。东固人民送粮送

① 关于红四军与红二、四团会师日期，有2月18日说、2月20日说、2月22日说。据笔者访问东固螺坑时当地老同志回忆，红四军与红二、四团会师是1929年农历正月十一，即公元1929年2月20日。这里采用此说。

② 据东固南龙水西村老人谢祥海回忆。

菜，送鱼送肉，热情慰问红四军。红四军在东固得到休整补充。毛泽覃、李天柱等三百余名红四军伤病员被安置在东固三彩红军医院和桥头根据地治疗休养。中共红四军前委与中共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1929 年 2 月 23 日，在东固螺坑的云汉堂，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赣西、赣南、红二团、红四团及兴国、于都、吉安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详细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详细听取了东固革命斗争情况汇报，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要求。前委对全军整编问题，再次进行了研究。

“东固会师”使红四军和红二、四团及东固人民的革命斗志受到极大鼓舞，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倍增。东固根据地成为红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征程中最重要的加油站。

七　长汀城整编

按原定计划，红四军在东固休整补充后就准备打回井冈山去。可是这期间毛泽东和朱德从赣西特委送来的情报中，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彭德怀、滕代远已率守山的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前来赣南游击。同时，得悉驻吉安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张与仁部和从于都县追来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已向东固逼近。前委认为，东固地形民情条件虽好，但红四军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红二、四团也未与大股敌军交过火，缺乏战斗经验，红军不宜与敌人大战。毛泽东已从东固根据地领导的汇报中了解到，东固红军实行秘密割据，经常采用“打圈子”策略与敌周旋。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遂决定率红四军离开东固，向闽、赣边境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游击，相机寻找落脚点。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则留在东固地区活动，保卫根据地。

1929 年 2 月 25 日，红四军从东固出发，经永丰县藤田、乐安县招携，3 月 4 日进占广昌县城。然后经广昌县赤水、石城县

观下，3月9日抵达瑞金县壬田镇。当日得知尾追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忽然掉头西返。为免遭敌暗算，红四军于3月11日离开壬田镇挥师东进福建长汀县，12日抵达该县南部的四都。当晚，军部得悉驻守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已派出一个团前来四都，另派一个补充团驻守长岭寨，扼守四都通往长汀城之要地。毛泽东、朱德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主动向敌出击。13日上午8时许，红四军分三路向敌发起猛攻，在渔溪将敌一个团歼灭过半。残敌仓皇向长岭寨逃窜。红军乘胜追击至长岭寨下的陂溪村，才停下宿营。

3月13日下午，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赶到陂溪村，向毛泽东、朱德等汇报了闽西各县革命斗争情况，介绍了郭凤鸣部现状，并告知长汀党组织已在郭部建立了秘密组织，可充做内应。毛泽东当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次日凌晨向据守长岭寨的郭凤鸣部发起攻击，歼敌夺占长汀城。

14日凌晨，红军分三路向长岭寨进发，上午8时发起总攻。据守山头的敌一个团很快被打得四散逃跑。敌旅长郭凤鸣和一团敌兵在山下梁屋头村闻听山上枪声大作，忙组织兵力向山上红军冲锋。红军居高临下，打得敌军抱头鼠窜，抓住时机向敌军发起全线冲杀。敌军两个团迅速被全歼。红军俘敌两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五百余支，迫击炮三门，炮弹一百多发。郭凤鸣在指挥所部向红军攻击时左腿中弹负伤，由两名勤务兵搀扶着逃至牛头村栗树园中的茅坑内躲藏，后被打扫战场的红军战士搜出，红二十八团连长王良一枪将其击毙。

当日下午，红四军抬着敌旅长郭凤鸣的尸体，押解着俘虏群，浩浩荡荡进占长汀城。前委和军部机关驻县城水东街汀江巷辛耕别墅，红四军各部分驻城内及城郊各乡。

15日，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在县城南寨广场召开军

民大会，欢庆长岭寨战斗胜利。会后，毛泽东在长汀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广泛深入了解长汀社会各界情况。红四军各部在城内外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发动贫苦群众起来打土豪，闹革命，发展党员，建立工会，帮助成立了中共长汀县委、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和长汀县赤卫大队。

在长汀期间，红四军按照前委罗福嶂扩大会议决议，完成了全军整编任务。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二十八团第一、二营组成，纵队长（不久后改称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第二纵队由原军部独立营、特务营和二十八团第三营编成，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第三纵队由原三十一团组成，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每纵队（相当于团）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支队辖三个大队（相当于连）。由于沿途吸收了部分俘虏兵并在长汀城招新兵 300 人，全军已恢复到 3600 人、1500 余支枪，每纵队约有 1200 人、500 支枪。“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①] 军部领导机关得到健全，成立了军政治部，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1929 年 5 月改由军党委书记刘安恭兼任，同年 6 月又改由陈毅担任）；各纵队也成立了政治部，从而大大加强了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由于原军参谋长袁文才和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已离队，军参谋长改由朱云卿担任，前委秘书长改由江华（黄春圃）担任。

红军在长汀城没收了军阀郭凤鸣的一个小型军服厂，又筹集到军饷现洋五万元和一批布疋。红四军每人发了四元零用钱，官长、士兵、俘虏兵一律平等待遇；赶制了 4000 套列宁装式样、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4 月 5 日于瑞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78 页。

佩有红领章的灰军装和红五星八角军帽、灰布绑腿，每人发了一套，使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首次统一了着装。全军整编和统一着装后，在长汀城南寨广场举行建军以来首次阅兵式。女红军们还乘坐汀州城唯一的一辆老式木炭汽车，随着游行的红军队伍绕汀州城一周，让巾帼英雄们大开了眼界。①

长汀城内有一座英国传教士创办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和红军，乐于救死扶伤。1927 年 9 月南昌起义军途经长汀时，起义军中的三百余名伤病员就曾得到福音医院的救治。此次红四军进占长汀后，傅连暲对在长岭寨战斗中负伤的三十余名红军重伤员又给予精心治疗，还为毛泽东、朱德等检查了身体，为红四军全军指战员种了牛痘。福音医院从此成为不挂牌的红军医院。

八　辛耕别墅决策

在长汀期间，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通过报纸得悉，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之间冲突日益紧张，大战在即。同时查明：在江西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之所以突然掉头西返，就是回去参加蒋桂军阀混战。面对这一局势和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的客观实际，为研究确定红四军下一步发展方向和行动方针，1929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红四军应趁蒋桂军阀大战之机，马上开回江西，接近蒋桂军阀战区，乘机夺取敌军辎重，并促使蒋派失败，红军改编他的军队，不如此错过了机会，在军阀混战中红军得不到什么好处是很可惜的。第二种意见

① 《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2 页。

认为，“所谓接近战区，是一个单纯军事阴谋，至多不过得些枪械”。“因为敌人大的集团军事行动，不见得我们的部队就会有左右他们战局的能力，尤其在两个军阀混战的当儿，我们不能有帮助一个敌人来打倒一个敌人的昏想，这个思想是机会主义的遗留，最足混乱我们阶级的政治立场”。这种意见认为蒋桂军阀混战客观上可以帮助革命势力的恢复与发展，但不能估量太过，只能说是为革命势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时机，“在此时期工作，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群众斗争，揭穿国民党的黑幕，号召群众起来，以组织的力量争本身利益，并反对军阀混战”。①

毛泽东完全赞同第二种意见。经过热烈讨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具体的行动计划是：“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②

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的上述决定，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这个战略决策，确定了赣南、闽西

---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83 页。

②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20 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7 页。

二十余县为红军和苏维埃发展“前进的基础”，勾画了未来中央苏区“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发展趋势和蓝图。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前委作出了这一战略决策，红军才得以开辟和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才有了坚实的“前进的基础”，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维埃区域乃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得以在这个坚实基础上构筑和建立。

汀州前委扩大会议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作出，表明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的思想较之井冈山时期又有了新的深化和升华。

第二节 红五军井冈山突围游击赣南与红四军会合

一 红五军井冈山突围

红四军原计划于1929年3月底或4月初返回“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恰在这时，毛泽东、朱德接到一位农民从瑞金送来的急信，得知从井冈山突围前来赣南游击的彭德怀率红五军已到了瑞金。于是，红四军按原计划于4月1日离开长汀东返瑞金，当日与红五军在瑞金城会合。

红五军是1929年1月30日从井冈山突围的。此前，按照红四军下山前柏露会议决议，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指挥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当时编为红四军十团）和红四军三十二团（袁、王部队）对保卫井冈山作了周密部署。1月26日，湘赣两省敌军开始向井冈山发起猛攻。29日晚，湖南敌军爬小路上山攻破黄洋界哨口，30日晨又攻破八面山哨口。守山红军与敌展开浴血搏斗，虽毙伤敌一百余人，自己亦伤亡七八十人，且弹药告罄。危急时刻，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根据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

军军委在井冈山联席会议的决定，“五井如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四军取联络”①，彭德怀、滕代远即于1月30日晚率领红五军四五百人、遂川县赤卫队与留在山上的赤卫军教导团及伤病员等共一千余人，从荆竹山冲出五井，向遂川方向突围。湘赣边界特委机关人员亦随红五军突围至遂川边境隐蔽，但很快被搜山敌军冲散；王佐率红三十二团转入深山，与敌周旋；何长工等则指挥边界地方武装分散各山区，与“会剿”敌军展开游击战争。

红五军下山后，在遂川大汾与敌激战，随军突围的赤卫队及伤病员全被打散。红五军五百余人向赣南突围，2月6日在崇义县思顺与国民党湘军第五旅一个团再次发生激战，7日到达崇义县麟潭又与敌战，随后转入崇义县稳下，9日到达大余县新城周屋村。因连日昼夜征战，指战员们包括派出去的哨兵都已极度疲劳，晚餐后全部倒头昏睡，唯有彭德怀军长摸黑独自在村中巡察。10日凌晨，四个营的国民党追兵赶来，枪声夹杂着除夕的爆竹声响成一片。彭军长赶紧叫醒熟睡的哨兵紧急吹号，命令部队抵抗。激战三个多小时后，红五军且战且退，转移到南康县龙回。清点人数，只剩下283人，另有200余人不知去向（后来查明这些人在混乱中与军部失去联系，由大队长李光带领转移到了广东省南雄县境，被敌击溃，李光也英勇牺牲）。当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剩下的队伍从信丰县牛冈圩附近渡过桃江，继续东进。2月15日在信丰县石背圩与敌军一个团遭遇激战后，经安远县重石、会昌县乱石（今于都县靖石）、西江，2月底到达

① 《中共湘赣边特委向中共江西省委并转中共湖南省委的综合报告》（1929年3月17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瑞金县瑞林寨，与中共于北特区委取得联系。于北特区委书记李骏闻知，立即前往迎接红五军到了桥头根据地。桥头居民热烈欢迎红五军到来，主动为红军侦察敌情，准备向导，还替红五军购买了近千发子弹。因敌军追来，李骏等人又带领红五军转移到兴国县茶岭，继续休整。

彭德怀、滕代远和中共于北特区委领导人一起，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采纳于北特区委领导人钟声楼的意见，以突然奔袭方式攻打于都县城。3月5日晚，彭德怀、滕代远与钟声楼率领红五军与桥头地方武装五百余人，急行军一昼夜，于6日深夜抵达于都城郊。于北特区委派出的先头部队已收集了登城的楼梯，并派人潜入城内。7日凌晨3时，红军突击队分四路翻越城墙，打开县城北门，部队猛扑城内，经激战后全歼敌第十五旅一个补充营和县靖卫团、县警备队七百余人，赶跑了国民党县长，击毙了县公安局长，放出了关押在狱中的全部革命群众；缴获步枪约四百支，轻机枪两挺，子弹几十担，筹得现洋两千余元。

为防敌人反扑，红五军和于北地方武装于当日下午3时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全部撤出县城，转移到城南15公里的小密村宿营。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热烈慰劳红军。彭德怀拨出一百多支枪给当地党组织发展地方武装。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在于都县城邮局收集报纸时因枪走火负重伤。彭德怀将他安置在小密村隐蔽治疗，同时留下的还有红五军参谋长邓萍等伤病员。

3月8日拂晓，彭德怀率红五军离开小密村，经于都县小溪到达赣县牛岭村。钟声楼率于北地方武装返回桥头根据地。红五军在牛岭村休整近十天，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当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随军行动的一百余名俘虏兵经过教育后也加入了红军。

3月中旬末，红五军从牛岭出发，奔袭近二百里，突然攻占安远县城。安远县靖卫团不甘失败，威迫近万名农民连续三天三面

围城反扑。红军一面向围城农民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一面派出两个大队突击城外，打死靖卫团丁数十人，还故意让几百农民进城，将没收地方豪绅的财物发给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后，围城农民提高觉悟，自动解散，有两三百人还自动报名参加了红军。红五军占领安远城十天，放出在狱“犯人”，赶制了军衣，筹措了经费。这期间，中共安远县委派杜隆奎入城，向彭德怀军长汇报了全县情况。彭军长了解到县委活动经费困难，全靠砍柴烧炭卖维持生活，便拨出现洋两百元和一部分缴获的烟土给安远县委作活动经费。杜隆奎退回了银元，留下了烟土。他对彭军长说，我们砍柴烧炭卖可以维持生活，银元退回红军作军费，烟土我们收下变卖后，买一台油印机印刷宣传品。彭德怀深受感动，后来在湘赣、湘鄂赣苏区多次表扬安远县委艰苦奋斗的作风。

红五军原准备从安远县打回井冈山去。一日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中得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已在福建长汀消灭了郭凤鸣旅，打死了郭凤鸣。这一消息被安远县地下党组织送来的情报证实。彭德怀喜出望外，立即率红五军进抵瑞金县城，并派一农民给长汀的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送去一信，告知红五军行踪，建议红四军速回瑞金，以期两军会合。

二　红四、五军瑞金会合

1929 年 4 月 1 日傍晚，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朱云卿等，与红五军军长彭德怀等在瑞金老祠堂内胜利会合。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等汇报了井冈山保卫战和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游击赣南的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对彭德怀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①

---

①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7 页。

两军会合后，红四军前委决定将来到瑞金的红五军六百余人、四百支枪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彭德怀仍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该纵队。此时，国民党军第十二师金汉鼎部下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枪由田桂清带领反叛出来要求加入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其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①]；在广昌、宁都一带活动的一支土匪武装三百多人、二百多支枪，也要求加入红四军，被编为红四军独立营，隶属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营长胡竹笙[②]。

红四军和红五军根据前委决定，以四天为期分散到瑞金县城和壬田、西江、九堡等地开展群众工作。

1929 年 4 月 3 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 2 月 7 日发出的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中央在信中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内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主张“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并且提出“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目）”；要求“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中央强调所以采取这一措施为的是避免红军“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③]

中央二月来信还要求朱德、毛泽东两人必须离开红四军，理

---

① 该部后来因故未加入红四军。两个月后，前委决定将闽西各县地方武装合编组建第四纵队。

② 胡竹笙后来曾任红军第二十纵队纵队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掌握的武装，以肃清“AB 团”分子为名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近三百人，激起公愤，1931 年 6 月在南丰县被红一方面军处决。

③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 年 2 月 7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 页。

由是："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信中要求"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①

中央二月来信在部队中传达后，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鉴于这封信涉及对形势的估量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不得不进行认真的思考。4月4日和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城一座大祠堂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中央二月来信。讨论后的意见，集中体现在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一封回信中。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极为坦诚而又尖锐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

①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年2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可能……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积极防止。”①

对中央来信中提出的“分兵”和“朱毛离队”问题，前委多数同志都持反对态度。毛泽东在信中说：“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见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的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②

当然，毛泽东和前委其他同志不是一概反对分兵。他们认为分兵是一种游击战术，必须讲究策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对红军建立三年来的游击斗争经验，第一次作了系统的总结与概括：“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674—675页。

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①

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②

最后关于朱、毛离开队伍速去中央的问题，毛泽东从党内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出发，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就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前来接替。毛泽东写道：“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③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4月4日在瑞金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向中央简要汇报了平江起义和红五军成立以后的斗争过程。他也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体会对中央说：“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以致卖枪变私（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数是好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5—67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党员。即平日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许多不坚决的。领导人能力亦大有关系，有些同志是忠实的，但到了紧急时想不出办法，以致消极，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①

党中央收到前委4月5日来信后，于同年6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在会上表示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而对于红四军前委瑞金会议批评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则认为"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②。而对朱、毛离开部队前来中央一事，事实上中央在当年4月7日致毛泽东、朱德指示信中就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③ 这说明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复信中的观点，对中央产生了影响。

三 前委"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从长汀城写给福建省委并中央的信中，就已提请中央应以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闽、浙、赣三省为目标创造公开割据区域。此次在瑞金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代表前委进一步提出了"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争期

---

① 《彭德怀同志给中央的信》（1919年4月4日于瑞金），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③ 同上书，第158页。

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①

前委为什么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呢？毛泽东在4月5日写给中央的信中分析说，在当前局势下，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二省国民党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我党盲动主义错误，致使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而闽、浙、赣三省则不同。第一，三省国民党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许省防军。福建地方军阀虽共有14个团兵力，但郭凤鸣旅两个团已被消灭，陈国辉、卢兴邦二部均系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个旅在沿海，以前从未打过仗，战斗力不大；只有闽南张贞比较能打，也只有两个团好一点；此外福建驻军五个部分之间四分五裂不能统一行动。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二部共有16个团，比闽浙兵力为强，但比湖南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都曾与红军交过战，除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外，其余都被红军打败过。第二，闽浙赣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基础都比湖南好。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势力仍然存在；赣南的希望更大，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有一天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这样就形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势。

在前委瑞金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计划虽遭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等少数人反对，但获得大多数与会同志赞成。按照这一计划，红四军和红五军于4月7日离开瑞金向于都县推进。4月8日，红四军军部和前委机关进驻于都县城，部队分驻周围农村开展群众工作。9日，红四军前委与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677页。

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尹绍伦及赣南特委负责人萧韶取得了联系，毛泽东指示他们要迅速建立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9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地召开了于都县工人、贫雇农代表座谈会。4月10日，他又出席了在于都县城昌村中学召开的于都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于都县革命委员会，推举张文焕为主席；还决定成立于都县赤卫大队，由红四军派出干部刘永和任大队长，张文焕兼任党代表，下设三个中队。

4月11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管屋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中共赣南特委、于都县委领导人和中央军委巡视员罗寿男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对“一年争取江西”战略计划正式作出决定，并讨论制定了实施这一计划的行动措施。

4月12日，红四军、红五军和于都县城乡工农群众近万人，在县城东门外河坝举行大会，热烈庆祝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成立。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庆祝大会后第二天，红四军兵分两路帮助于都开展群众工作：一路由军长朱德率领第一、二纵队，从于都城郊出发向北行动，经于都县岭背、仙下、银坑等乡镇，向宁都县方向前进；一路由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从于都县城出发，向西经于都罗坳、峡山和赣县的江口、南塘等乡镇，向兴国县方向前进。红军沿途打土豪，分发浮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帮助建立一些区、乡红色政权。

红五军由彭德怀率领，于4月13日离开于都县城，返回井冈山。部队再次经过于南小密村，接回了留在该村隐蔽养伤的军党代表滕代远和军参谋长邓萍等领导人。4月15日，部队到达信丰县安息圩。赣南红二十六纵队由纵队长郭一清率领，全体加入红五军，编为军部政治保卫大队，由李寿轩任大队

长，郭一清任党代表。信丰县当地近百名青年农民也报名参加红五军，使红五军扩大到近千人。随后，红五军经南康、大余、崇义等县和上犹县营前圩，4月底抵达遂川县黄坳，打败遂川萧家璧为首的地主武装数百人。经二十余天一路拼杀，红五军终于5月2日安全抵达宁冈县茅坪。彭德怀从红五军中拨出两千元救济井冈山群众，男女老少每人分得两块银元。5月9日彭德怀率部到达砻市，先后与何长工、李灿、王佐及宁冈、永新、酃县等县党的负责人会面。5月10日，在宁冈古城召开湘赣边界特委二届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传达了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信精神，改编了部队，调整增补了特委执委成员和执委常委，讨论并明确了恢复和发展边界割据区域的任务、措施。此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红五军和湘赣边界各县革命武装，不仅恢复发展了湘赣革命根据地，而且还创建了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也发展成为红三军团。

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于1929年4月中旬进抵兴国县城。第三纵队分散在兴国县东北部农村发动群众。毛泽东和三纵队党代表蔡协民带少量部队住在兴国县城潋江书院魁星阁。此前，兴国县已于是年3月成立中共兴国县委，兴国县城亦已在革命力量掌握之下。红四军三纵队到兴国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了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帮助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和《兴国县土地法》；在文昌宫旁的崇圣祠亲自主持举办了一期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并亲自为学员讲课，为兴国县培养了一批土地革命运动骨干，其中包括陈奇涵、萧华等人在内。

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一、二纵队，于1929年4月25日进抵宁都县青塘圩。4月27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也抵达

青塘与朱德所率部队会合。28 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三个纵队进占宁都县城西郊。毛泽东、朱德听取了宁都县党组织负责人彭澎、王俊等的汇报，得知 2 月 13 日被红四军从宁都县城赶跑的国民党赖世琮民团早已卷土重来，便决心再次攻占宁都县城，消灭该民团。军部当即组织观察地形，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29 日拂晓，红四军从西、北两处向宁都县城发起猛攻，同时组织宣传队向城内喊话宣传。赖世琮指挥民团负隅顽抗。主攻西门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萧克，带领战士们穿过城墙下的民房，找到一个从城内通出的涵洞口。他立即命令几名战士从洞口钻进城内袭击敌人，自己带领部队攀登云梯登越城墙。守城敌军在红军内外火力猛烈攻击下，迅速溃败。红军跃上城墙，攻入城内，全歼守敌赖世琮团，活捉敌民团团长赖世琮、副团长谢益生以下官兵五百余人，缴枪数百支。

红四军攻占宁都城后，各纵队分头在县城四郊打土豪、分浮财，宣传发动群众。毛泽东、朱德在县城温屋主持召开县城党员代表大会，帮助成立了中共宁都临时县委。5 月 3 日又在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宁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会后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敌民团副团长谢益生和另一个民团头目。民团团长赖世琮为保性命，答应派自己的老婆回石城县老家筹集银元和弹药送给红军，请求红军宽恕。后来红四军押着赖世琮到了福建上杭县。不料狡猾的赖世琮趁红军疏漏逃走，回到石城县，继续组织民团与红军对抗。1930 年夏赖世琮率石城民团向瑞金红二十四纵队进攻时，被瑞金红军击毙。

红四军分兵游击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并帮助建立红色政权，为前委“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开了个好头。在红四军的帮助影响下，赣西南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

1929 年 5 月，原在兴国、桥头地区活动的红军独立第二、

四团回到东固，为加强对红二、四团的统一领导与指挥，根据中共赣西特委决定成立了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兼政治委员。6月中旬，红二、四团将游击活动范围扩大到吉水、永丰、乐安等县，后在兴国、宁都交界的青塘与敌交战失利，遂转向广昌、南丰活动，以期与红四军会合。红二、四团离开兴、桥后，驻赣南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肖希贤团和第三十六旅周至群部，先后乘机进犯兴国、桥头、宁都红色区域，大肆烧杀抢掠，还强迫兴国县家家户户在自家门口张贴打倒“朱（德）毛（泽东）李（文林）段（起凤）”标语，妄图一举摧毁兴桥宁红色区域。面对敌军进攻，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以陈奇涵为书记，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党政组织和革命武装，开展对敌斗争，保卫红色区域。6月间，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调集兴国高兴、崇贤、城岗、莲塘、东村、官田等地革命武装和桥头、宁都部分游击队，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辖四个大队，共500人、350支枪，与进犯之敌开展游击战争，10月3日乘敌退出兴国之机攻入兴国城内，击毙敌靖卫大队长陈太祥等四十余人，缴枪三十余支。兴国县革命委员会也重新迁入城内。

桥头红色区域也先后组建了于北游击队第四、第九、第十等大队，攻打古龙冈、上下谢、葛坳、大田、瑞林、银坑等地土豪劣绅盘踞的土围据点，保卫和扩大红色区域。10月中旬红四团和红二十五纵队返回桥头后，于10月18日在于北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下，在桥头伏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六十八团，毙伤敌三十余人，俘敌数人，缴获步枪六十多支、重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这次战斗后不久，于北地方革命武装合编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七纵队，共百余人、枪。1929年12月，还在桥头成立了兴于边界革命委员会。

中共宁都临时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在红四军离开宁都后，因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旅进攻而退出宁都县城，转入北部东韶、黄陂、小布、洛口地区活动。中共赣西特委这时在宁都东韶设立赣东办事处，以金万邦为主任，领导宁都、广昌、永丰、乐安、宜黄、南丰等县革命斗争。宁都县北部地区遂成为赣东革命斗争中心，使宁、广、宜、乐、南边境红色割据区域连成一片。到1929年12月，宁都县已建立五个红旗社（中共区委），县赤卫大队扩大到三百余人、一百六十余支枪。

在赣西，东固根据地于1929年秋正式开始分配土地，10月正式成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吉安县北部的延福根据地也得到巩固发展。1929年8月，延福地区的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和北路游击第二大队，在油田七里村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三纵队，约五百人、四百支枪。同月成立延福区苏维埃政府。分宜、安福等县边界地区也相继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安分区苏维埃政府。10月30日，湘赣边界永新、莲花、宁冈三县赤卫大队协同作战，重新攻占永新县城，12月成立了永新县苏维埃政府。至1929年11月统计，赣西工农红军发展到有枪两千余支，另外地方武装也有枪一千余支。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三纵队也于同年底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刘铁超任团长，罗万任党委书记，陈伯钧任参谋长。赣西红色区域已扩大到赣西十县。1929年10月成立了赣西革命委员会，曾山任委员长，11月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主席。1929年11月15日，由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赣西特委发展入党的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率领吉安县靖卫大队四个中队五百余人，携带五百余支枪，在吉安值夏起义加入红军，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匡一心任团政治委员，金万邦任团政治部

主任。

“赣水那边红一角”。赣西南红色武装的发展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为红四军前委制订的“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第一节　红四军第二次入闽

一　红四军第二次入闽

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在宁都县工作期间，前委书记毛泽东收到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写来的一封信，得知闽西敌军兵力空虚，闽西党组织请求红四军尽快入闽，帮助闽西发展革命斗争局面。经前委研究，决定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游击。

此前，红四军第一次入闽游击半个月，对闽西各县革命斗争影响极大。中共福建省委于1929年3月28日作出《关于闽西斗争工作大纲草案》，认为在闽西有造成割据局面的可能，决定立即恢复上年因暴动失利而停止活动的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指定邓子恢任临时特委书记；同时要求闽西临时特委和暴动委员会要特别注意上杭、长汀、龙岩、永定四县的工作；要加强军事工作，在暴动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集中各县革命武装组建有一千人左右的红军团；要在割据区域中自下而上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福建省委还派出特派员赶赴闽西，指导工作；并派陈昭礼、罗明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朱、毛红军和闽西斗争情

况。5月间，因粤桂军阀间发生内讧大战在即，驻闽西龙岩的国民党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主力配属驻漳州的暂编第一师，南进广东潮汕地区，准备对依附桂系的粤军第五军开战，闽西敌军力量一时空虚，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遂要求红四军迅速入闽帮助开展斗争。

1929年5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宁都县城，17日宿营瑞金大柏地一带，18日到达瑞金县壬田镇。当晚，红四军前委在壬田召开扩大会议，商议入闽军事行动。5月19日，全军从壬田出发向闽西前进，当日进抵闽西长汀县濯田。20日，全军在水口安全渡过江水暴涨、水流湍急的汀江。21日，红四军经涂坊、南岭、新泉进抵连城县南部的庙前。

二　首克龙岩城

5月19日红四军在长汀濯田时，毛泽东和朱德分别致信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和正在上杭蛟洋的闽西红军负责人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要求他们做好策应红四军入闽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红四军进抵庙前当天，傅柏翠、曾省吾即赶到庙前。毛泽东和朱德立即接见两人，交给傅、曾四项任务：第一，阻击尾追而来的赣敌李文彬部四个小时；第二，侦察后方敌情，将敌军动静及时交龙岩县委转红四军前委；第三，尽快集中地方武装组建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随红军行动；第四，傅、曾二人于5月23日赶到龙岩。傅柏翠、曾省吾领受任务后，连夜赶回蛟洋，一方面发动群众欢迎慰问红军，一方面迅速集中地方武装。5月26日，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成立，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全团三百余人，下辖一个营和一个特务连。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接到红四军前委干部宋裕和送来的信后，也立即在上杭县庐丰太古上塘村召开特委紧急会

议，对配合红四军行动问题作出了布置。

5月22日，红四军从庙前出发，经过古田镇时在当地农民配合下消灭了当地反动民团，活捉古田民团团总廖建熊，缴枪36支，成立了古田革命委员会。当晚，红军在龙岩县小池宿营。毛泽东、朱德等连夜在小池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代表介绍龙岩敌情，得知：陈国辉主力尚在广东大埔，龙岩城只留有陈国辉旅部和特务连、机枪连防守；在龙岩县和漳平县，也只有该旅几个补充营分散驻守。据此情况，红四军军部当即作出攻打龙岩城部署：以一、三纵队沿通往龙岩的公路向龙岩城发起正面进攻，二纵队绕道从左翼占领龙岩城北门外的北山，对龙岩城实施包围夹击。

5月23日凌晨，红四军经简短动员，即分头向龙岩城进发。上午7时许，一、三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城外敌前哨阵地龙门圩。守敌第一补充营营长彭棠率残部仓皇向龙岩城逃窜。红军乘势追击，突破西门攻入城内。二纵队亦同时攻入北门，直插城内。城内守敌面对红军的猛烈攻击，纷纷缴械投降。逃入城内的敌营长彭棠来不及喘气，带着姨太太由少数残兵护卫乘乱潜出东门，逃往漳平县永福。中午时分，战斗胜利结束。当天下午，红四军又乘胜进军龙岩城西15公里的永定县坎市，击溃陈国辉部一个营。龙岩战斗大获全胜："陈国辉部第一营、补充营、特务连、机关枪连完全缴械，活捉营长一人，连排长九人，士兵三百二十四人，打死敌方官兵九十余人，缴得机关枪二挺，驳壳枪二十三支，步枪五百四十九支，步枪子弹三十九担，迫击炮弹九担。"[①] 当日，红四军拨给龙岩县委两百支枪，给随

① 《红军捷报》（中国共产党永定县党部印发，1929年5月26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91页。

军参战的连南农民武装三四十支枪。

三　进占永定县

5月23日下午红四军进攻坎市时，在上杭县蛟洋集训的永定县太平区游击队七十余人，由林梅汀、简祥明率领，跟随红四军进占坎市。毛泽东在坎市新街“德裕翔”店住地召集林梅汀、简祥明、郑荣澜等人开会，了解永定县情况，并商议成立了永定县太平区革命委员会，林梅汀任主席。24日，红四军向永定城进发，当日攻占湖雷，帮助成立湖雷区革命委员会，阮山任主席。随后，红四军兵分两路：林彪率一纵队开赴永定城东南面的陈东、岐岭、古竹、下洋、中川一带，扫清当地反动势力，并警戒阻击广东方面敌人；第二、三纵队于5月25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驻永定县城的国民党黄月波团和永定县长余晖照收拾残部逃往峰市。红四军入城后，毛泽东住在城内赖家祠，朱德住在张家祠，陈毅住在崇华堂，第二、三纵队分住在吴家祠、江家祠、孔子庙等地。

25日当晚，毛泽东在永定城内赖家祠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作出三项决定：其一，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其二，动员群众拆毁永定城墙；其三，召开万人群众大会。26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分头深入永定城郊各乡开展群众工作。27日，永定县万人群众大会在县城南门坝召开。会上，毛泽东亲自宣布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秘书长阮山；县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工农群众大会关于取消一切债务的决议》等文告，当众烧毁了缴获的田契债据，镇压了恶霸赖党民。会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张鼎丞亲自带领到会军民动手拆毁城墙，到会群众各自带了一块城砖回家。

红四军在永定城工作两天。28日，红一、二、三纵队均回

师湖雷宿营，并开展群众工作。29日回驻坎市，一、二纵队在坎市一带开展乡村工作一星期，三纵队进占龙岩县的龙门镇。

四 二克龙岩城

1929年5月23日红四军首克龙岩城，守敌营长彭棠败逃至漳平县永福镇，得知红军于当日即已撤出龙岩开往永定，遂拼凑起三百多人的队伍，在龙岩反动势力配合下窜回龙岩城。在广东的敌旅长陈国辉接彭棠告急电报，亦立即派出部分主力星夜赶回龙岩城，加强防守力量。

红四军攻占龙岩城的胜利消息，给龙岩县革命群众以极大鼓舞。龙岩县党组织乘这一胜利声威，组织发动白土、湖邦、黄坊、西山、东山、马坑、内江山、大池等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组建地方革命武装。得知敌军回防龙岩城，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和龙岩县党组织领导人郭滴人、张双铭等组织各地农民革命武装，对龙岩城守敌轮番攻击骚扰，使敌人成天惶恐不安。

红四军回驻永定县坎市和龙岩县龙门后，毛泽东、朱德从龙岩县委领导人的汇报中了解到龙岩县的情况后，决定派红四军第三纵队和闽西红五十九团一起，再次攻打龙岩城。

6月2日，红五十九团由傅柏翠、曾省吾率领从蒋武经柴坑赶到龙岩城东面的黄竹坑宿营。6月3日一早，红五十九团占据城东东宫山。当日下午3时许，红四军第三纵队从龙门镇向龙岩城西门发起猛攻，五十九团同时从东宫山压下，经东门攻进城内，黄昏时分与三纵队在城内胜利会合。城内敌军惧怕被歼，红军攻城枪一响就弃城而逃。

红军二占龙岩城后，于6月5日在城内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被推举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

五　白砂歼敌

6月5日上午，红四军在坎市得到从下洋方面哨兵送来的紧急报告，谓发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大队人马从广东大埔方面向永定县开来，但不知是何部敌军。红四军军部领导疑为张贞、陈国辉二部回师闽西，企图合击红军。为避敌锋芒，前委决定向上杭、连城方向转移。红四军三纵队和五十九团遂于当日下午从龙岩城撤出，在龙门与红四军前委及二纵队会合后抵达龙岩县北部的大池。红四军一纵队从永定县虎岗、灌阳转移至大洋坝。

此时，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旅卢新铭所部钟铭清团驻守上杭县白砂镇，并在离白砂镇15公里的丘坊及10公里之丰年桥各布设一个连兵力，企图堵截红军归路。毛泽东从上杭县蛟洋地方党组织处得知这一情报后，当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攻打白砂，消灭钟铭清团。

6月7日，红军分三路向白砂进击：一路由毛泽东、朱德亲自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及军直属队从大池出发，经吊钟岩、小禾坑向白砂正面进攻；一路由林彪率领一纵队从大洋坝向白砂攻击；一路由傅柏翠率领五十九团从大池出发进攻丘坊之敌。

白砂民众正好在这一天迎神打醮抬“定光古佛”，整条街道来往行人熙熙攘攘，敌军毫无戒备地在街上游逛。毛泽东、朱德指挥部队出敌不意首先解决驻守丰年桥的敌前哨连，接着直扑白砂犁头嘴，包围敌主力，迅速歼灭其大部，只有敌团长钟铭清带着二十余名卫兵逃回上杭县城。驻守丘坊敌民团在五十九团攻击下也狼狈逃向旧县。此战红军全歼钟铭清团主力，击毙敌军七八十人，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小炮两门。战斗结束后，红军在白砂召开军民祝捷大会，宣布成立白砂革命委员会。

六 红四军第四纵队组建与三克龙岩城

白砂战斗后，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6月9日在上杭县旧县召开会议，决定将闽西地方武装合编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并决定由傅柏翠任纵队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谭震林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长。第四纵队下辖第七、八两个支队：第七支队由原闽西红五十九团、连南十三乡暴动武装、长汀县赤卫队、永定县一部分地方武装合编组成，支队长陈紫峰；第八支队由永定县溪南、湖雷及龙岩县白土的地方武装和上杭县东五区农民武装合编组成，支队长卢肇西。半个月后第四纵队正式编成，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亦正式成立，但纵队领导人作了调整，纵队司令员改由胡少海担任，纵队党代表改由张鼎丞担任，纵队其他领导人未变。全纵队两个支队共千余人。

此时，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主力已从广东东江匆忙返回龙岩城。敌旅长陈国辉得知红四军已向新泉一线撤退，误以为红军胆怯欲退回江西，便在城内举行所谓“祝捷大会”，放假三天，日夜唱戏，怂恿士兵吃喝嫖赌。

红四军前委获悉上述情报，决心歼灭陈国辉旅。6月17日，朱德、陈毅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作出战斗部署：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在龙岩城外西山、下洋之间的新官岭集结，主攻南门；第二纵队和军部沿龙门大路直取龙岩西门；第三纵队兵分两路，一路埋伏于东面东宫山一带断敌退路，另一路攻打北门。闽西各县农民武装随红军行动，支援红军作战。按照这一部署，全军于18日从新泉等地出发，进抵离龙岩城20公里的小池宿营。

6月19日凌晨，红四军各部按预定部署兵临龙岩城下。拂晓时分，攻城战斗打响。朱德亲自指挥二纵队率先攻破西门，冲进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一、四纵队也很快从南门攻入城内，

一部兵力与二纵队会合直捣陈国辉旅部，另一部兵力配合三纵队攻占城北制高点“最高亭”。敌旅长陈国辉毫无戒备，遭红军突然进攻后对部队失去指挥，惊慌失措地化装成老百姓，带着几名亲信卫兵悄悄潜逃出城。敌残部群龙无首，蜂拥着朝漳平方向溃逃，不料在东宫山下遭到红军猛烈阻击。仅半天时间，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全歼敌陈国辉旅主力两千余人，俘敌营长以上军官九人，缴获迫击炮四门，机枪十挺，步枪九百余支，子弹无数。

红四军三克龙岩后，闽西红色割据局面大定。1929 年 7 月 20 日至 29 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蛟洋文昌阁胜利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当选为特委书记。这次大会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导，讨论确定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正确策略和方针政策，使闽西红色区域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第二节　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

一　红四军党内出现争论

红四军自 1929 年 1 月从井冈山突围游击赣南、闽西以来，连续三四个月游击奔波，鞍马劳顿，军情紧迫，环境艰苦，军部领导人的精力都集中于应付追敌和恶劣环境，较少顾及其他，因之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而红四军官兵来自于各个方面，既有从农民起义队伍中来的，又有从旧军队中来的，还有来自绿林武装和散兵游勇的。他们中原本就或多或少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弱化，加上恶劣的游击环境，军中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便有所发展、蔓延。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中党内

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产阶级思想的分歧，亦越来越明朗化，并日益反映到党内以及部队领导机关中来，前委对此又未能取得统一认识，因此对一些问题出现了争论。

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井冈山时期，红军中设置了党代表，并把支部建在连上，确定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原则。但是，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一些从旧军队中出身的干部感到约束，表示不满，认为“党代表的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军事领导政治”的主张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

其二，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党代表是“家长制”，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说了算，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都要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再作决议，否则就是不民主。

其三，关于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问题。有人认为“不打不骂是带不好军队的”，“城隍庙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尘”，主张“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提出取消士兵委员会。

其四，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一些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一味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吃大块肉喝大碗酒”的流寇生活。

这些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到“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上。

井冈山时期，红军是设有军委的，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当过军委书记，但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前委。1929 年 1 月朱、毛红军下山游击赣南时，为了应付险恶局面，简化领导层次，在 1929 年 2 月 3 日寻乌县罗福嶂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取消军委，统由前委指挥。这种局面维持了近三个月，直到 1929 年 5 月初

有个叫刘安恭的人到来，情况开始发生急促而微妙的变化。

刘安恭，四川人，早年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一起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他与朱德、陈毅等都曾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中供职，策动杨森响应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 年刘安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 年春回国后，5 月间由党中央派来红四军军部工作。此时，毛泽东身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军党代表和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忙得不可开交。当时红军对留苏归来的人都很推崇，刘安恭初来乍到，红四军前委便很快任命他接替毛泽东出任军政治部主任。5 月下旬，鉴于红四军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工作繁忙，兼顾不过来，于是前委决定恢复 2 月初在罗福嶂会议上已撤销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①

毛泽东提议恢复临时军委，初衷是希望临时军委能协助前委，为加强军队建设做些事情。未料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竟是限制前委权力，规定前委以后“只讨论行动问题”，就是只讨论红四军的作战行动，不要管红军的其他问题。如按这个决议实施，前委就被架空，无法领导全面工作。消息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甚感惊讶，认为这是军委在与前委分权，部队中许多人亦感到临时军委决议不合适，认为临时军委作为下级，怎能限制自己的上级——前委的权力呢？对此，军中内部一时议论纷纷。② 加上此时中央 2 月 7 日给红四军前委并湘赣边界特委信的内容又在红四军党内传达，刘安恭到处宣传“中央精神”，中央要“朱、毛离开部队”的话在军中广为流传，更

---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6 月 1 日）。

② 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8—102 页。

使红四军内部出现政治动荡和思想混乱，有些人甚至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问题，也产生怀疑和动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采取各种措施，做了许多工作，并几次在前委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阐释，然而收效甚微。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对前委与军委的关系、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毛泽东认为，当前前委领导工作的重心仍在军队，而军队又是战斗频繁经常转移，需要前委给予集中而敏捷的指挥，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现在却在前委下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不仅机构重叠，还限制前委权力，明显是与前委分权，是“分权主义”。他主张在前委之下不设军委，并提议撤销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刘安恭则在会上强调，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云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上，除毛泽东与刘安恭之间意见相左外，红四军领导层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前委成员谭震林、蔡协民以及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军长朱德等一些同志则支持刘安恭的意见；一纵队党代表陈毅则居中调停。在会上争论时，刘安恭竟然指责“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认为毛泽东犯有“家长制”错误，是“书记专政”。[①] 而支持刘安恭意见的同志“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8—102页；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①。

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争论的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在会后双方争论日趋激烈。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但对做好工作仍持有信心，1929 年 6 月 1 日他在湖雷代表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②

6 月 7 日红四军取得白砂战斗胜利后第二天，毛泽东决定当晚继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当日下午在离前委扩大会召开前不到三小时，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信中所述内容除支持毛泽东对军内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外，还污指朱德存有“封建关系”、“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等，极力挑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当晚召开的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共有 41 人参加。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一份书面意见交前委秘书长在会上宣读。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1）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领导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根本分歧在前委和军委；（3）反对党管一切（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归支部（主要主张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

---

①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7—68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84 页。

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反对一支枪也要问过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4）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充分发表意见，切实讨论，决议形成后又要反对，并把责任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①] 毛泽东要大家对书面意见进行讨论，反复说明不能因为要成立军委而攻击前委以至支部，削弱党的领导，军委前委分权形式所以不能成立，理由就在这里。

如同湖雷会议一样，此次白砂会议上又风云骤起，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得寸进尺，肆意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建议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②]。与会同志的态度，仍然是一部分支持毛泽东观点，一部分支持刘安恭意见。

毛泽东看到意见不仅得不到统一，反而越争越烈，便愤而提出辞职，说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会议快结束时，有人提议对设不设军委问题举手表决。表决结果，主张撤销临时军委、反对成立正式军委的有36票，只有5票赞成成立正式军委。[③]

于是，临时军委被撤销，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他所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被免去。前委将他调去担任红二纵队司令员。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

---

① 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史资料征委会：《关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若干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313页。

③ 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争论的焦点问题虽已解决，但刘安恭不服气，到处游说、煽动。“白砂会议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① 毛泽东认为在组织指导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不了，自己的工作完全做不起来，执意不肯收回辞职请求。为使红四军的工作不受影响，前委只好决定暂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前委还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理由，在《前委通讯》上发表，供党内讨论。

白砂会议结束的当天深夜，林彪又托前委秘书长江华转交一封信给毛泽东，信的内容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②。6 月 14 日，毛泽东根据前委决定，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就全军党内争论的问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指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他相信四军的同志经过争论，“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③

毛泽东在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 14 个问题：（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

---

①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 页。

② 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4 页。

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纪律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四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他腐败思想。这14个问题，实际上又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及当时实行的若干政策、制度的争论；二是对设不设军委并由此涉及的若干组织原则的争论。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①，"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②。而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③。

毛泽东在信中还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放任纪律等错误观念；否定红四军党内存在"家长作风"，分析了这次争论发生的原因，强调"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④。毛泽东特别指出："四军党内现在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6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74页。

斗的目标。”①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对其坚辞前委书记职务一事作了解释，说：“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一）对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②

6月15日，朱德也根据前委决定，给林彪复信一封。他在信中表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

第一，朱德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并认为“出此口号是说我代表军官要争自由，与党分权”，对此他表示不能接受。

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行动要受党的纪律约束，他表示赞同，但认为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

---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第三，朱德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员的自由要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为却是自由的，不服从调动。①

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给林彪的复信，以及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刘安恭的意见等，都刊登在红四军当月出版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但是，这些信文发表后，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为军中多数人所接受。相反，争论更加激烈地延伸开来。由于毛泽东平时对干部、对下属要求甚严，批评一些团、营级干部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因此许多干部对毛泽东有意见，认为毛泽东“不民主”，确实存在“家长作风”，更倾向赞成朱德的观点。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则急切希望朱毛之间的分歧意见早日消除，以增强党的团结和红军战斗力。然而，事与愿违，红四军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与军中党内的纷争，并未因此消除而取得共识。

二 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

1929 年 6 月 19 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城后，当日下午，红四军前委代理书记陈毅在军政治部驻地公民小学的兴学祠，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并决定利用闽西局面已初步稳定的机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讨论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但是前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②，只决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负

---

① 见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关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若干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0—313 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0—281 页。

责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准备在“七大”作的政治报告。①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内的兴学祠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四五十人，除前委委员和全军大队以上的党代表到会外，还来了一些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②

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主要议程为听取陈毅作政治报告。随后，朱德、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代表在会上发言。朱德在发言中承认自己过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迎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至于会上对他的批评，毛泽东表示现在不说，如果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③ 由于争论的双方都作了让步，大会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

《决议案》共分为“党内争论问题”和“分兵问题”两部分。因时间关系，“分兵问题”在会上没有讨论。关于“党内争论问题”，《决议案》讲了七个方面的内容：（1）过去工作的检阅；（2）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3）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4）对前委通讯第三期的意见；（5）对朱、毛同志的意见；

---

① 《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内刊稿）；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② 据出席红四军七大代表萧克、傅柏翠回忆，确切的代表人数未见史料记载。

③ 《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内刊稿）；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6）关于前委组成人员；（7）口号。

关于“过去工作的检阅”，《决议案》列出了红四军党内军内长期争论不休或看法不一致的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大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1）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2）1928年5月三十、三十三团回湘南问题；（3）1928年7月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往湘南问题；（4）1929年1月四军出发赣南问题；（5）1929年5月（注：应为4月）决定一年内争取江西问题；（6）政权形式问题；（7）经济政策；（8）地方武装问题；（9）军需制度问题；（10）边界时代行委制度问题；（11）宣传兵制度问题；（12）士委制度。这些问题中，有5个问题是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到的。《决议案》对这12个问题都得出结论。这些结论许多是正确的。例如，肯定1928年7月红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回湘南是不对的；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建立宣传兵制度和成立士兵委员会制度都是对的；1929年1月四军出发赣南也是对的。当然，其中有些结论也有欠妥之处。例如，认为井冈山时期有段时间是不顾群众需要采取强迫手段建立红色政权；认为前委在瑞金、于都会议上作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不对，等等。

关于红四军是否存在“家长制”，《决议案》赞同一些人的意见：过去四军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对上级，都有机械地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但是，《决议案》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一些人对四军党有代替群众组织、上级党包办支部工作的指责，认为这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明确肯定毛泽东不存在“书记专政”的现象。

关于“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问题，《决议案》明显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它符合党的章程；但又指出这个口号“在文

字方面太简单”，会引起不正确的理解，主张这个口号以后不要再引用。

关于红四军发生党内争论的原因，《决议案》基本赞同毛泽东的分析，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红四军党员成分复杂导致思想认识的歧异；二是领导成员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不完备，如军党代表兼前委书记并兼军政治部主任，军长和军党代表对工作的责任心都重，都爱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的反响；五是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这些分析都是符合红四军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

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性质，《决议案》虽然没有明确赞同毛泽东所说的是两种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但是指出这次争论不仅是朱、毛之间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而且是红四军历史上各种不同主张、不同工作方式分歧的延续，指出这个争论虽对党有益处，但若没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必不能得着正确的解决。《决议案》对毛泽东在6月8日白砂前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和6月14日给林彪复信的内容，进行了评析，否定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意见，并且对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愤而辞职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而对朱德在6月15日给林彪的复信中指责毛泽东的内容，《决议案》也提出了批评。《决议案》还对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后不调查研究、不顾客观事实胡乱发表意见、挑拨领导人之间关系、制造纠纷的错误，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原则、不服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批评刘安恭主张用完全的选举制度和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担任前委书记的做法，是非常不对的。林彪在6月8日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夕给毛泽东写信，《决议案》对此也给予了批评，认为他不应该将事关红四军前途的重大问题向个人写信，而应向党报告；更不

应该在信中随意指责朱军长，挑拨朱、毛之间的关系。

关于朱、毛二人的缺点及其处分，《决议案》列专条分别对毛泽东和朱德的缺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毛泽东存在“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惯用报复主义”等“严重缺点”；朱德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相信私人”、“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不注意维持军纪”等“严重缺点”。《决议案》说：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和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出现严重争论，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代表大会为此决定：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

关于会议的口号，《决议案》在最后提出了“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的13条口号：（1）拥护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2）反对英雄思想；（3）反对形式主义；（4）增加批评精神；（5）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去；（6）反对不正确的理论与思想；（7）反对小团体主义；（8）实行民主集权制；（9）反对家长制及极端民主化的倾向；（10）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11）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12）做事科学化、规律化；（13）改进支部生活。

大会最后讨论朱、毛去留问题和选举前委委员。关于朱、毛的去留，大会决定由中央处理，在中央未派人到四军来之前，他们两人可继续工作。关于前委委员，决定中央以前指定之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中央以前曾决定红四军所到之处地方党部派一名主要负责人参加为前委委员，此议亦不变动。余下的名额，由军直属队和第一、二、三、四纵队推选出陈

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5名士兵代表（军直属队和每个纵队各推选1人）。表决结果全部当选。前委委员共有13人。原前委委员谭震林落选（宋乔生、毛科文已牺牲）。前委书记也由大会选举产生，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大会决定将选举结果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可负责开始工作。①

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落选，铸成历史上的一大曲折，实为一大憾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也是难以避免的。“七大”主持人陈毅从党的事业出发，以团结为重，曾做了必要的力所能及的调解工作。他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但不太民主；朱德对红军有建树，但重用刘安恭是不对的。陈毅自己觉得夹在朱、毛之间，有难为之处。他曾诙谐地说：“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国之间，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②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只开了一天，于当日深夜结束。纵观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党内的纷争和“七大”召开全过程及其所通过的《决议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并非偶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如毛泽东所言“是历史的结穴”③。这场争论迟早要爆发，实属难免。此次因设立临时军委而引发争论，只是一个诱因。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毛泽东在6月14日给林彪的复信中已

---

① 以上参见中央档案馆保存件《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6月22日）。

② 《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内刊稿）；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作了深刻透彻的分析。总的看来，毛泽东的分析是颇为客观的，根本原因在于部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所致。

第二，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其性质不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然这也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则性争论。由于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坚决革命的同志，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正如毛泽东后来（1944 年 3 月 15 日）在致华中局电文中所说：“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① 然而，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大都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党对军队领导以及建党、建军、建政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根据地建设以及党与军队建设的方向和前途。这一点，毛泽东当时是清醒地认识到了的。然而，遗憾的是，争论的另一方以及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不少同志，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七大”以后直至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召开以前，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的这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

第三，红四军党的“七大”，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存在严重错误的会议。说其具有积极意义，是因为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对红四军过去的工作，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估，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缺点；对毛泽东、朱德两同志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对四军党内有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提出了应有的看

---

① 毛泽东：《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1944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4 页。

法，这对于当时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停止党内争论，消除个人成见，增强红军团结，争取粉碎敌人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的胜利，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红四军前委在1929年10月18日给福建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说：“党内争论问题，自七次大会后，即告结束，另有少数同志仍留有成见，但正确的指示，大家很诚恳的接受，消除一切成见去对待敌人。”① 红四军“七大”的积极意义，还表现在会议初步总结了红四军创建两年来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大会通过的决议后来呈报党中央审查，为后来党中央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和红四军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依据。说“七大”存在严重错误和不足，是如同中共中央在同年“九月来信”中所批评的那样：“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② 特别是会议在未报中央批准之前就擅自改选红四军前委，致使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

---

① 《四军前委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的报告》（1929年10月18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二，第258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8页。

选离职，这大大地削弱了前委的领导，使前委“顿失领导中心”，是十分错误的。

陈毅在毛泽东、朱德发生分歧、党内出现争论的情况下，本着“结束争论，增强团结”的宗旨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并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后来又亲赴上海向党中央如实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得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到红四军的全面情况，并对红四军作出“九月来信”的正确指示，这是有贡献的。红四军党的“七大”存在的错误和缺点，作为代理前委书记和大会的主持者，虽然负有某种领导责任，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避免、可以理解的。陈毅的出发点和主观愿望是好的。他在“七大”会上被选为前委书记，乃党内民主选举的结果，况且陈毅本身是红四军的资深领导人，在朱、毛意见不能统一的特殊情况下，他出任前委书记也是无可非议的。

第三节 红四军粉碎国民党军“三省会剿”

一 红四军出击闽中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党内争论渐渐停止下来，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不仅因为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没有受到批评而加以纠正，还因为毛泽东在会上落选，使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提出自己身体不太好，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并休息一个时期，在未获中央批准之前，允许他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地方工作休养一段时间。鉴于毛泽东态度坚决，新前委同意了他的请求。原来支持毛泽东的一些同志，情绪有些低落。前委对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的工作都作了调整。谭震林调任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蔡协民、江华、曾志调闽西特

委从事地方工作。有些军事领导干部，包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等在内，纷纷向中央写申请要求离开红四军，派往莫斯科学习。

1929年7月9日，陈毅将“七大”《决议案》连同《前委通讯》第三期，以及他给中央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情况、闽西情况和红四军行动计划的报告，一起交福建省委交通员呈送中央。7月中旬，陈毅和朱德率红四军前委和军部机关撤出龙岩城，迁往连城县新泉。

此时，蒋介石已下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红色区域实行“会剿”。这次“会剿”，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其部署为：江西国民党第十二、第七师共四个团，由瑞金入长汀，向新泉、古田进攻；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张贞部由漳州向龙岩进攻；广东国民党军第七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进攻。7月下旬，三省“会剿”部队开始行动。7月30日，江西国民党第十二师两个团进至长汀，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由长汀进至河田；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进至龙岩县南部的适中；广东国民党军也在大埔、松口、梅县等处集结。

面对敌军的进攻，为研究确定应敌对策，同时因7月29日陈毅接到党中央要红四军火速派一两名同志赴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军事会议的通知，前委遂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此时已离开红四军在上杭县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且重病在身。陈毅决定前委紧急会议于7月29日晚在蛟洋文昌阁召开。会前陈毅将自己准备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的打算告诉毛泽东并征求意见，得到毛泽东赞同。陈毅还提出自己离开前委赴上海期间，请毛泽东返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坚辞未受。

在当晚召开的讨论应敌策略的前委紧急会议上，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结果多数同志认为红军留

在闽西内线打破敌军“会剿”把握不大，遂决定集中红二、三纵队向闽中出击；红一纵队因远在回龙、官庄一线，受汀江阻隔，一时难以集中，决定留在闽西与红四纵队一起，在永定、上杭、龙岩三县，坚持斗争，保卫红色区域。会上决定陈毅走后，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会后，陈毅随福建省委交通员先到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工作，然后乘轮船经香港前往上海。

8月2日，朱德率前委与军部机关和第二、三纵队在龙岩北部的白沙集中，当夜兼程开往宁洋，8日占领漳平城。红军在漳平八天，并未迫使进攻之敌暂编第一师改变计划，调动兵力追赶红军。在此情况下，红四军第二、三纵队于8月15日分途从漳平出发，向大田、德化方向前进，进入闽中腹地，准备再向闽北出击。可是此时正值酷暑，红军病号增多，“沿途荒山峻岭，河水深入颈项，上山把脚走痛了，过河把小孩子淹死了，穷乡僻壤没有米吃，虽然有番薯等物，又因土匪太多，群众又不了解”，革命基础薄弱，军阀卢兴邦部又调动兵力前来阻击，红四军行动遇到很大困难，减员严重。“大炮抬不起也丢了，步枪背不起只得送土匪，叫他帮我们安置伤兵，计算这一次要损失300多人，100多枪，士兵群众都不肯走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击返闽西。”①

就在这时，随军行动的红四军前委收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信，了解到进攻闽西敌军动态。闽西特委要求朱德军长率领部队击返闽西，保卫赤区。根据实际情况和闽西特委要求，朱德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作出返回闽西的决定。8月29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县东北的溪南，歼灭福建国民党军暂

①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55页。

编第一师一个团。30 日，红四军又进占漳平城，歼灭敌军一个营，并连夜占领龙岩县东南的永福镇，迫使占领龙岩的敌暂编第一师杨逢年旅仓皇撤退。9 月 6 日，红四军二、三纵队收复龙岩城。

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的军事行动，虽有所损失，但从决策到击返，基本上是正确的。

二　红四军攻占上杭城

留在闽西的红四军第四纵队的三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面对敌军进攻，以支队为单位分散在上杭县北二、北三、北四、北五区，以古田、白砂、蛟洋等地赤区为中心，向汀南、连南（新泉）游击，对付赣敌第十二师第二十一旅的进攻，其中心工作是深入发动群众，与群众配合应敌。红四军第一纵队在林彪、熊寿祺率领下，进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交界的大洋坝，改名为上杭永定赤卫队，以迷惑敌人。全纵队分为三部分：纵队司令员林彪率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和特务大队，以上杭、永定两县交界的合溪为中心；第一支队支队长粟裕率第一、三大队和补充大队，以永定县金丰为中心，肩负保卫在永定金丰大山隐蔽养病的毛泽东、贺子珍安全重任；纵队党代表熊寿祺率第二支队及机炮大队以大洋坝为中心。各部分又以大队为单位将各中队分为若干中心，分散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帮助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组织训练赤卫队，并建立递步哨、交通网，严密监视敌军动静。红军战士们还积极帮助群众收割稻子，搞好生产。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岩、永、杭三县原来互相分隔的赤色区域迅速连成一片。红军与群众紧密配合，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进犯之敌，迫使赣敌撤退到长汀、连城两县，粤敌固守永定城和湖雷两地，不敢乱动。上杭县城之敌也被上杭县赤卫队和群众团

团围住。

龙岩城重新回到红军手中，标志着闽粤赣国民党军三省“会剿”已土崩瓦解；岩、永、杭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红四军攻打上杭城创造了条件。9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决定集中四个纵队兵力，攻打上杭县城。

上杭城建在汀江岸边，城墙高坚，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盘踞城内的是以郭凤鸣残部扩编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旅，旅长卢新铭原是郭凤铭部的一名团长。全旅兵力加上城内地主武装共有两千余人。

9月19日，朱德率全军指挥员仔细察看地形后，作出攻城部署，决定：由一纵队用迫击炮猛攻西门，吸引城内敌军主力并乘势攻入城内；二、三纵队主攻北门；四纵队一部配合赤卫队攻打东门，另一部和地方赤卫队佯攻南门。19日夜，攻城战斗打响。二、三纵队率先攻破北门，朱德随部队进入城内；接着，一纵队也从西门攻入。红军各部在城内会合。20日拂晓全歼城内守敌，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仅敌旅长卢新铭带领二十余名随从逃脱。

上杭城胜利被红军攻占后，上杭县群众和红军于9月20日在县衙门前广场召开军民祝捷大会。10月2日，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在上杭县城宣告成立，李立民、伍步祥分别当选为正、副主席。

红四军在上杭城休整了几天，将俘虏士兵补充各纵队，全军各纵队都扩充为三个支队，每个纵队有一千八九百人，全军扩充到七千余人。随后，前委决定一、三纵队向武平县进攻，准备与入闽赣敌第十二师作战；二纵队开至闽粤边境之峰市，监视已退回东江地区之粤敌陈维远部，四纵队留守上杭城附近巩固苏区。

第四节　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与出击东江

一　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由于毛泽东已离开前委去闽西特委帮助工作和养病，前委书记陈毅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领导同志中只剩朱德一人，领导机关不健全，全军在政治上顿失重心。军中政治工作也有所放松。红四军党内军内原先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又泛滥起来，尤其是极端民主化思想十分严重。几个月来，“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划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前委为了请调工作问题（当时很多同志请调工作），常常讨论几个钟头，无法解决。每次开会都要各纵队负责同志到了才能解决问题。各纵队负责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枪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了，没法解决。前委负责人，只有说些调和话，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开会。当时有许多同志说，前委是各纵队联席会。但是前委的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总之，当时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干”①。

红四军中许多干部战士都对这种状况不满。他们纷纷责问军部领导：为什么不请毛委员回来主持工作？面对这种状况，1929年9月底，代理前委书记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两件事：一是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希望通

①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55页。

过召开全军党的“八大”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二是讨论要不要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对前一件事，大家举手表决通过；对后一个问题，两种意见争论不休。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提议由他们找几个同志给毛泽东联名写封信，请他回前委工作。众人都表示赞同。但是，仍在上杭县合溪养病的毛泽东收到郭化若等人的信后，却拒绝返回前委工作。他给郭化若等写了一封回信，信的内容大致是，陈毅要他做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之人，他办不到。他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他不能回来。①

1929 年 10 月上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城的太忠庙召开②。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因未做充分准备，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交大会讨论解决。大会上“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次大会的选举为了要各纵队都要参加人，决定选举十七人，在大会上临时来推选，把新由中央派来四军工作的同志张恨秋、谭玺、郭化若（仁）等都选为委员。谭玺当时尚在一纵队，还没有与大会上的人谋面，他的观念正不正确没有人知道，便当选为常委（这是因为提议他的同志说他好，提议了两次，最后一次才通过的）……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有丝毫意见，结果选出来的八届前委，又是同从前一样”。这次大会就这样“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③ 毛泽东仍然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

---

① 郭化若：《六十余年艰难曲折的回忆（续二）》，《党的文献》1992 年第 4 期，第 92 页；《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内刊稿）。

② 关于红四军党的“八大”召开时间，多数党史著述认为是 1929 年 9 月下旬。但时任红四军前委委员的傅柏翠回忆说：“红四军进入上杭十天左右，即九月底，先召开了一次前委会，随之决定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员代表大会。”据此推算“八大”应在 10 月上旬召开。

③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 1929 年 7 月到 1930 年 4 月）》，《党的文献》1999 年第 2 期，第 55 页。

许多代表对“八大”开成这个样子强烈不满。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发言，再次要求请回毛泽东，得到许多代表支持。朱德也表示“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同意请回毛泽东。于是，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执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敦请信”。信中写道：接此信后若再不回来，就要给以党内处分。会后，前委派四纵队八支队党代表赖连璋带着这封信赶到合溪“师俭楼”，交给毛泽东。接到这封态度强硬的“敦请信”，毛泽东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于1929年10月10日从合溪回到上杭县城，住在城南汀江边上的“临江楼”。但此时红四军党的“八大”已结束，前委和军部机关已随一、三纵队前往武平县象洞，二纵队也已离开上杭城。毛泽东只见到了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傅柏翠和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等人。

红四军党的“八大”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促使了一部分人的觉醒。

二　红四军出击东江

红四军在上杭城召开党的“八大”期间，两广军阀陈济棠、陈铭枢与李宗仁、张发奎相互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战争爆发，广东东江地区国民党军兵力比以前薄弱，只有广东军阀第三师的三个旅和地方反动武装约六个团；闽西局势却因国民党军刘和鼎部入龙岩和赣敌金汉鼎部由长汀南侵而紧张起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福建省委于10月6日写来的指示信，信中转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①]。根

① 《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1929年10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据这一指示精神，10月15日开始，红四军一、二、三纵队陆续向闽粤边境进发。10月18日，朱德召开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讨论出击东江的行动计划，决定“取进攻策略，先占蕉平梅等区域，发动群众，夺取地方武装，武装农民，消灭一部分敌人，待机夺取大的城市，以影响粤桂战争”。“粤桂战争紧急时，再游击潮梅，深入东江，发展东江群众游击战争，转变到东江的大部分赤色割据”。①

1929年10月19日，红四军主力开始南下广东。当日，第二纵队在粤边石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战斗中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同日，第一纵队进抵广东蕉岭县的松源，打败敌军一个营。第三纵队在闽边武平县岩前击溃闽西民团。10月22日，红四军军部和二、三纵队开至松源集中。这一天，正好陈毅从上海回来抵达松源，与朱德等人会合。朱德、陈毅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了东江敌军兵力分布情况后，决定向梅县进攻，24日占领蕉岭县城，25日乘虚一举占领梅县县城。

10月26日午后，国民党粤军第十一师师长蒋光鼐率三个团兵力向梅县城反扑。梅县城无险可守，前委只得率部队仓促撤出城外，退入丰顺县马图和梅县南坑一带休息。前委原计划将全军三个纵队分散到东江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但多数人认为东江反动势力太大，分散兵力恐被敌人各个击破，故不愿意分兵，讨论数日亦无定论。这时，探悉梅县城只有敌一个教导团防守，前委遂决定反攻梅县。10月31日拂晓，朱德指挥部队乘敌不备包围了梅县城，前锋进入街心。因敌人凭城死守，用手榴弹、冲锋枪向入城红军猛烈射击；加上红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攻击，战斗

① 中央档案馆保存件《四军前委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的报告》（1929年10月18日）。

持续七个小时，至午后4时仍未夺占该城，红军官兵却大量伤亡，为避免遭敌援兵合围，保存有生力量，前委只得命令部队从梅县城撤出战斗，经大坪、石正，北上进入江西寻乌县境。

此次攻打梅县之战，虽给敌以很大杀伤，但红军本身亦伤亡二百余人。部队北移途中，由于前段时间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原先在上杭城编入部队的六百多名俘虏兵全部逃跑。部队减员严重，精锐损失不少。于是，第一、二两个纵队只好由三个支队缩编为两个支队，第三纵队也缩减一个大队，全军合计减员一千余人。这是红四军自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

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遭受重大损失。此次行动执行的是中央和福建省委指示，主观愿望是想利用两广军阀混战之机发展和扩大根据地，因此红四军前委在决策上无大错。此次失利，教训也是深刻的。红四军前委后来总结这次出击东江失利的原因是：“（一）四军去东江正李、俞下台，两粤局势业已缓和；（二）四军在上杭解决卢新铭部，当时前委对卢部俘虏改编的政策不对，只图数量增加，表面上做了扩大，实质不充，经不起挫折；（三）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①] 前委的这一剖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第五节　红四军党的“九大”胜利召开

一　陈毅上海之行与中央“九月来信”的贯彻

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根据中央指示，于1929年8月下旬乘

① 中央档案馆保存件《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

英轮经香港安全抵达上海，得到在上海做事的两位兄长帮助，很快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陈毅抵达上海前，中共中央曾两次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一次是1929年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第39次会议，专门讨论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从瑞金写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会上政治局同志承认中央“二月指示信”中要“朱毛离队”、红四军分散发展“是有些毛病”。会后由周恩来执笔致信红四军前委，肯定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8月上旬，中共中央又收到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及“七大”的会议记录。中央政治局感到问题严重，遂于8月13日开会，依据陈毅的报告和大会会议记录，对红四军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在讨论中，大家感到有些问题尚不清楚，要等陈毅到后再作定夺，决定由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代表中央先给红四军前委去一信，予以指示。

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发出。这封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作了初步表态，指出：“七大”主要解决内部争论而不是着重讨论“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是一个缺点；“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润之、玉阶同志亦特别重视个人的争论。尤其重要的是各方面都主张扩大军事中的党内民主化……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以恰当的批评。这些都证明你们在一切组织路线上还欠缺正确的认识与了解”①。指示信还肯定红四军暂不设军委的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4页。

定是正确的。信中还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这些意见与毛泽东历来的主张相似，有些还有发展。本来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前委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谁知党中央机关负责收发文件的同志竟然写错信封，阴差阳错地将此信发到鄂豫皖苏区去了，弄得鄂豫皖苏区的同志摸不着头脑，而红四军这边的问题又得不到解决。

陈毅抵达上海后，中共中央于8月29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成员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关向应等都出席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会上，要求陈毅就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的情况，写成详尽的书面报告；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周恩来为召集人，详细讨论红四军问题，起草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9月1日，陈毅写完了给中央的报告，一共五份：(1)《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2)《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3)《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4)《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5)《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周恩来将其中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登载在党中央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向全国红军推荐红四军的丰富经验。

按照中央政治局要求，陈毅与周恩来、李立三围绕着红四军的问题多次进行深入讨论。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每次讨论一两个问题。周恩来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令陈毅耳目一新。陈毅自到上海后，阅读了毛泽东在瑞金给中央的“四五”复信和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等材料，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他结合红四军的实际，对所讨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对周恩来、李立三的谈话，他认真记录，反复领会，有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与周恩来、李立三进行商榷。最后，三人委

员会对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在此基础上，陈毅受周恩来委托，就所讨论并取得共识的问题，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对这封指示信认真审阅修改后，于1929年9月2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签发。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1）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2）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3）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4）红军与群众；（5）红军的组织与训练；（6）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7）红军中党的工作；（8）“朱毛问题”；（9）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其核心要点是：

1. 强调要正确估量国内的政治形势，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要以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去打破国民党敌军“会剿”，发展农村根据地。信中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的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特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

2. 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这就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个规定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筹款、发动群众）完全一致并有新的发展，因为它赋予红军“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

3. 对加强红军自身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信中指出：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对加入红军的农民必须“加强无产

阶级意识的领导”，“使之减少农民意识”；红军的组织系统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挥，对外以军政治部号召，但形势发展、赤色区域扩大后，应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将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应建立与健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红军应有严格军事训练，不断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红军实行严明的纪律，但坚决废除肉刑。

4. 强调党应加强对红军的领导。信中明确指出红军中党的组织系统可保持现状，前委之下不设立军委。规定：“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并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5. 强调必须反对军队中的极端民主化。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决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并且指出：“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碍军纪之巩固。”

6. 强调必须“纠正一切不正确倾向”。信中指出：“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7. 明确表示了对朱毛争论问题的态度，指示毛泽东“仍为

前委书记”。信中指出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存在的不足，批评了朱、毛各自工作中的缺点，要求前委：“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①

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对正确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加强红军中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具有极为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陈毅顺利完成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任务后，谢绝了周恩来打算将其派往广西俞作豫部队从事党的工作或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的建议，坚决要求返回红四军工作，传达贯彻中央九月指示信精神，并表示要亲自将毛泽东请回前委工作。周恩来理解和满足了陈毅这一要求，将中央指示信交由他带回红四军。

陈毅离开上海经香港返回红四军，10 月 22 日在东江的松源与朱德等会合后，当晚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后，陈毅将中央“九月来信”和自己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派专人快马送交毛泽东。随后，他与朱德一起率部攻打梅县。攻城失利后，他随前委和部队北上寻乌县，与朱德一起将二百余名伤病员在寻乌苏区作了妥善安置。接着，前委率部到安远县工作了几天。11 月中旬，全军东进入闽，经广东平远县抵达上杭县。

---

①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47—489 页。

1929 年 11 月 18 日，陈毅在上杭县官庄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经陈毅提议，会议正式决定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红四军的当前任务是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赤色政权。陈毅在官庄又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希望毛泽东见信后立即回前委工作。11 月 23 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县城，前委机关亦迁入长汀城。

二　毛泽东重返前委领导岗位

毛泽东于 1929 年 11 月下旬在上杭县蛟洋的苏家坡村收到陈毅从上杭县官庄写给他的来信，十分高兴。他与贺子珍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从苏家坡村出发，于 11 月 26 日抵达长汀城，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

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会议同意前委官庄会议决议，深入分析了红四军现状，认为全军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党务上都亟须有一个时期的整理，决定 12 月份组织全军开展军政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会后，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一起，立即着手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11 月底，他们共同在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对红四军的意见。12 月初，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二次“会剿”。赣敌金汉鼎部由瑞金、会昌县向长汀县进犯。为使红四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军政整训和筹备召开党的“九大”，12 月 3 日，红四军主动从长汀退出南移，第三纵队前出龙岩方向，警戒漳州之敌；第四纵队进驻上杭县蛟洋、白砂之间；军部和第一、二纵队进驻连城县新泉。12 月中旬，三省“会剿”敌军开始向红军逼近，为避敌锋芒，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率全军又开至上杭县古田集中，只派少数部队牵

制和袭扰敌军，军部机关也转移到古田的八甲村。

在新泉期间，全军军政整训正式开始。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训，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起草和准备各种决议案。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的“九大”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将红军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将以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和陈毅在新泉的望云草室，连续几天召开各纵队、支队党代表和士兵代表调查会，详细了解部队当前存在的不正确思想及其表现与危害。毛泽东在新泉还请当地农民代表座谈，了解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部队在古田集中后，军长朱德和军参谋长朱云卿集中精力领导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毛泽东和陈毅则用了十多天时间召集各纵队、支队和一部分大队党代表及政治工作干部，举行讨论会。他们将这次红四军党的“九大”需要讨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成八个方面，并将党代表和政工干部们分成若干组，每个组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夜以继日地亲自起草大会决议案，然后召开前委会议，对各决议案草案预先进行审查修改，以便提交大会讨论。

三 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在毛泽东等领导下，红四军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召开大会的时机业已成熟。1929 年 12 月 28 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开幕。这次大会因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军直属队、各纵队、各支队和各大队党代表，士兵党代表，闽西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军中妇女党代表等，共一百二十余人。

大会由陈毅主持。宣布开会后，他首先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随后，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

大会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大会原定开三天，12月30日结束。因三省“会剿”敌军开始向古田推进，敌情变化，决定缩短一天。

12月29日，大会选举前委领导机构。“大会选举，也事先准备意见，提出要‘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的人才当选，反对从前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的办法，并提出名单，贡献大会。”① 选举结果是：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李力一）、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当选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3人当选为前委候补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分别是：（1）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废止肉刑问题；（7）优待伤病兵问题；（8）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这八个决议案总题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集中体现了红四军“九大”基本精神。其中第一、二、三主要是关于红军党的建设问题；第四、五、八主要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及内部组织问题；第六、七为红军官兵关系问题。八个决议案的内容归纳起来，主旨要义是：

1. 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案严肃批评了红

---

①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55页。

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他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①

2. 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案强调："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② 为此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要坚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③。决议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要求红军中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健全，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3. 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案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

---

①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

③ 同上书，第89页。

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① 决议案分析，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建筑于农民及其小资产阶级成分之上，然党的指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倾向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亦是使这些不正确倾向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原因。为了有效地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决议案指出了红四军党内的八种不正确倾向的表现，分析了产生的根源及其造成的危害，指出了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为此，决议案规定了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

4. 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决议案严肃批评了忽视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和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特别指出那种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观点，以及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实质上是认为“军事是政治的领导”，“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②。决议案规定红军的政治部和司令部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对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职责和职权范围，决议案作出了明确规定。

5. 规定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红军官长必

---

①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86页。

须关心士兵的思想和生活，坚决废止打骂士兵，士兵要尊重官长，接受管理，克服平均主义和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爱护人民利益，尊重地方政府；要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光辉结晶，不仅是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各种决议案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传承和发展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闪耀着毛泽东建军思想和建党思想的光辉。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红四军广大共产党人，都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和决议案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大会决议案所蕴涵的光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创造和智慧的结晶。

红四军党的“九大”结束后，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会的精神迅速地在红四军中传达，并且先后在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其他红军部队，乃至全国许多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中贯彻执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章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组建

第一节　红四军离闽入赣

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古田会议”结束后正值1930年元旦。红四军全军上下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地欢庆新年，同时也在准备打退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的第二次“三省会剿”。

正值此时，毛泽东又在思考着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直接提出者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

林彪能打仗，但是思想意识不够健康，本位主义思想较严重，有时不顾大局，曾造成红四军大余战斗失利、寻乌圳下军部遇险等严重恶果，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红军官兵的指责。他历来对做艰苦细致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感兴趣，喜欢走州过府打大城市，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对时局的估量较为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1929年5月18日在前委召开的瑞金壬田扩大会议上，他不仅不愿将一纵队的人和枪调出支援别的纵队，还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在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一方面支持毛泽东同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

误思想作斗争，一方面又蓄意攻击军长朱德，挑拨朱、毛之间的关系，在“七大”会上与刘安恭一起，煽情起哄，受到陈毅等人的批评。陈毅从上海返回红四军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特别是红四军“九大”召开以后，林彪的思想有所震动，于是，他趁大家高高兴兴过新年之机，以“祝贺新年”为名分别给毛泽东和陈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趁过年之机，我们举行一个会议，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希望提出批评。

陈毅对林彪的进步表示欢迎，很快给林彪复信一封，予以鼓励，并对林彪的主要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引起了深思。他虽然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得到了林彪的支持，但他对林彪不重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一直甚为忧虑。他知道林彪的想法非一人之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又是个事关全局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近一年来，毛泽东对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与井冈山时期相比，又有新的深化和飞跃。特别是他阅读了中共中央《红旗日报》围绕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和中央“九月来信”后，颇受启发，使他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日趋成熟。现林彪来信征求意见，毛泽东便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以党内通讯的书面方式，将自己这方面的认识和想法写出后刊印出来，发给林彪，同时也发给红四军和全党同志，以求得某种共识，并借以教育全军将士。

毛泽东此时因忙于指挥红四军二纵队突袭龙岩小池的国民党军刘和鼎部，掩护一、三纵队向连城行动，1930 年 1 月 4 日回到古田后，他在赖坊村协成店住地连夜给林彪赶写回信。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点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

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实际，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①

接着，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的右倾悲观、不愿做艰苦的建立根据地工作的错误。他以大量的篇幅，充分地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还明确提出，要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紧密结合。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舍此没有别的出路。他在信中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② 毛泽东在信中预言：“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③

毛泽东写好这封信，交给红四军政治部，用钢板刻写油印，发至红四军党内领导干部传阅。毛泽东的这封信，是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之后又一篇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它的发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页。

② 同上书，第55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表，标志着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确立和形成。此文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经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二 红四军离闽入赣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九大”时，全军给养已发生困难。会后，红四军前委根据敌军“三省会剿”态势，决定由朱德等率第一、三、四纵队出击连城筹款，留下第二纵队在龙岩方向掩护主力行动。1月5日，朱德率部抵达连城。已进至长汀县涂坊和上杭县旧县的江西“进剿”军，发现红四军主力已到连城，遂向连城追来，并隔断了红四军主力与留在古田地区的红四军第二纵队的联系。朱德根据这一情况，遂于1月7日决定率部离开闽西进军江西，以吸引江西“会剿”军金汉鼎部离闽回赣。1月9日，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进抵宁化县，随后西越武夷山进入江西石城县境，16日占领广昌县城，接着西入宁都县东韶地区，准备攻占乐安、永丰等县。

红四军第二纵队在龙岩县小池完成阻敌任务后，立即返回古田。毛泽东尚未得知敌情变化和红四军主力已改变行动方向，仍决定二纵队按原计划开向龙岩县梅村，以与在连城的红四军主力会合。就在这时，毛泽东在古田接到了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通报闽西苏区军民反“会剿”情况的急信。邓子恢在信中担心红军主力离开后闽西苏区可能受损失的忧虑。毛泽东阅信后即在信封上写下“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八个大字，交来人带回，说明红军离开闽西将把敌“会剿”军引走，敌之“会剿”将不攻自破，以增强闽西苏区军民反“会剿”斗争胜利信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个“八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率红四军二纵队向龙岩县梅村前进途中，得知朱德已率主力向宁化方向前进，便连夜追赶，经清流、归化（今明溪）、宁化，1月19日入广昌县境，20日在广昌县赤水击溃广昌县靖卫团，活捉国民党广昌县长。在行军翻越武夷山时，毛泽东豪迈地吟就《如梦令·元旦》词一首，描绘了武夷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景象。

在广昌，毛泽东得知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已到宁都县东韶，立即率二纵队前往该处。1月23日，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在东韶胜利会合。行军途中，毛泽东又在马背上吟成《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一首：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第二节　红六军的组建与红军赣南“三月分兵”

一　红六军的组建

红四军各纵队在宁都县东韶会合后，毛泽东即在东韶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各纵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扩大红色区域。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占取乐安县，第二纵队进占永丰县滕田，第三纵队占领永丰县城，第四纵队会同宁都赤卫队及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进占宁都城。全军指挥中心设在永丰县滕田。预计各纵队工作时间为一个月。

红四军自1929年5月中旬离开江西后，赣西南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地方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纷纷建立，赣西革命武装

还发动了攻打吉安城行动。1930 年 1 月 18 日，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雩田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赣西和湘赣边界特委合组为中共赣西特委，并决定将赣西和湘赣边界活动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和各县赤卫队集中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红六军军长黄公略，军党代表（后称军政治委员）刘士奇（兼，1930 年 2 月改由陈毅担任），军参谋长曾昭汉，军政治部主任毛泽覃。全军初辖三个旅（全军组建后不久旅改为纵队）：第一旅由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三团组成，旅长（后称司令员）柯武东，党代表（后称政治委员）李文林；第二旅由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第五团组成，旅长罗炳辉，党代表曾炳春；第三旅由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组成，旅长徐彦刚，党代表刘作述。全军两千余人、枪。

二 陂头联席会议召开

但是，赣西党组织领导人与中共江西省委派来的巡视员江汉波之间，在指导赣西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发生了意见分歧。江汉波反对赣西革命武装围攻吉安城，不赞成开展土地革命和实行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政策，对建立红色政权和组建红六军不热心甚至予以非难，对中央巡视员潘星元和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亦有一些非政治的批评意见，削弱了他们的威信。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赣西革命斗争的发展。

恰在这时，中共赣西特委和新成立的红六军军长黄公略得知红四军到了永丰县滕田，即派出代表前往红四军前委汇报赣西情况，请求前委帮助解决问题。而红四军前委根据江西当前的局势，亦决定加紧实施原先制订的“一年争取江西”步伐，在滕田已分别给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及红二、四团

（前委尚不知已成立红六军）发出一封长信，说明目前时局及应计划夺取江西的任务，并且提议于2月10日在吉东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前委在听取了赣西特委代表汇报后，遂决定将原定2月10日召开的联席会议，改为2月6日至2月9日在吉安渼陂村召开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此次会议因在2月7日正式召开，故史称“二七”会议。

出席会议的除前委代表团外，有赣西特委、红五军和红六军军委代表、赣西各行委和县（区）委负责同志、红六军各纵队负责人等五十余人。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第60号通告精神。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是：1. 明确提出了赣西南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2. 确定了“攻打吉安”的总目标和行动部署。3. 讨论并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即“二七土地法”）。4. 会议还要求各武装割据区域都必须迅速建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壮大地方革命武装。[①]

为统一和加强对各红军部队和赣、闽、湘、鄂、粤各红色割据区域革命斗争的领导，联席会议决定将原中央任命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及领导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色区域斗争的共同前委（以下简称“红军前委”），由毛泽东、郭贞、曾山（曾珊）、王怀、方志敏、朱德、潘星元、

① 《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17人组成；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星元（潘心元）5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会议决定重新成立中共红四军军委，领导全军工作，指定潘星元为军委书记（未到职），军委委员有朱德、潘星元、林彪、熊寿祺、伍中豪等和士兵代表数人。会议还决定将原赣西、赣南、湘赣边三个中共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同年3月22日至29日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刘士奇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因赣南特委代表团途中受阻未能参加会议，2月15日在兴国县北部的城岗专门召开了赣南工作会议。

三 水南、值夏之战痛歼唐云山旅

“二七”联席会议后，红四军根据会议确定的“占领吉安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一总目标，遂向吉水县推进，以对吉安城形成包围态势。正当红军准备进攻吉水时，江西国民党军向赣西南苏区和红四军发动了新的进攻，其张辉瓒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进到乐安，第五十二旅进到宜黄，第十二师主力由闽西返回到宁都。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更是骄妄冒进，孤军深入到距富田苏区仅20公里之水南、富滩、值夏一线，企图进攻东固苏区。

此时，红四军主力和红六军二纵队正集中在吉安县富田休息。毛泽东和朱德经过多方商议，认为这是歼灭唐云山旅的好时机，遂果断决定暂停攻打吉水，作出了歼灭唐云山旅的战斗部署。

2月24日凌晨3时，红四军与红六军第二纵队悄悄从富田出发，以一部牵制值夏、富滩之敌，主力直扑水南。晨7时，红

军趁敌开早饭之机向敌两个营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毫无准备的敌军慌忙丢下碗筷，四处乱窜，拼命朝值夏、富滩方向逃跑。红军猛追逃敌，将蜂拥过桥的敌军扫落水中，仅半个小时，就将水南之敌两个营悉数全歼。25 日拂晓，红军以一部向敌侧后施家边迂回，抄敌后路；主力向值夏、富滩之敌发起猛攻。激战一整天，再歼敌两个营。残敌两个营在敌旅长唐云山带领下，仓皇从施家边附近抢渡赣江，逃回吉安。

这次战斗，红军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四个营，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步枪近两千支、机枪二十四挺、迫击炮八门、子弹百余担。原红五军特务连负责人、1929 年 2 月初随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游击时途中与部队失去联系、后为寻找党组织被迫到唐云山旅当兵的宋任穷，就在这次战斗中乘乱带领十余名残兵主动向红军缴枪，重新回到了红军队伍。

这次战斗胜利，不仅击退了江西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攻，保卫了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红色区域，而且为红军后来实施“诱敌深入”方针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　红军赣南“三月分兵”

歼灭唐云山旅后，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值夏休息数日。红军前委决定红四军全部和红六军二纵队一起乘胜北进，由吉水、新干直下樟树镇。到樟树后，如不能北入南昌即由樟树折回抚州，在赣东一带工作；同时以各县赤卫队进驻吉水、永丰，扩大赣西南苏维埃区域。但当红军北进到吉水乌江南岸时，却遇江水不能徒涉，同时发现敌第十八师两个旅和唐云山旅残部已集结于永丰、吉水一线，阻击红军北进。前委遂在乌江南岸召开扩大会议，调整部署，红军主力退回水南休息。

在水南，前委与赣西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

敌我态势后，决定红军主力既不向北进，也不能向西，只能向东向南。向东有两个前途：一是到广昌入福建之建宁取得给养后，再入闽北或闽西；二是由乐安崇仁入南丰，然后或入抚州，或入横峰，再与方志敏部会合，到浙赣边界一带扩大红色区域；向南即去打赣州。讨论结果决定取由广昌入建宁路线。

1930年3月10日，前委率红四军全部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开至东固集结休整，伺机行动。这时，前委接到于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来信要求红军前往帮助攻打马安石的上宝土围，同时获悉兴国、于都没有国民党军驻守，毛泽东、朱德决定移师兴国。3月12日，红四军进抵兴国县城。

红军在兴国停留四天。期间，红军前委获悉驻赣州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已于3月9日离开赣州，入闽争夺地盘，与卢兴邦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师交战，赣州城防空虚，遂决定红四军全部南下乘虚攻打赣州，只留红六军第二纵队由陈毅率领，由兴国南部东出于都，开展地方工作。

3月16日，红四军抵达赣州城郊，当日从东、西、南三面发起攻城战斗，遭到城内守敌顽强抵抗。经深入侦察，发现原先对守城敌军兵力判断的情报不准确，守敌不是一个营，实为一个旅两个团。加上战前未预先观察地形，各部未按时发起总攻，在战斗中部分指挥不当等原因，攻城未克。毛泽东从兴国赶到赣州红军前沿阵地，经仔细观察询问，觉得赣州易守难攻。红军前委决定放弃攻打赣州。红军部队当晚撤出战斗，分驻赣州城郊监视敌军，前委机关驻于赣州城郊沙石埠村的楼梯岭。

1930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在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前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红军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国民党军三个旅以上兵力，红四军暂不宜北进；赣南仅赣州城驻有一旅敌军，闽西只有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张贞

部，广东东江也只有国民党一旅兵力。赣南、闽西、东江三地敌军兵力都较空虚，正是红军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机。于是会议作出决定，红四、五、六军以三个月为期，在赣南、赣西和闽、粤边境分兵游击。

当日，前委在楼梯岭发出关于“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的《前委第三号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首先对红军各部队的分兵游击区域作了划分：“红军第四军的行动应该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其游击区域是：赣南之赣县、于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之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各县；闽西之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各县。六军二纵队的游击区域三个月内应该是万安、赣县东乡、于都北乡、兴国东乡、宁都南乡和广昌、石城各县。六军一纵队的游击区域是吉安、安福、分宜、宜春、新喻、峡江、吉水、永丰、乐安、新淦各县。六军三纵队则是泰和西乡、遂川、万安各县。赤卫队的二十二纵队（应为二十五纵队——引者注）应与六军二纵队的行动配合，担任兴国全县、于都北乡、宁都全县的红色区域的完成，宁南游击队则担任广昌、南丰、宜黄的红色区域完成。红军第五军，第一步与六军二、三纵队的行动配合，完成赣河上游的工作（泰和、遂川、上犹、万安等县），第二步应开返五军的根据地湘鄂赣边一带，推广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并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通告》明确指出：此次“分兵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下，若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通告》同时指出：“分兵游击一时期后，因为别一种环境的需要和夺取闽南发展赣东等地，便应该集中行动。所以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

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①

《通告》在系统总结历年来红军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后，还明确提出了此次分兵游击的要求：第一，必须坚持“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方针；第二，必须坚持“伴着发展（即波浪式向前发展——引者注）的工作路线”；第三，必须武装农民，帮助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第四，必须大力训练地方干部；第五，必须做到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第六，必须正确处理好红军党部与地方党部的关系。

按照上述部署和要求，红军各部迅速行动。

红四军第三纵队于3月19日护送伤员从赣州城郊出发，向于都推进，3月20日到达赣县江口，工作两三天，随后继续北进，经于都县峡山、罗坳、岭背、仙下，3月下旬到达于北桥头根据地。这时红六军二纵队也从兴国出发，到达赣县田村、白鹭，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了赣县革命委员会和白鹭区苏维埃政府。3月下旬，红六军二纵队到达于北桥头，与红四军三纵队会合，在于北地方革命武装的紧密配合下，在桥头饭甑崇设下埋伏，给尾随红四军三纵队进犯桥头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三十四旅第六十八团以重创。战斗中，敌六十八团中共地下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乘机鼓动该团二营几十人火线起义，拖枪加入红军。战斗结束后，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北乡南下于都南乡，帮助召开了于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于都县苏维埃政府。4月中旬，三纵队经于都南部到达安远县境。红六军二纵队由陈毅、罗炳辉率领，按计划开赴宁都、瑞金、于都边界地

① 《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于赣州城郊楼梯岭），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9—491页。

区工作，在于都东乡的沙心帮助建立了于瑞会边区苏维埃政府，5月间到达会昌县境。

红四军另一路由第一、二、四纵队组成，毛泽东、朱德亲自率领，3月20日从赣州南郊出发，3月21日其右路克南康县唐江镇，左路进占南康县龙回。22日，打入龙回靖卫团任团总的共产党员朱佩隆，在红四军帮助下率靖卫团起义，编为南康县赤卫大队，随后在龙回宣布成立南康县革命委员会。23日，红四军第二纵队由南康县赤卫队配合，攻占南康县城，打开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群众，接着恢复了中共南康县委，并帮助成立了三个区的区、乡红色政权。24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六十七团从赣州追来。红四军主动撤出南康县城，会合一、四纵队向大余县推进，26日清晨进占大余县城。27日，红军前委由毛泽东主持在大余召开了信丰、南康、南雄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28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有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南雄六县党的活动分子和红四军部分党员干部参加的赣南西河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西河行动委员会，对西河各县革命斗争作出了部署，并帮助组建了赣南红军新编第二十六纵队。

4月1日凌晨，红四军由南雄县游击队作向导，经梅关向南雄县推进，在南雄县的新路口、石子岭连打两个胜仗，击溃国民党粤军吴文献部两个营，当日下午5时进占南雄县城。红四军在南雄休整一星期，教育处理了几百名俘虏，宣传发动群众，筹款四万元。

4月7日，红四军按原计划经南雄县乌迳、信丰县九渡、禾秋、大小窝，在红二十六纵队和信丰群众配合下，4月11日攻克信丰县城，活捉国民党信丰县长吴兆丰，击毙信丰县警察队长王覃勋，歼灭信丰、南雄、安远等县警察队、靖卫团近千人，缴枪五百余支。接着，红四军继续向安远、会昌两县推进，4月15日到达信丰县新田圩，帮助成立新田、金鸡两支赤卫队。随后红

军分兵两路：前委机关和一纵队往会昌县；二、四纵队往安远县，消灭了安远县靖卫团。4月17日，一纵队攻克会昌县城。20日召开会昌县城群众大会后，朱德率一纵队继续向寻乌方向开展工作；毛泽东和前委机关及一纵队纵队部留驻会昌城。毛泽东听取了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徐复祖关于盘古山地区革命斗争情况汇报，接见了前来要求参加红军的三百余名盘古山青年矿工和农民，帮助成立了中共安（远）、于（都）、会（昌）、赣（县）边界特区委和赣南红军第二十二纵队。毛泽东还根据徐复祖提供的材料，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仁风山及其附近》。5月4日，他又给中共安于会赣边界特区委书记刘义顺（徐复祖）写去一信，对四县边界地区的土地斗争作了指示。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四县边界红色区域很快形成。

5月2日，红四军一纵队在寻乌红五十团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6日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5月7日，安远县也在红军帮助下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闻讯红军攻占寻乌县城后，即率前委机关从会昌县前往寻乌县，住在县城西井巷天主堂。这时，红四军各纵队已按计划分布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县宣传发动群众。因闽粤赣边界敌军力量薄弱，战事较少，毛泽东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时机，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下，在寻乌县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天主堂，邀请寻乌县商会会长郭友梅等数十名各界人士，召开调查座谈会，用半个多月时间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并且写作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

红六军第一、三纵队在军长黄公略率领下，按照前委三号通告的布置，分别在永新、泰和、万安和安福、新喻（新余）、峡江等县做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5月16日，红六军一举攻下安源，动员四百名矿工参加红军。随后攻打湖南

浏阳县，缴获靖卫团枪支两三百支。在萍乡、宜春和醴陵等地，帮助建立了当地游击队。

红五军第一、三、四纵队由军长彭德怀、军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领，3月23日攻克袁州（宜春），俘敌千余人。4月初又攻占万载、铜鼓，4月4日至5日，先后占领湖南浏阳县高平镇、东门市和文家市。5月3日，全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在湖南平江县长寿街胜利会师。至5月底，已初步打通了湘鄂赣苏区与赣西南苏区的联系。

红军此次“三月分兵”部署得当，任务明确，方针正确，领导有力，因而进展顺利，秩序井然，收效显著。

第三节　红二十、二十二、三十五军的组建与八打吉安、五打赣州

一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的组建

赣西南原有的地方革命武装，于1930年1月大部编入红六军。为适应赤色割据和攻打吉安的需要，赣西南各县又积极组建新的革命武装。1930年6月间，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将赣西南红军第四、十一、二十、三十等纵队和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下属之东、西、南、北四路纵队在吉安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初定“以红军二十五纵队编为二十军第一纵队，有枪三百余支，北路五百余支地方武装编为第二纵队，西路三百余支为第三纵队，中路三百余支，编二百余支为第四纵队（各路还有少数武装编入）。赣南全部武装准备以一部来扩充二十军，以大部扩充四军的势力。军长是曾炳春，政治委员是陈东日……参谋长是陈伯钧”[①]。但当时并未向

①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240页。

外宣布。1930年7月上旬，红二十军在吉安县渼陂村正式成立。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谢汉昌任军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任军参谋长。该军成立后即担负第八次攻打吉安的主攻任务。1930年10月初配合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红二十军军长改由刘铁超担任，曾炳春改任军政治委员，谢汉昌仍为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改由钟效蔚担任。全军有枪两千五百余支。初编时下辖四个纵队，不久改为团的建制，设一七二、一七三两个团。1930年10月新编一七四团。一七二团由吉安、兴国、赣县、宁都、于都等县地方游击队组成，团长萧大鹏（后为杨念兰）；一七三团由永丰、吉水、安福、峡江等地游击队编成，团长刘承禄，政治委员陆松宜；一七四团由永新、莲花、宁冈等县游击队和安福、茶陵、攸县的部分游击队组成，团长李学俊，政治委员刘敌。军部直属教导队、卫生队和机枪连。1931年3月在赣江河西增编了一七五团。红二十军归红一军团建制，全军曾发展到有三千余人。1931年7月因“富田事变”被撤编解体。

二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的组建

赣南继1929年下半年在兴国、安远、桥头、寻乌等苏区先后建立红二十三纵队、红二十五纵队、红二十七纵队和红五十团后，1930年3月至6月间，又在安（远）、于（都）、会（昌）、赣（县）边区建立了红二十二纵队，在瑞金县建立了红二十四纵队，在河西信丰、南康、大余、南雄等县共同建立了新编红二十六纵队，在赣县建立了红二十八纵队。全赣南赤色常备武装组织人数，1929年10月只有1960人、840支枪，到1930年5月即发展到有14320人、4550支枪。1930年7月，赣南革命武装斗争的区域扩大到13个县。赣南17个县除赣州、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外，“其他国民党政府都经过一次以上的推翻，消灭了

两个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万数以上的地主豪绅一切反革命分子，收缴了3000以上的反动武装（红军收缴的不在其内）”①。

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和红一军团前委决定，由原红六军政治委员陈毅负责，将赣南地方红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纵队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陈毅受命后，即将随红四军到达汀州的赣南红军新编第二十六纵队和开赴长汀整训的瑞金红二十四纵队集中，先在长汀组建起红二十二军第一、二、四纵队。1930年6月23日，陈毅率一、二、四纵队离开长汀返回赣南，完善建制，扩充队伍。7月，陈毅到达于都县城，和中共东河行委一起，组建红二十二军军部，调集红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纵队归编。8月10日，陈毅率军部和已集中的部队从于都县城出发，西渡桃江到达信丰县城。途经赣县时，将红二十八纵队归编。全军各纵队分驻信丰各地整训并做群众工作。9月下旬，红二十二军组建基本完成，在信丰县城校场坝召开大会，正式宣告红二十二军组成。军长陈毅，副军长罗贵波，军政治委员邱达三，军政治部主任罗寿男，军参谋长钟效蔚，军特派员毛泽覃（未到职），军秘书长刘义顺（徐复祖）。全军辖有第一、二、三、四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陈紫峰，政治委员黄达；第二纵队纵队长唐天际，政治委员钟锡球；第三纵队纵队长杨斗文，政治委员谢芳湖（后罗贵波）；第四纵队纵队长张文焕，政治委员钟声楼。1930年10月，驻赣州的国民党三十四旅六十八团二营两百余名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彭加伦等领导下于大余县新城起义，加入红二十二军，编为第五纵队，纵队长王透，副纵队长嵩新胜（后改任纵队长），政治

① 《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第185页。

委员彭加伦。至此，全军共有两千余人，枪两千余支。

红二十二军一边组建，一边担负起消灭赣南地主武装、赤化赣南的艰巨任务。1930 年 10 月初，奉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紧急命令，红二十二军离开赣南，前往吉安接替红二十军防务，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江西省党政机关向根据地中心撤退。在吉安，将第一、二、三、四纵队改设为两个师：第六十四师，师长唐天际，政治委员黄达，下辖第一九一团、一九二团；第六十五师，师长杨斗文，政治委员何开荣，下辖第一九三团、一九四团；第五纵队改为军部特务团，团长王透（后嵩新胜），政治委员彭加伦。军部机关未变。1930 年 11 月 22 日，红二十二军完成掩护任务，全军东渡赣江转移到宁都县黄陂集结，划归红十二军指挥，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三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五军的组建

红二十二军组建后，赣南各县还留下一批地方武装力量。1930 年 10 月底，为夺取赣州，赣南的地方武装又奉令“绝对集中”，编为第三十五军。11 月下旬，红三十五军在信丰县城正式编成。军部领导人为：军长邓毅刚（原闽西红二十一军军长），军政治委员罗贵波，副军长曾毅生，军参谋长鄢一心，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禧，军需长邝任农。红三十五军虚设三个师，暂不设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第三〇七、三〇八、三〇九、三一〇四个团。后又改设为五个团：第一师第二团，由赣县、兴国地方武装编成，团长吕德贤，政治委员马荣澜；第一师第三团，由瑞金、于都和桥头（于北区）地方武装编成，团长谢桂荣，政治委员商辑伍；第二师第五团、第六团由安远、寻乌和闽粤赣赤卫军等地方武装编成，第五团团长谢荣蔚、政治委员孙亮恢，第六团团长邝佐、政治委员赵尚林；第三师第七团，由信丰、南康和赣粤

边界地方武装编成，副军长曾毅生兼任团长，邝世叔任政治委员；军部特务营由寻乌县赤卫大队编成，营长陈必达。红三十五军编成后，全军编员不足，武器很少，战斗力不强，但士气旺盛，官兵斗志高昂，曾攻克大余、安远、瑞金等县城。

四　八打吉安与五打赣州

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9月，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与数十万革命群众紧密联合，曾先后组织发动了八打吉安与五打赣州的壮举，其规模之大、声势之雄，空前未有，惊天动地。

（一）八打吉安

“攻打吉安”的口号，是中共赣西特委于1929年10月底提出的。11月初，开始发动第一次攻吉行动。赣西吉安、吉水、安（福）分（宜）县和泰和等地群众在攻吉口号鼓舞下奋起暴动，五万多农民以区为单位，组成九路农民纵队，配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行动，扫清吉安外围之地主武装，赤化吉安周围广大区域。1929年12月下旬，红五军一、三纵队从湘鄂赣边返回湘赣边与第四纵队会合，1930年1月红六军组建。红五军、红六军分别在赣江东、西两侧向吉安逼近，形成对吉安城包围之势。这次围攻吉安城历时三个月，虽未奏效，却建立了赣西13个县五十多个区的苏维埃政府。

第二次攻吉行动在“二七”联席会议之后。当时，联席会议主席团于1930年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号《通告》，对攻打吉安作出了部署。由于江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调集七个旅兵力“进剿”赣西南，红军前委指挥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攻吉计划未能实现。

第三次攻吉在1930年“五一”前夕。攻吉发起后，打败了吉水的封建反动武装“红黄学会”，恢复了水东、儒林的工作。

第四次攻吉在1930年5月9日。赣西南特委组织了以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为书记的攻吉前委，调集十万余群众武装包围吉安城七天。这次攻吉由于担负主攻的红六军一、三纵队未赶到，西、北两路群众武装没有如期行动，只是中路群众武装隔河向吉安城攻击，故毫无成效。

第五次攻吉在1930年5月下旬，由中路单独发动，也只是隔河打了一阵，牵制了进攻北路赤色区域之敌。

第六次攻吉在1930年6月底。是年5月中旬，中共赣西南特委总结第四次攻吉失败教训，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西、北两路，并将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机关迁至赣江西岸的吉安县永阳镇。6月中旬，赣西南特委探悉原驻吉安的敌成光耀旅已撤走，前来接防的敌新编第十三师邓英部尚在樟树，吉安城内只有第十二师的两个营，兵力空虚。特委立即抓住机会，以赣西红军第四、十一、二十等纵队和红军学校学员为主力，调集10万群众配合，分左、中、右三路，发动攻吉。总攻战斗6月28日上午打响。左、右两路先后攻占城外真君山、天华山、螺子山，中路也强渡赣江打到了神岗山，攻击天华山的队伍还打进了城西郊赵公塘，但因敌人工事坚固，突击受阻。为减少伤亡，特委下令撤出战斗。这次攻吉，歼敌百余人。

第七次攻吉在1930年7月初。第六次攻吉部队撤归途中，黄公略率红六军一、三纵队已经赶到。赣西南特委当即决定调回各路攻吉队伍，配合红六军再次发动攻吉。7月1日，红六军开始攻击。7月2日，各路攻吉群众武装赶到，投入战斗。城内敌军凭险固守，红军猛攻数次均未奏效，双方均伤亡四百余人。7月5日，攻吉战斗宣告停止。

第八次攻吉发生在1930年8月25日至9月5日，前后历时十天。这次攻吉是受到红一军团打南昌、红三军团克长沙的鼓舞而实施的。攻吉前，成立了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并在东、南、西、北各设立赤卫军总指挥部。参加攻吉的红军部队有红二十军、红军学校和青年干部学校学员，还有吉安等数县十万工农群众配合作战。8月25日，攻吉战斗打响。红二十军在高沙歼敌一营，溃敌一团，俘敌四百余人，缴枪四百多支。9月5日发起总攻。但红二十军和北路赤卫队在攻打真君山敌阵地时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两三百人，因干部损失甚多，战斗无法继续下去。赣西南特委遂决定红二十军撤出战斗，留下独立团、冲锋队、破坏队等地方武装，继续取包围态势骚扰吉安城。

赣西南地方红军和革命群众八次攻打吉城的壮举，虽然均未能攻克吉安城，却给江西敌军以极大威慑和震动。第八次攻吉后，吉安已成一座孤城，这就为后来主力红军第九次攻打吉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二）五打赣州

在赣西南地方红军和群众八次攻吉的同时，中共赣南东河行委和南路行委也指挥革命武装和群众，从1930年5月起，先后五次围攻赣州城。

第一次攻赣在1930年5月9日。这一次主要是配合第四次攻打吉安，而不是直接攻赣。赣南东河行委动员兴国、赣县14万武装群众占据了赣县良口、储潭，扩大了兴国和赣县西北苏区，打通了与赣西的赤色联系。

第二次攻赣在1930年5月下旬。主要是为配合赣州城内国民党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六十八团地下党举行兵暴。但因六十八团兵暴组织不充分未能如期举行，同时赣县七坊和于都县马安靖

卫团乘机进犯兴国县城，兴国参加攻赣的队伍不得不中途撤回保卫兴国城；加上红四军二纵队未按计划赶来攻城，结果未发起攻赣行动。

第三次攻赣是为直接配合赣州城内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六十八团地下党领导举行兵暴。兵暴时间定在6月7日晚，兵暴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城外的攻城队伍也已调集并已进入阵地，不料参加兵暴的骨干在6月7日傍晚不慎泄漏机密，兵暴计划被三十四旅旅长马崑察觉，16名领导兵暴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士兵当晚被捕遇害，攻城未能如期举行。

第四次攻赣在7月底。这一次虽有所动作，但未成气候。

第五次攻赣在8月下旬至9月初。参加攻城的队伍有数万人，以红二十二军为主攻部队，“昼夜猛攻，退而复骤”[①]。后由于广东国民党军前来增援城内守敌，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只得撤围而去。赣南地区的五次攻赣与赣西地区的八次攻吉一样，虽未成功，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掀起了赣南群众武装斗争的热潮。

第四节 闽西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与红九、二十、二十一军的组建

一 闽西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

在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3月成立）的领导下，闽西苏区地方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继1929年6月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后，从1929年秋到1930

① 赣州市档案馆保存件《国民党赣州县党部给南京政府电》（1930年8月21日）。

年春，闽西各县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极为普遍，凡16岁至45岁的男子和青年女子，都加入了赤卫队或少先队。各区苏维埃政府则建立了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人数由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他们的武器，除土枪土炮外，还有些较好的步枪和手枪。长汀、龙岩、上杭、永定、连城五县，都建立了由县苏维埃政府（或县革命委员会）指挥的赤卫团或独立团，每团有三百人至五六百人，武器一般都是步枪，有相当的战斗力。据1929年统计，闽西地方武装已发展到有枪五千余支。这为闽西主力红军的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的组建

1930年1月红四军第四纵队随红四军主力转战江西后，中共闽西特委就用升级的办法，于1930年3月底将各县赤卫团升编为闽西红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邓伟，政治委员高静山，政治部主任陈正，参谋长邓壹。全军共组建六个团：龙岩红一团，上杭红二团，永定红三团，连城红四团，长汀红五团，以后上杭又编组了红六团。

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指示闽西红军应编为第十二军。据此，遂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改番号为第十二军。军部领导人也作了调整：军长邓毅刚，政治委员邓子恢，政治部主任陈正，参谋长邓壹。全军仍下辖六个团，原红九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团依次改为第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一〇三、一〇四、一〇五团。全军共三千余人，两千余支枪。

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的组建

1930年3月底闽西各县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军团后，闽西各县又将各区的赤卫队抽调到县，成立了县赤卫军总队，每县尚有

3—5个连。同年5月中旬，奉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之命，红十二军全部向广东东江地区出击，闽西苏维埃政府又抽调各县赤卫军部分武装，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胡少海任军长，邓子恢（一说黄苏）为政治委员。全军初编3个纵队：龙岩一纵队，700人，400支枪；上杭二纵队，600人，400支枪；永定三纵队，700人，400支枪；后来又编了两个纵队：连城四纵队，300人，200支枪；长汀五纵队，900人，500支枪。此外，还有武平游击队，200人，150支枪；平和游击队，200人，150支枪，也编入红二十军序列。全军共3600人，2200支枪。[①] 红二十军组建后，主要活动于闽西各县，扩大和巩固苏区。

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的组建

1930年6月中旬，出击东江的红十二军返回闽西苏区，适逢红四军第四纵队也随红四军主力由江西返回闽西龙岩。根据闽西苏维埃政府建议和红军前委决定，红四纵队留守闽西，与红二十军第一纵队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胡少海任军长，邓子恢任军政治委员，陈正任军政治部主任，邓毅刚任军参谋长。全军共辖五个纵队：原四纵队第七支队为第一纵队，第八支队为第二纵队，第九支队为第三纵队，原红二十军第一纵队改为第四纵队，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五纵队。总兵力两千余人。红二十一军成立后，在闽西苏区扫除残余地主武装，巩固苏区内部，取得重大胜利。但在1930年8月5日攻打永福敌炮楼时，军长胡少海牺牲，伍中豪继任军长。此时，李立三“左”倾冒

① 参见李炳钧、黄金隆《闽西红二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龙岩军分区、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闽西地方武装概略》，1986年10月，第9—13页。

险主义在闽西的代表人物对红二十一军的行动予以严厉指责，邓子恢的军政治委员被撤销，改由李任予担任。从1930年8月至10月，红二十一军盲目执行中央指令，两次冒险出击东江，均遭惨重损失。至同年11月，全军仅剩八百余人。1930年11月，红二十一军与红二十军一起缩编为三个步兵团，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即新编红十二军）。

第五节　红四军第三次入闽与红一军团成立

一　红四军第三次入闽

1930年5月，毛泽东结束寻乌调查后，和朱德一起在寻乌马蹄岗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1）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2）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3）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4）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5）说服教育重于惩罚；（6）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7）赏罚要分明，应赏则赏，该罚则罚。这七条原则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古田会议有关决议精神，使红军的管理教育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

按照前委第三号通告分兵游击的部署，1930年6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寻乌县出发，经寻乌县吉潭、剑溪，越过闽赣边界大山，进入福建武平县境，在武平溪头圩击溃武平钟文才保商队，6月2日红四军与红六军二纵队会合进占武所，随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武平县城。红军各部队分散在武平县和上杭县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亦利用这一机会来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并于6月15日在长汀县南阳（今属上杭县）主持召开了红军前委与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重点研究如何解

决土地斗争中遇到的流氓问题和富农问题，讨论通过了《流氓问题》和《富农问题》两个决议案。

二 李立三“左”倾领导者对红军的错误指令

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游击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之时。

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党的“六大”时就已存在“左”倾思想。1929 年下半年开始，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左”倾“进攻路线”影响下，“左”倾思想更加膨胀，连续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他的“左”倾观点和主张，认为红军应抛弃游击主义和农村割据，集中力量进攻中心城市。

1930 年 3 月初，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能力甚弱，李立三便成为党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周恩来刚离开上海，3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李立三就在会上提出，要朱毛红军会合赣西南黄公略的红三军（即原红六军），去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汉暴动。他认为，武汉的革命力量已很强大，可以发动工人市民暴动，夺取武汉，建立湖北省革命政权。中央政治局竟同意了李立三的意见。

为促使毛泽东、朱德放弃“割据政策”，进攻中心城市，1930 年 4 月 3 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粤、赣、闽三省省委转发给红四军前委一封指示信，严厉批评红四军前委提出的“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和“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是“极端错误的”，“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

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①]。指示信还不顾事实，批评红四军主张并坚持实行的先发展群众地方武装再通过升级扩大主力红军的正确策略，指责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你们还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第二，你们错用了分散的去武装农民的策略；第三，没有从各方面来动员广大群众踊跃的加入红军。这是你们当前严重的问题。”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将“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以实现争取一省数省政权的任务。[②] 指示信还要求毛泽东立即前往上海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实际是要毛泽东前去接受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主张。

毛泽东对中央的上述错误决定表示拒绝执行。他没有去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而是留在赣南做“寻乌调查”，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党内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发出了挑战。李立三对此十分不满。1930 年 6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在会议报告中严厉点名批评毛泽东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③]

接着，1930 年 6 月 11 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 页。

② 同上书，第 59—60 页。

③ 同上书，第 108—109 页。

胜利》决议案。决议案重申“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强调：“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①

为了督促毛泽东、朱德尽快“转变观念”，李立三先委托蔡申熙向红四军前委口头传达中央指示。1930 年 6 月 15 日，李立三又专门就执行新的中央路线问题，再次以中央名义致信红四军前委，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信中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达，虽然我们的信都比较简单，蔡同志口头传达又不充分，但完全都是根据中央的路线，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

信中批评说：“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

指示信最后严厉指出：“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你们一定要坚决地猛烈的扩大红军，要决心歼灭军阀力量。……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8 页。

② 同上书，第 139—140 页。

这完全是一种非执行不可的“最后通牒”的口吻，不容毛泽东等前委领导置辩。

三　红一军团成立

中央除发信指令外，又派出涂振农为中央特派员专程赴红四军，于1930年6月中旬来到长汀城，向正在出席红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席会议的毛泽东等人，传达了5月间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精神。关于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精神，涂振农传达的内容主要有：

关于“扩大红军的策略与路线”，认为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以前扩充到五十万”；要“打破群众保守主义、地方观念”，“打破红军中右倾观念，使同志明确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有人就有给养，有群众就有干部”。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冒险主张。

关于红军的“战略与战术”，提出要“进攻打破游击主义”，“打硬仗打破逃跑主义”；要使“官兵有决心提高作战牺牲的勇气”，“与群众配合集中力量统一指挥”。这就是要红军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冒险进攻，死打硬拼。

关于“红军的编制”，提出“以前游击战争时代是短小精干，现在集中进攻时代，是强大充实”，“用三三制，一军三师，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师中除步兵团三个外，加教导团、炮兵团、补充团各一个”，“一连中三个排以外，加轻机关、重机关各一排”。这种规定虽好，但红军中每师配属一个炮兵团、每连配属轻重机关枪各一排，当时是脱离实际难以做到的。

关于“中央对四军的批评”，认为“四军是存在于群众拥护之中，四军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所以四军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但四军也有

错误，是新右倾主义”，这种“新右倾主义”表现在：“（1）否认突然的扩大；（2）逃跑主义，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这显然是一种混淆是非的指责。

关于“四军发展路线”，中央要求“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头一步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八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①。这一发展路线，就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集中体现。

涂振农还传达了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关于全国红军统一设置军区、统一编制及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

对涂振农传达的内容，红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进行了讨论。多数与会者对中央“夺取武汉”、“胁迫南京”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感到欢欣鼓舞。毛泽东、朱德等却对中央计划深感忧虑。

面对中共中央对四军的指令，是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策。朱德在1937年回忆当时情况时，曾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②

毛泽东、朱德等接受中央的指令是有条件的。联席会议根据中央关于红军的统一编制，决定成立红军第一军团（开初为红军第一路军），但是不同意将每一支枪都编入主力红军，而是将

---

① 以上均据宁都县博物馆保存件《中共中央特派员涂震（振）农同志报告纪要》（子恢记录）。

②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6—317页。

相当数量的武装留在地方，用以巩固和保卫根据地。

1930 年 6 月 19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在长汀县城宣布成立。

红一军团由红军第四、六（后改第三）、十二军组成。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军团参谋长，杨岳彬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同时，将原中共红军前委改称为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仍以毛泽东任书记。军团总指挥部和军团政治部由原红四军司令部和原红四军政治部改称。

红一军团下辖三个军：

第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即潘心源，未到职），参谋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李涛。全军辖三个纵队。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分别由原红四军第一、二纵队编成，第一纵队纵队长王良，政治委员李赐凡，第二纵队纵队长曾士峨（兼），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三纵队由原红十二军第二、三纵队合编组成，纵队长萧克，政治委员张赤男。

第六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陈毅（后蔡会文），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毛泽覃。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柯武东任纵队长，李韶九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罗炳辉（后龙芝道）任纵队长，王如痴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徐彦刚任纵队长，刘作述任政治委员。

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1930 年 7 月后为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林野，政治部主任谭政。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红四军第三纵队的一个支队扩编组成，周昆任纵队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由原红四军第三纵队的一个支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组成，龙普霖任纵队长，欧阳健任政治委员。

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都分别新建立了军司令部、政治部。

为保卫和巩固闽西苏区和赣西南苏区，联席会议决定将原红四军第四纵队留在闽西，与闽西地方武装合编组建红军第二十一军；派陈毅赴赣南组建红军第二十二军。红军第二十二军和赣西南红军第二十军，均归红一军团指挥。

红一军团及所部兵力共两万余人。

在成立红一军团的同时，成立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工作。毛泽东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朱德、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段起凤）、方志敏、邵式平等。

红军第一军团的成立，为红军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中央红军与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形成，创造了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 红五军开辟湘鄂赣边红色区域与红三军团成立

一 红五军开辟湘鄂赣边红色区域

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根据红军前委1930年3月18日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出的第三号通告部署，两个月以来一直活动在湘鄂赣边区。1930年5月3日，红五军第一、二、三、四、五纵队在湖南平江县长寿街胜利会师。随后，红五军除留一个纵队在平江县开展工作外，其余四个纵队由彭德怀率领，转战鄂南阳新、大冶、咸宁、崇阳等县，取得一连串战斗胜利。1930年6月上旬，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军第八军，李灿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后李灿赴上海治伤，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原有三个支队，分别扩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不久，红八军又将南渡长江的鄂东游击队和广

济游击大队扩编为第四纵队，将赣北游击队扩编为第五纵队。红五军、红八军在鄂南地区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使湘鄂赣边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1930年6月8日至17日，中共湘鄂赣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江县东乡召开。会议分析了形势，确定了边界党的斗争方针和任务，选举成立新一届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李宗白任书记。会上决定是年7月20日召开边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边界苏维埃政府。

二　红三军团成立

1930年6月上旬，赴上海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的滕代远、何长工等，回到了湘鄂赣苏区。

6月10日，中共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在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村召开。滕代远、何长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两会精神。扩大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红五军、红八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当天，红三军团正式宣告成立。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中共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红三军团下辖两个军：

第五军，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军长、军政治委员，邓萍、袁国平分别兼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辖四个纵队，第一、二、三、四纵队（分别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四纵队组成）。

第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卢匿才任参谋长，柯庆施任政治部主任。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李锷（后何时达）任纵队长，郭一清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谢振亚（后侯中英）任纵队长，石恒中（即石衡中）任政治委员；第三

纵队，何时达（后谢振亚）任纵队长，徐策任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总兵力近一万人。

红三军团的成立与红一军团成立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章

红一方面军成立与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第一节　红一军团向南昌推进

红一军团成立后，即根据中央“立三路线”指令，开始了向南昌推进的重大军事行动。

1930年6月21日，长汀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全县群众三四万人，在长汀县城南寨广场召开欢送红一军团北上大会。红一军团全体将士参加大会。毛泽东、朱德等二十余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致欢送词。毛泽东代表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向所辖各军授军旗。到会者高呼口号：“完成土地革命！”“打到南昌武汉去！”

6月22日，红一军团发布了《由闽西出发向广昌集中的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①]，准备攻打抚州。6月25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领衔，发表《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宣称：“本委员会为接受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率

---

①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内部发行），第48页。

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①

红一军团虽下达了向广昌集中准备夺取南昌、九江的命令，但并未作进一步的具体部署，红六军也仍在赣西南未开来广昌集中。7月上旬，毛泽东、朱德获悉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下令在南昌、九江、吉安抢修工事，蒋介石也已下令参加军阀混战的第十八师第五十二、五十四旅返回江西，毅然取消攻打抚州计划，命令全军团西进，7月8日抵达兴国县。在兴国集结休整期间，红一军团总指挥部侦悉敌新编第十三师主力集结吉安，凭险死守待援，樟树只有新编第十三师一小部分，兵力单薄。毛泽东、朱德根据这一情况，决定进攻樟树，窥袭南昌，并于7月11日在兴国发出了《红一军团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

7月12日，红一军团以第十二军为右纵队，第四军为左纵队，第六军二纵队为总预备队，从兴国出发，开始分三期向樟树推进。毛泽东与朱德于7月14日抵达吉安陂头，出席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军团行动方针。7月19日，红一军团按预定计划在新淦（干）县七琴击溃守敌七八百人，7月24日顺利占领樟树镇，击溃敌军两个营，缴枪约两百支，俘敌一百余人。红一军团总指挥部从七琴缴获的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敌在抚州地区有第十八师五十四旅，在峡江、新淦（干）地区有第十八师五十二旅，在南昌地区有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两个团。敌军这三个旅都可机动，另有驻吉安、赣州之敌不能机动。毛泽东、朱德在进占樟树当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提出，红军不能贸然前往白区攻打南昌，

①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内部发行），第51页。

也不能坐等敌军前来围攻，而要向敌人力量薄弱处发展。会上一致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沿赣江西岸向湘赣边界转移，佯攻南昌。这样既可向中央交代，又可保存军事实力。7月26日晨，红一军团全部西渡赣江，27日到达高安、上高地区，7月30日推进到新建县的万寿宫、石子坡、生米街一线。

这时，毛泽东、朱德派出红十二军代理军长罗炳辉带领部队到前沿阵地侦察南昌敌情，发现南昌城内守敌早已加强守备，红军若进攻南昌城，没有胜利把握。

8月1日，毛泽东、朱德命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两个纵队试探性进攻南昌城北牛行车站，向南昌敌人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城内敌军听见枪声龟缩不出，也不还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遂下令部队撤退，转向安义、奉新地区待机，一边筹款，一边做群众工作。随后，部队向湖南浏阳县推进，以图发展湘鄂赣边赤色区域。

第二节　红三军团攻克长沙

红三军团成立当天，即193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即给红五、八军前委来信，提出红五、八军的总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迅速肃清鄂东南反动武装，然后截断长武铁路，再沿长武路、长江向武汉发展。

根据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令，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所部先后攻占大冶、鄂城、通山、崇阳等县城，并控制咸宁大部分地区，对武昌造成极大威胁，迫使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驻守岳州的钱大钧部两个师12个团约四万人，星夜乘轮船赶赴武汉，加强武昌防务。岳州守敌仅剩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兵力。7月3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向岳州守敌发起猛攻，激战

两小时，歼敌两个营。残敌在帝国主义军舰接应下乘船逃往洞庭湖中的君山。红军攻克岳州，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机关枪18挺，还缴获4门七五野战炮和12门山炮。

岳州被占，长武路即被截断，迫使敌军急调长沙、武汉兵力向岳阳反扑。7月6日，红三军团主动撤出岳阳，开向平江县苏区，进行整编。各军改纵队建制为师、团建制：第五军由邓萍兼军长，张纯清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师、第三师。第一师，李实行任师长，吴溉之任政治委员；第三师，郭炳生任师长，朱荣任政治委员。第八军仍由何长工、邓乾元分任军长、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师、第六师。第四师，何时达任师长，石恒中任政治委员；第六师，陈毅安任师长，郭一清任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在平江整编时得知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已调去广西攻打桂军，长沙敌军兵力空虚。彭德怀在长寿街召开红三军团前委、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及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鉴于目前尚不具备攻打武汉的条件，遂决定乘虚向长沙推进。就在这时，长沙守敌7个团已于7月19日从城内出发向平江推进，企图“进剿”红三军团。彭德怀发现前来进攻之敌呈一字长蛇阵，首尾难以相顾，即当机立断，决定在平江城外迎敌，各个歼灭敌军，然后伺机攻占长沙。

7月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向进至晋坑之敌先头部队第五十五旅发起攻击，歼敌约一个团。敌五十五旅残部向金井狼狈逃窜。红军乘胜追击，翌日向金井敌第十五师主力进行前后夹攻，歼敌第五十四旅大部。战斗中，红八军第四师师长何时达、第六师政治委员郭一清壮烈牺牲。敌第十五师残部仓皇向长沙逃窜。红军紧追不舍，在浏阳河东岸的郎梨与阻击之敌激战，击破敌军防线。7月26日下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直扑长沙城下，攻破长沙守敌约五个团的城东防地，从小吴门、四十九标、韭菜

园、浏阳门等处突入长沙城内，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及湖南省清乡督办署。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眼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逃出长沙，退向沅江、湘阴、宁乡、湘潭等地。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获得空前胜利。是役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红军占领长沙后，迅速肃清了城内残敌，一大批从各地逃进城来的土豪劣绅反革命，被一个个捉拿正法。长沙城内被何键关押的几千名“政治犯”全部放出。城内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红军按照党的政策筹款四十万元，扩军七千余人；并以红五军第一纵队和湘鄂赣边红军独立师为主，加上各县赤卫军骨干共三千余人，编成红军第十六军，胡一鸣任军长，李楚屏任军政治委员，孔荷宠任副军长，下辖第七、九师，编入红三军团序列。红三军团政治部出版发行了对开四版的《红军日报》，报道红军攻占长沙的胜利。

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遥任主席，王首道任代理主席。省苏维埃政府出版了《苏维埃日报》。8月1日，长沙城十万劳苦工农和红军将士召开大会，庆祝红军胜利和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军攻占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省会城市，一时震动全国，大壮红军声威。这一胜利的获得，主要是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在指挥红军取得平江金井战斗胜利之后，敏捷地抓住了长沙城内敌军兵力空虚这一难得战机，果断指挥红军乘势向长沙城发起猛攻，加上红军英勇作战、不畏牺牲的结果。但这一胜利的取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更不能证明“立三路线”有任何正确之处。

被红军逐出长沙的何键不甘失败，急速调集其第十九、第十六师和第十五师残部、独立第七旅等部，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于8月5日向长沙反扑。彭德怀审时度势，在指挥部队英勇

抗击进攻之敌，歼敌一个团、毙伤敌千余人后，掩护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人员和进城群众，安全从城内撤出，退向平江长寿街等地休整。整训期间，彭德怀召开全军团团以上干部会，批评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要求五、八军分家的错误思想，撤销了其红八军政治委员职务，改由袁国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的组建

1930年8月7日，毛泽东、朱德得悉红三军团攻占长沙随后又撤离长沙的消息，当日即决定红一军团挥师西进，向红三军团靠拢。8月10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在宜丰发出命令，规定所属各军于8月15日前到达万载县城集中。

8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直属队到达万载县黄茅。此时，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15个团编成左、中、右三个纵队，正在追击撤出长沙退至平江长寿街休整的红三军团。其右路第十六师四十七旅和独立第九旅两个团，由第十六师副师长兼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指挥，已进至湘赣边界的文家市、孙家埠一线，孤军突出。毛泽东、朱德获得这一情报，立即于当晚8时下令消灭文家市之敌，援助红三军团。

20日拂晓，红一军团各部分成四路，向文家市之敌发起突然猛攻。经三小时激战，全歼敌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击毙敌第十六师副师长兼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毙伤敌一千余人，俘敌一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手提机关枪十支，机关枪二十七挺，无线电台一部（后被毁坏）。文家市战斗为红一军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但红一军团本身亦伤亡七百余人。战斗结束后，红一军团乘胜发动群众，扩大红军。

当红一军团进至万载时，中共万载县委派出交通员迅速前往湖南平江县长寿街，向彭德怀通报了红一军团已到万载的消息。彭德怀得报，立即派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万载，与红一军团领导取得联系。随后，袁国平返回平江长寿街。

文家市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军团进抵浏阳县东部的永和市。彭德怀、滕代远也率红三军团从平江县长寿街南下进抵永和。1930 年 8 月 23 日，红一、三军团的领导机关在永和市胜利会师。

永和会师当日，红一军团前委与红三军团前委在永和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统一红军编制和指挥的指示，决定红一、三军团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会上，共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彭德怀、滕代远分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副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杨岳彬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军团。全方面军共三万余人。

红一军团总指挥部由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理，朱德兼任总指挥，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朱云卿兼任参谋长，杨岳彬兼任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下辖五个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蔡会文，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毛泽覃；第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彭祜；第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代理），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林野，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二十军，军长曾炳春，政治委员刘士奇，参谋长刘泽民，政治部主任萧以佐；第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邱达三，参谋长钟效蔚，政治部主任罗寿男。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兼任总指挥，滕代远兼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和一个炮兵团：第五军，军长邓萍，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袁国平兼任，参谋长卢匪才，袁国平兼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政治委员袁志竞，参谋长陈建军，政治部主任吴天翼。

在成立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为总前委委员，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还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工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为古柏。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为常设办事机构。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成立，使红军的兵力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不仅建立和完善了红军的组织指挥系统，而且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歼灭更加强大的敌人创造了条件；并且将成为中央苏区的擎天之柱，更加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红色区域的巩固发展。

第四节　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

红一、三军团成立和红一方面军组建之时，正值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高峰时期。李立三不仅继续坚持要红一军团攻打南昌、九江，要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武汉，要鄂豫皖的红一军和湘鄂西的红二军、红六军分别向武汉进攻，最后形

成全国红军“会攻武汉”态势；而且还要求广西右江苏区的红七军北上攻打桂林，要求广东东江红军和琼崖红军攻打广州、海口等。

李立三认为，红军打下长沙、武汉后，可直接出兵北上，进攻冯玉祥，然后沿陇海路东征，夺取整个中原，配合北平、天津起义，实现全国胜利。8月1日和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部署南京兵暴。他甚至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要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发表政治宣言，承认自己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并出兵进攻中国北方；要“西北利亚”的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为此，李立三要求实现“全党军事化”，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合并，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省、县、乡乃至支部各级也要按中央办法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暴动的领导机关。8月6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长江局迅速抽调大批干部准备到南昌去，以便红军攻下南昌后在那里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待武汉攻下后再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8月10日李立三得到红三军团撤出长沙消息后，极为恼怒。他当日即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信长江局，批评说：“长沙事件，你们没有迅速坚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这是最严重的错误。因此使何键还可能集中各方残余势力做最后的反攻，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李立三在信中指令：“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

敌人忙于迎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①

但是，红一、三军团在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后，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在要不要再打长沙问题上，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

红三军团上上下下一致要求按中央指示精神再打长沙，近逼武汉。毛泽东和朱德却主张集中两个军团兵力寻找机会歼灭何键主力，先在湘赣两省边界建立和扩大红色区域，再相机行事。红三军团袁国平等部分领导人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有的军团领导人甚至责问毛泽东：“你们红一军团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你们想干什么，怎么向中央交代?”彭德怀则默不作声，未予表态。

毛泽东、朱德知道如果红军贸然再去攻打何键重兵防守的长沙城，必难获胜。可是如果执意不同意红三军团的请求，红三军团有可能单独行动，这不仅会导致红三军团遭到更大的损失，更可能使刚刚组建起来的红一方面军出现裂痕，削弱红军的力量。为避免红军分裂，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权衡再三，最终采纳了攻打长沙的意见。

1930 年 8 月 24 日 23 时，毛泽东、朱德在永和联名签发了方面军总部《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称“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并作了相应的部署。同日，毛泽东还致信中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了红军在文家市的胜利，要求赣西南特委速送两万新兵到方面军来，并请求中央“指示夺取武汉”的意见。

红一方面军各部依照总部命令，从 8 月 25 日开始分头向长沙推进，29 日主力进抵长沙近郊，总部进至新桥。当日，红军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7—248 页。

先头部队侦悉敌军主力已陆续向易家湾转移，企图以少数部队依长沙近郊猴子石、石马铺、栗塘、黄土岭、乌梅岭一带阵地工事牵制红军，而以主力利用铁道出易家湾向红军侧击。毛泽东、朱德等方面军首长认为长沙守敌有六个师另一个旅，工事坚固，强攻难以取胜，于是决定采取诱敌出工事外歼灭之而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战法，并作出相应部署。但是，守敌惧怕被红军歼灭，依托工事顽强抵抗，不肯轻易向红军出击。

9月1日晚8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白田铺下达向长沙发起总攻击命令。9月2日晚7时许，总攻长沙战斗打响。红三军团（缺第十六军）在乌梅岭右翼，红一军团（缺第四军）在乌梅岭左翼，同时向敌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红十六军则由东屯渡、湖绩渡沿新河向北关发起攻击。红一军团第四军为总预备队。是晚，大雨滂沱。红军各部冒雨向敌阵发起猛攻。敌在阵地上预先架设了铁丝网并通了电。红军攻势虽猛，却受阻于敌电网前，未能突破敌阵。

守敌见红军攻击受阻，以为反攻时机已到。9月3日拂晓，何键令其所部向红军出击。上午10时许，由猴子石、新开铺等地出动的敌新编第三十一师第一、第二旅等部，进到横塘、石牌岭、石人冲、姚家湾一带，接着又向俞家垅、洞井铺、高桥、黄泥塘、燕子岭、许家冲、烂泥冲、石马铺等地进犯。

红一方面军总部抓住歼敌良机，及时调整部署，于上午11时命令红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红一军团第三军及第四、第十二军各一部由石马铺、洞井铺向敌新编第三十一师发起进攻，第四军主力在林家咀、陈家冲一带向敌独立第七旅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5时，两敌均被击退。红军获得胜利，共毙伤敌九百余人，俘敌官兵一千余人。

由猴子石、新开铺出击之敌被红军歼灭大部之后，狡猾的何

键再也不敢派兵向红军出击了。一连几天，红军得不到诱歼敌军于工事外的机会。这时，一些红军干部求战心切，一再要求总部向长沙守敌发起强攻。9月10日上午9时，毛泽东、朱德发布《强攻长沙的命令》。具体部署为：红三军团（欠第十六军）进到栗塘附近，从右翼向二里牌敌阵地攻击前进；红一军团进到五马峰、圭塘、天际岭一线，从左翼向乌梅岭敌阵地攻击前进；红十六军经蟠斯港过河进至朗梨市附近，牵制雷公岭之敌。当晚8时，强攻战斗打响。

可是，阻碍红军前进的仍然是敌人架设的铁丝电网。为突破这一障碍，红军仿效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使用的“火牛阵”，从农家买来几百头水牛集中一处，在牛的犄角上捆上刀子，在牛尾巴上绑上油棉和鞭炮，点燃后驱赶牛群向敌阵冲去。一时间，只见阵地上火光一片，乱牛狂奔。由于田单的“火牛阵”，是用木棍将两三头牛的颈项连捆在一起，使牛并列低头往前冲。而红军的“火牛阵”，是一头一头牛单个地往前冲，遇到敌军枪弹射击和炮火轰击，受惊的牛群不仅不往前冲，反而改变方向乱跑，有些掉转头冲向红军阵地，大乱了红军阵脚。

“火牛阵”不奏效，红军战士又买来许多群众打禾的禾桶，将每只禾桶装上两只轱辘，用浸湿的棉被蒙在前面挡住子弹，红军战士在后面推着禾桶向敌阵冲去，战士们谓之“土坦克”。然而，这种“土坦克”仍然抵挡不住敌军火力的阻击而宣告破产。总攻战斗持续到9月12日凌晨，红军伤亡重大，可敌军阵地仍纹丝不动。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攻打长沙的战斗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在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停止攻城战斗。

为便于做好红三军团指战员工作，9月12日凌晨5时半，

毛泽东、朱德在新桥总部以红一军团总司令、政治委员名义，首先下达了红一军团撤出长沙的命令，命令说："方面军以消灭张桂军及何键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拟占萍、攸、醴、株等处待机。"① 当日，红一军团撤离长沙，随后，红三军团亦陆续撤出长沙。红一方面军遂向株洲、萍乡一带转移。红军"二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宣告结束。

红军二打长沙，"是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虽歼灭部分敌军，但久攻不克，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单以一军团说，高级干部有柯武东、刘作述两同志阵亡，死伤中级干部数十，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② 三军团损失亦不少，计伤亡一千余人。

红军二打长沙，显然是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所致。红军总部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开始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曾有所察觉和抵制，但因中央有令，军内"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呼声甚高，党内的组织纪律亦有所约束，在这种情势下，为维护一、三军团团结，避免红军分裂，总前委别无选择，只得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在实施战役计划时，毛泽东、朱德亦企图用灵活战术诱敌于城外予以歼灭，再相机攻占长沙，在诱敌出城未成情况下，才下令向长沙城守敌发起强攻。当强攻未能奏效，毛泽东便当机立断，下令部队撤围长沙，以避免更大伤亡。这种处置，是颇为得当的。

1930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此次方面军攻打长沙不克的三点原因："（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

---

① 《红一军团拟占萍攸醴株等处待机的命令》（1930 年 9 月 12 日 5 时半于新桥）。

② 毛泽东：《攻长沙不克的原因》（1930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0 页。

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置，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①

这些分析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提出的间接批评。

周恩来在1930年9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分析说：“第二次进攻长沙，连破坏电网的方法也不知道，用土办法以千余火牛去冲电网，结果不但不能冲进，反被敌人机关枪扫射，使火牛倒冲自己的阵脚，这证明我们的战术是如何笨拙。”② 这一批评当然是对的。

在红军二打长沙的激战中，广大红军指战员表现出了浴血奋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虽攻城未克，红军却打出了声势，打出了影响，打出了军威。诚如毛泽东所言：“围困长沙十六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九月三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九月十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九月十二日始决议向萍醴撤退。把敌军三十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①

第五节　红一军团攻占吉安与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红一方面军长沙撤围后，毛泽东于1930年9月13日在湖南株洲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针。此时，部队经费告罄，同时发现江西吉安敌军兵力较为空虚。根据这一实际情况，遂作出全军向吉安推进、沿途工作筹款17天的决定。

红军虽然已从长沙撤退，但部队中大多数指战员包括不少高级干部，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危害还认识不清，仍主张不打长沙就去打南昌、九江等城市，且呼声甚高。相反，毛泽东和朱德则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已由怀疑进而开始自觉地抵制和反对。针对部队中存在的这种盲目要求继续攻打中心城市的情绪，他们只得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期望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逐步引导全军官兵抛弃“左”倾错误观念，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轨道上来。

毛泽东尤其关注红三军团的情绪。当部队撤退到萍乡安源时，他即深入红三军团驻地同领导干部谈话，做说服解释工作。9月28日在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又有一部分干部提出要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坚持说服大家同意先打吉安再说。会议经过一番辩论，终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一军团按原计划先攻取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并担任警戒任务。9月29日，毛泽东和朱德在袁州签发了红一军团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不料，9月29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共中央8月29日给长江局的信和长江局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湖南再打长沙的严厉指示，赶到了总前委，要求红军必须坚决再攻长沙。

当晚，毛泽东与周以栗进行彻夜长谈。毛泽东耐心地说明不能再冒险攻打长沙的理由，细述了攻打吉安的三个有利条件：第一，吉安已处于红色区域包围之中，是座孤城，况且城中只有国民党驻军邓英一个旅，敌军兵力空虚；第二，红军攻打吉安，南昌、抚州、赣州的敌军都不易增援；第三，打下了吉安，可以将整个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使其成为巩固的后方，红军得到充分的补充和休整，就可以逐步沿赣江流域向南昌、九江推进，形成包围南昌的态势，以期建立江西全省苏维埃政权。

周以栗权衡利弊，思虑再三，终于被毛泽东说服。9月30日，周以栗在总前委会议上公开表示放弃再打长沙的主张，同意先攻取吉安的军事部署。紧接着，红一军团按照总部命令，于10月2日赶到吉安以北埠田等地集结待命。10月3日午后2时，毛泽东、朱德于山前总部签发了《红一军团总攻吉安的命令》，对攻吉战斗作出了具体部署。

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军邓英第十三师一部约三个团兵力，驻防城外螺子山、真君山、天华山、神冈岭等阵地。自1930年9月5日赣西工农和红二十军第八次攻打吉安以来，城内守敌至今惊魂未定。

红一军团攻打吉安的战斗部署是：以第四军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之敌攻击，以大校场至潘塘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第四军，线以右为第十二军；以二十军为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敌佯攻，左与第四军右与第三军联络，由第四军军长林彪指挥；以第三军（缺一个纵队）与第十二军共为右翼，向神冈岭、

天华山之敌攻击，以太平桥、江边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第三军，线以右归十二军，三军右与十二军左与二十军联络，十二军左与三军联络。各军攻击敌阵得手后，应以少数兵力监视炮楼内之敌，以主力攻城，并尽力截断城内与阵地上之敌联系。赣西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动员了赣西各县十万工农群众和地方武装，协助红军攻打吉安。

总攻时间定在10月4日拂晓。10月3日晚，担任左翼攻击任务的红四军攻城心切，不等三军还未完全进入阵地、十二军尚差一天路程，就急忙发起攻击。随后，红二十军和红三军也按预定方案打响。红四军攻占了城北雷公桥，一个连打进了北城门。因红十二军未赶到，红三军未全部集中投入战斗，对城西南敌阵地攻击不力，使得邓英得以从城西南抽调兵力增援城北。打进北城门的红四军一个连被迫退回城外。红二十军也攻占了真君山，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0月4日下午2时，红十二军赶到，投入战斗。当晚9时，红一军团总部指挥各部乘夜向敌人再次发起总攻，首先从城西突破敌阵地，直插城中心中山路大街。城内守敌惧怕被歼，邓英早已令城内保安团、警察队接替了东门、北门防守阵地，并偷偷将船只集中在白鹭洲待命。当红军攻进城内时，邓英已率所部从白鹭洲登船，顺赣江向清江、南昌方向逃窜，红军发现敌军乘船逃跑，立即沿岸追击，截获小船四艘，俘敌二百二十余人。因红三军团远在清江，未在峡江设防，逃窜之敌得以在新淦（干）登岸逃脱。

10月4日午夜，吉安全城为红军占领。10月5日，红三军团也攻占清江县城临江镇。

红军攻占吉安重镇，是在二打长沙失利后，“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央苏区的建立和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

剿”的胜利，也是“有直接意义的”。[①]

1930年10月5日清晨，红一方面军总部暨红一军团总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及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全部进驻吉安城。

红军攻占吉安城后，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吉城内设立“赣西南办事处”等机关，维持城内秩序，迅速肃清了从赣西各县逃亡进城的豪绅地主和反动分子。红军也乘着攻占吉安的声威，迅速占领了吉安附近的吉水、峡江、新淦（干）等县城，使赣西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1930年10月7日，有13万工农群众和红军将士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在吉安城中山场隆重召开。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推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曾山、方志敏等53人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曾山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召集赣西南各县党的负责人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合并党、团、工会领导机构，建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的指示，决定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由李文林等13人组成，李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宣传部长，丛允中为组织部长，李白芳为代理秘书长。省行委之下，分别设立赣西、赣南、赣东、赣东北、赣西北行动委员会。

吉安的攻占，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江西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毛泽东在1929年4月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至此已基本实现。这就为中央苏维埃区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通过的《关于

① 子任：《吉安的占领》，《红星》第3期，1933年8月13日。

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作出决定："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①] 此前，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区成立党的苏区中央局，并初步确定了苏区中央局组成人员名单。可以说，以江西赣西南苏区为核心区域的"苏区的中央根据地"，或者说"中央苏区"，至此已初步形成。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第六章

中央苏区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　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

朱毛红军攻打长沙和攻克吉安，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惊恐不安。

蒋介石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一直视共产党和红军为“共匪”，处心积虑要加以“剿灭”。只是因共产党和红军的势力尚未发展到威胁其统治的地步，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之间战事不停，特别是1930年春夏以来晋军阎锡山联合西北军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汪精卫等，结成反蒋联合战线，拉起七十万大军，在北京另立国民政府，要“驱蒋下台”。蒋介石被迫集中精力和兵力对付阎、冯、桂、汪联盟。自1930年5月至10月，他亲赴徐州、郑州、济南等地，调遣大军，展开中原大战。混乱的局面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剿共”之事，只得将“剿共”的希望寄托于各省地方政府和军队。直到南线何应钦、何键打败桂系之后，蒋介石才于7月24日任命何键为湘、鄂、赣三省“剿共”总指挥，要何键加速“剿共”。

不料，是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令蒋介石十分震惊。8月2日蒋介石急电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并让其转告何键：“速集各部，克期进剿，俾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①

8月5日红三军团主动退出长沙，二何（何应钦、何键）松了口气。蒋介石深知红军主力尚未被消灭，遂于8月22日经南京国民党中央发出战报，通报中原战事，同时提出要把兵力重点放在对付红军方面。根据蒋介石旨意，是年8月27日至29日，何应钦在武汉行营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策划“清剿”红军事宜，讨论通过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计15条，并具体商定了军事行动计划及联防办法、军队配备、经费筹措等问题。这次会议强调三省所有“剿匪”部队均由武汉行营指挥，要求被命担任“剿匪”之部队应“不分畛域，力剿穷追，无论如何非达到歼灭目的不止”②。

1930年10日初，蒋、冯、阎中原混战接近尾声，蒋介石于10月9日匆匆返回南京，10月10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告父老文告》，将“肃清共匪”列为其治理国政“五项政治措施”之首。他加紧从中原抽调兵力南下湘鄂赣三省，并且委派了鄂豫皖边区、豫陕边区、江苏、湘鄂赣边区、湘鄂川边区、江西、赣西、赣南、赣北、福建、鄂东、鄂南、鄂北、豫东等“绥靖区”督办、司令或总指挥。10月23日，蒋介石又偕夫人宋美龄赶赴汉口，主持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共”会议，部署对朱、毛、彭、黄红军的“进剿”。

---

①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② 《何应钦呈送湘鄂赣绥靖会议议决案》（1930年9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7辑，1990年，第182页。

至10月下旬，蒋介石将其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第五十师以及第六路军第二十四、第八师分别由湖南、河南调入江西境内。加上原驻江西的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云集江西的国民党军已达七个师又一个旅。此外，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六十一师，也按蒋介石命令由武汉准备进入江西，使“进剿”江西的国民党军达十万之众。蒋介石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辖指挥以上各部军队。

1930年11月2日，鲁涤平将已入江西境内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辉瓒，指挥第十八、二十四和新编第十三三个师，位于樟树、丰城、临川及其周围地区；第二纵队司令谭道源指挥第十四旅和第五十师，位于南昌万寿宫及靖安地区；第三纵队司令罗霖指挥第七十七师和新编第五师，位于上高、高安及其周围地区。鲁涤平限令在11月5日前后各部在上述地域集中完毕，作好进攻红军准备，限期收复吉安和景德镇，消灭红军于樟树（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

二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峡江、罗坊会议的召开

红军攻克吉安以后，红一军团各部即在吉安县城周围地区开展了45天的群众工作。红三军团也分布在清江、上高、高安等地做群众工作。

此时，党中央已于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采取果断措施，停止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

误。全会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

由于与党中央的交通联系一时中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和赣西南苏区。红军中不少官兵尤其是红三军团官兵仍然热衷于进攻南昌、九江、武汉等大城市。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对攻打南昌九江的态度甚为积极，在红军攻吉前夕就向中央状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红军先打吉安的决策是错误的，强烈要求红军早日攻打南昌、九江，并且已派人前往南昌筹建江西省委，以备配合红军的行动。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打吉安前已经表示过，打下吉安补充兵员后再打南昌、九江，并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有决议在案。现在吉安打下来了，兵员补充了一万多人，经费也筹集了60万元。红一军团编制也由纵队改为师团建制，红三军第一、二、三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七、八、九师，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次改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师，红十二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师。第二十、二十二军稍后也进行了整编。由刚参加红军的一百多名安源煤矿工人编成的红一军团工兵连也正式建立。

鉴于上述因素，毛泽东和朱德遂于10月13日签发了红一军团移师北上，向南昌、九江推进的命令。

1930年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到峡江县城。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即峡江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红一军团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纯清、何长工、袁国平，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江西省行委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等约三十人。

会议先讨论时局问题、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即工商业政策）。对土地和资本问题，很快形成了决议。在讨论时局问题

时，毛泽东说，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①

毛泽东反复强调大家要有敌情观念，不能冒险去攻打南昌、九江。但是，李文林等人坚持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② 这次会议对红军行动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会后于10月19日晚7时发出《红一方面军进攻高安的命令》。命令中说："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③ 这个命令仍提到"略取九江、南昌"，说明红军中要求打南昌、九江的意见仍没有被说服，但已有所缓和。这为以后红军的统一行动奠定了一个基础。

峡江会议后，红军中对"打不打南昌、九江"仍有争论。10月23日，毛泽东在清江县太平圩再次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即太平圩会议）。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已获悉国民党十万大军即将向江西苏区大举进攻的情报。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通报了敌情。

在讨论红军行动时，除少数人外，多数人再也不提打南昌、九江了。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0月24日午后2时半发布《红一方

---

① 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169页。

② 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261页。

③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167页。

面军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中，只说“方面军有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发动群众，消灭敌军，扩大红军，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①。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各部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工作七天，做好与进犯之敌决战的准备。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实际上已放弃打南昌、九江的任务。

可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红军到底在什么地方与“进剿”敌军决战？红三军团有人提出“夹江而阵”，就是将红三军团摆在赣江西岸，红一军团摆在赣江东岸，分头对付“进剿”敌军，认为这样既可保卫湘鄂赣边苏区，又可保卫赣西南苏区。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则主张红军主动出击到赣西北白区去打击敌人，不要将敌人引到赣西南苏区来，以免打烂坛坛罐罐，使苏区人民遭受损失。

毛泽东则认为，面对十万之众的敌军，只有三四万人的红一方面军不能分离，一、三军团必须攥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至于战场，若放在赣江西岸，夹在赣江与湘江之间，红军机动范围小了，只有让敌人深入赣江东岸苏区腹地，仗才好打。因为赣江东岸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平原、江河，阻隔小，回旋余地大，尤其是红军可以得到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只要红军选择有利地形，仗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非常主动。因此，毛泽东坚决主张一、三军团都退至赣江东岸，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再寻机歼敌。

朱德、周以栗、林彪、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李文林等人没表态。红三军团部分同志持反对意见，

---

①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内部版，第185页。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反对态度尤为坚决。

敌军进攻在即，红军反“围剿”战略方针必须早日决定，不容迟疑不决。

1930年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从清江太平圩移驻新余县罗坊镇陈家闹。在陈家闹一间染布店里，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这次会议前后共开六天，实际是峡江会议和太平圩会议的继续。前两天的会议，讨论了政治局势和二打长沙、占领吉安的经验教训，还讨论了土地问题、一方面军及江西苏区党和政府当前面临的任务，在思想、军事、土地政策等方面批评和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26日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后几天的会议都在晚上召开，集中讨论应敌方略。会上各种意见争执不下，直到10月30日晚，会议仍陷入僵局。深夜，毛泽东只好宣布休会。

红三军团的同志利用休会时机，走到屋外自动聚集到军团长彭德怀身边小议起来。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都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建议大家以大局为重，东渡过江。袁国平等仍然坚持“夹江而阵”，三军团与一军团分离作战。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彭德怀经深思熟虑，决心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军事上集中一、三两个军团，共同对付敌人。他认为三军团应该过江，坚决表示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随后命令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①

彭德怀一言九鼎。慑于他在三军团中的威望，一些主张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分家”的人再也不敢吭声了。

袁水两岸的彷徨与争议，终于有了定论。罗坊会议最终作出“诱敌深入”的方针。根据这一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全军东渡赣江，诱敌深入。

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正确抉择。这一抉择不仅表明红一方面从此完全摆脱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羁绊，而且表明红军已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转变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为了这个正确抉择的作出，毛泽东费尽心血，朱德、周以栗等鼎力支持，彭德怀等顾全大局，他们都是功不可没的英才。

三　东渡赣江，诱敌深入

罗坊会议期间，红一方面军各部的分布情况是：红一方面军总部驻新余罗坊的园前村；红一军团第三军驻分宜县，第十二军驻新余县，第四军驻新余县罗坊；红三军团驻清江县黄土街至临江镇一线；红二十军驻峡江县至永丰县之间；红二十二军驻吉安。

1930年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罗坊会议的战略决策，由毛泽东、朱德签署在罗坊园前村发出《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命令规定：

第三军团为中路军，在袁水南岸集中后，于11月5日在新干对河附近渡江，相机略取樟树，并在樟树通丰城、新干两大道附近筹款二十万元，发动群众，以后在永丰之滕田附近集中。

第四军、第十二军为右路军，应于11月3日集中部队，4

日检查工作，5 日开至峡江城，6 日渡江，经崇仁向抚州前进，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四十万元，发动群众，以后在乐安之招携市附近集中。

第三军为左路军，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包括安福）扰乱工作，与二十军及中路军取得联系，牵制敌人进攻吉安。

第二十军在吉水、永丰、新干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确取联络。

总司令部于 11 月 5 日在峡江城渡河，以后则随中路军（三军团）行止。①

命令发出后，各部队依令行动。红一军团第四军、第十二军于 11 月 6 日全部顺利东渡赣江。

红三军团开到峡江县准备渡江时，一部分干部思想动摇，不愿渡江，有个叫杜中美的团级干部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为此，彭德怀在峡江仁和镇召开全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斩钉截铁地表示说："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② 随即对大家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11 月 5 日，红三军团顺利渡过赣江，到达指定区域。

红一方面军总部于 11 月 2 日在罗坊彭家洲召开群众大会后，由朱德率领经峡江于 11 月 5 日东渡赣江，随红三军团行动。

毛泽东在罗坊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忙里偷闲，在新余罗坊的彭家洲，找了兴国县来当红军的新战士傅济庭、李昌英、温

---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1—182 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2 页。

奉章等八人开调查会，了解兴国土地革命状况。调查会从10月31日一直开到11月4日晚。这时，红军各部队和总部机关已全部离开新余开始渡江，形势已很紧张。毛泽东若无其事地继续开调查会，直到11月5日早晨，才随总前委工作人员离开彭家洲，带着傅济庭等八人向峡江县城撤退。后来，毛泽东在宁都县小布将这次调查成果整理成著名的《兴国调查》一文。

11月7日，毛泽东率领总前委机关离开峡江，8日回到吉安，途中又作了“东塘调查”。在吉安，他一连几天出席江西省行委扩大会议，与大家一起研究苏区土地分配政策和反“围剿”准备工作。11月19日早晨，国民党军罗霖第七十七师已经进到距吉安城只有二三十里的地方，毛泽东才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等的催促下撤离吉安，在值夏渡过赣江，22日抵达永丰县藤田，与朱德率领的方面军总部会合。从吉安到藤田途中，他又利用休息时间，作了“木口村调查”。毛泽东在大战前夕这一系列从容不迫的农村调查，为他后来指导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政权建设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　红一方面军黄陂、小布集结

红一方面军刚撤离袁水流域，敌“围剿”军总指挥鲁涤平就于1930年11月5日下令其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由北向南，向袁水流域进攻，结果扑空。敌军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后，鲁涤平急忙调整部署，以其第三纵队第七十七师和新编第五师留在赣江西岸地区布防，相机进攻；以第一、第二纵队共四个师一个旅和总预备队一个师，转向赣江以东地区，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发现敌军主力也转向赣江以东地区运

动。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三军团由新干县东部的七琴地区、红四军由崇仁地区、红十二军由宜黄地区、红二十军由吉水县八都地区、红三军由赣江以西油田地区，逐次向根据地腹心地域实施战略退却。

11月中旬末，各路“围剿”敌军已侵占吉安、新干、吉水、崇仁、永丰、南城、宜黄、乐安一线。红军诱敌深入，必须迅速对战略退却的终点和预定战场作出正确选择。毛泽东到达永丰县藤田与朱德会合后，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

毛泽东、朱德认为：退却终点即是反“围剿”的预定战场。预定战场的选择，在下列六种条件中至少具备两种以上方可：（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①

根据上述条件，红一方面军总部开始选定吉安东固、南垄为反“围剿”预定战场，并于1930年11月25日在永丰县沙溪下达命令，要求红军主力退至东固、南垄和永丰县的龙冈一线集结，准备出击敌人。几天后因敌情变化，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1月27日又在南垄发出《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准备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择吉安富田、东固一带为反攻战斗的预定战场。12 月 1 日，红一方面军到达战略退却终点——宁都县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黄陂中排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十二军驻黄陂、洛口间，红三军驻黄陂；红三军团驻小布。

红军在实行战略退却的同时，总部派出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红三十五师佯装主力，引诱敌军向吉安富田、东固地区靠拢，以便伺机各个击破。不料，是年 12 月 7 日发生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①，富田、东固已不适宜作为预设战场，红一方面军总部不得不改变计划。12 月 14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黄陂发布“红字第七号命令”，决定将部队再向东移至黄陂东边的平田、安福、砍柴冈一带，公开的理由是“为便利采办给养”。总部机关仍驻黄陂中排不动。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顺利完成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任务。

---

① “富田事变”是江西苏区红二十军一部官兵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乱肃乱杀“AB 团”错误不满而引发的一次反抗举动。1930 年 12 月 7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吉安县富田帮助红二十军肃“AB 团”。李韶九以“AB 团”要犯名义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拘捕，引起了红二十军部分指战员的不满。12 月 12 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率领教导营包围军部，将李韶九和支持李韶九在二十军肃杀“AB 团”的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以及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关押，释放了谢汉昌等人。当晚，刘敌、谢汉昌等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队赶到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被李韶九关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重要干部和群众一百余人。随后，刘敌、谢汉昌等事变领导者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错误口号，还发出捉拿省苏主席曾山、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李韶九等人的通缉令；以事变领导人为主成立了新的省行委领导机关。随后，事变领导人以防止毛泽东派兵来攻为理由，不顾总前委对红军反“围剿”战略决战的统一部署，擅自将红二十军拉过赣江西边活动，沿途到处刷写“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标语，并捏造了挑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与毛泽东关系的假信送给彭德怀，企图分裂红军部队，还缴了红军学校的枪械。这起事变因发生在吉安县富田镇，因而史称“富田事变”。

五 苏区军民的反“围剿”准备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江西苏区军民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立即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是从政治上紧急动员苏区军民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1930年11月14日至15日，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开扩大会议，省苏政府主席曾山传达了罗坊会议决定，对苏区反“围剿”准备工作进行了动员和布置。对未出席这次会议的兴国、宁都、永丰三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写信给这三个县，转达罗坊会议和省行委扩大会议精神。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签发“秘字第一号”《紧急通告——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对敌我形势作了正确的估量，批判了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悲观畏缩和消极麻痹、盲目乐观的思想。紧急通告对动员群众做好应敌工作提出了七项要求：（1）组织群众配合红军作战；（2）设立兵站，帮助红军输送给养、转运伤员；（3）建立交通线；（4）组织担架队；（5）筹备给养；（6）节省费用；（7）切实进行瓦解白军工作。11月24日，江西省行委专门就做好共青团工作动员青年群众实行阶级决战，发出第十一号通告。12月1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又发出《紧急通告妇字第一号——在阶级决战中妇女应做好工作》，动员全省苏区妇女勇敢地积极地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中。宁都、兴国、于都、赣县、吉安、泰和、永丰等县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都采用召开紧急动员会、印发宣传动员材料等各种办法，迅速将广大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投入反“围剿”斗争。

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断绝敌军接济。各地苏区群众在各级苏

维埃政府组织领导下，将家中的油盐柴米和锅碗瓢盆等日用物资，严密隐藏；将碾米用的砻、碓抬进深山或沉入水塘，并且破坏水源，困饿敌军。

加强赤色戒严，组织军事交通站。苏区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根据江西省苏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通告第一号——迅速组织侦探队灵敏消息》的要求，都组织了侦探队，专门负责侦探敌情，将每日所得情报，由乡、区、县逐级报告省苏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妇女和儿童团员因不易引起敌人注意，在侦探敌情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及时递送情报，除原有的赣西南赤色邮路外，省苏维埃政府还在吉安设立了秘密交通网，使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能及时得悉各方情报。

筹集现金物资，确保红军给养。1930 年 11 月 17 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迅速集中经济节省费用应付阶级决战”，务必在三个月内筹集现金 60 万元。11 月 20 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又发出“财字第二号”《通告》，再次要求在 10 天内立即筹集现金 30 万元，其中赣南赣东须筹集 10 万元，赣西各县、区共筹集 20 万元。为节省开支支援红军，各地按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尽量减少办公费用支出，节省伙食开支。如：写标语不用纸，尽量写在墙壁上；“办公地睡觉熄灯，信纸信套不要漂亮，使现金不致外溢”；“只发伙食费，不发零用钱——伙食费城市物价较贵，每天大洋一毛五分，乡村每天大洋一毛。客饭城市每天一毛，乡村客饭每天八分”①。后来省苏维埃政府又规定：“凡一毛五分

①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紧急通令秘字第一号——迅速集中经济节省费用应付阶级决战》（1930 年 11 月 17 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4 页。

的发给柴菜钱一毛，一毛的发给柴菜钱八分，八分的发给柴菜钱六分，六分的发给柴菜钱二分。”①

红军主力集结地所在的宁都及邻近的兴国、于都、于北区等县区苏维埃政府，都筹集了大批粮油、食盐、木柴、蔬菜秘密储藏起来，准备随时供给红军使用。各县、区苏维埃政府还根据省苏维埃政府要求，选择适当地点建立起兵站，专门办理红军给养和收容红军伤病员事宜，并且抽调精壮赤卫队员组织担架队，准备随时上前线支援红军作战。

地方武装积极活动，紧密配合主力红军牵制和疲劳敌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11日宣布成立全省军事委员会，金万邦任主席。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健全了军事部。各级军事部除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主力红军外，还大力发展和加强地方武装，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站岗放哨，封锁消息，骚扰牵制敌军，使侵犯根据地的敌军提心吊胆，日夜不安，陷于困境。兴国县红军独立师还直接配合罗炳辉率领的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在泰和、兴国、吉安三县边界地区警戒和牵制敌军。

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猛烈扩大红军。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于1930年11月12日就扩大红军问题发出军字第二号《通告》，提出：“猛烈扩大红军是准备阶级决战的主要条件”，“赣西南各级政府目前主要工作之一是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红军”②。《通告》指出了各地扩大红军时应执行的正确路线和具体方法，强

①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财政委员会主席周勉：《通告财字第二号——筹集现金准备给养节省经费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1930年11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1页。

②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通告军字第二号——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1930年11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8页。

调要做好宣传动员和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建设好红军预备军（独立团），以便能随时调动上前线，加入红军。

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瓦解敌军斗志。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1930年11月10日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公布了对敌军宣传的12个口号，要求：“立即动员全体工友、全体农友、全体红军兄弟长官，个个都拿起笔来写那十二个口号，不但在屋外写还要在屋内写，工友、农友在自己的屋子内，红军营地屋子内、前壁后壁左壁堂屋内、睡房内、厨房内、毛厕内一概给他们写得满满的，不要怕写坏了房子不好看，我们穷人，不要什么好看，不要用纸贴，一概用笔写，乡村由苏维埃领导写，红军由士兵委员会领导写……”①

江西省行委还要求“在敌人进来之后，应坚决动员一般老弱残废的老头婆子及幼小活泼的男女孩，用各种方法与白军士兵接近，乘机宣传及侦探其一切情形”；妇女群众“利用卖小菜小物或替白军洗衣等，去接近他们谈话借以宣传”；将对敌宣传品寄送或直接散发到敌人队伍中去。② 这些宣传措施对瓦解敌军斗志产生了重大作用。

兵民乃胜利之本。苏区军民的这些反“围剿”准备工作，紧张有序，扎实充分，必将使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六　红一方面军战前总动员

红一方面军主力退到根据地腹心地域宁都县黄陂、小布一

---

①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宣传动员令》（1930年11月10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教研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7辑，1990年，第38页。

② 《江西省行委通告第十一号——加紧团的工作号召广大青年群众实行阶级决战与团目前的工作》（1930年11月24日）。

线集结后，毛泽东于1930年12月上旬在黄陂中排村主持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总前委成员外，还有军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党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更具体的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①。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红军指战员的认识，为反“围剿”作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会后，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起草并向全军和苏区军民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宣传动员材料。这份文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红军必能打败敌军、争取反“围剿”胜利的八大有利条件：（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是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八个大胜利条件”，条条分析透彻，通俗易懂。如说到战略时，文件指出：“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就好像虾子落滩头，这一着就是敌败我胜”。“采用持久战略……敌人要快打，我们偏不同他快打”。“现在熬了他差不多两个月，使他们步步扑个空，要熬得他内部发作，给他一个猛打。”“敌人妄想给我们重围久困，河东河西开起几路军队来包围，我们就来一个坚壁

①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定——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1931年4月），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页。

清野，号召群众参战，给他一个久困重围……我们又大贴标语，又做白军士兵宣传，敌人又很动摇，还没有开始打仗，敌人步步失败了，我们就步步胜利了。敌人又恐慌又动摇，给他一个猛打，哪有不胜之理。”①

说到地利，“宁都永丰兴国一带，即是赤色区域，又是山多岭峻，路又窄，地又险，敌人大的步伐摆不开，大炮啦，机关枪啦，也失去作用。红军行动又快，地势又熟，山前一个正面攻击，山后一个包抄打来，要教那陷在那里的白军走投无路，打个片甲不留”②。

为进一步鼓舞红军反“围剿”斗志，1930 年 12 月 24 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黄陂移驻小布村，25 日在小布村外麻糍石下的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亲拟对联一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大红对联贴在誓师大会主席台两侧台柱上。看到这副对联，参加誓师大会的一万多军民，对毛泽东所提出和总结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夺取反“围剿”斗争胜利充满信心。

---

①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八个大胜利条件》（1930 年 12 月 2 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 17 辑，1990 年，第 105—106 页。

② 同上书，第 107 页。

毛泽东和朱德都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的讲话既富有说服力，又鼓舞人心。他一一分析了敌败我胜的有利条件后说，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两次大踏步地后退，敌人已开始掉进我们的陷阱，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利于我而不利于敌，胜利就在眼前。最后，毛泽东举起拳头，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①

小布誓师后，全军将士斗志高昂，同仇敌忾。

七 龙冈大捷

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于1930年11月16日下达"会剿"总攻命令后，本欲寻歼红军主力于吉安永丰之间，这个计划却因红军主力向宁都黄陂小布退却而被打破。

12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亲赴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由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当日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决定聚歼红军于吉安东固地区。

其兵力部署是：第九路军第十八师由永丰进攻东固，第五十师由乐安进乐龙冈、东固，新编第五师由吉安经富田进攻东固，第七十七师主力防守吉安，一部兵力向安福方向"清剿"，新编第十三师在临川、崇仁地区维护后方交通，独立第十四旅北开武宁进行"清剿"；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指挥第二十四师由宜黄县蛟湖向宁都县东韶、洛口、宁都城进攻，第八师由宜黄县黄陂、南丰之线向广昌、宁都、于都进攻，归该路军指挥的第五十六师经建宁向石城推进，第四十九师和暂编第二旅向瑞金、会昌

①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7辑，1990年，第146—147页。

推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指挥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经萍乡、分宜向万安、泰和前进，原驻赣州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归第十九路军指挥，防守赣州。

敌军“围剿”主力为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其进攻目标为吉安东固和永丰龙冈。12月16日，敌军开始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攻占东固的时间限定在12月20日。

毛泽东对于反“围剿”之“初战”极为重视。他认为，打好反“围剿”第一仗，至关重要。这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①。

他和朱德等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认为“进剿”军虽有十万之众，但均非蒋之嫡系，其内部矛盾甚多，总的形势并不十分严重。而且敌军兵力分散，罗霖第七十七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以西；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远在福建，相距八百里，有利于各个击破。公秉藩新编第五师（后升编为第二十八师）和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在富田和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这几处由于政治和地形情况，都不宜选作战场，且打了毛、许两师再回头西打，恐西面的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在一起，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将张辉瓒、谭道源两师选作初战攻击目标，较为理想。张、谭两师均系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号称“王牌师”，骄横跋扈，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扬言要“剃朱毛的头”。如消灭了这两个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该两师各一万余人，红军共有四万余人，红军一次打敌一个师是绝对优势；这两个师已分别进至永丰县龙冈和宁都县源头，虽离红军很近，但群众基础好，红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

能隐蔽接敌；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虽不好打，但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也好；红军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千余人，亦可迂回于敌后。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分析，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先打张、谭两师。而张、谭两相比较，毛泽东又认为先打谭道源师为有利，因为它距小布仅25华里，又是乙种师，仅两旅六团八千多人，已孤军深入到红军面前。

12月24日，敌谭道源师在源头大肆拉夫，准备向小布进攻。这一情报当日即为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毛泽东、朱德于当日发布第9号命令，决定在小布与源头间的一条狭谷里伏击该敌。

25日晨，红军依令进入设伏阵地，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动静，只得撤回。26日夜10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又下令部队于次日晨再次设伏于峡谷。谭道源师仍未上钩。后来红军查明，谭道源发出向小布进攻的命令后，忽从一个由小布跑出的反动分子口中得悉红军已在小布设伏，方立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派人将已出发的先头部队追回。这样，红军白等了两天。

就在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抱怨的时候，红军总部于28日午后侦悉敌张辉瓒第十八师已由东固进至南垄，有进攻龙冈模样。

张辉瓒师与公秉藩的新编第五师，原担负向东固进攻任务，定于12月20日会攻东固。此时佯装成红军主力的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在12月18日就已从东固撤走了。12月19日，公秉藩师未与红军交战进占东固。公秉藩一面命令部队在东固四周山上抢修工事，一面向蒋介石、鲁涤平发报，抢邀头功，却未将进占东固一事向张辉瓒通报。

12月20日清晨，大雾弥漫。张辉瓒指挥部队按原定计划向东固杀去，竟遭到公秉藩师的猛然伏击，双方杀得不可开交，直到中午才弄清原来是打了自己人。这场闹剧结束后，公秉藩再也不听张辉瓒节制，率领新编第五师径直返回富田。为此，张辉瓒遭到蒋介石斥责，恼羞成怒，下令部队在东固大烧大杀三天，然后按鲁涤平命令，留下本师第五十四旅在东固维持后方交通，自己率领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和师直属队，转兵趋向永丰龙冈，准备从龙冈向宁都黄陂、小布地区进攻。

毛泽东、朱德得悉张辉瓒师向龙冈开进的消息后，于12月28日晚9时果断下令全方面军西移，准备伺机围歼张辉瓒师。29日，红军除留下一个警卫团在黄陂警戒东面之敌外，其余全部秘密转移至黄陂西面30里之君埠，并探实张辉瓒先头部队确已进到龙冈圩。

当晚8时，红军总部在君埠发出《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作出战斗部署：红十二军（缺三十五师，含六十四师）任左翼，30日晨4时前出动，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万功山，以主力截断通南垄之大道，并于30日午前10时占领所要之阵地；红三军任右翼，30日晨5时出动，占领木坑以右地区及亭子边之主要阵地，向龙冈攻击前进，右与红三军团、红四军派出部队取得联系；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沿汉下攻击上固、下固，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凡埠、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以小部警戒下固、潭头。这一战斗部署，是置敌于死地的“五瓣莲花抄尾阵”战法。

红军各部按照命令连夜行动。12月30日一早，毛泽东和朱德冒着浓雾将总部指挥所移至距龙冈15华里的小别黄竹岭半山腰。毛泽东边走边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

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雾全歼顽敌啊！”①

上午8时许，浓雾逐渐散去，右翼红三军七师与敌遭遇战斗打响，拉开龙冈之战的序幕。敌军凭借优势武器，极力阻止红三军向龙冈方向攻击前进，战斗一时处于胶着状态。军长黄公略要求总部派兵增援，因预备部队总部警卫营已上前线，朱德总司令决定“无兵派将”，即派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前往红三军协助指挥作战，鼓励士气。中午12时左右，红军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张辉瓒电令在东固的五十四旅驰援龙冈，要求二十八师向龙冈迂回，均无济于事。至下午4时，红军总部发起总攻击令，阵地上杀声震天，敌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红三军直捣张辉瓒师部，随即战斗结束。张辉瓒第十八师两个旅和师直属队全部被歼灭。是役红军俘敌九千余人，缴枪九千余支，子弹一百余万发，无线电台一部。敌师长张辉瓒化装成书记官，潜逃至龙冈圩西边万功山半山腰的一窝茅草丛中，被打扫战场的红军活捉。此外，红军还击毙敌副旅长、团长各一人，俘敌代参谋长、旅长、团长各一人。

下午6时，毛泽东即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红军胜利捷报》。他满怀豪情挥笔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上半阕，咏颂龙冈大捷：

>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八 东韶再捷

龙冈大捷，打乱了蒋军部署，各路敌军惧怕被歼，纷纷后

---

①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页。

撤。第二十八师（原新编第五师）撤向富田，第十八师残部第五十四旅亦撤向富田，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由源头撤向东韶，第二十四师由洛口向广昌苦竹方向撤退。

根据敌情变化，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1月1日和1月2日连下两道命令，向东追迁逃至东韶的敌谭道源第五十师。1月3日上午，担任正面和左翼攻击任务的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团，赶到东韶，从南、西、北三面向敌发起攻击，敌抢占东韶以西的黄泥寨制高点，企图遏止红军攻击，掩护主力撤退。下午1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5时，歼灭该敌一个多旅，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机关枪十余挺，迫击炮一门，子弹十三万余发，电台一部。可惜担任右翼迂回的红三军未及时赶到指定位置，敌师长谭道源得以率残部逃回抚州。

龙冈、东韶两战皆捷，敌军愈加慌乱，纷纷撤退。第二十八师和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仓皇逃回吉安，第二十四师、第八师由苦竹、头陂撤回南丰。敌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六十一师，虽乘机进占兴国，也无补大局。

这样，红军在五天之内两战两胜，歼敌愈万。蒋介石十万大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四万人的红军彻底粉碎。

东韶战斗后第二天，即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返回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毛泽东和总前委、总司令部机关驻村内龚氏宗祠，朱德住在村西的邱屋，总政治部在上何屋村。当天，毛泽东召开方面军总部干部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经验，对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作出部署。1月5日，在小布河坝上隆重举行第一次反“围剿”祝捷大会。1月10日，红军利用缴获的无线电器材，动员被俘无线电技术人员参加红军，在小布赤坎村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

在龙冈被俘的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接受毛泽东、朱德审讯时，表示愿给红军输钱输物，请免一死，毛泽东准备对其实行优待，并嘱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对张予以保护，以利用其做湖南军阀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释放张辉瓒一事亦同意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并派李翔梧、涂作潮前往南昌与张辉瓒的家属就谈判一事接触。然因张辉瓒在东固血债累累，民愤太大，遂于1931年1月28日在吉安东固公审后被当地人民处决。

第二节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的成立

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苏维埃区域内成立了党和军队中的两个重要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

1930年8月以前，中共中央未设立统一领导全国红色区域的党的领导机构。1930年8月26日和10月3日、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议决，在苏区成立党的中央局，并初步确定了苏区中央局组成人员名单，决定以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暂时代理。193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致信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即项英——引者注）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① 总前委未收到这封指示信，故在项英未到中央苏区之前，中共苏区中央局未先成立。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页。

项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0年11月离开上海，由地下交通护送，经广东汕头进入闽粤赣苏区，12月底进入江西苏区，1931年1月初抵达宁都县小布，与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会合。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乡赤坎村龚氏宗祠正式成立。时委员9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名单未定）、共青团中央1人（名单未定）。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未到苏区），代理书记项英。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当天，项英签署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但目前许多苏区尚未与中央区连接起来的，因指挥不便，暂受各地最高党部指导，将来一打通后，则完（全）归苏区中央局指导。”①

这就是说，苏区中央局是中央苏区乃至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成立时，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实际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而朱德主要负责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工作，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又兼任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曾山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所以中央局负

①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1931年1月15日），据《石叟资料》影印件。

实际工作的只有项英一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名义上成立了，却无专人负责。

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先后两次开会讨论，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共七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四人为常委。具体分工为：项英任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王稼祥负责宣传，毛泽东负责军事。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在小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维埃中央军委），以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苏维埃中央军委成立后，仍保留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毛泽东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1931年2月17日，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为主任；同年3月，设立军委总参谋部，朱云卿代理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毛泽东、朱德、朱云卿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成立后，机关设在宁都县小布赤坎村龚氏宗祠，1931年2月22日迁至黄陂山堂村胡家祠。在小布期间，苏区中央局先后发出八份通告，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土地问题和反富农政策、地方武装建设以及对“富田事变”等问题作出了部署和处置。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即宣布撤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下属的赣南、赣东、赣西、北路等行动委员会。1931年1月17日，在富田新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五人组成临时党委会，陈毅任书记。同月，在赣县白鹭和宁都分别成立了中共南路分委和中共东路分委，中共南路分委书记罗寿男，中共东路分委书记谢唯俊。原赣

南行委机关设在信丰，因交通中断，未及时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赣西南特区委指示，遂于1931年2月将原赣南行委改组为中共赣南特委（同年4月改称中共西河分委），陈致中任书记，领导赣南西河各县的工作。闽西苏区在1930年10月就已称为闽粤赣边特区，随后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为书记。

二　“二十万军重入赣”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惨败后并不甘心，不久即重新调兵遣将，策划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赴南昌取代鲁涤平，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并兼任南昌行营主任。2月4日，何应钦抵南昌，改组南昌行营，召开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亲自确定的“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制订出新的“围剿”计划。

为组织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共计20万兵力。3月下旬，何应钦已将他们全部集结在中央苏区周围。

敌军具体部署为：王金钰任总指挥的第五路军四个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分驻赣江东岸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罗霖第七十七师分驻赣江西岸泰和至安福一线；朱绍良任总指挥的第六路军三个师（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驻南丰城及附近地区；张孝新第十三师驻南丰、南城、黎川一线；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和第十二师马崑第三十四旅，驻兴国至赣州一线；孙连仲任总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七师，驻宜黄、乐安一线；此外，在宜黄、

抚州、樟树间有关树人的骑兵第一师；在福建建宁有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在峡江、新干、清江间有韩德勤第五十二师。

这样，就形成了一条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形包围圈，由北向南朝中央苏区压来，红军在西南面的退路，也已被截断。

除陆军外，国民党空军航空队第一、三、五分队共七架飞机分驻南昌、樟树、吉安各机场，随时准备侦炸各地红军。何应钦宣称：此次“剿共”，“我们已有完整精密的计划，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相当最短期内，一定有剿灭‘共匪’可能”①。

三 苏区军民总动员

面对蒋介石“二十万军重入赣”的险恶形势，苏区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巩固发展苏区，于1931年1月16日、2月21日，先后两次下达命令，部署全方面军在宜黄乐安两县南部、广昌和南丰县东南部、石城等方向实施战略展开，规定在3月6日前筹足40万元现洋，兼为作战准备，伺机攻占乐安、南丰等县城；同时令红三军第七师及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在兴国东部与宁都、于都两县边界地区，消灭“龙聚三都”地主武装，贯通兴、于、宁三县苏区联系。这次战略展开前后历时两个月，不仅使苏区得到巩固，还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筹备了充足的经费给养。

1931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连续三次就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和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给红一方面军发出通报，作出指示。同年3月上旬，红一方面军

① 《何应钦在赣欢宴各界演说》，江西《民国日报》1931年2月26日。

总部侦知国民党军即将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并通过电台通讯准确地掌握了敌军“围剿”部署。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依据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一系列紧张而有序的反“围剿”准备工作。

首先，最重要的是进行政治动员。是年3月20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宁都县黄陂发布了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通令指出，自国民党军队向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始终是一种守势，龙冈战斗虽然胜利，但仍未改变这种攻守形势。因此转变敌我形势，就成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中心任务。只有取得比龙冈战斗更大的胜利，给进攻敌人以更沉重打击，才能迫使敌人退守中心城市，使苏区得到真正巩固和迅速发展。这是争取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意义所在。

通令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苏区军民争取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具备六个有利条件，其中“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此外，“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红军第七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等。“所以第二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①]

---

①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第四号——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1931年3月20日），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1991年，第70—71页。

通令要求各红军部队和各县、区、乡、村，各级都要召开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深入进行政治动员，鼓舞斗志，明确任务；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要热烈慰劳红军；要做好瓦解白军的工作等。

为贯彻通令精神，同年3月21日至22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陈毅主持召开中路各县区代表联席会议，研究了发动和组织苏区群众支援和配合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问题，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当时情况的财政经济政策。紧接着，红一方面军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保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顺利开展。月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召开了各县苏政府主席、游击队长和群众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对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和支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还连续发出指示，解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从而为反“围剿”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大力加强地方革命武装建设，是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将战争中缴获的近五千支枪，分发给赣西南各县苏区，用于扩大地方武装。1931年2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就苏区地方武装的组织和工作路线发出第10号通告，决定对赣西南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并实行统一指挥；通告还要求各县除组织以梭镖为主的赤卫队外，还要组织脱产的红军独立营、独立团和独立师，在城市组织红色警卫队。3月7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发布了“关于争取第二次战争胜利的意义及地方武装的任务”的《第一号通令》，决定将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划分为九个工作战区，设立九个区指挥部，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参战。还规定地方武装在反“围剿”中应担负起十大任务，即：扰乱，堵敌，截敌，袭敌，

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随后，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河东各县地方武装联席会议，对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及战术等，进行了详细讨论，作出了决议；同时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在上述九个工作战区之上，再成立东、南、西、北、中五个指挥部，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指挥。

第三，认真总结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是争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朱德于1931年3月17日联合发出红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对第一次反“围剿”战前、战中、战后红军部队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同时对第二次反“围剿”准备中红军部队的鼓动、会议、训练、给养等方面应做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使广大指战员胸有成竹，充满信心。

与此同时，赣西南苏区人民在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一面努力春耕生产，一面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准备工作中，为红军筹备了大量的军粮蔬菜等物资。

>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填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的下半阕，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军民同仇敌忾与国民党二十万大军决一死战的必胜决心。

四　青塘会议之争

在第二次反“围剿”准备工作过程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先

后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即黄陂会议和青塘会议。

黄陂会议于1931年3月18日至21日在宁都县黄陂山堂村召开，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朱德，红军每军二人，赣西南特区委二人，各分委一人，青年团代表一人，湘东南及平浏代表各一人，共四十余人。会议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并致开幕词。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简称“国际来信”，信中强调李立三所犯错误是与国际路线在原则上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并由项英作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报告》。与会同志对“国际来信”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接受其指示精神，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苏区中央局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讨论了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

苏区中央局黄陂会议虽然把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未展开讨论。由于红一方面军总部已进一步探明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兵力部署，1931年3月23日总部下达了《移动队伍整顿训练并筹款的命令》。命令规定：红三军团除留一师于宁都县肖田向南丰、乐安之敌监视并警戒外，其余应即移到宁都河以北赖村、葛坳、澄江、梅窖、三寮、古龙冈一带地区工作训练，指挥中心设在赖村；红三军于永丰县藤田附近工作并向永丰、吉水之敌警戒；红四军移到广昌、驿前、石城、湛田一带工作整顿训练，指挥中心在头陂、宁都之间，并向宁化、南丰警戒；红十二军以瑞金大柏地为指挥中心，布置于大柏地、瑞金、九堡、壬田市、黄石贯一带筹款；红三十五军北上至青塘附近训练整顿；红色警卫团移到宁都城附近整顿训练；西路军任务及位置依旧。

1931年3月25日，苏区中央局随苏维埃中央军委及红一方

面军总部离开黄陂，南移至宁都县青塘。

是年4月中旬，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任弼时、王稼祥和委员顾作霖组成的三人中央代表团，抵达青塘。他们来到中央苏区肩负着四项使命：一是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代表团到达后，苏区中央局在青塘的河背新屋召开会议，作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黄陂会议）的继续。参加会议人员除增加中央三人代表团成员外，其余未变。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以及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传达报告，通过了下列决议：（1）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2）土地问题决议；（3）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决议；（4）“富田事变”决议；（5）CY工作决议。这些决议，既肯定了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抵制立三“左”倾错误的成绩，又接受了王明“左”倾错误为主要内容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使中央苏区的工作在一些方面开始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决定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后未获中央政治局同意。）

由于会议只开了一天，对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仍未进行深入讨论。眼看敌人进攻在即，毛泽东甚为忧虑、着急。在他的催促下，项英同意第二天继续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事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局委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内部，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存在严重意见分歧。项英主张不要打，开步走，将红

军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少红军高级领导人主张“分兵退敌”，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四面散开，向粤北、湖南和闽西等地出击，路上遇到敌人就打他一下，像“削萝卜”一样，分散和吸引敌人兵力，以保卫根据地。毛泽东既不同意开到四川去，也不同意“削萝卜”，他坚决主张：一在根据地内打，二集中兵力打。

会议开了两天。会上各种意见争论激烈。毛泽东以充足的理由阐述了坚持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的主张，得到朱德、周以栗、林彪、罗荣桓等人的支持。项英要中央代表团成员表态。任弼时传达了中共中央 1931 年 3 月 2 日指示信的精神，对会上的争论未发表意见；王稼祥已同毛泽东交谈过一次，认为毛泽东有主见，但没有发言；顾作霖对打仗是门外汉，也未随意表态。会议结果，“开步走”到四川去的意见被否决，多数军队的同志虽然仍主张“削萝卜”，分兵退敌，但也同意打一仗后视情况再分兵。

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占了上风。于是，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

但是，先打哪一路敌人？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先打兴国的十九路军，也有人主张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毛泽东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不可取。因为第十九路军战斗力较强，历史上未打过败仗；第六路军兵力雄厚，又受地势影响，都不好打。红军应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王部虽有五个师，却是杂牌军，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对我恐惧，士气不振，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不灵，是这次“围剿”军的薄弱环节。红军打垮他们后，可以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地区发展根据地，征集资材，准备下一步反“围剿”。经一番论证，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终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1931年4月19日下午5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青塘发出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各部队依令迅速行动，从各自地域出发，4月23日到达永丰县龙冈、上固地区，几天后又移至吉安县东固地区集结隐蔽。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也于4月23日抵达东固敖上村。在向东固转移途中，毛泽东在兴国县城岗的一个小松林里，又召开了一个会议，进一步阐释必须先打王金钰部和不能“分兵退敌”的理由。

鉴于不少同志仍主张“打一仗再分兵”，为统一意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东固敖上村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详细分析了红军能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他列举历史上新汉昆阳之战刘秀八九千人打败王莽四十万大军，三国时官渡之战曹操歼灭袁绍十万精兵，赤壁之战号称拥有八十万大军的曹操败走华容道等战例，说明只要策略得当，官兵奋勇战斗，完全可以以少胜众、以劣胜强的道理。

在此时刻，任弼时、王稼祥表态支持毛泽东。一些坚持“分兵退敌”的同志发言承认过去的主张欠妥。会议最后确定了“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王金钰、公秉藩两师。

此事，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曾回忆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

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①

五 横扫七百里的壮举

根据总部的部署，隐蔽集结于东固的红军三万余官兵，像只敛威屏息的猛虎，卧伏在大山四周等待着威猛一扑：坚决歼灭近在咫尺的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第四十七师。而这两个师就驻守在与东固一山之隔的富田，距东固仅 20 公里！

不仅如此，东固北面 40 公里的水南、白沙和中村，分别驻有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和第五十四师；东固南面 45 公里，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两个师。红军隐蔽在敌人鼻子底下一直未被敌人发觉。期间虽有开小差逃跑的红军排长被敌捉获，向敌供述了大批红军隐蔽在东固的事实，何应钦得悉后连续几天派飞机在东固上空侦察，仍未发现红军主力踪影。可是，红军等了 25 天，敌人始终龟缩不出。这时有人将东固比作“牛角”，说红军三面临敌，是在“钻牛角”，太危险了。更多的红军官兵求战心切，总想早点打响反攻战斗。毛泽东坚持“钻牛角”，不为所动，并说服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将士。为克服三万大军云集大山物资供应的困难，毛泽东还和朱德等总部领导人与战士们一起，帮驻地老乡莳田插秧，没有菜吃，战士们就挖竹笋，摸泥鳅，一到夜晚，旷野上就出现一片“满田灯光摸螺蛳”的战地风光。

5 月 14 日傍晚时分，战机终于出现。下午 6 时许，驻富田的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明码通报，谓明晨出发东固。这一信息当即被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讯队队长王铮捕获。毛泽东、朱德得到这一情报，立即于 14 日下午 8 时

①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4 页。

发出《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

5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第二次反“围剿”反攻第一仗打响。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一部，埋伏在富田通东固之间的白云山九寸岭，多次与敌白刃相接，加上这一带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红军占尽地利，大获全胜。至下午3时，一举歼灭向东固进攻的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俘敌副师长王庆龙以下官兵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无线电台一部。敌师长公秉藩被俘后混在俘虏群中“谎称军中书记”领到赤卫队发放的路费一块银元后逃脱。公秉藩后来在回忆录中愧疚地说：“一个一万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①

同日夜晚至17日晨，担任迂回攻击的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一起，在富田歼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枪一千余支。红军首战获胜，终于钻通了“牛角尖”。

白云山、富田战斗胜利后，红军像猛虎出山，按计划由西向东横扫，5月19日在吉水县白沙歼灭敌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部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旅之残部，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枪两千多支。5月22日，在永丰县中村歼灭敌第二十六路军高树勋师一部。

5月23日，红军进驻宁都县东韶的南团村。在南团，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仍由毛泽东兼任总前委书记，周以栗任组织部长，古柏任宣传部长，郭化若任秘书长。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和红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概由临时总前委负责。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率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机关，回驻富田，着重负责指导地

① 公秉藩：《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歼逃脱记》，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98页。

方工作。

5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继续追歼逃敌。5月27日攻占广昌县城，重伤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胡于6月3日因伤重死于南昌）。

5月31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奔袭福建建宁城，歼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大部，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无线电台一部。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从5月16日至5月31日，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横断半壁，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

战后，毛泽东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挥毫填写《渔家散·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一首：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节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比第一次“围剿”失败得更惨。他怒斥何应钦无能，决定亲自出马指挥第三次“围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云：“……中正此次赴赣剿匪，临行之前，国耻党仇，万感交集……中正行将出发鄂赣，督率各军围剿赤匪，信赖我总理之威望，人民之协力，

诸将士之忠诚戮力，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共祸，奠安国族，幸而完此素愿，决当解甲归田，表我心迹，然军人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苟中正因此舍命疆场，克随总理及诸先烈于地下……”①

第二天，蒋介石还致电仍在江西“剿共”的朱绍良、孙连仲：“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② 一副踌躇满志、胜券在握之态。

蒋介石这次调集的兵力计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其中的第六、九、十、十一、十四5个师10万人，是他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次“围剿”军的主力。蒋介石将兵力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左翼集团军由何应钦兼总司令，驻抚州，下辖7个师，从南城方面向苏区进攻；右翼集团军由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亦下辖7个师，从永丰、吉安、乐安进攻苏区。另以1个师和1个攻城旅组成总预备队，位于临川地区。还配备有空军第一、三、四、五、七队分驻南昌、樟树、吉安等机场，支援左右集团军作战。此外，还有8个师2个旅担任后方守备和防堵红军东进。6月21日，蒋介石致电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此次“围剿”中央苏区新的作战计划，主要是先洗扫赣南红军为第一步，再将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为驱使“围剿”军进攻红军和苏区，蒋介石还采用法西斯手段，在军中实行“连坐法”，严厉规定：师长未退，旅团长先

① 上海《大公报》1931年6月7日。

②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长营长先退者，杀无赦。以此类推。他还严督各县长效力，宣布凡“闻警弃城”的县长，一经查获，必处极刑。他还施用“离间计”，委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派黄公略同父异母大哥黄梅庄带着劝降信潜入黎川县红三军团驻地，企图穿线策反黄公略（根据黄公略的意见，黄梅庄被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拿获处决），无所不用其极。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总攻命令，督促各路部队“长驱直入”，由此向南推进，妄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消灭在赣南地区。

二 红军千里回师赣南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抓住国民党军暂取守势之机，转入攻势作战。1931年6月2日，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建宁城召开第六次会议，对红军的攻势作战作出周密部署：第一期向建宁、黎川、泰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以促使两广军阀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江西南部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赣西发展，打通湘赣苏区联系。其中，第一期攻势作战的任务主要有：（1）建立游击队；（2）迅速分田；（3）建立苏维埃政权；（4）建立党、团组织；（5）筹款100万元；（6）开展军政训练；（7）扩大红军三万。进攻区域分为工作区和筹款区两类：工作区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筹款区只打土豪，宣传发动群众，但暂不分田，不建立政权。攻势作战时间，第一期暂定两个月。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

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第一期计划，分头进入指定区域开展工作，具体部署为：红三军团在黎川县，红四军在南丰县，红三军

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泰宁、黎川间，红三十五军在瑞金维持闽赣交通。

为准备下一次反“围剿”战场，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于6月20日至22日在南丰县康都圩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通过对敌情分析判断，一致认为蒋介石有调集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迹象，必须加速做好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尤其是兴国县和于北区的工作，准备好第三次反“围剿”战场。会议对红军的攻势作战部署进行调整，决定红军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推进，也不向两广势力控制的粤赣边区出击，而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

为在赣南准备好反“围剿”战场，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将红三军第七、第八两师南调到于都、赣县边界，消灭赣县七坊和于北区马安石一带土围内的地主武装，拔除白点，巩固苏区。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6月中旬撤销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赣江以东苏区分别成立中共赣南、赣东和永吉泰三个特委。陈毅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领导兴国中心县委和兴国、于都、赣县等县委及于北区委，特委机关设兴国；谢唯俊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领导宁都、广昌、宜黄、乐安、南丰、石城、瑞金等县委（工委），特委机关先设宁都，后移瑞金；毛泽覃任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领导永丰、泰和、吉安等县委，特委机关设吉安富田。赣江以西苏区和湘东南苏区合并设立湘赣省，中共中央决定派王首道前往组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并经苏区中央局批准，在红三军军委和赣南特委之上，成立中共南路工作委员会，以陈毅为书记，统一领导红三军和赣南各县工作；在瑞金成立以周以栗为书记的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领导红十二军军委、红三十五军

军委和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为使赣南地方武装能更好地配合主力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以宁、广、石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为主，合编成立红军独立第四师（又称红军赣东独立师），由龙普林任师长；以永吉泰地方武装为主，合编成立红军独立第五师（又称红军永吉泰独立师），由萧克任师长兼师党委书记；以于都独立团和兴国独立团合编，建立红军独立第六师（又称红军赣南独立师），由李介思（李介士）任师长，黄达任政委。

是年7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了蒋介石给“围剿”军下达的总攻击令密电。因未估计到敌人的进攻来得这样快，红军主力此时还分散在各地筹款和做群众工作，部队未来得及补充、训练和休息。得悉敌军进攻情报后，毛泽东和朱德处变不惊，立即下令全军停止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紧急行动，投入反“围剿”作战。为使部队获得必要的收拢集结休整时间，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军独立第四师、第五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以南地区，红三军第九师在宜黄以南地区，红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地区，与当地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少先队一起，采取运动防御和游击战术，阻击、消耗和疲惫敌军；同时命令在闽西北筹款工作的红军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向赣南苏区转移；命令在赣江以西地区活动的红二十军和红七军，向兴国苏区移动，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

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也全力投入反“围剿”的动员准备工作之中。1931年7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动员准备三次战争问题”特别紧急通知，在分析敌我形势、阐述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紧迫任务和有利条件后，要求各地苏区军民要迅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动员和准备工作。中央局还创办了刊物《战斗》。同一天，苏维埃中央军委也发出

第一号训令《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准备工作》。训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召集群众大会，红军各军、师召集全体誓师大会，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要立即动员群众，把白军从前做的工事，完全毁坏荡平，白军遗弃各地枪炮子弹，加紧收集；要加紧破坏敌军必经之地道路桥梁，做好坚壁清野，多派侦探侦察敌军动态并及时报告红军。8 月 12 日，苏维埃中央军委又专门给兴、于、赣、万、泰等县地方武装下达训令，要求他们努力破坏吉安一富田、吉安一赣州、赣州一兴国三条水陆交通线，以游击战术及坚决行动来阻挠敌军活动，使敌军疲极、饿极、病极、衰极，然后一鼓作气而攻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发出通告，要求苏区群众卖便宜米、菜给红军，支援红军作战。赣南苏区军民全力投入到支援红军反“围剿”斗争中。

1931 年 7 月 10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冒着酷暑，从闽西建宁出发，千里回师，直趋赣南，实行战略退却。7 月 14 日，部队经石城县退至瑞金壬田。毛泽东主持召开各军首长会议，确定退却终点选定在兴国县和于北苏区。7 月 22 日，红一方面总部率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十二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桥头地区，与原在瑞金、于都活动的红三十五军和红三军会合。红七军、红二十军东渡赣江后也来到兴国、桥头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

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三万余人，而敌人拥有三十万大军，双方兵力如此悬殊，红军处境极为险恶。

三　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

1931 年 7 月下旬初，敌“围剿”军主力开始动作：蒋介石嫡系罗卓英第十一师和陈诚第十四师，骄妄冒进，22 日从宁都分两路出发，一路经宁都县青塘进至兴国县古龙冈，一路经宁都

县油树坪进到赖村，妄图从于北桥头、平安寨夹击红军主力。

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情报，于24日午后11时在银坑牛角塘发布命令，决定25日在于都北部的葛坳地区聚歼由赖村向平安寨推进的敌陈诚第十四师。不料陈诚忽接电令由赖村转向东固、富田，逃脱了被歼命运。毛泽东、朱德按原计划，指挥部队继续向兴国退却，7月28日抵达兴国高兴地区，与项英、任弼时等率领的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及中共赣南特委机关会合。

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以东后方联络线防守较为薄弱。毛泽东在兴国县高兴圩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及赣南特委联席会议，确定了反攻作战的第一个方针，即“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①]。为防万一，毛泽东在高兴将红一方面军在建宁筹得的20万元现洋和自己的部分著作手稿，交给赣南特委书记陈毅，嘱其代为妥善保管。

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高兴圩发布《准备攻击富田、新安的命令》。红军各部依令隐蔽向富田出击。8月1日晚，红军进至泰和县沙村、固陂一带，忽发现敌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已先到富田，正在抢修工事。敌情突然变化，毛泽东与朱德经缜密考虑，当即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命令各部队连夜返回兴国高兴圩隐蔽集结。

这时，形势已变得异常严峻。高兴南面15公里的兴国城、东面10公里的崇贤圩以及北面泰和县的沙村，都有敌军重兵。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红军三面受敌，仅高兴地区方圆几十里地可供集结，西面又有赣江阻隔，处境十分危险。毛泽东经仔细分析敌情，发现东面的江背洞赵观涛第六师与崇贤蔡廷锴第一军团20公里之间，有一个空隙地带。临时总前委立即在高兴圩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后，果断决定秘密穿过这个空隙地带，采取“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方针，改变打法，出奇制胜。

这是一个绝招。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8月4日，毛泽东、朱德命令部队将一切能发亮的白色物品严密伪装，并派出一支部队牵制引诱敌人。当夜，全军三万余人冒着大雨，摸黑从高兴圩出发，一路偃旗息鼓，衔枚疾走，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夜间穿越敌人4个师驻地之间20公里的空隙地带，于6日拂晓安全转移到兴国的莲塘地区，跳出了敌人12个师的包围圈。

莲塘以北15公里的良村，已驻有敌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8月6日上午，敌四十七师谭子钧旅奉命由良村向莲塘搜索，中午进入“十万洲”十里狭谷，受到当地游击队和红三军团警戒部队阻击。当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歼灭该敌，再乘胜向良村追击。入夜，红军将谭旅严密包围。7日拂晓，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团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上午10时，战斗胜利结束，谭子钧旅被全歼，敌旅长谭子钧被红军击毙。

红军来不及打扫战场，即乘胜向良村攻击前进。在莲塘与良村之间的大坳，红军击溃前来阻击的敌第四十七师张銮诏旅。午后，红军将良村包围，发起攻击。良村圩内的敌第五十四师师部及两个旅抵抗，被红军消灭两个多团和两个师的辎重队。敌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和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惧怕被歼，率残部逃向永丰县龙冈、白沙。

莲塘、良村两战，红军在一天内歼敌两个多旅，俘敌三千五

百余人，毙伤敌千人以上，敌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峨威，师参谋长刘家祺及两名旅长也被击毙，缴枪三千一百余支、迫击炮十四门、电台两部、马二百余匹、子弹三十余万发。战斗中，红军亦伤八百余人，亡二百五十余人。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实行负重伤牺牲。

良村战斗后第二天，红一方面军总部原计划乘胜进攻逃往龙冈之残敌，后发现龙冈之敌已增加到九个团，附近敌五个师也可快速朝红军合围过来，而敌毛炳文第八师已缩回到宁都县黄陂，孤守据点。8月8日，毛泽东、朱德决定放弃攻击龙冈计划，派出红三军佯攻龙冈，主力连夜东向黄陂。

8月11日晨，红军主力进抵黄陂。总部命令红四军、红十二军（缺三十五师）任主攻，红三军团和红七军迂回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日中午，大雨倾盆。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冒着大雨向黄陂守敌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正在集合逃跑的敌两个团全被俘虏。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来不及收拾机密文件，率残敌四个团仓皇向洛口、宁都县城方向溃逃。红军追击二十多里，又歼敌一部。是役，红军歼敌约四个团，俘敌四千余人，毙敌千余人，缴长短枪三千余支，机关枪三十余挺，迫击炮十一门，电台一部，子弹四十余万发，红军仅牺牲八十余人，伤三百余人。

四　诱敌东向与白石休整

在黄陂战斗中，红军缴获敌第八师师部刚刚收到的敌军一份电报，得知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敌军发现红军已东移黄陂，在富田、东固的第十一、十四两师和在兴国崇贤、高兴的第六十、六十一两师，以及其他的敌军，全部转旗向东，朝黄陂扑来。敌赵观涛第六师和卫立煌第十师，已到离黄陂20公里的砍柴冈，与黄陂只隔一座大山。

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连夜向西转移到永丰县君埠地区休息。时红军又被敌军三面包围，只有兴国方面呈空虚状态。这时，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命令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两个师佯装主力，扬旗吹号、大摇大摆朝乐安方向前进，并袭占乐安县城，诱敌全部东向。8月16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却突然掉头西进，偃旗息鼓，从一个叫尖岭脑的地方，秘密穿过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仅十公里的间隔地带，再次跳出敌军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县西北的白石、城岗和枫边地区，隐蔽休息。

隐蔽在兴国县高兴圩长龙山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机关及项英、任弼时等领导人，从长龙赶到白石，与红一方面临时总前委会合。8月21日，苏区中央局在兴国白石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等文件。经任弼时提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决定改由毛泽东担任。同年10月底，中共临时中央复电同意了苏区中央局这一人事变更。是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正式批准由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追赶红十二军的各路敌军已转头向兴国扑来，毛泽东、朱德又率全军继续西移至兴国县隆坪、茶园及永丰地区，继续休整。苏区中央局和一方面军总部等机关移驻赣县的白鹭圩。临时总前委在白鹭召开红军军以上首长会议，总结了反“围剿”前三仗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反攻作战方案。红十二军完成诱敌任务后，亦于8月底返回宁都县休整。

五　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之战

红军主力在兴国、赣县休整期间，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慰问与帮助。而侵入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被红军牵着鼻子东扑西窜，狼奔豕突，后方补给线又被红军独立第四、五、六师和各县

游击队截断，缺粮缺盐，以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叫苦不迭。敌西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不得不哀叹，“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追到兴国的国民党蒋鼎文、蔡廷锴两军团和陈诚纵队，早已疲惫不堪，停滞不前了。

就在此时，国民党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乘蒋介石集中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之机，通电反蒋，于1931年9月1日出兵湖南。蒋介石急于应付两广事变，顾不得自己立下的“舍命疆场”誓言，下令各路“进剿”军从赣南苏区退却。9月4日，何应钦作出退却部署：蒋鼎文第四军团在蔡廷锴第一军团掩护下，从兴国、泰和撤往吉安；蔡廷锴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随后也撤往吉安；留第五十二师驻守兴国县城，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退守宁都；第一路进击军第八师残部、第二十四师及第二十三师，由宁都县黄陂和广昌头陂地区撤向广昌。

国民党军全线退却的部署很快为红军总部侦悉。毛泽东、朱德抓住战机，立即指挥部队乘胜追歼逃敌。

9月7日凌晨5时，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在萧克率领的独立第五师配合下，首先在兴国与泰和县交界的老营盘，堵住往泰和县沙村退却的敌蒋鼎文第九师，全歼其独立旅三个团。因红三军实际只有三个团，后续部队又未赶到，敌另两个旅得以逃脱。黄公略留下小部队在老营盘牵制敌军，自己率主力退回兴国茶园岗。

红一方面军总部原计划以红三军团、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在高兴圩围歼蒋鼎文第九师。不料敌第九师已先撤至老营盘被红三军截住，而敌军第一军团第六十师、六十一师和第七十八师两个团已赶到了高兴，总兵力达五万余人。9月7日中午时分，红四军按原计划迂回高兴西北面的长迳口时，突然和从崇贤来的敌第六十一师遭遇。红四军与敌六十一师

逐个阵地争夺，在竹篙山下从7日下午打到8日下午，有两个师的子弹全部打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敌第六十师和第七十八师两个团占据高兴圩，派出一个旅兵力扼守圩外高兴河上的大石桥。河里正涨洪水，不能徒涉。负责攻打高兴圩的红三军团，直至7日晚才攻占大石桥，8日下午攻进高兴圩内。敌六十师师长沈汉光率部向兴国城撤退，敌第一军团总指挥蔡廷锴率一部兵力仍顽强固守在圩内几座大房子内。此时，红三军团已筋疲力尽，无力继续战斗。傍晚，敌六十一师突破红四军阵地靠近高兴圩。敌六十师也从兴国城杀回来。红三军团腹背受敌，为避免重大损失，遂撤出战斗，退往茶园。红四军亦撤往均村。高兴之战打成对峙，红军“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①。红军伤1490人、亡780人。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代师长邹平在战斗中牺牲。

高兴战斗结束后，敌蔡廷锴一个师撤往赣州，蒋鼎文第九师残部在韩德勤第五十二师掩护下从老营盘退回，改为经兴国崇贤向吉安撤退。9月14日晚，第九师撤至张家背，第五十二师撤至方石岭下白石村。红一方面军也于14日晚追击蒋、韩两师至崇贤，抢占了方石岭，并将敌人分割包围。15日清晨，红军居高临下，从方石岭向山下白石村的敌五十二师猛冲，至中午就将该师全歼，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可惜被他冒充伙夫给释放了。敌第九师在张家背被红三军截住一个炮团和一个辎重营，并被全歼。敌师长蒋鼎文率残部逃回东固。

未料，战斗结束后，苏区“飞将军”、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东固六渡坳山峡指挥部队防空疏散时，突遭两架敌机扫射，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中央苏区军民素有“朱、毛、彭、黄”之称，黄公略的牺牲，是红一方面军的重大损失。红军折了这员大将，朱、彭及全军将士为之悲痛不已。9月1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兴国县水头庄召开大会，沉痛悼念黄公略军长。毛泽东亲拟挽联一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从7月1日至9月15日共77天，6战5胜，共歼敌1万余人（17个团），俘敌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关枪175挺，迫击炮55门，各种子弹250余万发，电台6部，骡马约500匹。①

蒋介石“御驾亲征”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他既没有“舍命疆场”，也未曾“解甲归田”，而是借口浙江水灾，悻然溜回南京。

第四节 中央苏区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意义

中央苏区军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中国红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神奇、光彩的一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①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三期战争胜利捷报》（于兴国总司令部9月2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1991年，第119页。

一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军军心和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歼灭国民党军共十个师五个旅计七万五千人，其中俘虏国民党军四万六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三万六千余支，迫击炮七八十门，子弹五六百万发。被红军歼灭或遭重创的国民党军部队，长时间难以恢复战斗力。大量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歼，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军军心。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中共永吉泰特委从国民党军第十四师某旅部的传令兵身上缴获九封该旅军官给家人、朋友的信件，每封信中无不透露出对红军惧怕、对“剿匪”厌恶、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后来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就是国民党军心动摇的最有力的例证。蒋介石置日寇侵华气焰日益嚣张于不顾，不事抗日，专事“剿共”，却连遭到惨败，引起国人极大不满，致使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加之粤桂地方势力连连发难，敦促蒋介石辞职下野。迫于各种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1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之职。这与他连续三次“剿共”惨败不无关系。

二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保卫和巩固了中央苏区

蒋介石连续三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一口吞掉全部苏区，一举歼灭所有红军。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却使蒋介石的企图未能得逞。即使在反“围剿”战争最困难的时刻，中央苏区的基本区域仍保留在红军手中。就是那些被国民党军暂时占领的苏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仍然领导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军展开顽强斗争，照常积极支援红军作战。国民

党军一退走，苏区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红军在每次反“围剿”胜利后，都不失时机组织攻势作战，开展群众工作，扩大苏维埃区域和游击区域，从而使中央苏区和闽粤赣（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使苏维埃区域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正式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同时确立了中央苏区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中心地位。

三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央苏区的中流砥柱——红一方面军得到严峻的锻炼与考验，战斗力大为提高

三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的兵力虽然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余人，减至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的三万人，但却在严酷的反“围剿”战争中得到锻炼和考验。红军以劣势兵力，迎战大于自己几倍甚至近十倍的敌军而毫无惧色，沉着应战，不仅实现了由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转变，而且能够成建制地一次歼灭敌军一个师乃至更多的敌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利用缴获敌军的装备，建立了自己的工兵、炮兵、无线电通信兵，兵种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军还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后勤保障体系，红军的领导指挥体系也逐步建立完善，等等。这些都使红军的战斗力有了质的提高，为以后争取更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迎接和经受更加严酷的考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战略思想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舞台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就和朱德一起，总结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和“打圈子”战法。面对国民党军队十

万、二十万、三十万大军的进攻，毛泽东又从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出发，提出并坚持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根据地内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坚持慎重初战，打好第一仗；坚持打运动战，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速决战等一系列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作战原则，这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框架雏形。

五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遭受惨败的蒋介石一时不敢贸然发动新的“围剿”，中央苏区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空间，红一方面军的广大将士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休整，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领导层因战事告一段落，可以坐下来专心研究和部署“全苏一大”召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有关事宜。正因为如此，自1931年9月15日第三次反“围剿”战事结束到同年11月7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就顺利完成。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紧接着，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村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

式成立，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首都所在地。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亦于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成立。

如果没有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前提，这一切的巨变都是不可能的。

第五节 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闽粤赣苏区的军事斗争

早在1930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明确决定将闽粤赣边各县苏区合在一起，划为闽粤赣特区，并将它与中央区、湘鄂西、赣东北、鄂东北、广西左右江等并列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1930年12月初在龙岩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邓发任书记；还建立了中共闽粤赣苏区军事委员会，邓发为主席；建立了闽粤赣军区，邓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且成立红军闽粤赣军区，萧劲光任参谋长。原先已建立的闽西红军学校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萧劲光兼任校长，张鼎丞兼任政治委员。

在江西中央苏区军民胜利粉碎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大规模“围剿”的斗争中，闽粤赣（闽西）苏区军民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同进攻闽西苏区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坚决斗争，保卫了闽西苏区。

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闽西苏区的红军部队曾遭受严重损失。1930年12月间，由原红二十军和原红二十一军合编而成的新红十二军，仅剩六百余人。闽西各县地方武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就在这个时候，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福建国民党军张贞第四十九师分三路从闽南南靖、平

和、漳平向龙岩进攻；粤军香翰屏部也进至饶和浦红色区域，随后向永定进攻。12月15日，张贞第四十九师攻占龙岩城，12月18日永定县城失守。汀州和连城也先后被盘踞宁化、清流一带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卢新铭旅和周志群旅占领。因此原定于1931年1月21日召开的闽粤赣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迫延迟召开。

面对敌军的猖狂进攻，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等领导机关从龙岩退至永定县虎岗，指挥闽西苏区军民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1931年元旦，东江红十一军第四十八团与永定工农武装六千余人，奋起围攻永定城。驻守城内的敌杭武永连四县保安总队六百余人仓促应战，大部被歼，残部弃城逃走。红军和地方武装一举收复永定。新红十二军也集中兵力，由上杭东北古田、蛟洋地区向龙岩进逼，在大小池歼敌四十九师二九二团大部，迫使残敌退守龙岩。驻坎市之敌亦惧歼后撤。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进攻遂被打退。

1931年3月中旬，为配合国民党军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二师、新编独立第十四旅、独立第三十二旅等部，开始对闽西苏区发动新的进攻，永定县城及永定县湖雷、坎市等战略要点重新为敌人所占领。6月上旬，敌人又将进攻锋芒指向虎岗。闽西苏区军民在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领导下，万众一心，决心保卫虎岗等基本苏区。正好这时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5月31日红军占领建宁。随后，红一方面军转入攻势作战，在闽西北地区筹款做群众工作。红三十五军奉命进入瑞金，红十二军奉命进入宁化、清流、长汀、石城，并以宁化、长汀为工作重点。为配合红十二军行动，闽西新红十二军北上长汀，6月16日收复汀州。以周以栗为书记的中共闽赣边界工作

委员会，也指挥红十二军于6月27日攻取宁化县城，7月1日占领长汀。盘踞在宁化、长汀的敌卢新铭旅受到沉重打击。长汀被敌占去的一部分苏区得到恢复，宁化、清流还新建立了一些新的红色区域。由此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进攻受到遏阻。

1931年7月，进占闽西的各路国民党军乘江西红一方面军回师赣南投入第三次反“围剿”之机，又向闽西红色区域发动新的进攻。8月2日，敌新编第二师进占长汀；8月10日，敌四十九师攻占虎岗，8月20日又占领永定。面对敌军进攻，新红十二军学习和运用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打运动游击战的经验，不与进攻之敌死打硬拼，而是主动避敌锋芒，在运动游击中寻敌弱点予以出击，先后在上杭回龙、庐丰、蓝家渡等地，给敌钟绍葵部以重创。9月上旬开始，新红十二军受江西红一方面军反“围剿”胜利鼓舞，向进占连城、汀州的敌卢新铭旅发起反攻，9月11日再次收复长汀城，并乘胜追击敌人至连城，给敌以重创并收复连城县城。

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1年5月间改为中共闽粤赣苏区临时省委，仍由邓发任书记，罗明、李明光分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萧向荣任临时省委秘书长。7月成立陈荣为书记的共青团闽粤赣苏区省委。9月11日新红十二军收复长汀城后，中共闽粤赣苏区临时省委等机关进驻长汀城。这时，临时省委书记邓发奉中央指示到苏区中央局工作，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主管政治保卫局工作。中共闽粤赣苏区临时省委书记由罗明代理。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第十二军东入长汀，与闽西新红十二军胜利会师。

至此，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完全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巩固的基本区域。

第七章

中央苏区红军巩固发展苏区的斗争

第一节　红军消灭苏区内的反动“土围”“白点”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9月23日在兴国县鼎龙水头庄发布《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命令说：“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命令将全方面军分为左、中、右路行军队形，规定了各路行军路线及行军日程，其中规定：“总部及直属队应于二十五日晨四时由现在地（水头庄）出发，在中路第四军前头，沿第四军之行军线前进，务于第二天（二十六号）在长沙渡河完毕，在河之南岸择地宿营。第三天到官仓下附近，第四天到瑞金城宿营，以后则沿右路第三军团之行军线到长汀。”[①] 这个命令规定总部和方面军都应开到长汀城集中，然后以长汀城为中心分散各地筹款做群众工作，休整部队，同时筹备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4页。

准备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红一方面军各部依令东移。9月28日，总部机关按原定计划抵达瑞金县城东北五公里处的叶坪村休息。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了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和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关于赣东苏区和瑞金县的情况汇报，研究了红军行动部署及筹备召开“一苏大会”等问题。根据赣东苏区特别是瑞金的革命形势，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遂对原定全军开至长汀城集中的行动计划作出调整，决定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留驻瑞金叶坪村，即将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和即将成立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设地点，也选定在瑞金叶坪村。10月3日，苏区中央局向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发去一份长电，详细报告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经过和战果，以及红军的近况与部署：“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开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于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① “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苏区内的反动“土围”“白点”，巩固苏区内部。

在赣南各地农民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剧烈斗争中，各县一些来不及逃往白区的土豪劣绅、反动官吏，纠集当地的反动势力组织地主武装，并且裹胁大批贫苦农民，充当武装力量，躲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土围山寨或边远山村，负隅顽抗。他们经常残杀苏区干部群众，抢掠财物，或者充当国民

① 中央档案馆保存件《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来自瑞金的长电》（1931年10月3日）。

党军队进攻苏区的向导、内应，严重危害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妨碍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反动堡垒。像这样的土围山寨等白色据点，在石城、于都、赣县、兴国、宁都、会昌、安远等县，大大小小共有二百余处。其中反动势力较为强大且顽固凶悍的，有于都县北部的马安上宝土围、澄江杨梅头土围，石城县南部的红石寨、李家寨、陈坊寨，宁都县的赤面寨（翠微峰）、观音寨、赖村土围，安远县的仰天湖土围、半边塘土围等。尤其是邻近瑞金的会昌县城，还被反动靖卫团占据，对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都首府瑞金威胁甚大。

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自 1930 年冬以来，一直忙于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围剿”，虽然于 1931 年二三月间安排红军部队拔除了兴国县“龙聚三都”等顽固反动堡垒，但对其他各地的白色据点则一时无暇顾及，未曾触动；而各县的地方革命武装也忙于支援红军反“围剿”战争，且力量单薄，难以抗拒和拔除这些白色据点。这样赣南众多的地主土围子就一直残存保留下来。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扫除苏区内这些残存白色据点的艰巨性和重要性。故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一结束，红一方面军总部就命令方面军从兴国东移闽赣边境，在休整之余，即对消灭白色据点的工作作出部署：命令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在石城县，第十二军在长汀县，红军第三军团在会昌、安远、于都三县，红军第三军在于北区，红军独立第三师（原第三十五军改编）在瑞金、于都边界地区，向豪绅地主武装盘踞的白色据点发起进攻，坚决将它们拔除。随后，“应接着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庾（即大余——引者注）、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十六县”，毛泽东、朱德等认为，加上石城、长汀、会昌、

于都四县“这二十县共有群众四百万，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他（它），同时，扩大红军十万；这是建立根据地聚集力量的必要”①。

毛泽东在领导筹备召开“一苏大会”的同时，对消灭苏区内白色据点的工作十分重视。1931 年 10 月 14 日，他与朱德专门签发了《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训令还指出，必须总结攻打土围炮楼的经验，“兵力布置，工作的方法，如挖地洞的方法，用的工具，爆炸的药种药量，爆炸的效力，收效的成绩，详细的开会讨论后汇集起来报告总部，再由总部参谋处加以讨论，汇集有效的有经验的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② 1931 年 10 月下旬，他亲自从瑞金去到石城县秋溪红四军军部，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红四军攻打土围山寨的计划，确定以红军主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还提出对白色据点实行“长围久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个消灭”的方针。

按照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部署，红军各部即刻在各自负责的地区，向白色据点发动进攻。

红三军团经过一个多月围攻并用地下坑道爆破法，于 1931 年 11 月 26 日和 27 日两次炸开会昌县城两处城墙，攻入城内，消灭盘踞城内的各县土豪千余名，活捉国民党会昌县长史丞汉及八百余名靖卫团丁，迅速赤化了会昌全县，解除了红都瑞金来自

---

① 中央档案馆保存件《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1931 年 10 月 3 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7—258 页。

南面的威胁。

红三军三个师，在于都县北部攻打拔除白色据点时，按照毛泽东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先后攻破仙下吉村、旗岭寨、翰林头、马安石、古石坑、罗屋、新圩、杨梅头等数十个土围。于北区剩下一个最大最顽固的上宝土围，经红三军第九师近一个月围攻，围内的六百余名靖卫团丁和土豪劣绅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被迫于1932年1月20日开围投降。红军缴枪三百余支，解放围内群众五千余人。为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以原于北区为基础，新设立了胜利县。

红四军在石城县南部也先后攻破洋地寨、陈坊寨、李家寨、红石寨等大小山寨十二处。仅红石寨战斗，红军就打死打伤地主武装一百余人，活捉国民党石城县县长黄光英、靖卫团团长黄绍荣、杨子美和寨主黄太年等豪绅靖匪一千五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机枪十三挺，台炮三门，土炮四十多门，子弹三百多箱。

红军历时4个月的打土围、拔白点战斗，共计消灭白色据点200余处，打死打伤敌人1100余名，俘敌7800名，缴获各种长短枪15451支、机枪23挺、土炮277门、台炮3门、子弹671900余发、手榴弹4箱。此外，还缴获大批金银财物。

红军打土围、拔白点的丰硕成果，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存在创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并为后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节　宁都起义诞生红五军团

一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困境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被国民党第二十

六路军占据的宁都县城，是苏区内存在的一个最大“白点”，对红都瑞金的威胁最为严重。可是在1931年12月14日，驻宁都县城的二十六路军却毅然举行兵暴，宣布起义，全体加入红军。宁都起义这一重大事件，震惊全国。

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魏野畴、邓希贤（邓小平）等，都曾在该军从事政治工作，刘伯坚还担任过该军政治部主任。他们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宁汉分裂”后，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一边，开始反共，将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清洗出队。但该部官兵对共产党留下了深刻印象。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如刘振亚、袁汉澄（又名袁血卒）等，仍然留在该部。刘振亚还与中共河南省军委保持着联系。

1930年夏秋间，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混战结果，冯玉祥惨败，其残部为蒋介石收编，给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和一个骑兵第四师。全军总兵力两万余人。其总指挥孙连仲兼任第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总指挥部参谋长先是赵大璞，后为赵博生。

第二十六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歧视排斥。1931年2月，蒋介石令其从山东开来江西“剿共”。该部官兵害怕与红军作战，对蒋介石的做法十分不满。1931年5月22日，该部第二十七师在永丰县中村首次与红军交战，其第八十一旅大部被红军歼灭，损失枪支三千余支和无线电台一部，二千三百余人被红军俘虏。此战惨败，令二十六路军官兵谈虎色变，同时更深感蒋介石驱使他们前来“剿共”用心险恶。加上北方人初到江西，不善爬山，水土不服，各种疾病频频发生；而蒋介石不仅对他们克扣军费物资，连战斗减员和枪支弹药损失也不给补充。这更使该部官兵思想混乱，军心动摇。

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中多数人出身贫苦，到江西“剿共”前线后，经常接触到红军的“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红军欢迎白军官兵拖枪加入红军”、“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宣传标语口号，很有感触。那些在中村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的官兵受到红军优待被释放后回到原部队，便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二十六路军官兵们看到苏区的贫苦农民都热烈拥护共产党、苏维埃，积极支持和帮助红军作战，而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却痛恨异常，唯恐避之不及，感到不可思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些正直爱国的官兵对日寇大举侵占中国领土义愤填膺，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为不满，纷纷向总指挥孙连仲要求开回北方抗日。孙连仲迫于官兵压力，向蒋介石发出请求北上抗日的电报，并且未等蒋介石复电，便下令部队离开宁都城，向北开拔。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急电孙连仲，严词责令他们坚守本土，“死也要死在宁都”，并将自己的嫡系许克祥、毛炳文部摆在广昌县一线，挡住二十六路军北返之路。在这种处境下，第二十六路军陷于进退维谷之中。一些高级军官心灰意冷，纷纷请假离队；总指挥孙连仲也借故在南昌“养病”。

二　中共在第二十六路军开展秘密兵运工作

面对第二十六路军中的这种情况，隐蔽在该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开展秘密活动。

当该部南下江西宜黄县境时，原西北军官学校学员、共产党员袁汉澄（即袁血卒，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二团三营上士）就与共产党员刘振亚（七十三旅上尉参谋）秘密接上了关系。刘振亚让袁汉澄返回河南开封，与中共河南省委军委接上关系。袁汉澄在开封会合了从事地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王超和进步青

年李肃。经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介绍，他们前往上海，与中共中央军委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他们三人派回江西的第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将该部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并委任王超为中央军委驻二十六路军特派员。袁汉澄与王超在上海秘密主持了李肃的入党仪式。他们还参加了中央军委关于兵运工作的短期培训。中央军委向他们交代了与江西苏区红军领导机关接头的暗号。之后，他们便离开上海前往江西。途经南京时，恰好遇到以回家“探亲”为名实为联络共产党组织的刘振亚。四人即在南京共同分析研究了第二十六路军的现状，确定了在该部开展秘密兵运工作的原则、纪律和行动计划。

王超、刘振亚等四人返回二十六路军驻地宁都后，便分头进行活动。王超以闲住和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和七十四旅，刘振亚仍回七十三旅当参谋，袁汉澄分到七十九旅二团团部，李肃到七十四旅二团团部任文书。他们先后秘密发展了李秉仁（七十四旅二团排长）、王铭五（七十四旅二团机枪连排长）、罗亚平（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王宏文（上尉执法官）、李青云（七十三旅学兵连连长）、王振铎（总指挥部执法队员）、孙步霞（总指挥部执法队员）等十余人加入共产党。随之成立了中共地下特支，由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汉澄任特支组织委员，王铭五任特支宣传委员。特支下设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经党中央特批，他们又发展了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入党。

赵博生，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人，农民出身。1917 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先后任团参谋、参谋处长和旅、师、军参谋长及特种兵旅旅长等职，素以为人正直、艰苦朴素著称。西北军残部改编为二十六路军后，孙连仲聘请他出任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受到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思想进步，早就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倾向革命。到江西后，

凡是以“赤匪”罪名抓到的老百姓送到总指挥部后，他都设法予以释放。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不久，孙连仲因北返受阻离开宁都，离队时留下手令将第二十六路军指挥权交给了赵博生。

赵博生和中共地下特支抓紧机会，在全军官兵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激发官兵们的爱国热情，同时大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宣传苏区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他们更受到鼓舞，坚定了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念头。二十六路军中有一批进步军官，赵博生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也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三　宁都起义胜利

正当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条件日益成熟之时，1931 年 12 月 5 日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变：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截获了该部中共地下特支的秘密，严令赵博生缉拿该部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原来，中央军委驻二十六路军特派员王超几天前奉令回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途经南昌时必须与一个地下机关接头，可能接头时发生意外，使敌人获得了地下特支三名成员的名单（后来查明，王超接头的地下机关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和控制，不知内情的王超误将二十六路军地下特支三名领导人名单和特支关于二十六路军工作的政治决议、组织决议等文件，误交给接头人。幸亏王超在与接头人交谈时发现了疑点，没有交代其他地下党员名单）。特支分析认为，王超不像叛变投敌，因为敌人还不知道赵博生等地下党员名单。但二十六路军中地下中共组织已经暴露，敌人一定会加紧破坏。应付事变的唯一出路和最佳选择，就是立即抓紧时间，在近期内策动全军起义，投奔红军。

果然，12 月 6 日上午，一架国民党飞机飞临宁都县城上空，

空投下蒋介石下达的“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反动分子”手令。情势危急，中共地下特支立时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由赵博生应付南昌行营，并做好争取董振堂、季振同共同起义的工作；刘振亚、王铭五等加紧发动下级军官和士兵；袁汉澄立即前往瑞金，与红军领导机关取得联系，请求指示和支持。

会后分头行动。赵博生当天向南昌行营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以应付行营。随后，他立即去找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密谈商议。

董振堂，河北省新河县人，与赵博生既是同乡，又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习武毕业，时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他也是一位正直军官，刻苦耐劳，体恤部下，受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影响较深，思想进步。到江西后，刘振亚以“探亲”为名前往南京、上海寻找共产党组织，就是受他派遣的。二十六路军离开宁都向北开拔，也是他这个旅打头阵。南昌行营怀疑他这个旅驻南昌留守处是“共匪”联络点，对这个留守处抄家搜查。董振堂和全旅官兵对此无比愤慨。赵博生入党后，对他做了许多工作。这些都促使董振堂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使他更加向往苏区，向往红军。

季振同，河北省沧县人，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旅旅长。他性情刚强直爽，富有正义感，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深得冯玉祥器重，冯玉祥曾派专人给他捎来密信，告诉他在必要时可以抗日为名假道红区将部队拉回北方。这一机密已为地下特支书记刘振亚获得。他的七十四旅与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装备精良。他们两人也亲如兄弟，情同手足。赵博生与他俩也关系甚笃。季振同手下的第一团团长黄中岳和副团长苏进，皆为思想进步、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正直军官。

赵博生很快做通了董振堂、季振同的工作。董、季二人都爽快承诺，愿随赵参谋长率部举事。为了进一步坚定季振同参加起义的决心，赵博生还搬到七十四旅旅部居住，连总指挥部的电台也设在七十四旅旅部。对二十七师的三个旅，特支和赵博生也加快了团结争取工作，使这几个旅参加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受特支派遣前往苏区的袁汉澄，几经周折到达瑞金后受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切热情的接待。12 月 8 日上午，朱德召集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叶剑英、军委总参谋部参谋处长左权、军委秘书长刘伯坚及刚到瑞金准备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一起听取袁汉澄汇报，并研究了策应暴动的措施。朱德将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一共有七点：（1）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如七十四旅争取不过来，则以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3）万一暴动不成功，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一定要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4）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行动要快，行动前要注意保密，暴动时间定在 1931 年 12 月 13 日夜 12 时，规定了暴动后部队开到苏区来的集结地点；（5）暴动以后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6）如有可能，暴动时把宁都地主武装的头子严维绅、黄才梯等逮捕起来；（7）派红四军在会同方面相机予以协助。

总参谋长叶剑英将一张标有暴动后各部队行进路线和驻地分布的苏区地图交给袁汉澄带回。

中革军委开完会后，袁汉澄由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带领去见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暴动准备等情况后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

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插上一刀也是好的。①

袁汉澄到达瑞金的第二天，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还派出另一名代表、地下党员郭如岳也到了瑞金，找到刘伯坚，他得到了如同袁血卒一样的答复，还带回了刘伯坚给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的亲笔信，对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决定起义的壮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洋溢的鼓励。

袁汉澄、郭如岳分途赶回宁都，分别向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汇报了与中革军委和刘伯坚联系情况。这时，恰好南昌行营发给二十六路军的一批军饷和棉衣，已到广昌，不日即可运到宁都。为得到这批饷款物资，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等决定将起义时间推后一天；季振同也认为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第十六军番号小了些，要求中革军委改变番号。为此，特支再派袁汉澄为代表，七十四旅也派出一营营长卢寿椿为代表，再入苏区，当天在彭湃县委所在地固村圩，见到了王稼祥、刘伯坚等人。王稼祥、刘伯坚当即将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意见通过电台向中革军委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军委、中央局、中央政府领导人连夜研究，答复如下：同意将暴动时间推迟至12月14日晚12时举行；起义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军、第十四军和第十五军；委任季振同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

① 袁血卒：《宁都暴动纪实》，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毛泽东在瑞金连夜签署了给季振同、董振堂等的委任状，派快马送到宁都固村圩王稼祥、刘伯坚处，转交袁汉澄、卢寿椿带回宁都城。

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袁汉澄和李青云（特支士兵支部书记）立即在七十三旅旅部召开兵暴行动会议，具体制订了兵暴起义的周密计划。会后，赵博生将暴动指挥部设在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旅部。

1931 年 12 月 14 日下午入夜，赵博生按预定计划，以总参谋长宴请名义，将全军的旅长团长都请到设在县城梅江河畔耶稣堂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宴会酒过三巡后，赵博生起身讲话，慷慨激昂地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阐述二十六路军的困难处境，指明全军唯一出路就是全体起义，加入红军，打回北方，抗击日寇。他的讲话博得在座绝大多数军官赞同。

就在这时，楼下负责解决赴宴军官卫士武装的七十四旅一团特务排一位士兵，行动时枪走火，一梭子弹直窜楼顶。二楼宴会厅中的两位团长一听枪声，冲到走廊纵身跳到楼下，被特务排擒住。其中一位团长李锦亭因为误解而跳楼，弄清情况后也满口答应率部起义。

总指挥部的问题顺利解决。赵博生向全军发出起义行动信号。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和特支成员按预定计划行动。一切进展顺利。只是在解决二十五师师部和该师电台时，未前来赴宴的该师师长李松昆率部顽抗发生枪战，小有伤亡。至 15 日清晨，二十六路军除驻宁都城北 20 公里石上的一个团未参加起义和李松昆逃跑外，其余六个旅十一个团总计一万七千余人，带两万多件武器装备，全部参加起义。

胜利捷报传来，赵博生兴奋不已，挥笔写下“解放”二字，用作起义胜利后的口令。

四 红五军团诞生

1931年12月15日上午9时许，起义加入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在赵博生等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苏区。起义部队在固村圩受到王稼祥、刘伯坚等领导人和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率全师进驻宁都县城，接管防务。

当日，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名义，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庄严宣告起义胜利，红五军团诞生，坚决表示："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①

起义部队进入苏区后，按原定计划，分驻在石城县南部龙冈、秋溪及瑞金九堡等地整编。

为将这支起义部队真正建成共产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毛泽东和朱德经审慎研究，决定对起义部队按红军建制进行改编，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军委和临时中央政府任命萧劲光为该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调邝朱权、黄火青、左权三人分任第十三军、第十四军和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同时给各师、团、营、连也配备了政治委员和政工干部；对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实行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欢送政策，提拔一批有革命思想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担任中下级官长；对原特支成员也作了适当安排，同时宣布特支结束历史使命。军委还采取

① 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

了其他一些有力措施，加强起义部队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发动瑞金、石城、宁都等县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向起义部队送粮送菜送鱼送肉，进行慰劳。为稳定起义官兵思想，毛泽东特意指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派出李伯钊、钱壮飞等著名演员，带着八一剧团赶排的现代歌剧《为谁牺牲》，深入起义部队巡回慰问演出。毛泽东和朱德还委托贺子珍、康克清、周月林等女同志，代表他们到起义部队演讲，宣传鼓动。每次演出和演讲，都受到起义官兵热烈欢迎。

毛泽东还亲自到起义部队驻地看望起义官兵，给大家讲话。他和朱德在瑞金亲切接见起义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同他们亲切交谈，深入了解起义部队情况，鼓励他们坚定革命信念。在毛泽东、朱德的亲切关怀下，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卢寿椿、苏进等一批起义领导人和骨干，很快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坚决的官兵，也都先后入党，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

经过教育、整顿和训练，起义部队很快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劲旅，在革命征程中为巩固、保卫苏维埃政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这次大规模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中共在该部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而该部中共地下特支的同志又能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兵运工作的方针政策，大胆、细致而又稳妥地开展兵运工作。他们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抛弃了过去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兵运工作方针，在积极慎重地做好士兵和中下层军官工作的同时，选准对象，抓住时机，大胆而又稳妥地开展高层军官的工作，发展了掌握该路军指挥实权的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从而使特支有了团结影响该路军全体官兵的核心

和关键人物；继而又通过赵博生团结、争取了董振堂、季振同等一批高、中级进步军官参加起义，从而确保了全体起义成功。

第二，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坚等中革军委领导人正确指导和全力支持的结果。特别是当个别起义领导人希望提升起义部队番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灵活处置，及时满足了起义领导人的要求，坚定了起义领导者的起义决心。

第三，是当时的抗日救亡国内政治形势，红军反“围剿”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及红军坚持瓦解敌军的政策等各种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宁都起义胜利，红五军团诞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给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以沉重一击，极大地动摇了“围剿”苏区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它对苏区军民和全国革命人民是一大鼓舞，使人们坚定了国民党必败、红军必胜的信心；它解除了敌军对红都瑞金的严重威胁，使中央苏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它使红军增添了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一万七千余人的主力军团，迅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三万余人骤增到近五万人；它将起义部队大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带到苏区，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提高了中央苏区红军的战斗力；它为中共开展兵运工作、将整军整师成建制的起义部队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创造和积累了成功经验。

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在巩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宁都起义的卓越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等以及成千上万的起义官兵，为中国革命胜利血洒疆场，英勇献身；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级党政军机关的重要领导骨干。他们中先后有五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有数十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有的还成为我国著名的外交家、艺术家。

1937年，毛泽东和萧劲光、王稼祥在延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毛泽东在合影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是对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

第三节　攻打赣州

一　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关于攻打赣州的意见分歧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如何动作、如何部署，王明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开始就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王明等人认为，中央苏区红军在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应该"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步（部）队，消灭它的一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在（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①

这完全是无视中央苏区红军经过连续数月反"围剿"斗争已极度疲劳，伤亡减员严重急需休整补充，并且仍处于敌强我弱状态的现实。1931年10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致电苏区中央局："接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三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刻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得成绩告诉中央。"②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估计蒋介石可能很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快向江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所以他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提出红军各部队应抓紧时机，加快消灭苏区内部由反动地主武装占据的土围白点，迅速完成赤化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四省边界20县400万群众的任务，并扩大红军10万，以便准备好反“围剿”战场。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后来被周恩来、任弼时等指称为“三山计划”①。毛泽东在接到中共临时中央10月22日电报后，复电临时中央，表示一时无法执行中央“向外发展”的指示，并陈述了理由。

中共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后，立即于10月31日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五号指示电，坚持说：“中央区正宜利用现在时机，继续胜利的行动，巩固的向外发展……我军急宜以主力军出击宁都广昌，此处敌力较弱，胜利可待。敌人钳制之势一破，然后依军情变迁，向有利方面发展……若困处瑞金一隅，避免与敌接触，恐惧四次战争爆发，因而向闽西北赣西南十六县发展，则不但给养难解决，自放弃良好时机，自处被动，使敌人得从容布置，且无法巩固根据地。现有根据地之巩固，必须消灭广宁之敌，绝不能将现有之根据地，准备作新战场，此无异取消红军之根据地。”②

毛泽东等接电后，坚持原定部署不变，即于当日再次复电临时中央：“行动问题，现三军在于都，四军在石城南部，十二军在汀东，三军团在于都会昌。苏大会后拟扩大工作区域：十二军去连城，三军去宁化，四军去石城北部，三军团再后南移，这是

①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3日于瑞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② 《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五号电——关于目前形势、发展苏区、红军编制等问题》（1931年10月31日）。

为了建立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①

不久后，毛泽东得悉蒋介石已在南京倒台下野。于是他对形势的估量发生了改变。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即便能很快东山再起，也要用一段时间收拾残局。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呼声日高，爱国学生不断前往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发兵抗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可能在近期组织大规模兵力再来进攻苏区。因此，中央苏区红军在消灭苏区内部白色据点后，应该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向赣东北地区出击，尽快打通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联系，并继续向外扩大苏区。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后来被周恩来、任弼时等谓之为“东北路线”②。

此时，负责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总领导人米夫，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对中国红军反“围剿”胜利过于盲目乐观，极力怂恿支持中共临时中央推行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1931 年 11 月 20 日，米夫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反复强调中国红军目前进攻中心城市的重要意义，向斯大林建议共产国际通过要求中共和中国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决议③。

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在米夫的怂恿支持下，根本听不进在苏区从事实际工作的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正酝酿和提出一条充满“左”倾冒险错误的“进攻路线”。他们急于要求将长江南北各块苏区连成一片，急于夺取几个中心城市，急于将苏维埃共和国

---

① 《苏区中央局电中央》（1931 年 10 月 31 日）。

②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 年 6 月 3 日于瑞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6 页。

③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1931 年 11 月 20 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81 页。

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一隅”搬迁到赣州等中心城市去。为此，1931年12月4日，他们向全国各苏区红军发出训令：“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对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在训令中专门要求：“应以红军主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① 而对赣南寻乌、安远、信丰等十余县及闽西北各县，训令仅要求各县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与土地革命，反对主力红军到这些地区活动。

1931年12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去第十二号指示电，再次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②。

这样，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红军行动的意见分歧，就集中在是打土围拔白点然后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还是取赣州、迫吉安了。

周恩来在参与起草中共临时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指示电后不久，就以中央代表身份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他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组织中央苏区红军攻打赣州等重要城市。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瑞金后，首先就攻打赣州问题征求毛泽东的

---

① 《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部署，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1931年12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意见。

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的。他与朱德在1930年3月16日就组织红四军攻打过一次赣州，未能克城，知道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高坚，素有“铁赣州”之称，向来易守难攻；赣州城虽然只驻有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两个团，但赣南17县的地主武装大都麇集城内，这些反动势力不可小视；况且赣州北面之吉安驻有国民党军罗卓英、陈诚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等五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南面驻有国民党粤军几个师，如果红军攻赣，他们势必前来增援，红军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

原对打赣州持积极态度的周恩来，在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即致电临时中央，陈述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尚有困难。但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求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①]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脱离苏区和红军实际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要求红军要“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②]。

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攻打哪个城市。会上决定选择攻打赣州。对此，毛泽东忧心忡忡，发言陈述不能攻赣的理由，并说即使一时打下赣州，红军也未必能守得住。他坚持红军还是按总部原定部署，继续开展赣南闽西北十六县打土围、拔白点的工

---

①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作，待完成这些任务后即向赣东北与方志敏部靠拢，然后向闽浙皖赣边发展。如果一定要打赣州，也只能围城打援，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未料，会上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除毛泽东外，其余都赞成攻赣。王稼祥态度最为坚决，他认为“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①。毛泽东又建议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他问过彭德怀，彭说，“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②。于是，毛泽东的意见成了少数。苏区中央局正式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

二 攻赣部署及经过

1932 年 1 月 10 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对攻赣军事行动作出部署。中央苏区所有红军部队分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主作战军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由攻城部队、监视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三部分组成。攻城部队由红三军团担任，红七军主攻赣州东门，第二师主攻赣州南门，第一师主攻赣州西门（西津门）；监视部队由红四军第十师担任，位置于南康县以北地区，任务是准备截击由赣州北逃之敌；地方工作部队由红四军担任，位置于大余县新城、南康和上犹县杨眉寺附近，任务是打击从南雄、大余前来援赣之粤敌，建立军事交通线，贯通于都、赣

① 参见《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 年 6 月 3 日于瑞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6 页。

②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3 页。

县、信丰、南康、大余苏区，占领大余、信丰县城，掩护攻城部队。

支作战军以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为总指挥。内有赣南红军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六师和赣东独立第四师及湘赣独立第一师。具体部署为：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驻于会昌筠门岭附近，消灭会昌、寻乌边境的团匪，巩固会寻苏区；闽西独立第七师须与独立二、三师联络，并以大部分向武平方面发展；独立第四师以广昌为中心，巩固广昌苏区，并派部队向南丰、宜黄、乐安方向游击，保障中央苏区北路之安全；独立第五师和湘赣独立第一师，分别驻于万安河东、河西地区，监视吉安之敌行动。

机动部队有红三军、红十二军和红五军团、红十六军。红三军担任消灭于都、宁都两县残余地主武装；红十二军在宁化县西南和连城县西北一带工作；红五军团部署在赣州东北面的江口地区整训，红十六军在株萍线附近活动，以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此外，还安排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担任总预备队。

为准备赣州攻克后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搬进城去，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训练了一支特别侦察队伍，准备随红军部队入城肃清城内地主豪绅反动分子，保卫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安全。

1932 年 2 月初，红军攻城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各自进入指定位置。红三军团于 2 月 4 日到达赣州城东外五里亭、天竺山及西南城郊后，很快完成对赣州合围，进入攻城出发阵地。彭德怀的攻城总指挥部，设在赣州城东外天竺山。

赣州城守敌为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崑。为抵御红军攻赣，他进行了严密的准备，组建了以地主武装首领肖昇犀为首的民团指挥部，赣南每县编 1 个大队，共 17 大队；同时成立城防办事处，强征物资粮饷，赶制守城器械。守城的兵力布置为：

六十七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六十八团守南门、西津门；各县民团大队分别协同守城。守城总兵力共有一万余人，枪近万支，“具有相当的兵力进行防御”①。

红军的第一次攻城战斗，于1932年2月13日晚打响。攻城红军在炮火机枪火力掩护下，十人为一组，架设云梯爬上城墙，从各处同时向敌人猛攻，但每一次猛攻都被守城敌军打退。

爬城强攻失败，改用坑道爆破城墙。守敌旅长马崑发现红军挖掘坑道，为掌握红军坑道挖掘进度，便在城墙上倒扣水缸，组织城内盲人日夜侦听动静，以便组织防御反击。

2月23日，红军分别在西津门、南门和东门通过坑道用棺材装满炸药爆破城门，三处城门先后被炸开后，红军立即发起猛攻，但都被守敌强大火力击退。攻打东门的红七军一部，曾突入城内，遇敌猛烈反击，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曾一度占领东门城楼的红七军部队不得不从城楼撤下。第二次攻城又失败。

红军攻赣受阻，担任攻打西津门的红一师政委黄克诚认为红军不能再盲目攻城，曾多次给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去电话建议撤退，均遭彭德怀拒绝。3月4日拂晓，红军继续采用坑道爆破法发起第三次攻城。主攻东门的红七军，用三个棺材炮炸开城墙二十多米。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二百多人。红七军五十五团在团长卢绍武、政委陈漫远指挥下，发起猛烈冲锋。不料敌军已事先获得红军爆城情报，在城门后已筑起第二道防御工事，守城兵力也由一个营增加到一个团。红七军先后四次发起冲锋，均被敌军打退，伤亡惨重，只得撤出战斗。同一天，主攻南门

① 马崑：《蒋军赣州守城战役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4年版，第141页。

的红一师和主攻西门的红二师，均因积水浸湿炸药，未能爆破城墙。

红军发起攻赣后，赣州守敌旅长马崑一面组织部队顽抗死守，一面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蒋介石令驻吉安的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独立旅三万余人，组成“援赣剿赤进击军”，由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任前敌指挥驰援赣州。2月29日，援赣军进抵赣州城西北部赤珠岭、言和梅渡地区，并在赣州北门外架起浮桥，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马崑冒险出城与罗卓英晤面，密商了“增兵进城，内外夹击”对策。罗卓英遂派出一个工兵营连夜随马崑进城，抢挖从城内向城外红军阵地出击的坑道。

红军发现敌援军正在架设入城浮桥，遂采用多种方法试图破坏，均未成功。3月5日晚，敌援军两个团从北门外偷渡浮桥进入城内。3月7日凌晨4时，城内敌军分三路突然从坑道向城外正在熟睡的红一师和红二师出击。红军部队在熟睡中被惊醒，仓促抵抗，一片混乱，建制亦被冲乱，阵地丢失，许多人牺牲。负责指挥红军攻赣战役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得悉城内敌军向攻城红军出击的电报后，知道情况危急，立即电告在后方瑞金的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请在瑞金叶坪东山寺养病的毛泽东马上赶赴攻赣前线商议对策。毛泽东冒着风雨立即下山赶到红军学校，通过红校电台告诉朱德：大胆起用红五军团增援攻城部队，掩护撤退。

3月7日上午，朱德亲率警卫营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军赶到赣州城外。下午3时，红十三军会合红三军团攻城部队，在赣州城郊天竺山、白云山一线与出击之敌展开肉搏。至傍晚，红军才全部撤出阵地。

三 赣州撤围与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

红军攻赣部队于3月7日傍晚撤围赣州后，3月8日开至赣县江口一带休整。

红军攻赣历时33天，久攻不克，以失败告终。红军在攻赣战斗中伤亡三千余人。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张赤男、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治委员欧阳健等十名师团干部牺牲。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在南京遇害。

红军攻赣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左”倾教条主义强令冒险攻打赣州造成的。此外，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失误：一是不敢大胆起用装备有炮兵的红五军团，让其置于无用之地。二是当吉安敌军前来增援时，未及时组织红四军和红五军团在援敌必经之地择险要地形予以阻击，而是只派两个地方红军独立师给予骚扰，使援敌能从容赶赴赣州前线增援。三是在瓦解敌军方面，红军虽向城内守敌开展了政治攻势，但只安排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致信敌旅长马崑劝降。马崑认为罗炳辉“威望有限”，心存疑虑，而且红军到处刷写“活捉马崑”、“只杀马崑，不杀守城士兵”等标语，令马崑胆寒，坚定了他死守待援的决心。四是当攻城部队突遭敌军反击时，攻城总指挥不但未及时命令部队撤退，反而令部队坚守阵地反击，致遭重大损失。

为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1932年3月中旬（约在3月9日至13日间），周恩来在赣县江口塘村上曾屋中革军委驻地，主持召开有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成员和红军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红军攻赣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听取各军团首长关于攻赣情况汇报后，对攻赣的重大伤亡和红军声威大损，甚

表愤慨，严厉批评了盲目攻赣的军事错误“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①。然而，原先积极主张攻赣的人们，却拒不承认错误，仍然认为：“红军这次攻赣州，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形势，对政策［治］形势估量不足。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以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②

攻赣失败还不能批评，批评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这种对攻赣失败而得出的混淆是非的结论，使临时中央“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局确定今后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进一步贯彻执行。

对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议“经过讨论后，毛泽东说了另一番话，说在攻打赣州的同时，应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毛［泽东］再次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十个月的工作计划，说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这一切证明，毛泽东有一个扩大苏区的一贯方针”。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汇报说，中央局的其他成员都认为毛泽东的“这条政治路线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势，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

---

①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 年 6 月 3 日于瑞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6 页。

② 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件《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1932 年 3 月 17 日）。

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①。红军总政治部在1932年3月17日发布的《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中，对毛泽东的主张更是赤裸裸地指责说："凡是认为赣州战争教训是叫我们不去夺取中心城市，而应向偏僻地带发展，那便是曲解了赣州战争教训……便是放过了目前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形势，那便是苏维埃发展的罪人。"②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等参加江口会议的多数人，都声称在适当时候还要继续攻打赣州，坚持主张红军当前应夹赣江而下，在赣江东、西两岸活动，将赣江两岸苏区连成一片，以便包围赣州、吉安、樟树，并夺取这些城市，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江口会议同意撤围赣州，但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后一种意见，决定以红一、五军团组成红军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先北上赤化宜黄、乐安等地，再攻打抚州；以红三军团组成红军西路军，开赴上犹、崇义一带，赤化湘赣边界各县，并向北发展，进逼吉安。

为便于指挥作战，中革军委于3月12日发出《重编一、三、五军团训令》，以第四军、第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以第五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以第三军、第十三军编为第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各军团的军事目标是进逼抚州、吉安。

---

① 以上参见《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3日于瑞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② 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件《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1932年3月17日)。

第四节　红军东路军获漳州大捷

一　东路军入闽

江口会议后，由红一、五军团组成的红军中路军依据中革军委命令，于3月16日从赣县长洛出发向宁都方向转移。途中，随中路军行动的毛泽东提出，根据粤军进犯赣南、闽西的动向，红一、五军团应东入福建工作，以巩固发展赣南闽西苏区。他首先做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工作。3月21日，林彪、聂荣臻致信中革军委主席，说："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三军团应暂在信丰西南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各方情形之变化。五军团应随一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泰、宁及清流等县。"①

此时红军军费即将告罄。3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被迫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重新研究红军行动方针。会上，"由于缺乏资金"，毛泽东的意见终被苏区中央局采纳，"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②。会议决定将红军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先入闽活动一个时期，任务是消灭闽西敌军和侵入闽西的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巩固闽西苏区，并筹集资金；同时强调这只是"临时行动"，待任务完成后仍继续执行"夹江

① 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件《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②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而下”夺取吉安、抚州、南昌任务。会上，周恩来还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入闽，指挥作战。

二 毛泽东建议攻占漳州

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时，红一军团已由林彪、聂荣臻率领进抵长汀，休整待命。会一开完，毛泽东即赶到长汀，通过中共福建（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和福建军区司令员罗炳辉了解到：闽南闽西均无强敌，只有国民党福建省防军张贞第四十九师占据漳州和龙岩，粤敌陈济棠部暂未入境；漳州近海，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华侨和台胞之乡，十分殷富，其地形无险可守，便于攻击。若打下龙岩、漳州，消灭张贞第四十九师，闽东南局面就可打开，红军亦可筹得大批资材。

鉴于此，毛泽东果断作出决策：跳出根据地向闽南出击，攻占龙岩，直下漳泉。3 月 30 日，毛泽东召开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东征动员；同时给瑞金的周恩来发出一份电报，提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①] 电报中还建议速命红五军团和第十三军入闽，第十三军位于龙岩坎市，以保障后路。

1932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乘船离开长汀抵达上杭，与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会合。4 月 7 日，毛泽东抵上杭县白砂，与林彪、聂荣臻会合。4 月 10 日，在毛泽东和林、聂指挥下，红一军团一举攻占龙岩城，消灭守敌张贞部一个多团，俘敌六百八十余人，缴枪近千支。翌日，毛泽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3 页。

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入漳计划。

与此同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率苏区中央局机关东移长汀城。周恩来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了罗明汇报，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漳州战役计划。4 月上旬，中革军委机关也移驻长汀城。周恩来和朱德留在长汀调动指挥部队，筹措物资，保障红军东路军后勤供给。王稼祥则率红军总政治部进至龙岩城。

三　漳州之役胜利及其重要影响

1932 年 4 月 12 日，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按时赶到龙岩，与东路军主力会合。4 月 18 日，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等率部进抵南靖前沿阵地，兵临漳州。4 月 19 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当天在漳州外围的天宝、南靖一线，歼灭张贞第四十九师两个旅主力，俘敌 2674 人，缴枪 2131 支，炮 6 门，子弹 13 万余发，炮弹 4900 发。还缴获飞机两架。敌旅长杨逢年在全旅被歼后，演出了一出“弃袍割须”、泅水出逃的丑剧。是役红军仅伤 349 人，亡 103 人。

4 月 20 日，红军东路军胜利进占漳州城。敌师长张贞率残部狼狈逃向诏安，从此一蹶不振。

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当天，派出第三军追击逃敌。随后，东路军主力以漳州为中心，向四周出击，在闽南进行了为期月余的分兵活动。红军发动群众，帮助建立闽南龙溪苏区。4 月 27 日，在漳州东板后基督教堂召开了闽南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闽南革命委员会，王占春任主席。红军还派出干部并拨出几百支枪加强闽南原有红色游击队，使其从六十多人发展到六百多人，正式组建了红军闽南独立三团。闽南青年工农纷纷加入红军，仅一个多月红军就扩大千余人。

红军入漳后，严格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城市政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连教堂里的一只洋公鸡也未乱捉，深得民众好评。在保护工商业和海外侨胞利益的同时，红军顺利筹得现款一百余万元。此外，还筹集了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张贞的两座兵工厂也被完整地缴获过来了。毛泽东还意外地获得《资本论》、《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及一大批报刊资料。周恩来和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从苏区动员和组织三千多民工前往漳州搬运战利品，费时一个月，将这些物资全部运回苏区。红军缴获的两架飞机，一架修好后飞回瑞金，一架未修好也拆下运了回去。

在东路军闽南分兵的同时，红十二军在闽西攻占了永定城和坎市、龙漳等镇，开辟了永（永定）和（平和）埔（大埔）三县大片新区。闽西红军独立第七师向宁化、清流两县发展，占领清流县城。到1932年7月，闽西苏区已发展到包括龙岩、永定、长汀、上杭、武平、平和、南靖、漳平、宁洋、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等十余县的广大地区。

红军攻克漳州，消灭了闽敌张贞的主力，为闽西苏区消除了一大隐患，并且贯通了闽西南苏区，创造了有利的革命形势。红军攻克漳州，在海内外引起震动，影响极大，扩大了红军的声威和政治影响，动摇了闽西南反动统治的基础，并使红军的装备得到了极大补充，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军事上、经济上的准备，中央苏区由此得到发展和巩固。

红军攻克漳州，是毛泽东“出击求巩固”战略思想的胜利。毛泽东在四个月前根据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取守势防御的客观形势，提出红军向赣闽浙皖边境发展的主张，就是“出击求巩固”的战略思想。漳州战役期间，毛泽东就苏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致电苏区中央局并临时中央，认为主张红军“夹江而下”是一种

“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是一条“走入错误的道路”，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出击求巩固，“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①。漳州战役胜利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节　红军西路军进军赣南西河地区

在毛泽东和林、聂率领东路军入闽东征的同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军西路军于1932年3月20日从赣县江口出发，经信丰县、南康县贤女埠、大余县新城、崇义县杨眉寺，4月12日进抵上犹县，总指挥部于4月14日进抵上犹县营前镇。

赣南西河地区的上犹、崇义两县，自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崇义县于1928年和1929年11月先后两次建立中共县委。上犹县也建立了中共区委。为统一对这两县革命斗争领导，后来又成立了中共上崇县委。1930年5月，两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了上犹县革命委员会和崇义县暴动大队，后又成立了崇犹游击大队。1930年冬，该游击大队发展为西河红色警卫营。

1931年2月11日，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千里转战来到崇义县，使崇犹边界红色区域得到巩固发展。同年6月，原设在信丰县的中共西河分委机关也迁驻上犹县营前，促进了上犹江两岸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崇义、上犹两县都相继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31年10月起，赣南西河地区划属新设立的湘赣省领导。1931年11月，撤销了中共西河分委，在上犹县营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前成立了中共上犹中心县委。崇义、上犹、南康等县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独立第九师，辖有第四十三团。红军攻打赣州期间，红一军团第四军部署在信丰、南康、大余、崇义、上犹间活动，争取了这些地区的群众，建立了许多赤色政权，并于1932年2月25日撤销中共上犹中心县委，成立了中共西河特委。

彭德怀等率红军西路军抵崇、犹苏区后，首先对当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和充实。1932年4月17日，在上犹县营前成立了中共河西道委，贺昌任书记（后陈葆元接任），加强对所辖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道委从红军和地方上选调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九个工作团，分派到湘赣边各县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组织群众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到1932年6月，整个河西苏区发展到有10个区、人口13万，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

红军西路军进抵上犹、崇义两县后，开展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首先集中兵力对西河地区的地主武装予以打击。4月下旬，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部率红五军向崇义县西部开进，于4月22日一举攻占由湖南汝城县保安团胡凤璋部五百人占据的文英圩，毙伤守敌一百余人，活捉敌营长一名，缴枪四百五十余支，从而打通了江西通往湖南汝城县的交通孔道。战斗结束后，红五军分两路向汝城县进发，追歼胡凤璋保安团，5月1日进抵汝城城郊。驻守汝城县城的胡凤璋保安团惊恐万分，星夜退缩至汝城西乡马桥下湾村，并向粤军陈济棠告急求援。5月3日，红军猛攻下湾村，歼敌一部。随后又乘胜围困退守在上古寨老巢的胡凤璋团部，发起数次猛攻。

红军西路军出击湖南，震动了湘粤赣3省敌军。湘敌何键急派第二十八军两个师驰援汝城。粤军陈济棠也派出第一、第二师各一部及三个旅十个团急赴汝城。蒋军第四十三师和第五十二师

进犯赣南。三省敌军六个多师对红军西路军进行“会剿”。根据敌情变化，红军西路军于5月13日主动撤出汝城，返回崇义苏区，继续在湘赣边界与国民党军周旋。

红军西路军在湘赣边界活动期间，扩军千人。原在犹崇苏区活动的红军独立第九师第四十三团也编入红三军团第七军第六十二团。西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共河西道委决定将崇义大队、上犹游击大队和南康的赣南游击大队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二师，派红军干部叶长庚任师长，魏桓任师政治委员。此外，还组建了崇义游击大队和独立十二营及上犹独立第二团。

第六节　水口战役

一　红军东、西两路军会合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加紧策划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蒋介石将从抗日战场撤下来的第十九路军调入福建“剿共”。同时，撤销江西省“绥靖公署”，改设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在蒋介石重利诱使下，粤军陈济棠部趁红军向东、西两路出击之机，以其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的19个团大举向赣南进犯。

粤敌进犯赣南的兵力布置是：第一师（4个团）、第二师（4个团）和军属第二教导团集结在赣州城及其以西唐江等地，并向南康县北部横石井及上犹县社溪一带“进剿”红军西路军；第四师（4个团）驻信丰，并向于都进逼；军属第一教导团随第一军军部驻大余县城；独立第一旅（3个团）、独立第二旅（2个团）分驻粤北仁化、南雄。

粤敌大举进犯赣南苏区疆地，对中央苏区南部构成极大威

胁。1932年5月底，中革军委为确保中央苏区南部安全，令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也发布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①。

5月29日，红军东路军接到中革军委电令，立即开始撤离漳州，开往龙岩集结。6月8日，东路军总司令部在上杭县官庄召开军事会议。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从长汀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决定了东路军回师赣南的行动计划。6月中旬，红军东路军一、五军团及红十二军回到赣南安远县天心、版石地区。回师赣南途中，红四军军长王良于6月13日在福建武平县大乐村侦察地形，遭民团冷枪射击，不幸牺牲。

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的同时，红军西路军第七军也从赣县沙地向南康县横石井和上犹县方向移动。6月21日在上犹县社溪与粤军第一师王道团遭遇，双方激战半日。红七军与敌周旋四五天后，返回上犹县油石，与红五军会合。

红军东、西路军会合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红军东路军、西路军名称，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仍辖第一、三、五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叶剑英、王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暂缺。毛泽东仍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军政大计。

---

① 《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1932年6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

二　池江、大余战斗

毛泽东与朱德根据国民党粤军在赣南的态势，1932 年 6 月 21 日在安远县天心圩决定，集中红军主力进攻南雄国民党守军，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6 月 23 日和 24 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集中优势兵力，在信丰县南部与粤敌决战，并要求红十二军到定南、龙南、全南三县活动，配合行动。这一提议获苏区中央局批准。6 月 25 日，红一、五军团在大余县袭击敌人，准备与红三军团会合。

遵照红一方面军总部电令，6 月 27 日，红三军团主力约五千人从上犹县营前出发，经过崇义县城，28 日抵达崇义县长龙圩，先头部队当天到达崇义县东部杨眉寺，占领大余县新城水西的蔡屋，并向南康县唐江方面警戒。

粤军陈济棠、余汉谋面对红军集结赣南，也于 6 月 29 日作出集结兵力“歼匪全部于康、庾、雄、信地区”的部署。6 月 30 日，粤军第一师指挥的六个团由赣州进至南康向大余集结。7 月 1 日下午，该敌在大余县池江附近与红三军团一部遭遇。经短暂接触，红军主动撤退。7 月 2 日拂晓，红三军团主力向池江之敌发起猛攻，与敌四个团激战至下午 4 时，将敌击溃。残敌退守大余城。战斗中，红三军团第七军第十九师师长李显英勇牺牲。

7 月 3 日，红三军团奉方面军总部命令围攻大余县城。方面军总部判定大余之敌将迅速向南雄集中，遂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师兵力进攻梅岭关隘，断敌退路。经两小时激战，驻守梅关的粤敌第二师第五团不支，逃回大余城。红军追击至大余城下，后又主动撤回梅关，固守阵地。此时，红一军团主力和红

五军团、红十二军已进至大余至南雄间中站、灵潭等地；江西红军独立第六师也向南雄发起佯攻，红军独立第三师牵制信丰之敌。

池江和梅关战斗后，余汉谋决心固守大余城待援。其部署为：第一师（缺第三团）防守大余老城，第一师第三团和军属第二教导团防守东山，第一教导团防守宝珠山，特务营、工兵营防守大余新城，第二师第五团配置在大余新城为总预备队，炮兵营在东山及大余老城占领发射阵地，以火力支援战斗。

7月4日，红三军团依方面军总部命令向大余城发起进攻。彭德怀亲临西华山侦察敌情、地形，指挥战斗。5日，攻城部队因判断失误，误报军情，谓“大余之敌已经退却”。红一方面军总部据此迅速调整部署，令红五军团插至南雄以南，阻截南雄之敌南逃。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现大余城之敌并未逃跑，而敌第四师已放弃信丰城进到信丰与南雄交界之九渡水地区，正向南雄集结。红一方面军总部只好令红五军团从南雄北返罗田、赤石、州头一线。红三军团在大余也攻城未克，于7月8日撤围。

池江、大余战斗，红军尚未获胜。

三 水口恶战

由于红三军团攻城部队误报军情贻误战机，粤军已乘机调整好部署，准备固守大余和南雄两个县城，并急调驻韶关的两个师和信丰九渡水的第四师向南雄集中；北面蒋介石的两个师也以一部接防赣州，主力向大余急进。敌人拟从南雄和大余两头以八个师兵力来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

1932年7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决定以红五军团消灭已进至南雄县乌迳之敌第四师；8日又决定待南雄

之敌向乌迳出动增援，再集中红军一、三军团及十二军乘机将增援之敌消灭，并攻占南雄城。

8日上午9时起，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向乌迳之敌发起攻击时，发现该敌已离开乌迳沿浈水南岸向水口方向逃跑。红五军团首长当即改变计划，命令部队向水口方向截击。下午1时30分，红五军团先头部队红十三军进至水口对岸与敌接触。接着，红三军赶到，从红十三军左翼加入战斗。至下午4时，敌两个团狼狈逃跑。红五军团乘胜追击，越过浈水直追至离水口圩5华里的高地才停止。

遭到攻击的敌第四师退至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据守待援。7月9日拂晓，红五军团继续向水口之敌展开进攻。当日中午12时，由南雄城出动的增援之敌六个团赶到水口。

可是，红五军团却未察觉，将敌十个团错当四个团来打，结果遭敌反扑。敌军蜂拥着向红军连续发起冲击。红五军团各参战部队奋勇抗击，英勇冲杀，抡起大刀同敌肉搏，战场上尸横遍野，水沟里的水泛着红色，“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①。

因敌军兵力大大超过红军，红五军团渐渐招架不住，处于困境。危急时刻，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率独立三师和独立六师赶到投入战斗，始稳住战局。

当天，红一方面军首长本拟以主力增援水口，会歼敌人。但是，红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退，致使增援计划未能执行。当日下午，方面军首长获悉水口之敌并没有撤退，这才急令红一、三军团和红十二军火速增援，准备围歼水口之敌。

此时，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从中站、里东、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邓坊等地出发，星夜疾驰，10日拂晓时分赶到了水口战场。他和林彪、聂荣臻等听取了红五军团领导人董振堂、萧劲光的汇报并亲自察看了敌军阵地后，当即与两个军团首长商定了作战部署：命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及江西军区独立三师担任正面进攻；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第三、第十三军及江西军区独立第六师由左翼向敌之右翼进攻。上午11时，红军向敌军发起全线攻击，仅激战一小时，就将敌十团全线击溃。红军追击逃敌至距南雄城仅十余公里的石塘圩、大坪圩附近才收兵。当天下午7时许，溃敌退入南雄城内。

水口战斗结束后，固守大余城的敌军未动，蒋军第五十二师和第十四师亦分别停滞在大余县青龙和崇义县杨眉寺地区。红军经过这场恶战，亦亟须补充休整。于是，南雄水口战役至此结束。

水口之役，红一方面军先后击溃粤敌15个团，毙伤敌人三千余人，粤敌遭此沉重打击后，其主力龟缩在南雄、大余两地，不敢再向赣南冒进。在水口战役中，红军亦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两千余人。红五军团第三军损失尤为惨重，伤亡团长七名、连排长半数、战斗员一千名以上；第十三军有的团剩余不过百人，军长赵博生负伤。

水口恶战打成消耗战，原因有四：一是“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①]；二是在水口战斗中主要攻击方向选择不当，红军主力本应从右翼向敌之左侧背实施包抄，断敌南雄退路，然而主攻部队却从左翼向敌发起攻击，给敌留下溃逃退路，敌溃退后又追击不力；三是在大余战斗和水口战斗中，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两次误报军情，致使方面军总部部署失当，给敌以可乘之机，而向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口之敌发起攻击时，红三军团又未及时赶到战场；四是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决策机制不甚顺当，在前线的毛泽东和方面军首长对战斗作出重要部署时，还要向处在后方瑞金的苏区中央局报告请示，得到批准之后方可下达作战命令，使前方指挥员受到掣肘，误了战机。

尽管如此，水口战役后，粤敌再也不敢贸然进犯苏区，南线战事趋向稳定，从而使红军在后来的反“围剿”战争中解除了后顾之忧，中央苏区从此得到了切实的巩固。

第八章

乐宜战役与宁都会议

第一节　水口战役后红军军事决策机制的改变

一　赣州撤围后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评斗争

如同前文所述，自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以及苏区中央局其他委员之间，围绕着苏区红军军事行动方针，开始产生严重意见分歧。尤其是毛泽东一再反对红军冒险攻打赣州，严厉批评红军攻赣错误“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坚持主张红军攻赣撤围后应向闽浙皖赣边境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更引起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不满，因而被指责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江口会议后，苏区中央局原代理书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回上海向中共临时中央汇报工作时，乘机状告毛泽东对执行中央“进攻路线”“消极怠工”，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临时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不满。博古将中央苏区贯彻执行“进攻路线”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能更好地贯彻执行临时中央提出的“进攻路线”，也决心与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斗争。1932 年 4 月底（或 5 月初），周恩来在毛泽东缺席的情

况下，在长汀城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①。5月1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领导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还写了一篇题为《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文章，严厉批评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让红军主力分散去“打土围子与创造战场”，是“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与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来源是中央局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估量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与积极进攻的路线，便缺乏明确的认识”；还认为“在去年三次战争中所认为最好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在今年积极向外发展到白区去出击敌人时便不能完全适用了”②。这篇文章发表在1932年5月30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上。

1932年5月间，前往上海汇报情况的项英回到长汀，带回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新的批评指责。邓颖超也从上海来到苏区，带来了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批评与对苏区工作的意见。苏区中央局还收到了临时中央于1932年5月20日发来的电报。临时中央在这份电报中批评苏区党大会（即“赣南会议”）没有充分开展自我批评，“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认为党大会以反对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反对毛泽东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有必要加大对毛泽东批评的力度。正好6月上旬红军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148页。

② 周恩来：《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转引自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第5期，1932年5月30日。

东路军从漳州回师赣南，毛泽东回到长汀城。于是苏区中央局立即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迫使毛泽东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迫使他放弃原先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这次会议的情况，苏区中央局于6月9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作了汇报。电报说：“共产国际的指示信中央局全体委员之间已阅。1. 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结束，取得很好结果，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2. 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①

1932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又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所谓“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给予批判，明确提出中央苏区党的任务是“采取更积极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②。

二 红军军事决策机制的改变

自1931年11月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后，红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版，第249页。

一方面军建制即宣布撤销。毛泽东原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职务自然撤销，只担任新成立的中革军委委员，在红军中没有别的具体职务。但是，中革军委受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领导，毛泽东仍可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领导中革军委，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仍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红军东路军入闽进行龙岩、漳州战役和南雄水口战役，毛泽东都是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指挥的。也就是说，自1932年4月至1932年7月，中央苏区红军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周恩来曾于1932年6月10日在瑞金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说："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①

但是，苏区中央局对此却不放心，生怕毛泽东利用自己的决策指挥权对"进攻路线"消极怠工，因而千方百计要削夺他的这一权利。1932年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苏区中央局执意不恢复毛泽东原所兼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而故意让这一职位空缺。同月22日，苏区中央局决定在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之下成立中央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以周恩来、项英、朱德、邓发、邓子恢五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毛泽东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却被排斥于该委员会之外。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南雄水口战役后，苏区中央局对战斗结果不满意，对毛泽东留在前方决策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更加不放心。1932 年 7 月中旬，苏区中央局遂决定委派周恩来为中央局全权代表，亲赴前方，直接领导前方军事行动。

周恩来刚刚到达前线，被指定担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职务的任弼时和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项英等人，就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显然，这个提议的目的，就是要将毛泽东排斥出红军军事行动决策圈之外。周恩来对后方中央局成员的这一提议思量再三，觉得不妥。因为按规定，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是受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领导的。如果按这个提议实施，就会形成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和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平行指挥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格局。不仅如此，还有红军总政治部与中革军委是平行的领导机关，按规定，总政治部主任也可以在政治上直接领导红一方面军，这就将形成红军军事领导机制中“三驾马车”（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主席、苏区中央局代表）“多头指挥”的局面。于是，周恩来考虑了一个较为稳妥、周全的办法，提议对于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取消中央政府主席一级，改由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指挥红军战事；而红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与决策权归中革军委主席团三位成员（即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局全权代表（即周恩来自己）对行动方针有最后决定权。这个意见，兼及了方方面面，并征得了朱德等人的同意。为此，1932 年 7 月 25 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给瑞金苏区中央局发出电报，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策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

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①

按这种办法，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可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一起，拥有作战指挥权，但没有作战计划的决策权，因为毛泽东不是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周恩来作为中央局全权代表，拥有红军行动方针的最后决定权。然而，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连这个较为妥善的折中方案也不同意，仍复电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只得又改变主意，提议在前方成立“最高军事会议”。7月29日，周恩来从信丰县去兴国县途中，给后方中央局任弼时等人写去一信，阐述道：“关于组织问题，军委会原指主席团，但仔细想仍不好。我原意是提高军委信用，故出此。现在我想是否可以改为最高军事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即朱德——引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银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如同意，可先电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国告我。”①

周恩来关于成立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和任命毛泽东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实为苏区中央局削夺毛泽东军事决策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后方中央局成员终于领会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权衡再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第二节 乐宜战役

一 兴国会议关于红一方面军是否西渡赣江之争

毛泽东的军事决策权力虽然受到极大限制，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充分利用自己“最高军事会议”成员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所拥有的权力，对苏区军事行动方针发表己见，为此常常与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发生争论。1932 年 8 月初在兴国县坝南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就与任弼时发生了激烈争论。

1932 年 7 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结束南雄水口战役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部队分散在赣南的信丰、龙南、全南、定南及南雄县北部一带，筹款兼做群众工作，同时休整部队，等待敌情发生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变化，以求歼灭进入赣南南康、大余间的蒋军第五十二师和第四十三师。红军休整时间从 7 月 14 日至 7 月 24 日，暂定为十天。

这当然不符合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要求。在瑞金的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得悉后，即于 7 月 23 日以中央局名义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应迅速在赣州上游西渡章水，并以极迅速的行动打击蒋军。7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9 页。

月25日晚，周、毛、朱、王联名复电瑞金后方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但此行动须极迅速秘密，我们决后天开始集中行动。望密电中央。"①

为到河西去攻打吉安，周恩来已密电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命他派人广搜船只，秘密做好渡江准备。7月2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途离开信丰、龙南等地，经于都县北上兴国集结，准备西渡赣江。周、毛、朱、王等率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于8月初抵达兴国县城郊的坝南。

因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之间对红军今后行动方针意见不一，周恩来于8月初在兴国县坝南陈家祠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毛、朱、王和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西渡赣江攻打吉安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到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现在赣江以西赣州至吉安一线，驻有国民党军七八个师，且他们互相间相距不远，联系紧密。红军若贸然前去攻打，难有取胜把握。不如集中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两地力量较弱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再打赣江以西或由南丰、南城等地前来增援的敌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应该说，毛泽东的意见是符合苏区和红军实际的较为稳妥的进攻作战方案。但这个方案仍与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要求相距甚远。会上，任弼时等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毛泽东据理反驳，毫不客气地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①。任弼时对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反感。会后任弼时以中央局名义在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时，顺便向临时中央“参”了毛泽东一本，说毛泽东“在信丰龙南迟延十数天是一错误”②。

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和前方中央局成员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北上，开展宜（黄）、乐（安）战役，先消灭驻宜、乐之敌，再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会议正式同意成立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会后，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行动。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二 乐安、宜黄之役

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决定，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在兴国发出《关于一方面军的任务及中央苏区整个军事布置的训令》，部署乐、宜战役。

训令将中央苏区红军部队分为主作战军与支作战军两部分。主作战军由第一、三、五军团组成，任务是首先消灭盘踞在乐

①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安、宜黄两县之高树勋所部，乘胜突入敌军后方，进迫邻近的中心城市，相机打击与消灭敌人，争取继续胜利。支作战军由红十二军及新组建的红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和江西、福建两军区所辖地方武装组成，任务是配合主作战军行动，在苏区东、南、西线牵制敌军力量，保卫苏区安全。

1932 年 8 月 7 日，红一、三、五军团分别在兴国、于都集结完毕。8 月 8 日，各部依据中革军委训令从各自驻地出发，行军八天，于 8 月 15 日和 16 日陆续抵达乐安县招携一线，投入攻打乐安、宜黄战斗。

乐安、宜黄两城，当时均由敌孙连仲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据守。在乐、宜东面之南丰至南城一线，驻有敌朱绍良部之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三个师，西面驻有敌陈诚、罗卓英、吴奇伟三个师。根据这一敌情，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消灭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取得乐、宜两城，再乘胜东击毛、许、李等师，取得南丰城；然后西进攻击陈、罗、吴师，调动敌人分兵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压力。

按照这一作战方案，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及总部特务营，于 8 月 15 日从招携出发，夜行军 30 公里，于 16 日凌晨 5 时向乐安城守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两个团发起攻击。红军攻城部队第三军原拟袭取该城，因守敌顽抗，袭取未果。16 日午后 4 时红军调整部署，改袭取为强攻。红军经一晚激战后，于翌日上午从四面突进，占领乐安全城，全歼守敌一个旅两个团并一个营，俘敌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约两千支，机枪十余挺，迫击炮十余门，无线电台一部。

乐安战斗后，红一方面军挥师东进，乘胜直扑宜黄县城。

宜黄城守敌为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八十一旅（4 个团欠 1 个营），其主力守城，一部驻守城外工事。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红

三军团在宜黄城南担任主攻，红一军团在城北担任助攻，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20日拂晓，红三军团发起总攻。因事先未占领城外峨眉山高地，总攻受挫。当晚，彭德怀指挥所部再次发起总攻，一举攻入宜黄城内，击溃守敌大部，俘敌近千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机枪十余挺，迫击炮十门，无线电台两部，其他军用物资无数。守敌一部弃城北逃。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和第四军第十一师尾敌追击。22日，红军部队在通往抚州的大道龙骨渡追上敌人，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

乐安、宜黄两役，红一方面军全歼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俘敌五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驻守南丰、南城之敌为红军胜利声威所震慑，不敢援救而退守南城县城。8月23日，红十二军乘虚进占南丰城，缴获敌遗弃的大米、面、汽油等物资。福建红军独立第七师亦于8月19日乘机占领宁化县城。

红军在一周之内连克四城，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有生力量，缴获山炮、迫击炮、机枪等大批武器弹药，南昌、抚州为之大震，敌军连连调整部署。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支持的北上击敌的行动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节 宁都会议召开

一 后方中央局再次干涉前方军事行动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十二军占领南丰县城后，又指挥红军直奔南城，准备攻克南城县城，以打开赣东局面。不料南城守敌已增加至3个师17个团，且发现城防工事坚固，增加了红军攻城困难。

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共同研究敌情后，毅然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改令红军后撤至

南城、南丰、宜黄间发动群众并筹款，准备待机歼灭西来增援之敌。8月27日，周恩来致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中共临时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及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

这时，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正遭到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红军作战连连失利。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接连给瑞金的苏区中央局发来电报，请求中央苏区红军赶紧发起进攻作战，以策应他们的反“围剿”斗争。上海临时中央也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连连告急和要求中央苏区红军给予牵制、配合的电报。任弼时等不断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积极向北进攻、威胁南昌的指令。而偏偏此时任弼时等又接到周恩来发来的关于前方红军停止进攻南城、后撤待机的电报。这使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十分着急。他们认为前方的这一部署违背了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要求。于是，任弼时等不顾毛泽东在兴国会议上提出的“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要求，一再致电前方，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以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压力。

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有难，作为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中央苏区红军，完全应该给予支援。问题是中央苏区与湘鄂西、鄂豫皖两个苏区相距数千里，即使红一方面军立即向敌军发动进攻，也是鞭长莫及，远水解不了近渴，难以将围攻这两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吸引过来。更为重要的是，眼下尚未出现红一方面军出击的有利战机，若不顾一切地盲目出动进攻，不仅援助不了两个苏区，而且必使红一方面军也遭到不必要的重大损失，弄得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据此，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没有按照后方中央局的意见行动，反而根据敌情变化，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进一步南撤至宁都县北部乃至宁都县南部的青塘一带隐蔽休

息，以便诱敌南进而乘机歼灭之。另一方面，他们又连续致电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分局，建议他们改变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实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以打破敌人“围剿”。

得知前方红军不仅不北出西进，反而向后南撤，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甚为不满。1932 年 9 月 7 日，任弼时、项英等致电周、毛、朱、王，指责红军向后南撤待敌前进是“不正确的决定”，要求红军立即进攻敌人有重兵据守的永丰县城。

任弼时等不顾实际强令红军攻打永丰坚城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毛泽东等的反对。毛泽东等坚持红军主力必须在宁都县北部隐蔽休整一星期以上，以观察敌军动向。9 月 23 日，他们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强调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他们在电报中详细分析了当前敌军据守分布情况，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等解释说，上述部署“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①

二 周恩来向任弼时诉说苦衷

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成员周、毛、朱、王 9 月 23 日给后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0—291 页。

方中央局的电报，虽然是他们四人达成的共识，但主要又是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实属不易。因为他们四人对红军的行动计划作出决策时，意见也往往不尽一致。9月24日，周恩来从宁都以个人名义致信后方中央局，诉说了自己的困惑和苦衷。信中说：

“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立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因在军事行动中，不比在平时可以多想多说，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机断专行，在前方可用之于日常事务上，而无法用之于临时紧急处置上）。但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样一来，已定的方案与原则又改变了，又须另在一种标准下进行，以至许多行动并非在一致的路线下执行的，且行动定了、做了，又人各一见，各异其解释。自然到了检阅时，可以做其结论，彼此竟不相侔，结果对于新的方案的执行，也就更不能有一致的见解了。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周恩来信中的中心意思，就是告诉后方中央局成员，他在前方对许多事情也不能说了算，做不了主，因为其他中央局成员（尤其是毛泽东）常常意见相左。他在考虑如何改变前方目前的决策机制。如何改变呢？周恩来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回到后方一行”，或者是“与其各持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线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者到河西去都可”。无论哪种办法，周恩来都要求自己离开前线。他在信中还建议将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调来前线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页。

接替叶剑英任军委总参谋长，以便有一个帮手。

三 周、毛、朱、王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收到了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成员联名于9月23日发来的电报，知道前方同志坚决反对后方同志提出的攻打永丰城的意见，并知道了前方红军已经开始分散部署在南丰河两岸等地做群众工作。

对前方的这一部署，任弼时等又提出了反对意见。9月25日，任弼时等复电前方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并断言这将“可以演成严重错误”①。很显然，任弼时等只考虑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而根本没考虑前方红军面临的实际情况。

而在前方的毛泽东，考虑的是红军面临的实际，他不愿为贯彻错误的“进攻路线”而拿红军的生命作无谓的牺牲。他对于前、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就红军军事行动经常发生争论，互相掣肘，很有意见，因此主张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两人都到前方来开中央局会议。周恩来也感到确实须解决前、后方中央局成员对红军行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他赞成在前方开会，但他认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

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①

于是，9月25日接到任弼时等复电后当天，周、毛、朱、王即复电后方中央局，坚持原有看法，再次阐明不能贸然攻打永丰城的理由，并正式提议：“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三十日开为好，三天赶到宁北的小塘。”②

9月26日，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与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成员之间，就打不打永丰和在前方开会问题，又相互电报磋商。任弼时在致前方电报中坚持“攻城打增援部队”，并反对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说：“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③ 而周、毛、朱、王则致电任弼时等，坚持不能攻打永丰、乐安等城市，并坚持认为中央局全体会待项英、邓发回瑞金后，仍应到前方召开，因有许多问题必须讨论解决，开会日期以10月10日以前为妥。

四　任弼时决定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鉴于周、毛、朱、王坚决要求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同

---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时任弼时也收到了周恩来于9月24日写给后方中央局的来信，了解到前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在讨论决策重大问题时常有分歧，周恩来在前方颇感困难，有回瑞金或到河西湘赣苏区之意。于是，任弼时于9月27日致电前方周、毛、朱、王，提议周恩来回瑞金开会，以便解决前方问题，留毛、朱、王在前方主持战事。

果真如此，也许是件好事。谁知正当周恩来刚要启程时，上海临时中央向苏区中央局通报说："蒋由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机动。望即定军事行动计划，电告中央。"①

其实，军事行家都懂得，蒋介石即便已经召开军事会议，也有个调兵遣将的部署过程，绝不可能开完会就立即对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大可不必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而仓促出击。可是，在瑞金的后方中央局成员缺乏这些军事知识。他们接到临时中央的通报后，以为国民党大军立马就会杀奔而来，似乎中央苏区已十分危急，因而表现得心急如焚，巴不得红军立即向敌人出击，打破敌人一面，才是生路，一天也耽搁不得。

偏偏在这时，任弼时却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于9月26日签发的《敌人大举进攻之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这个训令，根本没有理会后方中央局关于攻打永丰、乐安两城的指令，仍然布置红军主力在宜黄、南丰两县间分散做赤化工作，待机破敌。恰在这节骨眼上，项英、邓发从闽西回到了瑞金。任弼时与他们一合计，便于1932年9月29日上午11时向前方发出一份急电，通知周、毛、朱、王："中央局决定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9月治（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38—39页。

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恩来同志可暂不来瑞，如已起程，望派人追回前方，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我们四人并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出发到前方。电到，望即刻电告你们现在驻地点。"①

9月30日，任弼时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从瑞金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了苏区中央局即将召开全体会议一事。电报说："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在扩大苏区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即周恩来——引者注）同志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我们在上一封信中指出了我们领导工作中的困难。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该电报还说："中央局四位委员——布林斯基（即任弼时——引者注）、顾作霖、邓发和项英今天出发去前线召开中央局全会，会上将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并解决前线与中央局之间的争论以及前线在组织问题上的争执。我们坚信，［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中央在上述诸问题上给予［新的］指示。"②

于是，就有了宁都会议的召开。从以上背景分析可以看出，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38—3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之间围绕第四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分歧，仅仅是宁都会议召开的原因之一。宁都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国际、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都认为毛泽东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进攻路线”表现动摇乃至反对，成为“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贯彻执行的最大障碍。为彻底扫除这一最大障碍，苏区中央局在4月、6月两次长汀会议和8月兴国坝南会议的基础上，再一次召开全体会议对毛泽东展开批评斗争，实为势所必然。而且从9月30日苏区中央局给临时中央的电报来看，召开这次会议完全是一种对毛泽东兴师问罪的架势。

五 宁都会议的内容和经过

宁都会议于1932年10月上旬（具体时间待确定）在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传达讨论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即“中央长信指示”）。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述长信中，对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中央苏区所犯的所谓“政治错误”，进行了系统、严厉的批评；不点名指责毛泽东在红军占领漳州的一个多月里，“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力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地注意到”[①]。宁都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同时认为苏区中央局在1932年6月17日作出的《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的决议》的全部精神，与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信和指示电是相吻合的。苏区中央局的这个决议，表示完全接受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揭露”和批判了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自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所犯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苏区中央局在作出和通过这个决议时，毛泽东都不在场，对毛泽东是“缺席审判”。这次宁都会议追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进行批判。

2. 以中共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为尚方宝剑，对1932年2月以来红军的几次战役进行评估和总结。

会议“认为攻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往来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对攻打赣州失败造成的严重损失，会议避重就轻地认为“攻赣（州）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未能克城而撤围”。会议期间，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等及周恩来在发言中，都批评毛泽东在南雄水口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犯了分兵错误。宜乐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且遭敌在宜黄之袭击”，并批评“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还批评“以前三军团过河西也犯对形势估计不足及分散主力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同意上述评价和批评。他坚持认为中央苏区红军自攻赣撤围后，就应该北上向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发展新苏区，红军在过去七个月的行动，总体来说都是错误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和周恩来都不同意

毛泽东的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批评了毛泽东过去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向赣东发展路线”。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批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所谓“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实际就是批评毛泽东不尊重以任弼时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

3. 讨论了对付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

会议传达并讨论了临时中央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军事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前方的有关军事部署，认为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精神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坚持认为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26日的训令符合当前实际，是正确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却认为，前方同志表现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存在“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不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对“以准备为中心”的解释，说他的报告连“积极进攻”的字眼也没有。后方中央局成员更是反对毛泽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军事行动方针的主张，认为这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面对后方中央局成员的批评，周恩来发言并作结论，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电，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也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指出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有过分的批评。

4. 讨论决定了前方战争领导问题。

会上，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首先提出：“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表示同意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机构，但不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后方

中央局成员则坚持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既反对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周恩来，更反对让毛泽东负战争总责。

个性极强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所提的两种办法，他都得不到中央局全权信任，实际上都削夺了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权，即使留在前方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对周恩来所提两种办法他都不赞成。他愤而同意离开前方，回后方请假治病休养。

会议就此问题表决，“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毛泽东坚持要求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有关人事问题，批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①

六　宁都会议的后果

宁都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有严重错误的会议。

宁都会议最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权。任弼时等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准备将毛泽东调回瑞金专做中央政府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离开前线回到瑞金，稍住数日又前往长汀福音医院治病休养三个月时间。毛泽东刚离开前线，中革军委便于1932年10月12日发出通令，正式解除毛泽东所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所遗总政治委员一

①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530页。

职由周恩来代理。这就达到了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所企盼的目的。1936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中曾重提宁都会议一事，说，当时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傲的宗派主义”①。

宁都会议以贯彻推行“左”倾“进攻路线”为宗旨，以批判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消极等待”、“观望”为借口，“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处于孤立困境。这次会议加速了“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特别是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前线，剥夺了他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挥权，这就为“进攻路线”的推行者们后来滥用职权胡乱干涉前方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和便利，使中央苏区红军在后来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受不应有的惨重损失，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的丧失。

必须指出，宁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的所有批评，均属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斗争。在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人看来，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提出的“进攻路线”“百分之百”正确，他们批评毛泽东乃至削夺毛泽东对红军军事行动决策权，为的是贯彻执行“进攻路线”，而非所谓个人之间“权力之争”、“意气之争”。无论是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还是周、任、王等苏区中央局成员，都希望通过批评斗争这一手段来团结、争取毛泽东支持“进攻路线”。周恩来在会上“温和”地批评毛泽东，并主张将毛泽东留在前线协助他指挥作战，表现出他对毛泽东仍持信任态度。但毛

---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日、1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泽东始终对“进攻路线”持批评与不合作态度。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庆幸之处。

七　宁都会议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左”倾冒险的“进攻路线”，并强令中央苏区党和红军坚决贯彻执行，是导致宁都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置毛泽东问题上，共产国际、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态度不同。

共产国际尽管也多次批评毛泽东对“进攻路线”贯彻不力甚至消极怠工，但却对毛泽东持支持爱护态度。一再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团结毛泽东，耐心说服毛泽东支持“进攻路线”。还在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就曾召开会议，正式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任命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而非“代理书记”）的决定。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驻上海政治代表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对于苏区中央局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共产国际的情况下，作出了对毛泽东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十分不满。埃韦特认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对决定的这一部分。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①

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要求团结毛泽东一道工作的意见，也一再表示尊重。1932年5月27日，中共临时中央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18页。

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表示："至于对毛泽东的态度，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指示，你们的意见将转告给［中共苏区］中央局。"① 收到任弼时等于1932年9月30日从瑞金发出的电报后，博古等于10月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要在党内、红军内和群众中宣传积极的路线。争取党和红军中的干部，使他们相信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和危险，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要保证领导的一致。这是斗争成功的前提。速发给我们补充信息，不要等到［一切］事实既成之后。"② 这就是说，博古等人主张"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更反对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撤销他在红军中的职务。

可是，任弼时等却拒绝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执意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削夺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1月下旬，任弼时委派中央苏区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王盛荣去上海，向博古等汇报了宁都会议的详细情况。博古担心苏区中央局因批评毛泽东而产生意见分歧，导致不团结。1932年11月23日，临时中央以忧虑的口气致电苏区中央局询问：宁都会议后"进攻路线"执行如何？有否反对和抵制？中央局领导在策略上目前有所分歧否？领导人团结是否成问题？并且强调说："我们坚主采取一切方法，根据党的路线，缩小争论；无严重破坏纪律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② 同上书，第213—214页。

之事，则绝不应采取任何组织结论。”① 三天后，任弼时以苏区中央局名义给临时中央复电称：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对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中央局内部对总路线无分歧与争执，更无采取任何组织结论的意见”②。这显然与事实相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② 同上。

第九章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节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开始第四次军事“围剿”

1932年10月，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军事“围剿”得手后，即开始将“围剿”的重点转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周围陆续集中了近二十个师四十余万兵力，准备与中央苏区红军决一雌雄。

蒋军的分布情况是：闽北方面：第五十六师在建瓯、顺昌、建阳地区；新编第二师主力在沙县，一部在永安、尤溪；新编第四旅主力在泰宁，一部在邵武。赣东方面：赵观涛第八路第五、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九师分布在上饶、弋阳、余江、铅山等地。赣中方面：朱绍良第六路第八、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十四师主力在南丰、南城，第二十四师一部在黎川；孙连仲第九路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残部和骑兵第四师在宜黄、崇仁、抚州地区；陈诚第二路第十一、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在吉安、吉水、永丰等地，第九十师在乐安。赣南和闽西北地区仍由粤军余汉谋第二路、李扬敬第三路和蔡廷锴第十九路军驻守。

上述兵力统一由在南昌的国民党“闽粤赣剿匪总司令”何

应钦指挥。敌军对中央苏区采取左、中、右三路包围态势，“各方大半都是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阵势配合经济封锁，遂行其合围并进的‘围剿’计划”①。

从国民党军的上述兵力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北线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敌军兵力较为空虚，仅有敌新编第四旅和第二十四师一部据守，似有机可乘。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发起建黎泰、金资战役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在严厉批判了毛泽东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后，完全接受了中共临时中央要求红军“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的指令。红一方面军总部立即停止执行原定在南丰河两岸分兵赤化的计划，决定乘敌暂取守势之际，集中兵力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发起攻击。

1932 年 10 月 14 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广昌下达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指出：“本方面军为要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乘敌人上述部署未完成的时候，击破敌人一方和联系东北红军起见，拟出敌不意迅速而同时地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而占领其地域。占领泰宁的兵团，并于占领泰宁时即刻发出一个相当的兵团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该兵团任务完毕，即归还建制，其余各兵团在达成以上这些任务后，应赤化所在地域及征集红军所需的资材，以利于此

① 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1932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0 页。

后的战役，但须集结主力，常作战斗准备和集中姿势。”①

这次战役选择的进攻方向和所规定要达到的战役目的是正确的。毛泽东早在八个月以前的江口会议上就提出并一再坚持，红军主力应向东北方向出击。红一方面军此次发起建、黎、泰战役，与毛泽东原先的设想甚为接近。周恩来在签发这一计划时特意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② 可见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和对毛泽东仍表尊重。

建、黎、泰战役的具体部署为：

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负责消灭泰宁地区敌人。该纵队由广昌县巴口桥地区集结出发，经尖峰、客坊、均口、梅口向泰宁前进，并以一部兵力直趋邵武，沟通与闽北苏区崇安红军的联系。

红一军团为中央纵队，负责消灭建宁地区敌人。该纵队由广昌县头陂地区集结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广昌城、水南、里心向建宁前进，并派一部兵力到康都向南丰警戒，以掩护建宁红军；一路经白水（今赤水）、尖峰、客坊、黄泥铺、水溪口向建宁前进。

红三军团为左纵队，负责消灭黎川敌人。该纵队从广昌城附近集结出发，经千善、康都、西城桥、横村向黎川前进。

红五军团为战役预备队，任务是随时援助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二军消灭建宁、泰宁敌人。该部由广昌县甘竹地区集结出发，经千善、傅坊、蛟洋、建宁、椿树下，19 日到达梅口以西地区，策应红二十二军行动。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机关随红一军团行动，待占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0—201 页。

② 同上书，第 205 页。

领建宁后移驻建宁城北之安宁。

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按预定计划从广昌出发，发起建、黎、泰战役。18日，红一军团占领建宁，红三军团占领黎川。红二十二军于19日占领泰宁，22日占领邵武，24日再占光泽。红军在九天时间内连克五座县城。红军各部在新占领地区发动群众，征集资材，密切注视敌军动向，准备粉碎敌军的反扑。红军和建、黎、泰、邵、光各县地方党组织经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巩固了新扩大区域，拓开了赣东、闽北局面，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红军在这一战役中未能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建黎泰战役后，红一方面军接着发起了金溪、资溪战役。

1932年11月16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分别由黎川和邵武、光泽地区出发北进；红五军团以一部留驻泰宁维护建宁、邵武间交通，主力进至资溪桥和西城桥地区对南丰、南城之敌警戒，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11月17日，红一军团击溃敌第五师一部，占领资溪县城；11月19日，歼敌一部再占金溪县城。

红军占领金、资两座县城后，何应钦为确保贵溪至南城间交通，令国民党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七师，分别由南城和浒湾合击金溪，并令第二十三师由南丰向南城集结，第五十六师一部和新编第四旅主力进取邵武、光泽，然后向赣东进逼，配合金溪方面的作战。11月21日至22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在南城东北部之渭水桥附近截击向金溪进攻之敌，歼灭敌军一个团，并击溃援敌，迫使敌军退回南城县城附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三军一部及第二十二军也于11月20日在浒湾东北之琉璃岗、八角亭、大仙岭一线，击溃自浒湾向金溪进攻之敌第二十七师五个团，迫敌退守抚州。

此后，何应钦为改变其在抚河流域的被动局面，决定将驻在赣江流域的陈诚所部三个师东调，并委陈诚为“抚河方面进剿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驻守抚河流域的国民党军九个师，与红军对抗。陈诚慑于红军攻势，令其所指挥各部暂时采取防堵策略，坚守据点不出，使红军一时难以觅得歼敌机会。直到1932年12月下旬，敌第五师第十三旅三个团，前出至南城县东北黄狮渡地区，兵力较为薄弱，位置亦较为突出。红一方面军总部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命令红军主力由黎川北进，于1933年1月4日至5日，集中优势兵力攻占黄狮渡，歼灭守敌第五师第十三旅，俘敌一千五百余人，缴枪一千五百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1月5日，红军再占金溪县城。1月8日，红一方面军在浒湾东南地区之荷树铺和黄狮渡附近之彭家渡、徐元地区，歼敌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和第十四师各一部，迫使敌人退守抚州和南城。1月4日至8日，红军在黄狮渡、荷树铺战斗（又称黄狮渡、浒湾战斗）中，共俘敌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击溃敌军三个师。至此，结束了金资战役第二阶段作战。

在1月8日浒湾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亲临前线指挥，并在战斗关键时刻率部冲锋，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为纪念他的革命业绩，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1933年冬在红都瑞金叶坪修建了“博生堡”。

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和金资战役，前后历时三个月，先后占领七座县城，恢复发展了大片苏区，歼灭敌军一个多旅，给北线之敌特别是号称国民党“基干军”的第九十师以沉重打击。此后，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得到贯通，能在斗争中互相策应。这为后来的反“围剿”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敌人大举进攻即将到来之际，集中红军主力寻战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企图“先发制人”，打破敌军“围剿”，不仅未能达到战

役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惫了自己，使反“围剿”有限的准备时间更为仓促。这也是贯彻临时中央“进攻路线”所致。

第三节　周恩来果断决策撤围南丰

在组织建黎泰、金资战役期间，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准备工作，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等中革军委和方面军首长，是考虑到了的。1932 年 10 月 26 日，中革军委就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问题，发出《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规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赣江流域和东南三个作战地域，各作战地域分别成立总指挥部，并在总指挥部下依地域各成立若干作战分区；规定各作战地域的红军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统归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和分区指挥部指挥，配合红军主力的反“围剿”作战。密令还对红军的后方联络线及物资补给等作出了明确规定。11 月 24 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联名发出对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在政治上进行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的动员。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就第四次反“围剿”准备问题，发出了相关的训令和指示。1933 年 1 月间，中革军委又将在赣南、闽西地区活动的红军第二十一军（1932 年 7 月由原红军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六师合编成立）和第十二军调到北线，同时将闽浙赣（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南调至中央苏区（改番号为第十一军）。上述三个军统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这样，就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有三个军团、四个独立军和若干个独立师、团，共约七万人。这些，都为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方面军发起建黎泰、金资战役，令江西国民党当局惊恐

不安。省城南昌53个国民党团体于1933年1月连电蒋介石："近日赤匪乘隙倾巢进犯，陷金溪，掠东乡，占崇仁，围临川，逼近南昌，人心震动，岌岌可危，设有疏虞，赤匪且沿江顺流而下，径薄安庆，旁溃湘鄂，蔓延闽浙，东南半壁，从此休矣。万迄简锐亲往，悉移驻鄂之师，速为援赣之举。"①

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亲抵南昌，安抚各方，并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2月6日，蒋介石自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重新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布置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以陈诚的中路军十个师为主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集结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由吴奇伟指挥，辖第十、十四、九十师，集结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由赵观涛指挥，辖第五、六、九、七十九师，集结在金溪、浒湾一线。蒋介石企图以三个纵队同时推进，对红一方面军形成合围之势。

红一方面军结束金资战役后，周恩来、朱德本拟指挥红军主力乘胜北上贵溪，与闽浙赣红十军密切配合，调动临川、抚州等地敌军，在运动中歼灭抚、赣流域敌军有生力量，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完全连成一片。可是，后方中央局成员项英、任弼时却于1933年1月16日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周恩来、朱德，要求红军主力首先攻击南城之敌。1月24日，他们又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提出改变原定作战计划，要求集中红一方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

① 上海《大公报》1933年1月19日。

再攻占南丰，并强调要稳固地占领南丰城。他们要求前方同志必须“站在一致的路线上”①，绝对地执行这一新策略。

南丰城位于盱河西岸，敌军视其为进攻中央苏区的中心基地，驻有毛炳文第三十八军第八师的五个主力团，兵力计两万余人，城郊筑有坚固工事，是一座防守严密的坚城。

周恩来和朱德等认真分析敌情后，反对红军主力贸然过河西攻打坚城。1933 年 1 月 27 日，周恩来电复瑞金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陈述主力暂不宜过河西攻打南城、南丰的理由：“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只是后方联络远不便运输，主要还在于南丰、广昌、建宁、黎川的赤化工作差。但我之利则敌之不利。”他强调指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② 1 月 30 日，周恩来深感战事重大，言犹未尽，又再次致电瑞金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陈述强攻南城、南丰的不利条件：“攻城如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

---

①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电》（1933 年 1 月 24 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0 页。

② 周恩来：《红一方面军部署情况的说明》（1933 年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2—243 页。

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①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已从上海来到瑞金，成立了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对外仍称苏区中央局）。博古和项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前方红军指挥员意见，于2月4日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指令红军先攻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并声色俱厉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②电文咄咄逼人，不容周恩来、朱德等再作任何变更。

周恩来、朱德只好于2月7日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当天周恩来在给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以略带激愤的口吻说：“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③

对临时中央和中共中央局成员的专断，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感到忍无可忍。在被迫作出攻打南丰部署的当天，他们又联名致电瑞金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强烈要求给前方指挥员“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电文说：“唯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45页。

②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电》（1933年2月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因此，我们恳切请求你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因电报无法说明。”① 话已说到这种地步，可见前、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大和周恩来等人的处境之难。

然而，临时中央领导人和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前方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拒不理睬。于是，2月9日，周恩来、朱德鉴于“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约束，只得率领方面军主力从黎川出发西进，包围了南丰城。2月12日傍晚，红军向南丰城守敌发起总攻。

果不出所料，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主攻西门的红三军团和主攻北门的红五军团激战一昼夜，城外敌堡被摧毁不及一半；敌堡后面又是一片开阔地，攻城红军完全暴露在敌强大火力之下，伤亡四百余人，仅红三军团就牺牲了第三师师长彭遨和两名团长。更为严重的是，增援敌军已纷纷出动，其中敌第一纵队第十一师已开至宜黄；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已由吉安开向乐安；第三纵队也有一师从南城前出至新丰街。敌人企图从三面合围攻城红军，与红军主力决战。

面对攻城红军将面临敌内外夹击的危险，周恩来、朱德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待请示后方中央局，于2月13日命令部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256页。

立即撤围南丰，将强攻改为佯攻，主力秘密西移至宁都县北部的东韶、洛口一线隐蔽休整，伺机歼敌。

南丰撤围，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

第四节 黄陂、草台冈大捷

一 黄陂大捷

红一方面军南丰撤围后，为掩护主力秘密西移休整，方面军总部令红军第十一军佯装成红军主力东向黎川运动，以迷惑敌人。敌军果真中计。陈诚令其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二纵队由南城东进，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进攻广昌，企图在黎川南部三面合围红军。此时，敌第一纵队第十一师在宜黄，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在乐安。敌第一纵队罗卓英根据陈诚命令，率第十一师（师长肖乾）从宜黄县城南下，令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由乐安地区东进宜黄南部的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尔后南下广昌、宁都。

1933 年 2 月下旬，当敌第二、三纵队被红十一军吸引向黎川运动时，敌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行动已完全暴露在红军主力面前，态势突出，且又孤立。周恩来、朱德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命令红军主力于 2 月 23 日和 24 日秘密移至宜黄县南部的东陂、河口一线，以红一、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以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董振堂、朱瑞指挥，分两路向北包抄敌人。红军各部冒着刺骨寒风和绵绵春雨，在山林中绕过枯树野藤，劈开荆棘树丛，翻过座座山头，于 2 月 26 日晚全部进入预定的伏击阵地——宜黄县南部登仙桥至黄陂之间的摩罗嶂山区。

2月27日上午9时，大雾渐渐散去。摩罗嶂山下依稀传来人喊马嘶声。第五十二师已全部进入红军左翼队伏击阵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声令下，各个山头顿时爆发出山崩地裂般的枪弹声。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四个团及辎重队，一下子被压到蛟湖北面红军的伏击阵地。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亲自带领下，向被包围的敌人猛烈冲击。傍晚时分，敌第五十二师除先头团外，其余全部被歼。暮色苍茫中，一群群敌兵从丛林、茅草中被搜出来。红一军团炮兵营仅二十多人，一弹未发就俘敌五百余人。一位炊事员还带回一个营的饿兵。敌师长李明负伤被俘，当晚自杀毙命。

与此同时，在第五十二师后面跟进的敌第五十九师，也被红军右翼队红五军团等部包围。2月27日下午，红军向敌发起攻击，敌师长陈时骥令部队就地占领阵地抵抗。28日拂晓，红军左、右两翼第一、三、五军团同时向敌发起总攻。至上午10时许，敌人除两个团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下午，战斗结束，清查俘虏时，不见敌师长陈时骥。原来他躲藏在山上一座小庙中，以为五十二师安然无恙，正在写信向李明求援，最后被红一军团部电台班于螺峰山俘获。

黄陂之役，国民党军两个师基本被歼，两师长被活擒，是为大捷。

二　草台冈再捷

黄陂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主动撤回到宁都县东韶、南团、小布地区隐蔽集结，伺机再次歼敌。

红军神出鬼没，敌人一时摸不清去向。陈诚综合各方面情况判定，红军主力不可能远离，一定还在南丰、广昌、宜黄、宁都某一地区，便改变策略，将原来的“分进合击”战术改为“中

间突破”，准备先攻占广昌县城，截断红军退路，并在政治上求得主动，使左、右两路军更积极地向赣南赤区推进。1933 年 3 月上旬，陈诚调整部署，将原来的第二纵队四个师编为前纵队，由吴奇伟指挥；将原来的第一纵队第十一师残部和第九师、第五师及第五十九师残部编为后纵队，由罗卓英指挥。两个纵队交替前进，直指广昌。

是时罗卓英刚被蒋介石委任为新成立的第五军军长，但是不待他成立军部，其所辖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大部就被红军歼灭。此时陈诚又委任他为后纵队指挥官。他感激涕零，决心打一胜仗挽回面子。3 月 18 日，他从临川匆匆赶到宜黄县南部的东陂，指挥后纵队行动。陈诚也从临川到达宜黄县城，设立前线指挥部。

敌陈诚中路军的行动计划，很快为红一方面军获悉。周恩来、朱德等决心创造战机歼灭罗卓英后纵队。总部命令赣东北红十一军和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等部队开至广昌县西北，吸引敌人的前纵队继续向广昌推进，以拉大敌前后两个纵队间的距离。3 月中旬，红军主力秘密从宁都北上，准备截击敌之后纵队。

3 月 20 日黄昏，敌后纵队的第十一师陆续到达宜黄县南部的草台冈、徐庄地区，第九师尚在东陂，中间隔着一座雷公嵊大山。此外，上次战斗中逃脱的敌第五十九师两个团残部，也由罗卓英亲自率领留在东陂的五里排。

此时敌第十一师孤军突出。周恩来、朱德抓住这一良机，立即下达作战命令，决意集中力量歼灭之。罗卓英因连折两师，在这次行动中特别谨慎。3 月 20 日，他得知第十一师先头部队已与红军小股部队接触，连夜给十一师师长肖乾去电话，要十一师后撤十公里，脱离与红军接触，到东陂的五里排宿营，以避免被红军包围。可是肖乾骄横得很，不听罗指挥，拒绝将部队后撤，

坚持在草台冈、徐庄地区宿营。

肖乾的这一举动，为红军提供了歼灭该师的天赐良机。当他率十一师刚向草台冈开拔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就已下达了在草台冈歼灭第十一师的命令。

3月21日拂晓，红军全线发起攻击。敌十一师是陈诚的王牌师，战斗力较强，遭到红军攻击后，凭借地形顽强抵抗。红军向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一直战至黄昏，才将该师基本歼灭。接着，红军又歼灭了由东陂赶来增援的敌第九师一个营和第五十九师残部。一天之内，红军俘敌六千余人。敌师长肖乾被击伤，后在南昌死亡。敌师参谋长和一名旅长亦被击伤，三个团长被击毙。①

草台冈之役（亦称东陂战斗）大捷后，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结束。

第五节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黄陂、草台冈大捷，战绩辉煌。两役中，红军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精锐之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活捉两名敌师长，毙、伤敌16名师、旅、团长，消灭了敌人“围剿”苏区的有生力量，并缴获了300余挺新式机关枪，40门大炮，取得重大胜利。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灵活运用毛泽东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不断排除“左”倾错误干扰的结果。早在“宁都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就研究确定了第四次反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围剿”战略方针，勾画了战役作战的蓝图。“左”倾错误领导者们迫使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红军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大体还是照旧”①；留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在准备反“围剿”斗争过程中，在许多作战训令中，强调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经验”，“来准备和进行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②，并善于从战争实际情况出发，确定红军的行动。尤其是当红军强攻南丰不克、敌援军纷纷赶至的危急情况下，周恩来等当机立断，撤围南丰，变被动为主动，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赢得了关键的一着棋。1944 年，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③ 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并较好地贯彻执行了红军一系列正确战术原则的结果。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总结说：“南丰撤围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在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7 页。

② 解放军档案馆保存件《中革军委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密令》（1932 年 12 月 26 日）。

③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2 页。

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①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根据地红军与地方武装积极行动、紧密配合的结果。红军反“围剿”作战期间，各战区的红军独立师、团和地方游击队，按照中革军委的统一布置，积极行动，袭扰敌人，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确保了苏区后方安全，使主力红军得以集中全力在前线与敌作战。苏区群众在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持红军作战。1932 年 7 月至 9 月，仅赣南兴国、于都等 13 个县参加主力红军的就达 8690 人，参加地方红军的约 2 万人。1932 年 10 月至 12 月，江西省在“全省两个月冲锋工作竞赛”中又扩大红军 14991 名。为弥补战争经费的不足，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于 1932 年 6 月和 9 月先后发行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分别为 60 万元和 120 万元。苏区人民踊跃购买，如期完成，从而保证了红军战费所需。后方群众还自觉地组织担架、救护、运输、慰劳、洗衣等服务队，奔忙于前线和后方之间，帮助红军救护伤员、运输物资、押看俘虏、打扫战场等。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统计，仅 1932 年 7 月至 9 月，赣南苏区组织的担架队和运输队员就达 22493 人，长短夫子 48461 人。② 红军主力从南丰撤围后，曾两次集结宁都县北部。宁都县党政组织及时发动群众，收集粮食、蔬菜、铺板、禾草等物资供给红军，保证了数万红军部队的物资供应。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 页。

② 参见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4—206 页。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开创了红军大兵团伏击的战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经验。这一方面表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红一方面军中仍具有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朱德等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既充分运用了毛泽东领导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丰富经验，又首次成功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法，对集群敌军予以围歼并获得重大胜利，在红军战争史上写下了重重一笔。周恩来、朱德等红军统帅功不可没。毛泽东曾称赞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蒋介石“以致命的打击”①。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给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当局以沉重打击。1933年3月4日，蒋介石得知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被歼后，曾致电陈诚抚慰云：“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②。然仅过20天，他又接到第十一师被歼消息，提笔给陈诚手谕曰：“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之隐痛。”③ 陈诚接读蒋介石手谕，羞愧交加，在手谕后面写下数字：“诚虽不敏，独生为羞!”④ 他将失败责任发泄到第十一师败逃回去的官兵身上，对该师军官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⑤ 罗卓英身为“进剿”军第一纵队指挥官，所指挥的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第

① 《红色中华》第97期，1933年7月。

② 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③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10日。

④ 同上。

⑤ 宋瑞珂：《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攻纪略》，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转引自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20辑，1991年12月内部版，第224页。

十一师，被红军悉数歼灭，手下三个师长或被擒或毙命。他哀叹道：“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隳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①]敌军遭受重创之状，可见一斑。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贯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发展。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前期战役建黎泰、金资战役后不久，新成立的以博古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就于1933年2月初准备将建黎泰、信抚、闽北三块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苏区合在一起，新设立中央苏区闽赣省，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黄陂、草台冈大捷，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为闽赣省的设立创造了条件。193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局确定将原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调任即将成立的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并从闽浙赣省调邵式平到瑞金与顾作霖一起负责闽赣省的组建工作。4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会，讨论建立闽赣省有关事项，决定成立以邵式平为主席的闽赣省革命委员会。5月上旬，在黎川县湖坊圩召开了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以邵式平为主席的闽赣省革命委员会。6月4日，正式成立闽赣军区，萧劲光任军区指挥兼政治委员，下设有建黎泰、闽北、抚东三个军分区；同年7月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并且组建了建黎泰独立师和若干个独立团。闽赣省成立后，先后下辖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所辖区域面积约达两万平方公里，人口百余万。

1933年4月24日，还新成立了粤赣军区，以杨岳彬为司令

①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10日。

员，下设有三个作战分区。同年8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南方战线，更好地巩固发展南线苏区，决定以会昌县为中心新设立粤赣省，成立了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至1933年夏秋间，中央苏区疆域迅速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整个中央苏区设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共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辖22县，福建省辖15县，闽赣省（含闽北）辖16县，粤赣省辖7县。全中央苏区土地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时称500万）。

第十章

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体制及武装部队建设

第一节　中央苏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一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武装部队最高领导机构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赣西南和闽西的革命武装，在1930年6月以前，除分别受中共江西省委军事委员会和中共福建省委军事委员部指导外，还接受红四军军部的指挥。而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革命武装建设等工作，均由中共中央军事部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军事部成立于1927年5月。周恩来、杨殷先后任部长，罗亦农、邓中夏先后代理过部长，王一飞也代理过部务。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改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关向应为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各农村根据地主力红军的行动，并先后在广东和湖北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南方办事处和长江办事处。

1930年8月，为适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强调：军委在政治上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执行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委常委负责具体讨论并执行一切军事行动计划。中央还要求中央军委必须设

立秘书处、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作部、军务部、经理卫生部、士兵运动委员会、外兵工作部等部门。但是由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难以建立如此庞大的工作机构，也难以对全国各根据地红军实施有效、适时的指挥。

1930 夏，中共中央在强调全国红军必须服从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试图在赤色区域建立红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1930 年 6 月中旬在福建长汀正式宣告成立，由 17 名委员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其职权为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因受条件限制，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并没有设置具体办事机构，未召开过全体会议，未实际行使其领导职权。

1930 年 8 月 23 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扩大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为全国临时红色政权机关，仍以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朱德等 35 人为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为办事机构，但实际仍未行使具体领导职能。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扩大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后，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于 1930 年 8 月 28 日决定成立全国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但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军总司令部对全国红军实际也未行使过领导和指挥职权。

二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0 年 8 月下旬，主管全国苏区工作的周恩来，曾在中央总行委会议上提议在苏区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得到参加中央总行委会议与会者的赞同。同年 9 月 6 日，周恩来在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又提议将全国所有苏区划分为六个军区和若干游击队，组织系统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

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对中央军委也可实施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建立在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其下应在各苏维埃特区建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指挥各特区红军军事行动。

根据周恩来提议，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组建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甦、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25人为委员，但军委主席一职当时没有议定。因中共中央已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前往江西中央苏区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遂把组建苏维埃中央军委的任务也交由项英实施。

1931年1月初，项英抵达中央苏区宁都县小布村，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1月15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正式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苏维埃中央军委成立后，即撤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但仍保留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毛泽东分任总司令、总政委。1931年2月17日，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为主任；同年3月设立军委总参谋部，朱云卿代理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1931年5月，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与军委总政治部（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随军在前方；后方成立军委总参谋部（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暂代部务）、经理部（范树德任部长）、财政部（杨立三任部长）、政治保卫处（王稼祥任处长，后邓发接任）。6月，苏维埃中央军委

主席改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仍继续保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31 年 1 月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再次改称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仍为周恩来，同年夏由李富春接任。1931 年 9 月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后，中共中央军事部也改称中共临时中央军事部。1931 年冬，该部主要工作人员李富春、聂荣臻、刘伯承等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工作，但该部组织仍存在，由武胡景（即吴福敬）任部长。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临时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军事委员会。

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按照中共中央的设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同时，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 年 10 月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通知说，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朱德为主席，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外交部长①。苏区中央局认为中央提议的这个名单不全面，1931 年 10 月 31 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只提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我们提议加周恩来，毛泽东，贺龙，林彪（四军军长），谭震林（十二军政委），孔荷宠，叶剑英，邵式平，请讨论电告。"②

中共临时中央采纳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1 月 25 日在瑞金正式成立

①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件《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1931 年 10 月）。

② 据江西省档案馆保存件《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接受中央土地问题指示，苏维埃政府问题》（1931 年 10 月 31 日）。

了隶属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其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或“中革军委”。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称：“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的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①]、关向应、王盛荣等十五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华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之下。”[②]

中革军委成立后，先后下设如下工作机构：

总参谋部：部长（后称总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接任。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先后为聂荣臻、贺昌。

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

总军医处（1932 年冬改称总卫生部）：处长（后称部长）贺诚。

秘书处：秘书长刘伯坚，后徐梦秋。

副官处：处长杨立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后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

后方办事处：1932 年 4 月在胜利县（现属于都县）桥头区设立，主任杨立三，政委倪志侠。

---

① 即徐向前。

② 据宁都县委党史办保存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1931 年 11 月 25 日）。

后方总兵站：1932年6月在瑞金设立，主任杨至诚。

中革军委成立后，办公机关驻瑞金叶坪乡洋溪村刘氏宗祠。1932年6月下旬，中革军委机关随军到前方。

中革军委不仅是中央苏区最高军事领导和指挥机关，而且是全国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但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与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军事行动和一切重大决策都受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制约。

由于中革军委成立后即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建制和领导机构，自1931年12月起，中央苏区红军作战行动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1932年3月中旬后，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到前方随军行动，具体指导红军东路军作战行动。

1932年6月下旬，中革军委机关随军到前方，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与番号，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7月下旬起，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亲赴前方，直接指导红一方面军作战行动。根据周恩来提议并经留在瑞金的后方中央局同意，从1932年8月8日起，毛泽东不再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指挥红军作战，改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为便于讨论决定红军作战总计划等重大问题，另在前方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周恩来有最后决策权。“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所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被免除，改由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932年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5月8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决定中革军委机关从前方撤回瑞金，驻在瑞金沙洲坝乡乌石垅村杨氏私宅，并加委项英、博古为

中革军委委员，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下设工作机构也作了调整，将总参谋部改为总司令部，总司令部下设各局分别改为第一、二、三、四、五局，各局机关也分驻乌石垅村各屋场。中革军委机关撤回瑞金后，博古、项英逐渐加强了对中央苏区前方红军作战的干预和控制。

1933 年 6 月 30 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从 1933 年起，每年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 7 月 11 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批准每年的“八一”为建军节。红都瑞金军民为纪念第一个建军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1933 年 9 月底，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瑞金。博古擅自将红军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为加强对前方红军作战指挥的控制，1933 年底，博古、李德等决定将在前方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调回瑞金，并下令撤销红一方面军建制，由设在瑞金的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前方红军作战。1934 年 2 月 3 日，中革军委改组，朱德仍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被免去。

1934 年 7 月，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沙洲坝乌石垅村转移至瑞金云石山乡梅坑村。

四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1932 年 2 月 1 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受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与中革军委属平行关系。其职责为负责指导全国红军和地方武装政治思想工作。总政治部主任仍为王稼祥，副主任聂荣臻，后为贺昌、袁国平。1932 年 6 月，红军总政治部机关与中革军委机关一起随军在前方。1933 年 6 月中革军委机关撤回瑞金时，

红军总政治部机关也同时从前方撤回瑞金，驻在沙洲坝乡白屋子村，1934 年 7 月转移至瑞金云石山乡梅坑村。

红军总政治部内设政务部、组织部（科）、宣传部（科）、破坏部（科）、地方工作部（后成立）、青年部（后成立）等工作部门。办有《红星》报等报刊。

五 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军事人民委员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从 1931 年 11 月至 1934 年 10 月，均由朱德兼任中央军事人民委员（亦即中央军事部长）。办公室初设叶坪村临时中央政府办公的谢氏宗祠，后与中革军委合署，平时业务由中革军委代理。

第二节 中央苏区所辖各省军区

中央苏区所辖各省原在省苏维埃政府内设军事部，为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机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将各省军事部改设为军区，受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和所在地中共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共同领导。各军区之下设若干军分区（亦称作战分区），同时各县、区苏维埃政府设立军事部。军区、作战分区和各县、区军事部负责指挥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以及扩红、编练赤卫军、模范少队及支前作战等任务。

中央苏区先后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五个军区和瑞金卫戍司令部。各军区情况如下：

一 江西军区

1931 年 11 月设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陈毅任部长。

1932年1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撤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成立江西军区。1932年2月1日，江西军区总指挥部正式成立，陈毅任军区总指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数月后政治委员改由李富春兼任。彭雪枫亦曾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军区总指挥部先设兴国县城郊筲箕窝村，1933年1月迁驻宁都县七里村。1934年8月28日，军区总指挥陈毅在兴国县老营盘指挥作战负伤，蔡会文接任总指挥。同年10月又由李赐凡任总指挥，曾山兼任军区政治委员。

从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4月，江西军区先后下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作战分区：

第一作战分区：又称南、广、建、黎、泰分区。1932年10月成立，指挥部设广昌，同年冬迁建宁县城。李德胜、魏赤先后任司令员，余泽鸿曾兼任政治委员，指挥南丰、广昌、建宁、黎川、泰宁等县地方武装。1933年6月闽赣军区成立后，建、黎、泰三县划归闽赣军区第一作战分区，南丰、广昌继续为江西军区第一作战分区，机关驻两县交界的朱坊辽陂地域，指挥红军独立第四团。

第二作战分区：又称宜、乐分区。1932年9月成立，指挥部设乐安县招携。张方说、谢唯俊、马炳连、屈元清、刘加贺、戴福胜、刘汉雄等先后任司令员，陈洪时、胡嘉宾、李福槐等先后任政治委员，指挥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独立第十一团、宜黄独立团和宜黄、乐安等县军事部和地方武装。1933年8月28日，中革军委对各军区所辖各分区作了调整，将宜黄、乐安、崇仁、新干等县划为江西军区第二作战分区，指挥部驻乐安县东部边境谷岗、圭峰和宜黄县西部边境西源等地。

第三作战分区：又称会、寻、安分区。1932年7月成立，指挥会昌、寻乌、安远和福建武平四县军事部和地方武装。指挥

部先后设会昌县桂坑、罗塘、长岭、门岭等地。司令员先后为钟亚庆、吕赤水、杨岳彬，政治委员先后为邓小平、杨岳彬（兼）。

第四作战分区：又称永、吉、泰分区。1932 年 8 月成立，指挥部设吉水水南圩。指挥永丰、吉水、公略、万泰等县军事部和地方武装。

第五作战分区：又称于、信、赣分区。1933 年 2 月成立，指挥部设于都。指挥兴国、胜利、于都、赣县、信丰等县军事部和地方武装。司令员刘雄武，政治委员李宗白。

1933 年 4 月，因新设立了粤赣军区，江西军区改设为四个作战分区。其第一作战分区原辖的建、黎、泰等县划归闽赣省领导；第二作战分区维持原状；第三作战分区改辖永丰、吉水、公略三县地域；第四作战分区扩大到杨殷、兴国、赣县等县；第五作战分区撤销。

二 福建军区

又称闽粤赣军区。1932 年 2 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在福建长汀县十里铺成立。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林野。下辖闽西各县工农立第七师、红十二军等部队。后来为统一指挥全省武装及独的地方武装，先后成立了杭永岩、汀清连、宁清归三个军分区。1932 年 6 月，罗炳辉率红十二军入赣作战，军区司令员由谭震林兼任，政治部主任为李明光。周子昆、叶剑英、龙腾云曾先后担任过军区司令员。

福建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

杭永岩军分区：又称第一军分区。1932 年 2 月成立，由上杭、永定、龙岩独立团、营和游击队组成。分区指挥部驻上杭县太拔村。司令员郭清义。

汀清连军分区：又称第二军分区。1932 年 2 月成立，由长汀、清流、连城三县独立团、营和游击队组成。分区指挥部驻连城县新泉。司令员黄火清，政治委员黄苏。

宁清归军分区：又称第三军分区。1932 年 3 月成立。辖有东南游击支队、东北游击支队和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独立团、营。分区指挥部驻宁化县城。司令员杨春山，政治委员霍步青。1933 年初春，所辖各县地方武装组建成立独立五团、独立七团和独立七师，统辖分区指挥。1933 年 8 月苏区扩大，增设彭湃、泉上二县，所属地方武装亦归该军分区指挥。张荣发任分区司令员，黄火星任分区政治委员，司令部机关移驻清流、归化县。

三　闽赣军区

1933 年 6 月 4 日按中革军委命令成立。萧劲光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未到职前由邵式平代理）。军区司令部先后驻江西黎川县的牛头岗、湖坊、城关等地。军区成立时下辖建黎泰、闽北、抚东三个军分区，及其所属地方部队。军区直属部队为第十九师、闽赣少共师、闽赣工人师。1933 年 10 月，闽赣军区的独立师、团整编为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并以这三个师组建了红军第七军团。1933 年 9 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闽赣省级领导机关驻地黎川县城失守。同年 11 月闽赣军区司令部迁驻建宁县城，叶剑英接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4 年 1 月，邵式平任军区司令员。同年 2 月，建宁城又失守，军区司令部再迁彭湃县（辖今福建宁化、江西石城县部分地域）、宁化县。1934 年 7 月，邵式平奉命前往瑞金工作，中革军委派宋清泉任军区司令员，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兼任军区政治委员。

闽赣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

闽北军分区：1932 年 12 月 11 日成立，原隶属闽浙赣军区。

1933年5月划属闽赣省。指挥部驻崇安县，指挥闽北红军独立师、闽北军政教导大队、闽北赤色警卫团和崇安、广浦、铅山、广丰、邵武、光泽等县地方武装。1933年5月闽北独立师划归中央苏区红军建制，7月编入红七军团。12月该分区又划归闽浙赣军区领导。司令员先后为薛子政、邹琦、李德胜，政治委员先后为萧韶、黄道。

抚东军分区：1933年5月成立，指挥机关驻资溪县泸阳镇。指挥信抚独立团和资溪、贵南、金南县和金资特区等军事部和地方武装。1933年11月因辖区被敌所占，机构解体。司令员郭如岳，政治委员黄道。

第一作战分区：为击退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5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划分军分区及其目前的任务的命令》。闽赣军区奉命将辖区划为第一、第二作战分区。6月，闽赣军区第一作战分区成立，司令员邱尚聪，政治委员温含珍。司令部设归化县城。下辖泉上、清流、归化县的独立团、营。1934年10月，该分区撤销，人员编入闽赣军区独立第十八团。

第二作战分区：1934年6月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明兴，司令部设泉上县。下辖建宁、泰宁、黎南县独立团、营。同年10月，该分区撤销，人员编入闽赣军区第十七、十八团。

四 粤赣军区

1933年4月23日由原江西军区第三、五作战分区合并后设立。军区总指挥部先后驻会昌县筠门岭的芙蓉寨和会昌城郊文武坝。先后任总指挥（司令员）的有：杨岳彬、张云逸、左权、龚楚、何长工；政治委员有何长工等。辖第一、第二、第三作战分区。红二十三军（后改编为独立红二十二师）归其指挥。

1934年5月17日后，其所辖第一作战分区划属赣南军区。

1934 年 10 月，军区总指挥何长工随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军区建制撤销。

粤赣军区下辖三个作战分区：

第一作战分区：1933 年 4 月成立。指挥部先后驻于都县新陂、小溪等地。辖信丰、于都、西江等县地域，红军独立六团归其指挥。司令员不详，政治委员任新喜，政治部主任谭平。1934 年 5 月该分区所辖地域划归赣南军区第二作战分区。

第二作战分区：1933 年 4 月成立。指挥部驻安远、寻乌、会昌三县交界的清平圩、长安圩、清溪一带。辖安远、寻乌、门岭三县地域，红军独立五团归其指挥。1934 年 5 月该分区改为粤赣军区第一作战分区。

第三作战分区：1933 年 4 月成立。司令员先后为游端轩、吕赤水、刘化生；政治委员先后为邓富连（邓飞）、吴福林、陈伟勋。辖会昌、武平、上杭河西地域。指挥部先后驻筠门岭、帽村、亭头。红军独立第十团归其指挥。1934 年 5 月 17 日，其第一作战分区划属赣南军区，此后只辖两个作战分区。1934 年 10 月，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和部分工作人员随野战军长征，军区建制撤销，军区所属地方部队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1934 年 5 月该分区改为粤赣军区第二作战分区。

五　赣南军区

1934 年 5 月 17 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设立。辖第一、二两个作战分区和信康、南雄两个远殖游击区。红军独立六团和独立十四团归其指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先后驻于都县城、于都南部的里仁、黎村、小溪、禾丰等地。司令员先后为项英（兼）、龚楚、蔡会文；政治委员先后为项英（兼）、钟循仁（兼）、阮啸仙（兼）；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李赐凡、刘伯坚。

赣南军区下辖两个作战分区：

第一作战分区：1934 年 5 月设立，以杨殷、赣县为其作战地域。指挥部设均村（今兴国县辖）。司令员王某某（具体不详），政治委员罗孟文等。1934 年 11 月该分区改称为杨赣军分区，仍隶属于赣南军区。

第二作战分区：1934 年 5 月设立。以登贤县及于都南部天心河以西为其作战地域。司令员杨海如，政治委员张正芳（阮壁芳，兼）。1935 年 3 月，该作战分区因所辖游击部队被打散而停止活动。

六 瑞金卫戍司令部

1932 年 6 月设立，归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直接领导。刘伯承兼司令员，副司令员刘联标。1932 年 10 月后叶剑英兼任司令员。凡驻瑞金的红军部队、地方武装及红军学校的军事行动，均归其指挥。

中央苏区上述五个军区和瑞金卫戍司令部均受中革军委和苏维埃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直接领导，在作战行动上，亦接受红一方面军总部指导。

中革军委和苏维埃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除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各军区和红军部队外，还领导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西北和湘鄂西分会、湘鄂川黔分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军事组织。

第三节 中央苏区主力红军

一 红一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 1930 年 8 月 23 日在湖南省浏阳

县永和镇成立的。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政治委员滕代远，参谋长朱云卿，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副官长兼经理处长杨立三。同时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红一方面军辖红一、三军团和红二十军（赣西南）、红二十一军（闽西）、红二十二军（赣南），1930 年冬增加红三十五军（赣南）。总兵力约四万人。

1931 年 1 月 15 日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时，撤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但保留红一方面军建制。同年 2 月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1931 年 5 月 23 日，在宁都县南团村恢复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仍为毛泽东。6 月，由周以栗代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31 年 11 月 25 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即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建制，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红一、三、五军团和各直属部队。1932 年 6 月中旬，中革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全方面军下辖红一、三、五军团。1932 年 8 月 8 日，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年 10 月上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错误批判，被迫请病假回后方休养。10 月 12 日，中革军委即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了毛泽东所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周恩来代理，1932 年 10 月 26 日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原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调回瑞金任红军学校校长，所遗职务改由刘伯承担任。1933 年 5 月 8 日，中革军委重新任命朱德为中

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杨尚昆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先由袁国平代理）。同年5月底6月初，方面军按“三三制”统一整编，各军番号撤销，由军团直接指挥各师。1933年7月5日和10月28日，先后新成立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归红一方面军指挥。

1933年12月，博古、李德决定再次撤销红一方面军番号和组织，朱德、周恩来被调回瑞金。此后，中央苏区各红军部队（历史上统称为中央红军）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直至1935年11月在陕北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才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二 红一军团

红一方面军下属主力军团之一。1930年6月19日在福建长汀县城宣布成立，始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朱云卿，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经理处处长先后为宋裕和、杨立三。原中共红军前委改为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

红一军团成立时，下辖第四军、第三军和第十二军。

（一）第四军

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即潘心源，未到职，由罗荣桓代理），参谋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后为彭祜、高自立）。初辖第一、二、三纵队。1930年10月上旬，全军三个纵队依次改为第十、十一、十二师，后又增加第十三师。

第十师师长王良，政治委员李赐凡，参谋长陈光，政治部主任李赐凡（兼）。辖有第二十八团（团长先后为刘海云、陈光，政治委员沈联雄）、第二十九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赵尔陆）、第

三十团（团长先后为陈光、唐儒，政治委员先后为丁纪修、沈联雄）。

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政治委员先后为罗瑞卿、曾士峨（兼）、张际春，参谋长耿凯，政治部主任先后为罗瑞卿（兼）、张际春（兼）。下辖第三十一团（团长先后为耿凯、彭雄，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三十二团（团长先后为周正湘、聂鹤亭、罗占云，政治委员先后为黎林、胡发坚）、第三十三团（团长先后为聂鹤亭、李学铭、赖传珠，政治委员先后为谭楚材、赖传珠、刘忠）。

第十二师师长先后为萧克、耿凯，政治委员张赤男，参谋长先后为李学铭、耿凯，政治部主任先后为张赤男（兼）、刘英、刘型。下辖第三十四团（团长先后为曹福海、向玉成，政治委员孔繁树）、第三十五团（团长罗占云，政治委员刘亚楼）、第三十六团（团长林发，政治委员先后为刘英、刘忠）。

第十三师原为红二十二军改编的第六十四师，1931 年 6 月改番号为第十三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先后为高自立、蔡树藩、粟裕，参谋长唐天际，政治部主任先后为粟裕（兼）、何开荣。下辖第三十七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陈铁生）、第三十八团（团长赖绍尧，政治委员何开荣）、第三十九团。

（二）第三军

军长黄公略（1931 年 9 月 15 日黄公略牺牲后，周子昆继任军长），政治委员先后为蔡会文、高自立，参谋长先后为周子昆、陈奇涵、张锡龙，军需处长范树德，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七、八、九师。

第七师师长先后为周子昆、陈伯钧，政治委员李涛（李湘舲），参谋长先后为张锡龙、李俊通。下辖第十九团（团长先后为龙入云、彭雄，政治委员先后为宋裕和、殷超、符竹庭）、第

二十团（团长姚金馥，政治委员先后为聂绍闻、胡发坚）、第二十一团（团长先后为彭万龙、曾云，政治委员先后为符竹庭、蔡先云）。

第八师师长先后为龙芝道、李聚奎、刘畴西，政治委员先后为戴奇、王如痴，参谋长先后为钟声楼、郭天民。下辖第二十二团（团长田甲根，政治委员先后为王如痴、金祝生）、第二十三团（团长先后为李天柱、刘雄武，政治委员先后为刘霞〈刘石〉、王东生）、第二十四团（团长先后为凌扬胜、钟享元，政治委员王德兴）。第二十四团于1931年12月撤销编制，并入第九师第二十六团。

第九师师长先后为徐彦刚、刘雄武，政治委员先后为朱良才、戴奇，参谋长先后为李剑平、耿飙、曹里怀。下辖第二十五团（团长王玉洪，政治委员易荡平）、第二十六团（团长先后为李介思、曾云，政治委员先后为张汉风、刘华香）、第二十七团（团长先后为李聚奎、周振国，政治委员贺曙光）。

（三）第十二军

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林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军需处长欧阳郎莹，军医处长张令彬，副官处副官长杨至诚。下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师。

第三十四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先后为高自立、旷朱权，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刘英。下辖第一〇〇团（团长先后为寻淮洲、杨海如，政治委员蔡钟）、第一〇一团（团长先后为漆德伟、黄永胜、陈树湘，政治委员先后为罗震廷、丘树欣、陈绍华）、第一〇二团（团长先后为杨海如、刘玉庭，政治委员先后为刘型、田桂祥）。

第三十五师师长先后为龙普霖、欧阳健、寻淮洲，政治委员欧阳健，参谋长郑伦，政治部主任欧阳健（兼）。下辖第一〇三

团（团长先后为粟裕、魏协安、李健平，政治委员宋任穷）、第一〇四团（团长先后为郑由义、孙长清，政治委员阮华庭）、第一〇五团（团长叶松，政治委员先后为丘伯琴、赖际发）。

第三十六师师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石玉成，政治部主任邓华（兼）。下辖第一〇六团（团长杨梅生，政治委员雷松生）、第一〇七团（团长张荣发，政治委员何醒南）、第一〇八团（团长先后为萧美虎、孙长清、萧刚）。

（四）红一军团发展沿革

1932 年 3 月 12 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重编第一、三、五军团。重编后的红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陈奇涵、徐彦刚先后任参谋长，罗荣桓、袁国平先后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彭祜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罗瑞卿任政治保卫局局长，赵尔陆任供给部长，姜齐贤任卫生部长。军团下辖第四军、第十五军，1932 年 6 月增辖第十二军和由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等部改编的第二十二军。

其时，第四军军长先后为林彪、王良、周昆，政治委员先后为罗荣桓、罗瑞卿，参谋长先后为粟裕、陈奇涵、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先后为罗荣桓（兼）、李卓然，政治部副主任先后为李卓然、彭祜，经理处处长赵尔陆，军医处长先后为姜齐贤、陈先多、彭显伦、张雄。第四军仍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师。原红十二军第三十四、三十五师亦归其指挥。

第十五军由宁都起义部队一部编成。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下辖第四十三、四十四师。1932 年 3 月 12 日该军划归红一军团指挥后，左权任军长，朱瑞、乐少华先后任政治委员。在红军东路军攻打漳州期间，红四军第十三师划归红十五军指挥，改为红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同年 6 月，高自立任军政治委员。7 月，陈伯钧任军长，朱良才任军政治委员。8 月，

第四十五师划归红三军指挥。11月，李青云任军长。12月28日，红十五军重归红五军团建制，所辖两个师缩编为四个团由军部直接指挥。

第十二军原属红一军团。1931年10月该军军部奉命兼福建军区总指挥部，其所辖第三十四师和第三十五师留在江西归红四军建制，第三十六师在闽西苏区活动。1932年6月，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奉命率第三十六师回江西作战，仍归红一军团指挥。同年10月，第三十六师与新成立不久的红二十二军合编。

第二十二军是1932年7月由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师和独立第五师合编组成的。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先后为梁锡祜、旷朱权、蔡树藩，参谋长先后为张世杰、毕占云，政治部主任谭政，1932年10月，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与该军合编，军长改由罗炳辉担任。合编后下辖第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师：

第六十四师由原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师改编而成，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先后为陈铁生、史犹生。下辖第一九〇、一九一、一九二团。

第六十五师由原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师改编而成。

第六十六师由原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改称。

1933年5月底6月初，红一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整编为三三制的大师大团。红一军团在永丰县藤田整编后，仍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毕士悌、左权先后任参谋长。原第七师、第九师与红二十二军合编为第一师（师长先后为罗炳辉、李聚奎，政治委员先后为蔡树藩、谭政〈代理〉、黄甦、黄开湘，参谋长先后为毕占云、曹里怀。下辖第一、二、三团）；原第十师、第十一师合编为第二师（师长先后为徐彦刚、吴高群、陈光，政治委员先后为胡阿林、张兴〈代理〉、刘亚楼，参谋长先后为熊伯涛〈代理〉、李堂尊。下辖第四、五、六团）；

另由中央政府警卫团、军团教导队和瑞金模范师合编成立第三师（该师于1933年10月划归红九军团）。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中革军委将红军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划归红一军团建制。

三　红三军团

红一方面军下属另一主力军团。

红三军团是1930年6月在湖北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八成立的。军团总指挥（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经理处长周玉成。下辖第五军、第八军、第十六军。

（一）第五军

军长、军政治委员、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分别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袁国平兼任。1930年8月23日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军长改由邓萍兼任，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辖有第一师（师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吴溉之〈兼〉）和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谢翰文）。1931年10月，第八军番号撤销，其所部编入第五军各师。此时，全军未设军部，辖第一、二、三师：第一师师长侯中英，政治委员吴溉之；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徐策。1932年3月赣州战役结束后，重新设立红五军军部，邓萍任军长，耿万敌任参谋长。1932年底，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撤销红五军番号，所辖各师由红三军团军团部直接指挥。

（二）第八军

1930年6月由红五军第五纵队与鄂东南地方武装扩编组成。军长李灿，后何长工；政治委员邓乾元，后袁国平。该军编成后即与红五军一起参加攻打长沙战斗，留在鄂东南坚持斗争的两个

大队与当地地方武装一起，扩编为红十五军，编入鄂豫皖苏区红军序列。红八军的第一、二、三纵队，编为第四师、第六师。第四师师长黄云桥，政治委员石衡中，参谋长彭绍辉；第六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1930 年 10 月，红八军随红三军团东渡赣江，参加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

（三）第十六军

军长胡一鸣，副军长孔荷宠，1930 年 8 月后孔荷宠任军长；政治委员先为李楚屏，后为黄志竞；参谋长余发明。政治部主任吴天骥。下辖第七师、第九师。第七师师长高咏生，政治委员邹之漠；第九师师长李玉根，政治委员邱训民。红十六军成立后，一直留在湘鄂赣苏区活动，实际未接受红三军团指挥。

（四）红三军团发展沿革

红三军团于 1930 年 8 月 23 日编入红一方面军后，一直与红一军团一起，在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下活动。1931 年 7 月，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

红七军原为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军长张云逸，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原辖四个纵队，后扩编为三个师。1930 年 11 月上旬奉中央命令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因受挫于 1931 年初转向湘南、江西前进，部队也缩编为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2 月 5 日五十五团先行渡过粤北乐昌河，五十八团大部受阻渡河未成，两团遂分开行动。邓小平、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率五十五团于 2 月 14 日进占江西崇义县城。根据前委会议决定，邓小平离开崇义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许卓代理。1931 年 3 月中旬，红五十五团撤离崇义，经遂川县到达永新与红二十军会合。张云逸率五十八团经湘南宜章、汝城，在酃县与湘赣红军独立师会合后，于 4 月初到达永新县与五十五

团会合。两团会合后，军长仍为张云逸，代理政治委员许卓。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成立红军河西指挥部，李明瑞任总指挥，曾炳春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1931 年 7 月底红二十军编入红七军后，全军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八三个团，共 2050 人。军长李明瑞，政治委员许卓，参谋长张云逸。1931 年冬，李明瑞在会昌县被错杀，龚楚继任军长，张纯清任政治委员。1932 年 6 月扩大编制，重组第十九、二十一师师部。8 月，张锡龙任军长，张纯清任政治委员。12 月，两个师师部再次撤销，由军部直接指挥所辖四个团。

1931 年 10 月，红三军团所辖第八军番号撤销，原红八军第六师改为红三军团第二师，原红八军第四师三个团分别编入红三军团第一、二、三师。此时红三军团直辖有第一、二、三师和第七军。1932 年 3 月 12 日中革军委决定重编第一、三、五军团，红五军军部恢复（不久后再次撤销），红三军团下辖第五军、第七军和第十四军（十四军实际未归建，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后又改由江西军区指挥）。1933 年 5 月底 6 月初，红三军团在乐安县大湖坪整编，所辖第五军、第七军番号撤销，全军团改编为第四师（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师合编）、第五师（由原红七军四个团和红二十一军合编）。不久，兴国模范师全体加入红三军团编为第六师。各师情况如下：

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张翼，政治部主任李井泉。辖第十、十一、十二团。

第五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黄克诚。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

第六师师长钟元洪（8 月后洪超），政治委员谢远松（后陈阿金），参谋长邱会钰（后马骏），政治部主任曹其灿。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团。

红三军团的这一建制，一直保持到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突围长征。

四 红五军团

红五军团是由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部队改编而成。1931年12月19日宣布成立，归中革军委指挥。1932年6月中旬后隶属红一方面军建制。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萧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军。

（一）第十三军

第十三军由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改编成立。董振堂兼任军长，旷珠权任政治委员，邓友毅任参谋长，李翔梧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十七师、三十八师。1932年3月军政治委员改由何长工担任。同年6月，由红十四军缩编的第三十九师划归第十三军建制。8月，赵博生兼任军长，王如痴任政治委员。1932年12月24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第十三军建制，将原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编入第三十九师，与第三十八师一起受红五军团直接指挥。

（二）第十四军

第十四军由宁都起义部队一部编成。军长由赵博生兼任，政治委员黄火青。辖第四十师、第四十一师。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重新编组红一、三、五军团时，红十四军划归红三军团建制，接着又改受江西军区指挥。1932年6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十四军建制，其部队编为第三十九师，归第十三军建制。

（三）第十五军

第十五军由宁都起义部队一部改编成立。军长黄中岳，政治

委员左权。辖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1932 年 3 月 12 日中革军委重新编组红一、三、五军团时，第十五军划归红一军团指挥，军长改由左权担任，政治委员朱瑞，后乐少华。1932 年 4 月，红十五军编为红军东路军参加攻打漳州战役。这期间，红四军第十三师归红十五军建制，改为红十五军第四十五师。6 月，高自立任军政治委员。7 月后，陈伯钧任军长，朱良才任军政治委员。8 月，第四十五师划归红三军指挥。11 月。李青云任军长。1932 年 12 月 28 日，红十五军重归红五军团建制，所辖两个师缩编为 4 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

（四）红五军团发展沿革

红五军团编成后，整训两个月，参加了攻打赣州战役。1932 年 3 月 12 日中革军委重编红一、三、五军团时，红五军团辖第三军和第十三军，军团参谋长改由周子昆担任。接着，与红一军团一起编为红军东路军入闽作战。6 月，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以所谓“反革命阴谋叛变”罪被捕判刑，董振堂继任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军团副总指挥。8 月初，红十五军重归红五军团指挥，红三军亦调出归还红一军团建制。1933 年 1 月 5 日在黄狮渡战斗中，赵博生英勇牺牲。期间，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军部和第十五军各师师部取消。1933 年 6 月，根据中革军委统一整编命令，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军部撤销，全军团缩编为第十三师，另将博生、胜利、石城等县加入红军的赤卫军模范师（团）改编为第十四师，少共国际师后亦划归红五军团编为第十五师。军团长仍为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参谋长陈伯钧。1933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四师划归第九军团建制。年底，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1934 年 4 月参加广昌保卫战。7 月，红七军团第三十四师划归红五军团指挥。此时军团参谋长郭如岳，政治部主任曾日三。1934 年 10 月 17 日，全

军团为红军野战军后卫从兴国出发，参加长征。此时军团长仍为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陈云为驻军团中央代表。

五 红七军团

1933年6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决定在中央苏区组建红军第七军团。随后，中共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闽赣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指令，整编所属地方武装，筹建红七军团。7月中旬，红七军团组建完毕，在闽赣省黎川县城篁竹街李树坪举行了军团成立大会。红七军团军团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第十九师：由原闽浙赣苏区第十一军改编而成。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萧劲光兼任。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

第二十师：由闽北独立师和邵光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合编成立。原闽北独立师编为该师第五十八团；邵光独立团编为第五十九团第一、二营，将扩大后的金资模范团编为第三营；以建黎泰独立师第三团编为第六十团第一营，黎川独立团编为第二营，将扩大之“无产阶级团”编为第三营。师长粟裕，政治委员李翔梧。该师编成之初受闽赣军区指挥，后归建红七军团。

第二十一师：1933年6月成立。以闽赣独立师即少先师与建黎泰独立团合编为该师第六十一团；以工人第二师编为第六十二团；将扩大后的黎川模范团编为第六十三团。师长黄立贵。

1933年7月，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作战。红七军团上述各师划归东方军序列，参加作战。1933年10月28日，红七军团整编，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师。第十九师师长先为周建屏，后寻淮洲兼任，政治

委员萧劲光（兼），下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第二十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李翔梧，下辖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团；第三十四师由福建军区第十九军改编而成，师长先后为周子昆、彭绍辉、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下辖第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团。

1934 年 7 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抗日。此时，军团长为寻怀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下辖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师。约六千人。

六　红八军团

1934 年 9 月 21 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军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合编成立，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唐浚（后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

第二十一师：1934 年 9 月 8 日由原红军西方军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在兴国县崇贤圩合编组建。师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第二十三师：由中央警卫师于 1934 年 2 月 18 日改编而成（中央警卫师又由原红军工人师改编而成）。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周桓。下辖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团。

七　红九军团

1933 年 10 月 28 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原属红一军团的第三师和原属红五军团的第十四师组编而成。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李涛（李湘舲）。未设

军团部和直属队，由第三师师部兼军团部。1934 年 4 月在广昌保卫战中，第十四师损失惨重，该师被解散。此后，红九军团只辖第三师。1934 年 10 月，中革军委将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独立第二十二师是由原红军第二十三军改编而成，属粤赣军区主力部队。该师师长先后为蒋信才、龚楚、程子华、魏协安、周子昆；政治委员先后为方强、黄开湘。全师辖第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团。该师自成立后一直在会昌县筠门岭一线担负中央苏区南线防守任务。

八 其他主力红军部队

中央苏区除上述主力红军部队外，还有一些红军独立师、团部队。

（一）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

1934 年 3 月 10 日根据中革军委司字第十一号命令组建。由原红军独立第一团编为该师第七十团，原红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编为该师第七十一团，原第一教导团编为该师第七十二团。全师两千余人、枪。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1934 年 10 月后由杨英接任），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直接受中革军委指挥。该师自编成后一直在福建汀杭地区作战。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该师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二）红军第三十四师

1933 年 6 月 7 日由原福建军区红军第十九军整编而成。历任师长为周子昆、彭绍辉、陈树湘。辖第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团。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1933 年 7 月后编入红七军团建制，但实际未归建，长时间担负独立作战任务或暂归红三军团指挥。1934 年 7 月划归红五军团建制，后随红五军团参加长征。1934 年 11 月底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担任后卫被阻未能

渡江，留在湘江东岸，后大部被打散，余部转入湘南坚持游击战争。

（三）少共国际师

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口号。在不久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方面军政治部负责青年工作的萧华等，提议在中央苏区创建一个“少共国际师”，并将这一提议电告少共中央局。少共中央局非常赞同这一提议。1933年5月20日，少共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要求“各级团部必须将前方的号召与中央局的决定，在团内和群众中广大的解释，利用过去扩大红军的光荣的经验，为整团整连的加入红军，整个青年团支部加入红军的光荣的例子。成批的动员团员、少先队与劳苦青年到红军中去创立‘少共国际师’”。同时决定“由江西征调四千，福建征调二千，闽赣征调二千，到今年‘八一’节为止，完成‘少共国际师’”。少共中央局“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议：责成江西军区将青年团所动员之团员与青年群众编立少共国际师两团，在福建军区一团，在闽赣军区一团”。[①] 中央苏区广大团员青年热烈响应少共中央局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少共国际师。仅胜利县一个县，就组建起一个“少共国际胜利团”，由团长谢远祯、政治委员谢明（少共胜利县委组织部长）带领，加入少共国际师。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博生（今宁都）县城正式组建并举行授旗典礼。中革军委正式给该师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归红五军团建制。全师初为九千余人，后发展到万

① 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687页。

余人，其中70%为共青团员。全师下辖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团。为加强领导，中革军委从红军学校和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富有作战指挥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充实该师。师长初为陈光，后为吴高群，吴高群在团村战斗中牺牲后，又由曹里怀、彭绍辉先后继任；政治委员先为冯文彬，后为萧华、罗华民；政治部主任冯文彬。少共国际师刚组建时，第四十三团团长张顶生，政治委员谢明；四十四团团长朱水清，政治委员陈中清；四十五团团长卢子美，政治委员罗华民。

少共国际师组建后，即开赴广昌县进行军政训练。9月3日在广昌县城召开全师出征上前线誓师大会，10月正式开赴前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该师先后参加过拿口、将军殿、邱家隘、团村等战斗和建宁保卫战、石城保卫战，表现英勇顽强，受到军团领导多次表扬。1934年6月后，该师划归第三军团指挥。1934年10月初完成掩护红三军团在石城南部集结转移任务后，从石城县南部出发开赴于都县段屋地区，归红一军团建制，参加长征。1935年1月19日，全师分编到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少共国际师”番号由此撤销。

（四）红军工人师

为响应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号召，1933年4月1日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代表大会和5月1日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上，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提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的倡议。这一倡议发出后，参加上述两个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首先热烈响应。继而全中央苏区广大工人都热烈响应。1933年8月2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载：“在创造工人师的动员工作中，首先是永丰县给了最实际的回答，一个动员，就完成了永丰县应有的数量而且超过。继着是胜利，于都，博生，兴国，瑞金，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超过了大会决

定的数字。”① 潘汉年在《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一文中，曾欣喜地写道：“在这两个师的动员工作中，更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勇的领导作用。在胜利县的平安区，区工会领导了全区的工会会员加入红军，万泰一个雇农领导了三十余个贫农自动的加入红军，还有一个工会会员组织了八十余个贫农与中农加入红军。”②

1933 年 8 月 1 日，红军工人师在瑞金城南竹马岗广场宣告成立。全师共一万二千六百余人，编成三个正规团、一个补充团。成立时由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长梁广担任师长兼师政治委员，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该师在瑞金接受军训并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故又称“中央警卫师”。1934 年 2 月 18 日，红军工人师改番号为红军第二十三师，编入红军西方军序列。此时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周桓。红军工人师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工人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受到红军西方军司令员陈毅的赞扬。1934 年 9 月 21 日，该师与红军第二十一师合编，成立红军第八军团。

（五）中央教导师

1934 年 7 月在瑞金高围成立。由瑞金、宁都、会昌等县地方武装组成。辖第一、二、三团及师直属队七百余人。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李熙，特派员斐周玉。其任务是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受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该师组建不久，即编入红军野战军参加长征。1934 年 12 月 23 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该师番号，所部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

---

① 《工人师怎样成立的?》，《红色中华》第 104 期第 2 版，1933 年 8 月 22 日。

② 《斗争》第 24 期，1933 年 8 月 29 日。

（六）国家政治保卫大队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虽不属于红一方面军序列，亦不受中革军委直接领导，而是受苏维埃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与指挥，但其前身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大队。1931 年六七月间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成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大队遂改称为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政治保卫大队，由吴烈任大队长，海景洲任大队政治委员。政治保卫大队直接受政治保卫处处长王稼祥领导。其任务“主要是保卫苏区中央局、总前委、总司令部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同时还担任无线电台队的警卫任务”①。一苏大会召开期间，政治保卫大队圆满地完成了一苏大会各项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原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大队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大队（简称“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仍由吴烈任大队长，马竹林任政治委员（原政治委员海景洲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工作）。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下辖三个队：第一队队长杨敬光，指导员李亚古；第二队队长吕玉山，指导员刘得明；第三队队长石承仁，指导员孙守廷。全大队共四百余人，每个队一百二十余人。官兵中“多数是老战士、战斗骨干，党团员较多，政治质量很好，有战斗经验。武器装备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中，挑选出比较好的步枪和德国造的冲锋枪、轻机枪配备起来的，武器装备比较好，具有较强的战斗力”②。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1933 年冬，国家政治保卫局增加了一个政治保卫大队，由江西省政治保卫局抽调来的一个保卫队和江西军区独立团抽调两个连组成，全大

① 吴烈：《峥嵘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8 页。

② 同上书，第 91 页。

队有三百七十余人。原大队改称国家政治保卫第一大队，仍由吴烈和马竹林分任大队长、大队政治委员；新增加的大队称国家政治保卫第二大队，卓雄任大队长，李焕章任大队政治委员。

1934 年夏秋间，国家政治保卫局将政治保卫大队扩编组建国家政治保卫团，姚喆任团长，张南生任团政治委员，孙毅任团参谋长。下辖三个营：原国家政治保卫第一大队改编为第一营，营长吴烈；原国家政治保卫第二大队改编为第二营；从江西军区所辖的几个独立团挑选了一批战斗骨干组成第三营。全团将近千人。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主要职责：一是担负驻瑞金的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项英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包括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安全保卫工作。二是负责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三是担负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案犯的逮捕、拘押及看守所、劳役队的警戒保卫任务。四是担负护送中央重要领导干部和重要物资通过地下交通线进出苏区的安全保卫任务。博古、张闻天、陈云以及李德等从上海前来瑞金时，自广东大埔至瑞金这段路程，就是由卓雄带领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的小分队负责护送的。五是担负临时战斗任务。六是长征前夕奉命对红军野战军在赣南省于都县、登贤县的预定集结地域秘密侦察路线，清除安全隐患，严密封锁消息。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团在长征途中完成遵义会议警卫任务后，奉命缩编为政治保卫大队，下辖三个连。长征到达陕北后，改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1937 年 4 月在延安改编为中央军委警卫营，继续担负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任务。

第四节 中央苏区地方红军

中央苏区各县地方武装，从1931年夏开始组建红军独立师、团。1932年3月22日，江西军区政治部颁发了《江西地方武装暂行编制大纲》。大纲规定：各县现有脱产的红色警卫营、连、排和各种形式的游击队，一律取消，所有脱产地方武装一律编成独立团；全省建立南、北、中三个军，五至九个独立师和一个警卫师；各县独立团拨归就近活动的独立师指挥。此外，每县成立一个警卫连，负责县级红色政权的警卫。这些独立师、独立团、警卫连和赤卫军模范师、团、营、连及赤卫军、少先队，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地方革命武装体系。

从1931年夏至1933年春，中央苏区先后组建十余个红军独立师：

红军独立第四师：又称红军赣东独立师。1931年六七月间由宁都、广昌等县红色警卫营和部分游击队编成，龙普霖任师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7月，该师与红军独立第五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新编第二十二军。

红军独立第五师：又称红军永吉泰独立师。1931年6月组建，萧克任师长，毛泽覃兼任政治委员（未到职）。主要活动于永、吉、泰等县的赣江东岸地区。1932年7月与独立第四师一起编组成立新编红军第二十二军。

红军独立第六师：又称红军赣南独立师。1931年6月组建，由兴国独立团和于都独立团合编成立，师长李阶思（李介士）。1932年3月，该师编入红三军团第七军。

红军新编独立第六师：1932年3月由于都、胜利、赣县、信丰、南康等县的独立团和兴国游击队，分别改编为该师第一、

二、三、四、五、六团。黄达任师长兼政治委员。1932 年 7 月，该师与红军独立第三师合编为红军第二十一军。1932 年 12 月，中共于都中心县委根据江西军区指示，又将于都、赣县和信康县地方武装合编，组成新的红军独立第六师，隶属于江西军区第五作战分区指挥。

红军独立第二师：1931 年 10 月由于都、会昌、瑞金等县地方武装编成。师长龚楚，副政治委员邓飞（邓富连）。1932 年 3 月中旬编入红军独立第三师。

红军独立第三师：1931 年 10 月由红三十五军改编成立。师长邓毅刚。邓牺牲后，继任师长有王云桥、刘铁超、程子华、萧克等；政治委员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参谋长宋时轮。全师下辖八个团：红三十五军原有部队改编为第一、二、三、四团，会昌独立团为第五团，瑞金独立团为第六团，安远独立团为第七团，寻乌独立团为第八团。1932 年 7 月，该师与红军新编独立第六师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一军。

红军新编独立第三师：1932 年 8 月由留在地方的红军独立三师部分干部与寻乌、安远两县地方武装一起，在寻乌县吉潭组建红军新编独立第三师。师长蒋信才，政治委员罗贵波。隶属于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

红军新编独立第五师：1932 年 7 月，原红军独立第五师编入红二十一军后，又由乐安、宜黄、崇仁等县地方武装重新组建了红军新编独立第五师，师长谢唯俊，政治委员胡嘉宾。

红军独立第七师：1932 年 8 月以福建军区独立第五团为基础，加上宁化县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在宁化县城关成立。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范世英。1933 年 3 月在上杭县编入红军新十二军第三十四师。

红军新编独立第七师：1933 年 3 月在宁化县城关成立，由

宁化县地方武装和石城独立团组成。1933 年 11 月缩编为红军独立第七团。

红军独立第八师：1932 年 9 月由福建龙岩县独立团和永定县独立团合编成立。师长韩伟，后游端轩；政治委员简载文，后范世英。下辖三个团，隶属福建军区，活动于岩、永边境一带。1933 年 3 月，编入红十九军。

红军独立第九师：1932 年 11 月由福建长汀县独立团、连城县独立团在长汀县扩编成立。隶属福建军区。师长陈树湘，下辖两个团。1933 年 3 月编入红十九军。

赣南红军独立第九师：1931 年 9 月由上犹、崇义、南康等县地方武装合编成立，仅辖第四十三团，活动于上犹、崇义苏区。1932 年 5 月，该师第四十三团编入红三军团第七军第六十二团。

红军独立第十师：1932 年 12 月由福建武平县独立第二团和杭武独立团在武平县桃溪区小澜合编成立。隶属福建军区。师长张荣发，政治委员张平凯，政治部主任赖玉宏，参谋长王胜。下辖两个团。活动于杭武边界及武平县一带。1933 年初，与赣南独立第三师、红军学校学员队在宁化组成以叶剑英为总指挥的东南作战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1933 年 3 月编入红十九军。

红军独立第十二师：1932 年五六月间由上犹县独立团、崇义县独立团和湖南汝城、桂东及遂万赣游击队合编成立。隶属湘赣军区。师长叶长庚，政治委员魏桓。1933 年 2 月起，师长、政治委员分别由田海清、袁任远担任。全师辖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1932 年 11 月因作战失利缩编为两个团，另编成上犹、崇义和赣南（赣县、南康）三个游击大队，在崇、犹、遂等地进行游击战争。1933 年 6 月，该师编入红八军。

红军建黎泰独立师：1932 年 11 月，由建黎泰作战分区以建宁独立团、建泰独立团为主力，并将唐坊、容坊、里心、枧头一带游击队集中，在建宁县华美学校编成。师长周振国，政治委员余泽鸿。辖有独立第一、二、三、四团。1933 年 1 月 6 日，中革军委将随红军主力转战闽赣边的赣县独立团和兴国、胜利两县游击队，编入该师。1933 年 7 月，该师分别编入新组建的红七军团。

第五节　中央苏区地方群众武装

中央苏区的地方群众革命武装，包括赤卫队、模范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赤色警卫队等，构成苏区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和红军主力部队兵员的主要来源。

（一）赤卫队

最初创建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脱离生产。初期无统一编制，一般以乡或村为单位编成一队，也有的以县、区为单位组成一队或数队。队员男女都有，以 16—60 岁男性为主。

1931 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统一规定了赤卫队编制：每村编成数班或数排，每乡编一连或数连，每区编一团，每县编一师。排、连、营、团平时不设指挥机关，分别附设于村、乡、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

1932 年 9 月 20 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十五号训令，同年 12 月 20 日发出第一号密令，对苏区赤卫军的建制作出新规定，即：赤卫军每县成立一个军，每三个区成立一个师，每区成立一个团，每乡成立一个营，每营二至五个连，每连三个

排，每排三至五个班，每班十至十五人。赤卫军隶属于各军区指挥，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兼任赤卫军军长，党县委书记兼任政治委员。

赤卫军武器多系大刀、梭镖等，工余或农闲进行一般性军事训练。赤卫军的主要任务是担负支前作战、地方警戒、向红军部队输送兵员等任务。

（二）模范赤卫队

模范赤卫队是从赤卫军中抽调青壮年骨干组成的半脱产、有训练、有快枪、能调动远出的地方革命武装组织。1932 年 12 月以前，中央苏区各县只编有赤卫军模范营、连。1932 年 12 月后，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密令规定，每县都单独成立一个赤卫军模范师，每区成立一个模范营，每三个营编为一个模范团，每县三至五个团成立一个师。模范赤卫军的任务是：配合红军行动，支援红军作战；训练赤卫军的下级干部；为红军补充兵员。

根据临时中央政府指示，从 1932 年冬开始，中央苏区各县都相继组建了赤卫军模范师或模范团。中央苏区著名的模范师有：

兴国模范师：1932 年 9 月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密令在兴国县城郊筲箕窝组建，同年 11 月 7 日正式组建师部。辖五个团一个特务营，全师约七千人。其第一团辖高兴、上社、城市三个模范营，第二团辖沙龙、乐江、杰村三个模范营，第三团辖方太、崇贤、城冈、枫边四个模范营，第四团辖莲塘、鼎龙、东村三个模范营，第五团辖均村、茶园、永丰、黄塘四个模范营。1933 年红五月扩红突击运动中，该模范师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报名加入红军，带动全师集体报

名参加红军。5月底，全师报名参加红军的共5700余人。6月1日，兴国模范师精壮青年5161人集中在筲箕窝广场红军检阅台前，举行盛况空前的誓师出征大会。中央、省、红军各军团及江西军区领导机关代表和兴国县各界群众共三万五千余人，出席欢送大会。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代表中革军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正式成立。6月6日，该师从兴国县出发奔赴前线，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第六师。兴国模范师全师上前线的壮举，得到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界群众热烈赞扬。中共中央局、少共中央局给兴国模范师的贺电说这一壮举是“革命史上灿烂的一页”①；苏维埃中央政府称兴国模范师是“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②。

于都模范师：1933年春组建。师长陈桂，政治委员由中共于都中心县委书记李国盛兼任。1933年5月在兴国模范师带动下，全师一千九百余人集体报名，加入红军第二十三军。

胜利模范师：1932年冬组建。全师共2895人。师长钟圣翔。1933年5月，该师率先向兴国模范师学习，集体报名参加红军，组成“胜利师”。

瑞金模范师：1932年冬组建。全师三千余人。1933年5月，该师向兴国模范师学习，全师集体报名加入红军，与瑞金、永丰县其他自愿报名加入红军的一千三百余人一起，编入红军第一军团。

安远模范师：1932年9月，由全县各区的赤卫队、游击队、警卫连等合编组建。全师2878人。1933年9月，编入红军第二十二师，隶属粤赣军区指挥。

---

① 《红色中华》1933年5月17日。

② 同上。

（三）少先队

苏区时期的少先队，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是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下广大工农劳动青年的半军事性群众组织。其章程规定：凡苏区内年龄在16—23岁（有些地方规定14—23岁）的男女贫苦劳动青年，只要承认少先队章程，均可加入。

苏区少先队的任务是：团结广大青年施以政治军事训练，培养青年的革命热情并组织青年实际参加阶级斗争。

苏区少先队的组织系统为：中央总队部——省队部——县队部——区队部——乡队部（或工厂、街道队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为王盛荣（后由张爱萍继任），党代表周恩来。

少先队要求队员服装尽量整齐，左臂佩戴臂章，每人配备梭镖一支。队礼为：右手握拳举至右耳。

因少先队队旗与赤卫队相同，所担负的任务也大致与赤卫队相同，所以赤卫队与少先队常常统称为赤少队或模范赤少队。中央苏区斗争后期，一般都称少先队为模范赤少队。

（四）游击队和赤色警卫队

赤卫队、少先队、模范赤卫队等是苏区最广泛、最普遍的群众性地方革命武装组织。在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各个时期，这些组织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武器装备差，训练较少，军事素质较差，战斗力不强。

苏区地方革命武装组织中战斗力相对较强的，是各地在不同时期组建起来的众多游击队、赤色警卫队和地方红军部队。仅赣西南苏区，从1927年冬至1930年夏，就曾先后组建了工农革命

军第三（赣西）、第五（万安）、第七（赣西东固）、第八（赣西）、第九（赣西延福）、第十五（于北区）、第十六（于北区）、第十九（安远）、第二十一（寻乌）、第二十六（信丰）等纵队和工农红军第二十（赣西）、第二十二（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第二十三（安远）、第二十四（瑞金）、第二十五（于北区）、第二十六（赣南河西）、第二十七（于北区）、第二十八（赣县）、第三十（赣东）等纵队；组建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和赣西红军第一、二大队等。还有各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的赤色警卫营、警卫连等。

在闽西地区，土地革命初期，也先后建立过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工农红军第三路军、闽西红军第五十八和五十九团、长汀独立第五团、长汀赤卫团、上杭县游击大队、上杭县独立团、上杭县赤卫团、龙岩后田游击队、龙岩县赤卫军大队、龙岩县赤卫团、永定溪南红军营、永定金丰游击队、永定县赤卫总队、永定县赤卫团、永定县游击总队、闽西工农红军连南游击队、闽西红军连城游击总部、连城赤卫独立四团、连城县赤卫团、宁化赤卫大队等。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对地方革命武装实行统一指挥，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号通告《地方武装的策略组织和工作路线》。要求各县农村除普遍组织以梭镖为主的赤卫队外，还要组织脱离生产的红军独立营、独立团和独立师，在城市组织红色警卫队；要求所有地方武装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1931 年三四月间，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专门召开苏维埃地方军事会议，讨论地方武装问题，通过了《地方武装的组织编制和军事训练决议案》。明确规定：地方武装分脱离生产与不脱离生产两种。凡地方游击队、红色警卫营（连）及

特务队，即是脱离生产的组织，是地方红军；赤卫队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的预备军。

根据这一规定，中央苏区各县从1931年春起都成立了脱产的红色警卫营、连。赤卫军组织也进行了整顿，并在整顿基础上设置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成立了各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之下，设置了东、南、西、北、中五路指挥部。1931年3月间，又在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之下重新设立九个区指挥部。第一区（东路）指挥部，指挥宁都、广昌、南丰、乐安四县赤卫军和红色警卫营（连）；第二区（中路）指挥部，指挥吉安、吉水之赣江东岸地方武装；第三区即永丰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指挥永丰县地方武装；第四区指挥部，由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代行指挥职权，负责指挥赖村、青塘江口、城岗、龙冈头等地方武装，主要任务是对付兴国之敌；第五区（西河区）指挥部，主要任务是扰截南雄与赣州之交通，截断蒋、蔡第十九路军后方联络线；第六区（东河区）指挥部，指挥赣南东河各县地方武装，主要任务是向赣州迫近，扰袭蒋、蔡第十九路军后方；第七区指挥部，指挥泰和、万安、遂川县地方武装，主要任务是监视赣江上游；第八区指挥部，指挥赣西及北路地方武装，并以红二十军为骨干，袭扰河西之敌，积极向吉安行动；第九区指挥部，指挥湘东南地方武装，以湘东独立师为主力，截扰由湘入赣之敌，迟缓其行动。

苏维埃中央军委交给以上九区地方武装的主要任务是：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地方武装在反“围剿”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组织上的严密性。

除上述地方革命武装组织外，中央苏区边境各县从1933年冬开始，还组织了数量不等的挺进游击队，经常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开展游击战争。

第十一章

中央苏区红军党的建设与政治工作

第一节　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南昌起义部队这支崭新的人民军队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置于党的领导指挥之下。1927 年 9 月湘赣边界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时，起义部队不仅接受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和指挥，而且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国民革命军”名义，将起义部队定名为“工农革命军”。起义受挫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南段进军，途中在永新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这次改编时，重新在部队建立了党组织，设立了党代表制度。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并第一次在班、排建立党的小组，在营、团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同时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随后，毛泽东还为红军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这就使红军开始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军队。

但是，由于受旧军队的影响，红四军内部有些人对于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原则和领导制度感到不习惯，甚至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由于红四军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居多，红四军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又有所放松，因此，1929 年春夏间，红四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产生，并在党内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内容，涉及党对红军领导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在 1929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上，经过陈毅等同志的努力，红四军党内的争论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对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1929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的任务，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工作上，特别中国现在的工作上，他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案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批评一些同志将军事政治二者对立起来：“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承认军事是政治的领导了。”决议案严肃指出：“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之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① 因此，决议案提出必须坚决反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01—802 页。

对单纯军事观点，坚决反对忽视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只愿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

为了确保红军的性质及宗旨、任务的实现，决议案明确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指出红军中“党的各种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计划及报告列于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为了实现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决议案除了再次规定红军中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和要求外，还特别指出，“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提出要“编制红军法规”，通过法规形式，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与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明白地规定下来。①

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的上述规定，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军队建设原理与中国红军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此后，我国的人民军队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为实现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壮丽篇章。

第二节　中央苏区红军党的组织系统

党在红军中建立严密而健全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党对红军领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02—804页。

导的物质保证。中国共产党从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建设人民自己的军队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由于认识及经验等方面的原因，军队中党组织的建立、发展，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及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中党的组织系统

“八一”南昌起义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建立了领导起义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在前委领导之下，起义部队各军、师都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称军委、师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有的连队也建立了党的支部。当时规定党组织的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①。在整个起义过程及起义军南征过程中，军中党组织发挥了重大作用。起义军南征到达瑞金时，中共前敌委员会吸收了贺龙、郭沫若、彭泽民等人入党，并帮助瑞金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组织。起义军在广东潮梅地区失败以后，10月间朱德、陈毅等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至赣南，10月底到达大余县。朱德、陈毅在大余对起义军进行整编，缩编为一个纵队，并对党、团组织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党、团员，全纵队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党、团员被分派到各连队充当骨干。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中共中央也任命了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起义受挫，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率领下退向农村，进军井冈。在永新三湾，毛泽东主持将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班排建立党

①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接着在营、团也建立了党委。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部队和湘南的农军到达宁冈，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 年 6 月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后，在军一级设立了党的委员会，称红四军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 月间，因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特委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此时除团、营分别设立团委、营委外，在军部还另建立党的特支，为军直党的组织。军委受边界特委指导。红四军出发游击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同级党委（军委或团委、营委）成员参加外，还吸收红军所到地方党部负责人参加。它除了领导红军本身的行动之外，“同时可以命令指挥当地群众机关，行委成了一又是党又是群众机关的一种权力组织”①。

1928 年 11 月 6 日依中央的指定成立中共井冈山前委后，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另于 11 月 14 日召开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②

二　开辟和创建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中党的组织系统

（一）红四军中党的组织

1929 年 1 月中旬，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进军赣南闽西，红四军前委随军行动。这期间，红四军处于敌军围追堵截之下，每日行军打仗，情况复杂，行动困难。2 月初，红四军到达赣南寻乌县罗福嶂山区。在此，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遂决议军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 年 9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7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 页。

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利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①]。“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主义的束缚”[②]，更便利于军队行动。1929 年 3 月中旬，红四军进占闽西长汀县城，将原来团、营、连的建制改为纵队、支队、大队建制，辖第一、二、三纵队。于是，原来的团委、营委随之改为纵队和支队党的委员会。军部特支不变，连党支部改称为大队党支部。大队之下中队、小队仍设党小组。

1929 年 3 月后，红四军得到发展。因“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③]。这是 1929 年 5 月间的事。6 月 8 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议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调任红四军第二纵队纵队长。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军党内对于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发生争论。6 月 22 日在福建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仍决定设军委。同年 9 月 28 日周恩来听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汇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信红四军前委，指示说：“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一般的可以不必设立营委，营部可以设立直属小组；一营单独行动时，可委托营的支部来指挥，但此点前委可斟酌采用。”[④] 中央的这一指示，切合红四军实际，因为既然成立了红四军前委，在军部再设立军委组织，就显得重复了，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而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84 页。

② 同上书，第 773 页。

③ 同上书，第 684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0 页。

红四军前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包办代替毛病，所以中央指示信中也要求前委予以改正。根据中央指示，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便撤销了军委组织，但保留了纵队和支队党委。军部和纵队部的直属队，分别成立党的委员会，为直属队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至七人。

1930 年 2 月在“二七”联席会议上，因成立了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红四军再次成立了军党委，由军党委领导全军党的工作。军委书记潘心源（未到职）；军委委员有朱德、潘心源、林彪、熊寿祺、伍中豪等和士兵同志数人。

（二）红五军中党的组织

红五军是 1928 年在湖南平江起义成立的。起义后，红五军也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同年 10 月，成立军党委，由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任军党委书记。1928 年 12 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两军合编，红五军改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红五军军委随之取消。1929 年 1 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游击后，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月底，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突围，也到赣南游击，4 月初与红四军在瑞金城再次会合。接着，红五军一部与湘赣边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四军第六纵队；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另一部与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合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彭德怀仍任红四军副军长（对内为中共湘赣边军委书记），指挥这两个纵队。1929 年 5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返回井冈山，恢复红五军番号，滕代远仍任军党委书记。1930 年 6 月，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组建红三军团，同时成立中共红三军团前委，由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兼任前委书记。红三军团所辖红五军、红八军分别成立党的军委。

（三）红六军、红三十五军等部队中党的组织

红六军成立时，同时成立了中共红六军军委，刘士奇兼任军委书记。1930年2月“二七”联席会议后，中共红六军军委由黄公略、陈毅、王如痴、罗炳辉、曾炳春、柯武东、李韶九及士兵姚起华等组成，常委为陈毅、黄公略、王如痴和两名士兵（姓名未详），陈毅任书记。1930年6月后，陈毅调红二十二军任军长，改由黄公略任军委书记。1930年7月，红六军编入红一军团，并改称红三军，军委书记仍由黄公略担任。

红三十五军成立时，也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三十五军军委，书记罗贵波，常委有罗贵波、邓毅刚、谢家禧、商辑五、曾方春等人。

此外，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和闽西成立的新老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等红军部队，均成立党的军委。军以下各纵队、各支队，也都成立了党的纵队委、支队委等组织。1930年8月以后，中央苏区各红军部队都先后将纵队、支队建制改设为师、团、营、连建制。军中党组织也随之改称师、团、营党委，连设支部。红军的这一党的组织系统，一直沿用至1931年冬。

三 1932年以后红军中党的组织系统

1930年冬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对红军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作了调整，明确指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这就是说，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是党在红军中的代表，负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红军中

的贯彻执行，负责党交给红军的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这样，就取消了红军中的党委制。但是，红军中党内有些问题，如接收与处罚党员、解决党内纠纷等，仍必须根据党章规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解决。这是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无法完成的。因此，《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在红军中的军团、军、师、军区及独立军、师政治部内，另设党务委员会。各级党务委员会由红军各级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如果在军事行动时期不能召集党员代表大会，则可由上级党部指定。各军团、军区和军的党务委员会，由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三人组成，师（含独立师）由委员五人、候补委员二人组成。《条例》对各级党务委员会委员的党龄，作了严格规定。

党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党章的规定接收党员和处罚党员，解决党内纠纷（如党内发生不团结现象、党员申诉等）。党务委员会不负责党员调动手续，对党员的政治宣传教育，也不单独负责，这些都由各级政治机关办理。同时，党务委员会不单独设立工作机构，有关工作由本级政治机关的相应工作部门办理。但是，各级党务委员会需推举一负责书记，其职责为：执行本级或上级党务委员会的决定；负责准备党务委员会开会所需要材料；审查各种文件；召集有关会议，作党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各级党务委员会可参加同级政治机关召开的会议，以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党员的思想状况，协助政治机关做好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红军中的团一级，按《条例》规定，不设党务委员会，而成立团党总支部委员会（简称“团委”）。团委由团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设书记一人，组织、宣传各一人。团委负责全团的党务工作，并指导各连党支部的工作。团委书记不需由团政治委员担任。红军中营一级一般不单独成立党支部。营部的党员就近

参加连支部。

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1931 年 11 月初召开的苏区党代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中，正式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负责制。由于将政治委员作为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不适当地突出强调了个人的作用，而否定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因此这一决定作出后，受到红军中指战员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部队虽然取消了党委制，但仍继续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

1931 年 12 月以后，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督促下，红军各部队陆续成立了各级党务委员会和团党总支部。红一方面军党务委员会也于 1933 年 1 月成立，由朱德、林彪、王稼祥、蔡树藩、袁国平、刘伯坚、乐少华、陈阿金等为委员，袁国平任书记。1933 年 7 月袁国平调离后，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兼任党务委员会书记。

四 红军中的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

由于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因而红军中的党组织与地方的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

红军中党的组织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有一个演变过程。

1931 年冬以前，红军根据毛泽东的建军原则，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在瑞金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曾说：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其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

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1：10。[①] 因为红军担负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根据地的繁重任务，因此，红军中的党组织与红军所到地方的党组织，互相间都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种关系，在1930年3月18日于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出的《前委通告第三号》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它的工作，但在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它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行使指导的职权。"[②]

前委还特别强调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以提高红军工作的效力。前委所作的这一明确规定，非常切合当时根据地斗争的实际，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据地建设作出的又一贡献。

1930年底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对红军中党组织（政治机关）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相互指导关系，改为相互"协商"关系。为了使红军中党的领导机关与地方党组织更好地互相"协商"工作，《条

---

① 《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② 《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4页。

例》规定：在组织上，红军中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可做地方党部委员，如军区政治部主任可参加省委（特别区委）；军团、军和师政治机关主任可参加省委县委和市委；团以下各级政治机关主任亦照此类推。在“协商”手续上，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可将自己的工作计划和训令，交同级地方党委征求意见；地方各级党委也可将自己的工作计划等，交同级红军政治机关征求意见；对于上级机关布置下来的工作任务，如涉及地方党部和红军政治机关，可共同研究贯彻落实办法；红军中接收或处罚党员，须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党员统计，红军和地方分别进行。

中共中央在《条例》中规定的这种相互“协商”的关系，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是不甚相符的。因为它只考虑到红军以打仗为主这一方面，而忽略了红军还须担负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等项任务。

第三节 中央苏区红军党员队伍与基层党支部建设

一 红军部队党员队伍建设

据红四军前委1929年5月统计，全军约有5400人，其中有党员1329人。至1932年7月底，红一方面军党员人数为9749人。1933年9月统计，“党团员占全体战士45.5%”，“军事指挥员中党团员占55.1%”[①]，以当时全方面军10万人计，党员人数当在1.5万人以上。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红四军在发展党员时，曾一度出现忽视党员质量的现象，“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

① 贺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

就弄得很差了”[①]。这个问题引起了前委书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决定，要对“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或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②]。决议案明确提出：“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1.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 忠实；3.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 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入党。”[③] 这五个条件，既坚持了党章要求，又切合当时实际情况。此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红军中发展党员，基本上都坚持了这些条件，实行了严格要求。

红军部队的基层党支部在1930年底以前，虽然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红军部队党员的身份至1931年初才公开），但在发展党员时始终比较认真地按照党章规定履行发展党员的手续。1929年7月1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中，在“怎样介绍同志”一节中，就明确要求介绍人一定要选择符合条件的人作为介绍对象。选择好介绍对象后，即要对其考察。考察内容包括：“从他的家庭经济背景，考察是否有革命之需要。”“从他平时做事待人，看他是否忠实可靠。”“从斗争中看他是否勇敢不怕得罪人。”“从他的交友中或反对者，各方面看他是否好人。”“从他谈话中看他能否守秘密。”“从他的脾气上看他是否会服从。”“从他平常看书上看他的思想是否革命。”经过严格考察之后，若基本符合入党条件，即由党小组指定同志和他谈话，了解他对入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入党目的；然后在

---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1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813页。

小组会报告谈话结果，介绍被考察对象的家庭状况、社会地位、谋生行为等基本情况；党小组如果认为其具备了入党条件，再由党小组长找其正式谈话，向其说明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以及秘密常识等，但不能将党内负责同志姓名、党内组织状况及机关地址告诉他。最后，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新党员经支部大会通过入党后，即被编入特别小组加以特别训练。

新党员有候补期。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党的“六大”以后，新党员候补期作了调整。1931 年 2 月 20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的《几个组织问题》第十二号通知规定：“产业工人雇农手工工人入党，没有候补期。”“贫农入党候补期为两个月。”“独立劳动者（即做手艺的）、中农以及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入党候补期为六个月。”“不属于上列三项的社会出身者，入党候补期可以按照特殊情形延长到一年或两年。”红军部队都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个候补期规定。

由于红军部队在发展党员时都认真地执行党章规定，履行入党手续，坚持了党员入党条件，同时切实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确保党员思想合格，因此不论党员阶级出身如何，革命觉悟都比较高，从组织上保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二 红军基层党组织建设

红军中的基层党支部，是连队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是红军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陈毅对这一点认识也非常深刻。他说：“连上成立支部的作用非常大，因每一连可以担任一方面的任务，一个支部恰可以应付这个任务，连支部的精神，在‘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上，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

力量也寄托在上面。”① 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更加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29 年 12 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② 对红军连队中党小组的编制方法和活动方法，也作出了明确规定。红军总政治部也一再明确指出：红军中的“连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③“是党与群众的连环”④，“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必须凭借着支部的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⑤。

为了帮助连队基层党支部的同志更好地了解、掌握支部工作的原则、方法，以适应加强支部建设的需要，1929 年 7 月 13 日，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写了一份《党员训练大纲——支部工作》。这是红军中最先制定的关于党支部工作的条例性文件。其内容包括 20 个问题：1. 党的组织原则；2. 支部的意义；3. 支部的组织与党员；4. 支委会的组织与责任（即干事会）；5. 支部书记的责任；6. 出席人的责任；7. 支部与上级机关的关系；8. 党团作用；9. 怎样编组；10. 怎样当组长；11. 怎样当主席；12. 怎样做记录；13. 怎样作报告；14. 怎样开会；15. 怎样批评同志；16. 怎样介绍同志；17. 宣传须知；18. 分工原则；

---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 年 9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74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11 页。

③ 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件《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1932 年 9 月 21 日）。

④ 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件《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1932 年 1 月 19 日）。

⑤ 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件《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1932 年 9 月 21 日）。

19. 技术工作；20. 几个错误观念。上述20个问题，几乎包括支部工作的各个方面。它对于加强红军中党支部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后来，红军中的政治机关不断总结红军中支部工作经验，逐渐形成了红军中党支部建设的一套较为完整的条例、法规。1932年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就红军中支部工作问题，向各级政治部、政治委员、支部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对支部工作提出了详细要求。紧接着，红军总政治部在1932年初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暂行工作条例》。同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又编写了专供红军中用的“支部工作纲要”。这些条例、纲要，尽管在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但它们在指导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切实加强了连队基层党组织建设，红军中的每一个党支部，都是坚强的战斗堡垒。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第60期（1934年8月20日出版）刊登的红三军团供给部政委吴溉之撰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九连党支部事迹，可以说是红军基层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缩影：“党团员在群众中，每做一件工作均能以身作则，做群众的模范。如慰劳新战士，党团员领导大家一天一晚打了一百多双草鞋。行军中有人病了，每个党团员都能自动地替病员背枪、背包袱，弄稀饭给病兵吃。一排在山上做工事，其他两个排的党团员能够领导大家送水给山上的人洗脚。在军事政治学习上，党团员能耐心教育其他同志。炊事班给养员中的党团员们都很负责，在这次行军中，粮食缺乏，各连都有一两天没有干饭吃了，但他们没有中断粮食茶水的供应，每天都烧水让大家洗脚洗澡，并且自动减饷，借了米给友军。群众中有个别表现不好的，党团员都能耐心地对他谈话教育。……党在群众中威信很好，群众对党团员很尊敬，不懂的问

题，愿问党团员。班排中出现犯错误的同志，支部书记能找这些同志谈话，纠正他们的错误。连长指导员工作方面有错误时，支委亦能建议他们纠正。一般干部能在党的组织力量之下，纠正他们的错误与缺点。……支部对战斗的领导非常注意，每次战前都能开五分钟的支部大会或小组会，进行党内动员；领导‘十人团’开会，讨论战时防止逃亡与肃反工作；鼓舞战斗员负轻伤不下火线，负重伤不哭；订立缴枪比赛条约等。在作战时，根据不同的任务与环境，党的组长及党团员更有具体的领导。如在广昌战斗中他们守备最顽强，党的支书、支委、组长分配哪个党员喊口号，哪个进行瓦解白军宣传，都各尽其责。当敌人飞机打炸弹，打大炮时，党团员鼓动大家沉着应战，不论敌人冲来到什么地方，不论打枪打炸弹多么厉害，在党的领导下，都能坚持顽强抗战。在突击时，能进行紧急动员，并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在战斗结束后的支部会上，有政治工作总结，对动摇怕死及有违犯纪律的人，能开展思想斗争。”

第四节　中央苏区红军青年工作

苏区青年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力量。少共苏区中央局 1931 年 7 月 14 日写给共青团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写道：“二次战争得到伟大光荣的胜利，这种胜利的获得，与青年有莫大的关系。青年的积极性，在这次战争中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战争爆发之前，地方武装和群众不休歇的与敌人战争，堵敌、扰敌、袭敌；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同样有广大群众的配合行动，这些群众有拿着枪的，土枪、土炮的，打着红旗的，和徒手的，最主要的是谁呢？青年！此外，对于战争有很大帮助的，如交通、侦探、看护、慰劳以及保护后方的勤务，如放哨、检查行人等等工作都是

谁做的呢？青年！在前方火线上，在后方的种种活动上，主要的是看到青年的活跃，奋勇。战争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青年都吸引去了。伟大的二次战争的胜利，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没有胜利。”①

历史证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没有胜利”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历史同样证明，做好红军中的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对于加强红军部队建设，提高红军战斗力，至关重要。

红军初创时期，对部队中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一度忽视。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指出：“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② 1930 年 3 月，毛泽东毅然将虽然年轻但富有青年工作经验的兴国县共青团县委书记萧华调入红四军，协助军政治委员罗荣桓专门负责军中青年工作，任红四军青年委员，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红军各级政治机关的青年工作机构也得到健全。1932 年 1 月 15 日至 20 日，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讨论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问题》等决议。决议强调红军中开展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意义，总结了以往红军中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经验教训，理顺了红军中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关系，以及青年工作与红军政治工作的关系，就是基层连队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列宁青年小组，发展青年团员，开展团的工作；营、团以上各级则在政治工作部门成立专门从事青年工作的青年部（或青年科），领导红军中的青年工作。红军军事学校中则建有团支部，隶属于学校政治部领导。

---

① 《苏区团中央局报告（第四号）》（1931 年 7 月 14 日），江西省共青团省委编《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7—308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15 页。

青年团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出席会议的红军代表，召开红军青年工作会议，制订了为期三个月的团员发展计划，并要求红军各军召开连以上青年委员会议，以师为单位召开团员大会，传达宣传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和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发展团员，促进青年团工作的开展。同时，总政治部和师以上各级政治部都增设青年工作部，团政治处设青年工作干事，负责指导部队的青年团和青年工作。总政治部编印了《战争与青年》、《反帝运动与青年》、《苏维埃与青年》、《共产青年团》等学习材料，供部队各级青年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学习。1932 年 3 月 17 日，总政治部决定在红军部队中普遍建立青年队组织，并发出《关于青年队组织与工作方法的指示》，指出："青年队是在部队中一般的文化、政治的教育工作之外，特别适合于青年心理方式的教育青年士兵，以提高青年士兵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的一种方式。"要求凡 23 岁以下富有朝气的年轻士兵都应编入青年队，营成立小队，团成立中队，师成立大队，进行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教育。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央红军青年团工作的开展。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青年部长萧华，为红军青年工作的蓬勃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五节　中央苏区红军干部教育

培养训练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对于任何军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工农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训练。

红军创建之初，主要是靠办红军随营学校、红军随营教导队等来培养红军初级指挥人员。朱毛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办有这类随营学校或教导队、教

导营。

1930年初，闽西红军和党组织在龙岩创办的闽西红军学校，是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的红军正规学校。该校校长谭希林，政治委员邓子恢。招生200人，学习4个月毕业。不久，该校改为福建红军学校，由中共中央军委负责办理。1930年5月中旬，该校又改名为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招生800名。校长蔡申熙（未到职），后为贺沉洋，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校务委员会主席李中沸，军事教官谭希林。1930年冬，该军校又改名为红军彭杨（为纪念彭湃、杨殷两烈士）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张鼎丞兼任政治委员。校址由龙岩县大池迁至永定县虎岗。该校一年中招生2期，共1000人。

1930年4月，红四军在江西吉安县富田区创办了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朱德、毛泽东分别兼任校长、政治委员，陈奇涵任教育长，陈东日任校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后，由李文林任校长兼政治委员，金万邦任校党委书记，陈伯钧任学生总队政治委员。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三分校迁到赣江西岸，1931年春与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合并。

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军政治委员邱达三）创建后，也于1930年8月在信丰县犀牛（今信丰县西牛）创办了一所红军学校，陈毅兼任校长，培训该军军政干部。

1931年冬，中革军委决定以闽西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初设瑞金城东谢氏祠堂。萧劲光、何长工（代）、刘伯承、叶剑英先后任校长，周以栗、刘伯承（兼）、叶剑英（兼）先后任校政治委员，周以栗（兼）、刘伯坚、刘畴西、欧阳钦等先后任校政治部主任。1932年夏，该校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从开办至1933年秋，共招生6期，培养各级红

军军政干部6000余人。其中：

第一期：1个政治连，1个工兵连，3个军事连。军事第一连连长龙云，政治指导员张华；军事第二连连长彭绍辉，政治指导员石衡中；军事第三连连长粟裕，政治指导员刘西平；政治第四连连长林野（兼），政治指导员伍修权；工兵连连长胡国杰。军政学员共600人，教职员、勤杂人员约200人。学习时间3个月。

第二期：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校政治部主任刘畴西（后欧阳钦），校训练处长林野，校务处长杨至诚，校供给处长钟禧。这一期共有学员1500人，下设1个高级研究班、1个工兵连、1个炮兵连、2个军事营、1个政治营。高级研究班学员48人，培养团、营两级干部，学员均为优秀的连长、独立营营长、小团团长及部分参谋人员。高级研究班班主任为唐庆云（原红三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长），主要专职军事教员有郭化若、钟伟剑，专职炮兵教员武亭（朝鲜族），政治教员吴亮平，兼职政治教员有刘畴西、欧阳钦、张如心、危拱之等。军事营培养目标是连、排级干部；政治营培养目标是连政治指导员、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

第三期、第四期：各招生2000人。这两期的校长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欧阳钦，训练处长林野，校务处长杨至诚。下设1个学员军事团、1个政治营、1个工兵连、1个炮兵连。学员军事团3个营共1200余人，团长张锡龙（后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政治营4个连共约500人，营长陈伯钧，政治委员葛耀山（第一任）、伍修权（第二任）、黄火青（第三任）；校训育主任周子昆。军事教员有左权、苏进、边章伍、韩振纪、赵志奇、鲍德心、张子承、吴子罕、卢寿椿、孙毅；工兵教员谭希林；专、兼职政治教员有张如心、吴亮平、危拱之、刘畴西、

欧阳钦、刘西平、黄火青、伍修权等；专、兼职文化教员有刘月华（台湾同胞）、沈已庚、施英、施月娥、铁轮、崔音波（朝鲜族）；专、兼职文艺工作者有危拱之、李伯钊、张爱萍、张欣、蒋耀德、赵品三、石联星。第三期于1932年秋末结业，第四期于1932年冬初开学。

第五期：编制与第四期同，但增加1个上级干部队，队长卢寿椿，政治委员董必武，政治处主任张如心，负责训练师、团两级干部。1933年夏增加1个五期团，团长钟伟剑，政治委员伍修权，副团长苏进。1933年夏末秋初增办六期团，团长卢寿椿；同时办1个特科营，辖1个工兵连、1个炮兵连、1个重机枪连。①

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第六期学员为基础，扩编为5所学校：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其中红军大学为高等军事学校，其余4所为专科军事学校。

红军大学：又称红军郝西史大学（纪念苏联红军将领郝西史），由原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上级干部队为基础扩编成立，校址设在瑞金大埠乡。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何长工。1934年2月，何长工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周昆代理校长，徐梦秋代理政治委员。1934年6月，张宗逊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9月彭雪枫任校政治委员。校政治部主任徐梦秋，教育长周昆，校务部长杨至诚。红军大学下设4个科：高级科——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彭雪枫，负责培训师、军、军区以上的军政干部；上级指挥科——科长卢寿椿，负责培训团、营

① 刘少卿：《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的光辉历程》，《革命回忆录》第18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长；上级参谋科——科长苏进，负责培训团、师、军参谋长；上级政治科——负责培训团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宋任穷、程子华、李天柱、唐亮、刘道生、曹里怀、苏静等，都曾是红大学员。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主要课程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步兵战斗条例、野战条例、军事基本知识、射击刺杀技术等。红军大学专职教员有萧劲光、周士第等，兼职教员有瞿秋白、刘伯承、贺昌、李弼庭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董必武、刘伯承、贺昌等，都曾到红军大学作报告或讲课。红军大学先后共办4期，每期200人。第四期未毕业即编为红军野战军干部团上级干部大队，于1934年10月随野战军参加长征。

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又称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址设瑞金县九堡，以原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学员为基础扩编而成。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先后为刘西平（刘希平）、宋任穷，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下设2个军事营、1个政治营、1个参谋营，主要训练连、排级干部。共办3期，第三期于1934年10月编入红军野战军长征。

红军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取此校名，又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由原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学员扩编成立。校址设于都县城昌村小学。校长林野，政治委员先后为陈铁生、张际春、李方远，训练部长韩振纪。主要培养连、排级干部。最后一期学员1934年10月随红军野战军长征。

红军特科学校：1933年10月由原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特科营扩编而成立。校址设瑞金武阳镇。校长胡国杰，后由武亭继任，政治委员袁血卒。下设机枪营、工兵营、炮兵营。最后一期学员随红军野战军长征。

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1933年10月由原中国工农红军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扩编成立。校长初为滕代远，后为刘海云，政治委员张灵。主要训练区、县以上地方独立团、赤卫军、少先队的指挥人员。该校在红军野战军突围长征后仍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办学，培训留守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

此外，在中央苏区还办有红军无线电学校和红军军医学校。

红军无线电学校：1931 年 12 月创办，校址设瑞金叶坪。该校前后共办 6 期，每期 30 余人。1933 年 3 月，该校改称为红军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政治委员曾三。下设无线电、电话、旗语、司号等通信专业，另设有机务人员训练班。1934 年 10 月，该校学员编入红军野战军长征。

红军军医学校：1932 年 2 月创办，校址初设于都县城天主堂，后迁至兴国县茶岭，1933 年 8 月迁回瑞金，改为红军卫生学校。

上述红军学校自 1931 年冬至 1934 年秋，共为红军部队培养各级各类军政干部万余人。他们之中除牺牲者外，绝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和指挥人员。

第六节　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工作

自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工作。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有了发展。“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党开始创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在起义军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建立了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开展了军内外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严肃军纪、爱护人民的要求，鼓励将士奋勇杀敌。

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

领导下，党在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开始创立。不仅在军中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还在连以上各级设立了党代表，在军、师、团各级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毛泽东亲自为红军规定了三大任务，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宗旨；制定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了连队士兵委员会，做到官兵一致，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还废除了打骂士兵等军阀作风，制定了以瓦解敌军为目的的正确的俘虏政策等；红军中的对内对外宣传工作很活跃，除政治工作机关外，还专门建立了宣传队，配置了宣传人员。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下山后，在开辟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中，虽然受到军中党内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但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井冈山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经验。

1929 年 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建军两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所作出的决议案，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其基本的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坚强的人民军队。决议案除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外，还详细规定了对部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和方法，确定了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发展了红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同时对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这些重要原则的确立，为后来红军政治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田会议的召开，使红军政治工作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古田会议后，红军各部队兴起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萧克将军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这段时间由于战局紧张，加上沿途

都有反动武装的骚乱和抵抗，所以不能很好地驻下来学习红四军古田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只好边行军边贯彻会议精神。这次在广昌①，纵队抓紧时间召开了纵队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肃清部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把红军建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并按照决议检查纵队存在的问题。会上根据‘决议’精神，对一纵队一支队的队长，违犯党的工商政策，没收广昌县城一家商人的东西，进行政策教育和严肃批评，并决定他停职反省一个月，并说明为什么不能没收，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的理由。我们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通过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军队的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得到了逐步克服，如打骂士兵的现象少了，枪毙逃兵的事没有了。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大家都能以决议为准则，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红军每到一处，对工商业者按苏区税则合理征收，所以市面情况良好，商人安心做生意。”② 毛泽东在1930年春、夏领导红四军赣南分兵游击期间，又多次就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向红军政治工作干部发表讲话，进行了系统阐述。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期间，根据战争的特点和要求，红军的政治工作，在战前和战斗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团结友爱精神、巩固部队防止非战斗减员、动员根据地群众参战支前、瓦解敌军等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1930年冬，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

---

① 古田会议结束以后，红四军一、三、四纵队即由朱德率领离开闽西进军赣西南。1930年1月16日攻占广昌县城，接着在广昌开展群众工作。

② 萧克：《在广昌路上》（于都县博物馆藏访问记录稿）。

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包括总则、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团政治处、师政治部、军区及军政治部、总政治部、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党务委员会、共青团、红军政治机关及党与地方党部关系等具体条例。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直到1931年春才送达中央苏区。由于反“围剿”战争紧张，条例的一些具体规定当时未在红军中及时贯彻执行。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2月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后，这些条例才在红军部队中正式实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依据《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于1932年先后制定发布了《政治工作与政治部》、《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红军中政治工作会议规划》、《红军抚恤条例》、《关于红军支部工作的指示信》等，对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作出规定。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是参照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经验而制定的，尽管在一些方面照抄照搬了苏联红军的做法，但它的制定、颁布和实行，不仅使红军的政治工作步入系统化、条理化发展阶段，而且还使全国各苏区红军政治工作原则、制度、方法和要求得到了统一。

第七节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为了总结中国工农红军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讨论研究红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方法等问题，提高红军政治工作水平，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总政治部在瑞金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258人。其中：方面军2人；每军团

政治部2人；每师5人（其中须有党支部书记1人、总支书记1人、连指导员1人、团政治委员或政治处主任1人）；独立师每师2人（内须有党支部书记1人）；独立团营1人（政委或政治主任）；军区和军分区政治部各2人（政委及政治部主任至少1人到会）；挺进游击队各1人，军区政治部各另指定4个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或党支部书记参会，军分区政治部各指定4个县赤卫军及10区乡赤卫军政治委员到会；少先队中央总队部2人，并指定10个县区乡党代表到会。

会议于2月7日下午5时在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分别向大会致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作关于五中全会的报告，王稼祥作政治工作报告，李卓然作政治工作副报告（战时政治工作报告），朱德、陈云、顾作霖、凯丰等分别演说，袁国平、李翔梧、贺昌等发言。2月12日下午，周恩来作关于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演说，接着王稼祥作会议结论，贺昌致闭幕词。大会胜利闭幕。

这次会议继承了古田会议的基本精神，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会议系统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红军的一切政治工作应该为着战争，为着红军最大的胜利，为着提高红军指战员的军政素养，反对政治工作脱离作战实际的现象。因此，要改善政治工作的方法，要去掉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刻板的工作方式，将政治工作做得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从而使红军政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当时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后来进一步促进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十二章

中央苏区的战争动员工作

第一节　战争动员体制与法规建设

一　战争动员体制

追溯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自从发生了战争，战争动员（亦称国防动员）也就相伴而生。战争动员准备与实施也就成为具有特定目的、内容和方法的自觉的军事实践活动。战争动员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存亡。

战争动员领导机构的出现，是战争动员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建立和健全战争动员的领导体制，才能确保战争动员工作的实施。

中央苏区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建立革命战争动员体制的重要意义，在不同的斗争时期，根据革命斗争的特点和红军战争的需要，建立起符合根据地实际和适应红军作战需要的战争动员体制。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于建立了中央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和战地委员会等组织，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战争动员体系更趋健全和完善，在巩固、保卫根据地的战争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根据地初创时期，即从 1927 年冬至 1930 年 10 月，无论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战争动员工作，都是在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统一领导下，政权机关和各群众团体共同参加进行的。

1930年10月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攻占吉安城，10月7日宣告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也在这时正式决定以江西的赣西南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为基础，建立中央苏维埃区域。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调集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从此时至1930年12月上旬，江西苏区（亦即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紧张动员工作。这些动员工作，是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统一领导下，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省苏维埃政府和地方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具体进行的。

1930年12月12日，因赣西南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导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瘫痪，无法开展工作，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前动员工作，就改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直接承担。

1931年1月3日，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1月15日，统一领导全国各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在宁都县小布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撤销。从此时起至同年5月，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动员工作，就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进行。

1931年5月2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南团村召开会议，决定苏区中央局留驻后方，主要指导地方工作；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从此时起至同年11月，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和战地一切工作由临时总前委负责领导，后方的战争动员工作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负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的战

争动员体制在不同的阶段而有所不同。

1931 年 12 月至 1932 年 6 月，战争动员由中共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共同负责。

1932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瑞金会议，着重研究战争动员问题。鉴于此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随军在前方，为便于后方战争动员工作的开展，会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央劳动与战争委员会（简称中央劳战委员会）。该委员会隶属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是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个临时机构。以周恩来（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邓发（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子恢（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五人组成，主席周恩来。其任务是统一领导经济、政治、劳动等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劳战委员会作出关于战争动员方面的决策后，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分头贯彻执行。

1933 年 6 月，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从前方迁回瑞金。中央劳战委员会遂撤销。从这时起，整个苏区的战争动员工作，即在中共中央局（1934 年 1 月后为中共中央）领导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共同负责。中革军委除原先已经建立的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后方办事处、抚恤委员会总会外，还于 1933 年夏新成立总动员武装部，由杨岳彬任部长（后改为滕代远任部长、金维映任副部长），专门负责中央苏区的扩红动员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也成立动员部，罗荣桓任部长，专门负责红军的兵员动员工作。

为便于动员和组织战区及其附近的工农群众支前作战，1933 年 2 月，根据中央劳战委员会决定，在苏区各县成立战地工作委

员会。该组织初为县一级临时机构。下设运输、粮食、战场清扫、伤兵收容、俘虏管理、交通、经济、宣传、文书九个股。办公地点随战场移动。非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不脱产。各县战委会受各军区及战区红军部队最高政治机关双重指挥。1934年5月后，在闽赣省、粤赣省和赣南军区所在地域，亦先后成立了闽赣、粤赣、赣南三个省级战地工作委员会。它们由各省党政军及群众团体负责人组成，实际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关。红军主力长征后，各地战委会即停止工作。

1934年6月开始，因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严峻，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转移的秘密动员和准备工作，是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直到1934年9月，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才介入突围转移的政治动员和军事、后勤的动员和准备工作。

二 战争动员法规建设

随着战争动员涉及面越来越广，战争动员的活动更趋于正规和严密，因而迫切需要以法律来保证战争动员的有效实施。

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战争动员的法规，主要是由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以通知、决议、通告等形式发布。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使战争动员工作能更好地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渐注重有关法规的建设，围绕不同时期的战争动员任务，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战争动员的法律、法规和其他形式的文告。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行委分别发布了《紧急通令秘字第一号——迅速集中经济节省费用应付阶级决战》、《紧急通告秘字第一号——

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1930 年 11 月 20 日）、《通告财字第二号——筹集现金准备给养节省经费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江西省行委通告第十一号——加紧团的工作，号召广大青年群众实行阶级决战与团目前的工作》、《紧急通告妇字第一号——在阶级决战中妇女应做好的工作》、《紧急通告第一号——迅速组织侦探队灵敏消息》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的《宣传动员令》七个主要文告。这些文告对苏区各级党和政府及各群众团体在反“围剿”期间的任务、应做的主要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期间，苏维埃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先后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一号通令》、《红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第四号——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三个文告。要求各红军部队和各县、区、乡、村，各级都要召开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深入进行政治动员，鼓舞斗志，明确任务；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要热烈慰劳红军；要做好瓦解白军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当时情况的财政经济政策。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先后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特别紧急通知（动员准备三次战争问题）》（1931 年 7 月 4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第一号——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准备工作》、《红一方面军训令——战时勤务分工分段负责问题》三个主要文告。这些文告分析了敌我形势，阐述了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的紧迫任务和有利条件，明确了各地军民应做好的反“围剿”准备工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发出通告，要求苏区群众卖便宜米、菜给红军，支援

红军作战。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先后发布了四十余个关于战争动员的法律、法规、文告。内容包括：1. 关于成立战争动员组织；2. 关于战争的政治思想动员；3. 关于战争的后勤保障；4. 关于兵员动员；5. 关于支前动员，等等。其中关于优待红军及红军家属方面，就先后颁布过七部法律、法规和条例。1932 年 9 月 20 日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对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当前在扩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今后扩红工作的要求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由于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较为注重战争动员的法规建设，及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战争动员的法规文告，使得苏区的战争动员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有力保障了战争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比如红军优待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就从法律上确保了红军家属的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开展。又如关于支前作战人员的调动与待遇条例的制定，也使支前参战人员减少了后顾之忧，使他们能踊跃支前，安心支前。

第二节 政治动员与兵员动员

一 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战争（国防）动员的首要工作。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战争的政治动员工作。它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做得十分出色。这方面的情况，在本书有关中央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及一些重要战役、战斗的章、节中，都有述及，在此不再赘述。

二　兵员动员

兵员动员是战争动员的最重要工作之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的兵员动员工作是不同的。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特别是苏区初创时期，红军的兵员补充，主要是通过建立和扩大地方革命武装，然后将地方武装升编为主力红军，从而使主力红军得到扩大和补充。与此同时，主力红军也常常直接从地方招募青壮年男子加入红军，使部队得到扩充。此外，对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给予优待，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动员并欢迎他们参加红军，也是红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除继续采取将地方武装集中升编为主力红军部队之外，扩大红军工作逐渐改为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根据地青年自愿加入红军。1933 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又开始由自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役制过渡，参加红军成为苏区青壮男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具体做法是：

（一）将地方武装升编为主力红军，使主力红军得到扩大补充

苏区时将地方革命武装升编为主力红军的具体方式有三种：

一是将地方革命武装成建制地直接编入主力红军部队。如 1928 年春赣南农民武装暴动后，创建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十六纵队，百余人。1929 年 4 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于都县返回井冈山途经信丰县时，将该纵队编为红五军特务大队。

二是将地方革命武装合编新组建成立主力红军部队。如：1930 年 1 月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和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成立红军第六军（同年 8 月改称红军第三军）；1930 年 6 月将永新、吉安、安福、莲花、泰和等县赤卫队

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军；1930 年 7 月将赣南红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纵队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二军；1930 年 11 月将赣南各县地方武装集中合编，成立红军第三十五军，等等。1931 年春夏间，赣南苏区的地方武装，又先后集中合编，成立了红军独立第四、五、六师。1932 年夏秋间，独立第六师和由原红三十五军改编的独立第三师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一军；独立第四师和独立第五师合编成立红军新编第二十二军。

三是从地方武装中抽调部分人员补充主力部队。就是保留地方武装番号和编制，只从其中抽调一部分力量充实到主力红军部队。这种方式对地方武装建设影响较小。

（二）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苏区青壮年参加红军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苏区大规模地扩红运动，共有三次。

第一次大规模扩红运动：1931 年 12 月 2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扩大红军决议案》，要求 1932 年 1—3 月，在全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扩大红军运动，江西和闽西在三个月内要扩大红军 1.5 万人。1932 年 4 月 2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将当年 5 月定为“扩大红军突击月”，要求江西和闽西在一个月内要扩大红军 7000 名。同年 7 月和 10 月，中央苏区又先后两次开展扩红突击运动，并且在苏区县与县、省与省之间，掀起扩红竞赛热潮。1933 年初，全中央苏区又开始执行新的“扩红春季冲锋季”计划。从 1932 年春到 1933 年 2 月，全中央苏区共扩大红军 8.76 万人。

第二次大规模扩红运动：1933 年 2 月 8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随后，在中央苏区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扩红热潮。尤其是在 1933 年 5 月

“扩大红军冲锋月”期间，兴国模范师、胜利模范师等均先后整师整团加入红军。江西苏区全省仅5月份一个月，就扩大红军2.5万人。闽西苏区红五月也扩大红军约3000人。在此次扩红热潮中，最突出、最典型的是兴国模范师全体加入红军和苏区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创建。

第三次大规模扩红运动：从1933年9月到1934年9月，全中央苏区先后5次发动扩红突击运动。其中1934年5月至7月3个月的扩红突击，计划完成扩红5万名，实际1934年6月30日就已扩大红军62269名，仅60天就超额完成3个月的计划。据《红星》报报道，中央苏区从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15日止，一年内共扩红112105人。1934年9月，中央苏区在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前夕，又突击扩红18204名。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累计达33.1万余人。这13个县苏区人口和参加红军人数如下：

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0000人，参加红军49000人；

兴国县：苏区总人口231826人，参加红军55000人；

宁都县：苏区总人口273652人，参加红军56304人；

于都县：苏区总人口343330人，参加红军67709人；

赣　县：苏区总人口159164人，参加红军11107人；

会昌县：苏区总人口240000人，参加红军38600人；

石城县：苏区总人口136000人，参加红军16328人；

安远县：总人口100110人，参加红军12618人；

寻乌县：总人口120000人，参加红军6150人；

上犹县：总人口101518人，参加红军约2000人；

信丰县：总人口203660人，参加红军约10000人；

崇义县：总人口89000人，参加红军约2000人；

南康县：总人口 230000 人，参加红军 3656 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赣南各县参加红军人数占苏区总人口的比重相当大，苏区贫苦青壮农民参加红军的热情极为高涨。

中央苏区的扩红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1. 苏区在扩红运动中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首先，宣传动员内容紧密联系苏区群众在土地革命前后截然不同的境况，充分讲清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的重大意义，讲清参加红军是每个苏区群众义不容辞的职责，从而极大地激发广大翻身农民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其次，扩红宣传动员的形式活泼多样。大量的是通过召开党团员会、妇代会、各行业工人代表会、儿童团会、红军家属会等，进行宣传动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组织还广泛组织扩红宣传队，到田间地头、工厂作坊、街道墟场，进行宣传。从 1933 年冬开始，在扩红突击运动中，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红军总政治部动员部还从中央机关抽调力量，组成扩红突击队，由滕代远、罗荣桓、金维映等领导亲自带队，分头深入兴国、于都、瑞金、宁都、会昌等兵员较足的县，进行扩红动员。宣传的手段多种多样。有口头演讲，化装演讲，戏剧歌舞表演，有标语、传单、漫画、墙报、黑板报，等等。更多的是深入屋场家庭，针对动员对象的实际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同时，还充分利用《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各种新闻宣传媒体，大量报道宣传各地扩红情况、先进典型和苏区群众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动人事迹。最后，充分发挥各类群众团体的作用。在苏区的扩红宣传动员工作中，各类群众团体尤其是妇女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发挥了突出作用。苏区各地，到处涌现妻子劝郎、父母劝子、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2. 切实做好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工作，是苏区做好扩红工

作的重要措施和方法。

根据地创建之初，各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就十分重视做好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的工作。1931 年 11 月召开的一苏大会上，首次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使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工作有了法律保障。这部条例共 18 条，对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政策作了详尽的规定。除规定红军与贫苦农民一样分得土地、山林、水塘，外籍红军战士应分得红军公田，各级苏维埃政府应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等外，还规定：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苏维埃共和国之一切捐税，住房免纳租金，可享受国家商店 5% 减价优待；外出乘坐轮船火车的费用，由公家发给；红军伤病员应得到细心照料，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在红军中服务 5 年以上年满 45 岁者，可退职休养，由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费用；红军中的伤残人员，应得到国家供养，按年发给终身抚养费；红军与家属通信，盖军邮章后免贴邮资；凡已牺牲的红军战士，应得到红军机关和政府褒扬，其家属应得到抚恤帮助。条例还特别规定保护红军婚姻。1932 年 2 月 1 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第九号训令，颁布《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各种办法》，要求各省、县设立优待红军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对执行优待红军条例提出了具体办法和措施。1934 年一二月间，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连续颁布《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这些条例的颁布，进一步从法律上确立了红军家属应该享受的优待和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优待红军家属方面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

优待红军的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和认真落实，从根本上解除了参军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真切感受到当红军光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

带头执行优红条例，积极参加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帮助军烈属砍柴、挑水、耕田，促进各项优红条例的落实。省、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积极参加优待红军家属活动。

3. 做好归队动员工作，还必须努力巩固扩红成果。

由于各种原因，一部分参加红军的人到了部队以后，思想动摇，经常出现开小差离队现象，影响部队的稳定和巩固。这种现象在1934年尤为严重。因此，动员开小差离队人员返回部队，成为摆在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严重问题。自1933年夏开始，中央苏区以乡为单位成立了归队运动委员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深入持久的动员红军离队人员返回部队的归队运动。

在归队运动中，各地都把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放在首位。对开小差回来的战士，耐心地向他们做好宣传解释，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并组织红军家属现身说法，动员离队人员早日归队。同时，切实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及时解决红军家属的实际困难，使离队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如兴国县，由红军家属组织起反逃兵突击队。在该县鼎龙区，派出得力的宣传队和活泼的慰劳队，带着慰问品到开小差及请短假回家的士兵家里，问寒问暖，好言劝慰，两三天就有15人归队。瑞金下肖区官山乡有33人开小差回家，当地组织发动妇女做丈夫的工作，提出“开小差最可耻”、“反对老公不归队”等口号，使归队工作成效显著。

为做好归队工作，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5号命令，对红军中的逃跑问题规定了统一的处置办法，视逃跑人员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理。在红军部队中，也广泛开展了反逃跑运动。1933年7月11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以连为单位组织反逃跑“十人团”。反逃跑“十人团”成员必须是政治坚定、作战勇敢、工作热心，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团员或战士。“十人团”团长必须是共产党

员。“十人团”成员由群众自愿报名参加，全连军人大会通过，团政治委员批准，在团政治处和连指导员领导下工作，从政治上鼓舞全体指战员战斗情绪，维护革命纪律，进行反逃跑教育，战时帮助畏惧、恐慌的战士鼓起胆量和勇气，执行追回和教育逃跑分子的工作。各部队还切实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各补充团加强党、团组织领导，将巩固红军新战士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

（三）建立红军补充团和补充师

1932 年 7 月以前，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新战士，一般都是未经训练就直接送到前线战斗部队。这就难以确保新战士到部队后的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1932 年 7 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 14 号训令，决定在中央苏区组建若干专门训练新战士的补充团。训令规定：补充团归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领导，同时就近接受军区、军分区、瑞金卫戍司令部和军委后方办事处指挥。为使红军主力部队的兵员补充能得到保证和有序进行，1933 年 8 月 1 日，中革军委又具体规定：瑞金、会昌、石城、彭湃、长胜五县为红一军团兵员补充区，组织一个补充师，师部设瑞金；兴国、赣县、公略、万泰、杨殷五县，为红三军团兵员补充区，组织一个补充师，师部设兴国；胜利、博生、广昌、洛口、赤水五县，为红五军团兵员补充区，师部设博生（现宁都）；安远、寻乌、于都、信丰、武平五县，为红二十二师和红军独立五、六、十各团兵员补充区，组织一个补充团，团部设西江市（今会昌县西江镇）。各补充师下设若干补充团。补充师、团干部统由接收兵员的部队派员充任，新兵训练也由红军部队负责。这种兵员补充制度，一直坚持到 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时止。

第三节 财经商贸动员

一 粮食动员

粮食对于苏区军民来说至关重要。中央苏区在战争动员中，十分重视粮食动员工作。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无论是成立前还是成立后，都把粮食工作放在重要地位。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各县、区、乡红色政权都设立了专门的粮食委员会和粮食工作部门（省县称粮食部，区称粮食科，乡称粮食委员）。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中央人民委员会虽未专门任命粮食人民委员，未专门成立中央粮食部，但临时中央政府委托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内务部共同负责粮食调剂工作。

1932 年夏邓子恢就任中央财政部长后，为妥善调剂苏区的粮食余缺，决定借鉴闽西苏区创办粮食调剂局的经验，在全中央苏区开展粮食合作社运动。1932 年 8 月 21 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发展粮食合作社问题》的第七号训令，要求在全中央苏区迅速创办粮食合作社，同时还颁布了《粮食合作社简章》。中央财政部部长邓子恢还在《红色中华》报发表题为《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来巩固苏区经济》的文章，通俗而又深入地阐述了创办粮食合作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号召苏区人民动员起来，大力发展粮食合作社，调剂根据地内的粮食余缺，解决粮食问题。

此前苏区的粮食工作，主要是收集粮食以供军用，有计划地储备和调剂粮食做得很差。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迅速增多，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粮食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为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1933 年 2 月成立中央国民经济部时，决定在各级国民经济部内专设粮食调剂局。省设总

局，县设分局，重要圩镇设支局。省、县粮食部的工作也归并到国民经济部领导。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创办粮食合作社的工作进展缓慢。随着1933年春荒的到来，苏区一些地方的粮食供应又紧张起来。1933年3月4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调节粮食，接济军粮》第三十九号命令，要求加紧做好粮食调剂工作。3月5日，中央内务部也发出同样内容的布告。1933年5月20日，中央国民经济部又发出《为发动群众节省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第一号训令，要求在最近两个月内每人节省一斗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以帮助缺粮地区群众渡过夏荒，同时支援红军。1933年6月4日，为支援前线红军，临时中央政府向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群众发出公开信，要求群众在6月底前节省五万担谷子卖给红军，分配给瑞金1.6万担，会昌1.5万担，博生1.2万担，石城1万担。这几个县都按时完成了任务。1933年7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出《关于创办粮食合作社问题》的第二十一号布告。同一天，中央国民经济部也发出文告，阐明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社的关系。1933年8月，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和宁都先后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又将创办和发展粮食合作社列入苏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重要内容。至1933年8月，全中央苏区已建立粮食合作社513个，社员11.2万人，股金9万元；至同年9月底，有16个县建立了粮食调剂分局。这就为苏区粮食调剂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好粮食的收集和管理工作，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单独设立中央粮食部，任命陈潭秋为中央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部长），张鼎丞为中央副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副部长），主要领导苏区粮食的征收与保管、分配工作。1934年2月

26日，由于征收粮食突击运动进展缓慢，中央人民委员会专门作出《关于粮食突击运动的决定》，要求3月15日以前继续开展突击运动，并从中央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征粮突击队，到各县帮助工作。据1934年3月20日统计，全苏区共收到谷子19.8万担，现款64.8万元，有5个县完成了任务，6个县基本完成任务。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在全苏区紧急动员24.2万担粮食供给红军。其中分配给江西省12.52万担，粤赣省9000担，赣南动员区2.58万担，中央直属4县（瑞金、西江、太雷、长胜）3.77万担，福建省1.03万担，闽赣省3.4万担。仅一个多月，到7月下旬各省和直属县就全部完成了任务。接着，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再次决定在全苏区开展60万担秋收借谷运动。至1934年9月5日止，全苏区共动员粮食666581担，其中已收集入仓470296担。中央粮食部如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交给的上述各项粮食收集、运输、保管和调配任务，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中央苏区十余万红军部队和各级机关工作人员粮食供应。

为了保证前线红军的粮食供给，中央苏区军民开展了旷日持久的节约粮食运动。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作出规定，禁止用粮食酿酒，杜绝浪费粮食现象发生。节约和爱惜粮食，成为苏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对各类人员的粮食定量都有严格规定。如1934年3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规定：前方部队和警备区人员以及红军学校学生、各省军区作战部队、兵站运输员、补充师人员，每人每天大米1斤6两（16两制，下同）；红军新编师、红军学校工作人员及后方卫戍部队，每人每天大米1斤4两；其余人员每人每天大米1斤2两。为节省粮食支援前方红军，后方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党政军各机关工作人员，主动提出每人每天节省2两米，有的甚至每天节省4两米。广大

苏区群众也自动开展每人每天节省一把米、每月节省3升米活动，从而节约了大量粮食支援红军，保证了前方军粮供给。

二　财政动员

开展革命战争，必须有必要的战争经费保障。所以财政动员是中央苏区战争动员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土地革命初期，根据地财政（红军战费）的来源，主要靠打土豪筹款解决。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因为这是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需要，也是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需要。这种政策和做法，一直沿用至1931年冬。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区域范围的相对稳定，靠打土豪筹款已不能满足苏区财政支出和红军战费开支需要。为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在根据地的税收方面。1931年11月28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暂行税则》，规定在苏区彻底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改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在苏区暂时只开征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三种；还规定了商业税和农业税的税率（工业税税率暂未规定）。除税收外，红军在新发展区域也承担一定的筹款任务。比如，1932年4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方军攻占福建漳州，仅一个多月红军就筹得现款百余万元。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开始创办自己的经济事业，成立了中华钨砂公司，通过开采和销售钨砂来获取收益。这种一靠税收、二靠筹款、三靠发展苏区经济为主要来源的财政收入政策，是符合苏区实际情况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因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根据地相对稳定，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发展，收入增加，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苏区内的工商贸易也逐步发展起来，苏维埃政府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开征

农业税收和工商税收；而红军在新发展区域向土豪筹款，有利于扩大革命影响，有利于发动群众，同时也有利于减轻苏区人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来源。

1932 年 6 月后，苏区财政收入政策有了改变。中共苏区中央局以红军必须集中精力打仗为由，取消了红军筹款任务。这样，红军的经费就完全由苏维埃政府供给，苏区财政收入的来源变为主要依靠税收和发展经济来解决。而当时苏区地域范围有限，人口也只有三百余万，苏区经济建设又刚刚起步，税源不足，这样财政收入自然是有限的，必然导致苏区财政捉襟见肘，发生困难。果然，这种财政困难到 1932 年夏秋间就显现了出来。

为了克服苏区财政的困难，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好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1932 年 6 月，中央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讨论决定，由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中央苏区群众发行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 60 万元，1932 年 10 月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 120 万元。两期共发行 180 万元，全中央苏区人均负担 0.5 元。这个额度不算太高，加之苏区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两期公债任务很快超额完成。1933 年 7 月，为筹措开展经济建设资金，临时中央政府又在全中央苏区发行经济建设公债 300 万元。经过深入动员并开展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竞赛，公债认购任务也胜利完成。此时，苏区人口发展到 450 余万，人均负担 0.7 元左右。

1933 年秋起，由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战事日趋频繁激烈，战费开支日益增加；而随着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根据地范围日益缩小，苏区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日益减少，苏区财政日益困难。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苏维埃中央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确保红军军费

需求：

一是大量发行苏区货币。至1933年8月，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累计达到二百万元，超过国家银行资金一倍。至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夕，发行总数约达八百万元。苏区货币的大量发行，虽然一时满足了前方战费的需要，但是造成苏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致使苏区货币信用日趋低落。

二是决定在苏区内部征调富农多余的财产，开始向富农罚款，甚至侵犯中农利益。

三是严格执行财政收支预决算制度，严肃财政纪律，坚决杜绝浪费现象的发生。中革军委于1933年7月30日发出《中革军委关于部队改编后各项费用的规定和执行预决算制度的训令》，对红军部队的伙食费、马干费、办公费、擦枪费、津贴费、杂费、特别费、零用费等开支，均作了明确规定，强调指出："一切不坚决执行预决算制度，不切实照规定开支的游击主义习气残余，是绝对不容许的。"此后，中革军委还多次就严格红军经费开支问题发出命令。在1934年4月4日发出的《中革军委关于经费开支规定的命令》中说："为保证革命战争经费的充裕，本会曾颁布严格执行预算制度，禁止一切浮支浪费的命令。最近各部队的支出，每有超过预算，如第二补充师二月份超过一万一千余元，第三补充师二月份超过七千七百余元（第二、三补充师虽然主要的是因为人数增加，但部分的还由于伙食费的浪费），二十二师二月份［每月］超过约一千元，其他如各军区及警备区等超过预算的仍不少。这样巨额的超过预算，是［势］以［必］妨碍整个的财政计划。这些现象不容许再有发现，各级首长以后应坚决执行下列规定：（一）每月各项费用，应依照军委批准，不许有额外支出。（二）遇有特殊情形，确实急需开支而又不能等待批准时，得变通先行支出，但应立即报告。此项变通

支出，如有浪费情事，各该级首长应负绝对责任。（三）没收土豪谷子吃，要经过没委会转账在预算数目内扣除，各级首长要负责严防以多报少。（四）各部队、各伙食单位节省经费的数目及拨用情形，应由各部队供给机关加以统计，报告上级，以便在预算中扣出，不得任意拨用，延不报销。”

四是深入持久地开展节约运动，节省开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苏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工作人员，在物质生活本来就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开展节约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就于1932年2月27日在《红色中华》报发表题为《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的社论，号召苏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特别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中央人民委员会于同一天发出第三号通令《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此后，“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就成为苏区军民尤其是苏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

1934年春，由于苏区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节省运动在中央苏区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4年3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响应。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中央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各工厂、企业、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红色中华》号召，投入节约运动。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发布了《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报告，公布了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成绩：“不仅完成了八十万元计划，而

且可以说将近超过一倍即一百三十万以上。”① 这些节省下来的经费，都用于保证前线红军的战费开支。

三　商贸动员

中央苏区的战争动员，离不开商贸动员。

中央苏区的商业贸易，包括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三部分。

中央苏区的国营商业，主要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统管下的各级对外贸易局和粮食调剂局经营的业务。

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在中央国民经济部成立之前，由中央财政部对外贸易处管理。中央国民经济部成立后，由该部对外贸易总局及其所辖四个直属分局负责。中央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又称中央对外贸易局，成立于1933年4月，是中央国民经济部的工作机构之一。首任局长钱之光，副局长江亚民。下设会计、保管、总务、采购、运输五个科，还设有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乱石、吉安值夏等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各省、县国民经济部，也分别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其业务受中央对外贸易总局领导。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以统管苏区外贸业务为主。苏区货物的具体进出口业务，由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乱石和吉安值夏四个分局负责。这四个分局中，会昌乱石分局以收购和出口钨砂为主；闽西汀州分局主要承担向福建、广东沿海采购物资的任务；值夏分局主要承担向吉安、南昌采购物资的任务。江口分局是四个分局中最大的一个分局。它地处贡江、兴国平江和信丰桃江三江交汇处，距白区赣州城仅五十余华里，物资通过水运，内可与赣南苏区各县和红都瑞金直接相连，外可通赣州、吉安、南昌、

① 《红色中华》第232期第3版，1934年9月11日。

九江，直抵上海。1933 年夏，中央外贸总局为加强与白区商人的联系，又在江口李家村设立了赣江办事处，下设白区工作部、组织部、宣传部、妇女工作部和苦力运输工会。江口分局还在南昌设立一个办事处，负责中央苏区在赣江下游船只的管理工作。赣江办事处专门在接近赣州的茅店、储潭等地设有工作网，在南昌、九江等地都派驻工作人员。此外，还成立了茅店、良口、筠门岭等 17 个关税处，负责对外贸易进出口物资的检查、关税的核算等工作。

江口外贸分局和赣江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赣州、南昌、九江、上海等白区的贸易。苏区所需的大量紧缺物资，都是靠江口外贸分局从赣州、南昌、上海等地采购运进苏区的；苏区的大宗出口物资，也是靠江口分局出口到白区去。时任中央外贸总局首任局长的钱之光回忆说，当时所谓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货易货，以物换物。我们出口的东西有：粮食、钨砂、豆子、樟脑、纸张、木材等，这些都是大宗大宗地出口。进口的东西主要有：食盐、布匹、军工材料、医药器材、无线电器材。仅江口外贸分局每月出口的钨砂、粮食、烟叶、樟脑、茶油、花生、豆子、竹木等商品，营业额少则 60 万元，多则 150 万元以上；进口的食盐、布匹、西药等苏区急需物资，每月少则 130 万元，多则 200 万元以上，均以黄金、银圆结算。

各外贸分局从白区采购到的货物运回苏区后，由中央外贸总局统一调配，按计划计口限量拨付给红军部队；或以微利批发给各消费合作社零售，以供苏区民用。

中央苏区红色外贸的活跃开展，有力地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支援了红军战争，保障了苏区军民供给。1934 年 7 月，中革军委为准备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时用的药品，要求江口外贸分局在两个月内筹办六万元西药。江口外贸分局受命后，召集

赣州商人在江口外贸分局秘密开会，研究采购办法。经过四十多天的努力，终于采购到八万余元所需药品和一批布匹、食盐。赣州商人们将货装船后，伪装顺江运往南昌，待船一到储潭，便将货物悉数交给江口外贸分局设在储潭的采办处，随后很快安全运抵瑞金，确保了红军急需。

中央苏区集体商业以各类消费合作社为主要形式，最早出现于东固根据地，是1928年10月由东固革命委员会拨款和群众集资建立起来的，经销布匹、药材、食盐、烟叶、鞋袜等商品，同时收购运销山货。1929年10月，扩建为东固消费合作总社，下设南垄、东固两个分社。工作人员不仅坐店经营，还“一双草鞋一副担”，自带干粮，送货下村，受到苏区军民热烈欢迎。闽西苏区也于1929年10月开始在上杭县上、下才溪乡分别创办消费合作社。到1933年初，整个中央苏区各区、乡普遍建起了消费合作社组织。据1934年2月统计，全中央苏区办有消费合作社1140个，社员295993人，股金372525元，基本实现了一乡一社。江西省消费合作总社和福建省消费合作总社及17个县分社，也于1933年秋冬间相继建立。

中央苏区红军部队和国家机关及人数较多的企业中，也建立了规模不等的消费合作社。中国工农红军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曾经发过一份布告，号召广大红军指战员踊跃加入消费合作社。布告说：“我们自己的合作社——红军合作社，是我们红色战士的群众经济组织。你要用廉价购买物品，就要到合作社来！你要得到购买的优先权，就要加入红军合作社！你要得到折扣的利益，就要加入红军合作社！你要吃清洁卫生、适口的食品，请到红军合作社食品部来！你要吃卫生的食品，并且得到折扣的利益，就要加入红军合作社！第一批加入红军合作社的社员，每股（五角）分了一角五分大洋的红利！股金在十元以上，还有四厘

的利息。同志们，踊跃入股呀！”①

苏维埃中央政府切实加强了对各级消费合作社的指导。1933年12月5日至9日，中央国民经济部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消费合作社的工作经验，表彰推广了瑞金壬田消费合作社和兴国上社消费合作社等五个模范消费合作社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订了互相竞赛条约，有力推动了苏区消费合作社事业的健康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苏区商品流通，方便了苏区军民生产生活，也有力保障了红军战争的胜利进行。

中央苏区的个体商业以各地圩镇摆摊设点的经营者和游乡串村的肩挑小商小贩为主。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宣布保护商业自由，不许侵犯商人尤其是小商小贩的利益。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又专门颁布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贸易投资经营工商业。”② 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28日颁布的《暂行税则》也特别规定：“（乙）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出卖其剩余产品者，一律免收商业税。（丙）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丁）商人遇险或遭意外损害，报告政府经查验证实者得许免税。”③ 这些政策促进了苏区个体商业的发展，使他们在活跃苏区经济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苏区的个体工商业后来受到“左”

---

①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③ 同上书，第414—415页。

倾错误经济政策的干扰和影响，使其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第四节　交通与邮电通信动员

一　交通动员

交通运输对于战争至关重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西南和闽西地区，地处山区，原先没有一条公路，更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各地道路狭窄不平，交通十分落后不便。

为了适应红军军事行动和苏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动员根据地群众修桥筑路，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交通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1 年 11 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加强对苏区交通事业的领导，改善苏区交通条件。中央内务部成立了交通管理局，专负领导筹划苏区的交通设施建设和管理，并很快发出第一号训令，制定出修筑道路桥梁的八项原则，且提出竞赛办法。1932 年 6 月 7 日，中央内务部又发出第二号命令，要求各地加紧修筑道路桥梁，对一些地区忽视这一工作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

临时中央政府的这两份文件发出后，各地即积极行动起来。江西省在 1932 年 5 月召开第一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就曾决定以于都县为中心建筑于都—会昌、于都—赣县、于都—宁都、于都—兴国、于都—兴国—万泰等交通干线。接到中央内务部训令和命令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又对道路桥梁状况进行检查，重新制订修筑计划。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2 年 11 月报告称：兴国县已按省政府规定宽度修好道路 520 里，桥梁 98 座，解决了 18 艘渡船船工待遇问题，并筹措经费新建了 1 艘渡船。宁都县已修好大小桥梁 80 余座，4 处渡口的船只也已配备。永丰县修桥梁 43 座。寻乌县已开始全面整修道路。万泰县有一

半的道路已修好，桥梁也已修好97座。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也积极行动，耗资数千元，修建十里铺大桥和汀州城内的两座大桥；汀州到连城间的福宁桥和白沙的新坊桥也已竣工。

为进一步改善陆路交通，1933年11月12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出《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八号——发布修路计划动员群众修筑二十二条干路及各县乡支路》。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利用冬闲之机，组织群众大举修路；规定干道分为二等：一等路路宽不得少于5尺，二等路路宽不得少于4尺；凡干道上的桥梁，桥面宽不得小于路面宽。训令同时规定必须在5个月内完成这一修路计划。训令发出后，一些县立即行动，迅速开工。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逐渐紧张，这一修路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中央苏区的物资运输，主要靠水运。因为苏区大部分县的河流都可通航。搞好水运航道建设和管理，发展水上运输，成为苏区交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使水运航道畅通，中央内务部于1933年7月14日发布《关于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道路问题》的第四号训令，要求各级内务部与当地苦力运输工会共同组织修理河道委员会，动员和组织沿河群众参加修整，以便利船工拉船行走。所需经费，由修理河道委员会向船主募捐（每艘船两元）。训令还严禁砍伐河岸树林，以免洪水毁坏河岸，保护河堤安全。据全国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称，当时全中央苏区共有各类运输用木帆船近两千艘。这些运输船只均属私有，但船工们都组织参加各条河流的木船工会（后称苦力运输工人工会）。船主和船工们都积极、自愿地日夜不停地为苏区运输各类物资。1934年3月，中国苦力运输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动员五百名船筏工人做五个月义务劳动，帮助苏维埃政府运送粮食，并节省七万担谷子的运费支援红军战争，得到广大船筏工人的热

烈响应。有些船工在为对外贸易局运送物资出入白区时，还为苏维埃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苏区的造船业也得到迅速发展，造船工人赶造了不少新船下水，以适应苏区水上运输发展的需要。

二　邮电通信动员

邮电通信犹如人的神经，在战争中显得极为重要。

中央苏区的赤色邮政通信，最早建立于1930年春。在此之前，红色区域的邮政通信主要依靠当地原有的邮政网络。毛泽东和朱德曾明令对地方邮局要加以保护，发出过“保护邮局照常转递”的指令。

1930年3月，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就在吉安县富田设立了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这是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个苏维埃邮局。该邮局设有邮务科、总务科，共有60—70人。总局在吉安县陂头设立有赣西南分局，在兴国设立了赣南分局，在万泰、兴国、于都、赣县等十余个县设立县支局，县以下设路站，路站下设分站，区、乡设邮点，基本形成了赣西南苏区内比较完整的邮政网络。到1931年夏，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管辖的县局已扩展到二十余个。该局成立后，第一次发行了苏维埃邮票。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吉安城成立后，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从吉安县富田迁至吉安城内，改称为江西省邮政总局。该局于1931年迁至永丰县龙岗，同年秋迁至于都县平头寨，1932年初又迁至兴国城。总局的邮路，在吉安时，东到吉安县东固和吉水县，西到永新县，南到吉安县永阳，北到吉安县延福；在龙岗时，南到宁都县，东到永丰城，北到吉安县东固，西南到赣县、兴国；在兴国时，邮路有：（1）赣县到田村（与兴国交界，县委所在地）；（2）于都到会昌、寻乌、安

远；（3）平头寨到瑞金、宁都、江背洞（有个分局，在兴国南面，信送到平头寨又分开）；（4）送瑞金；（5）送宁都、广昌。江西省邮政总局在兴国时，颁发了《赤色邮政暂行章程》，发行了江西赤色邮票。

1931年9月底，红一方面军总部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等领导机关迁驻瑞金叶坪村后，为便于驻瑞金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传递公文信件，在叶坪村设立了中央邮政局。由于该邮局的业务没有向基层延伸，而闽西和江西省邮政总局之间又没有互相间开通邮政业务，严重影响了苏区内外各种信息的传递，进而影响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1932年4月，苏维埃中央内务部召集闽、赣两省邮政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对中央苏区的邮政工作进行整顿，在瑞金成立中央内务部领导下的中央邮政总局，建立苏区统一的邮政系统。中央内务部为此于1932年4月发布关于《整理苏维埃邮政统一组织统一办法》的训令。同一天，中央内务部正式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对邮政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邮政业务的开展等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使苏区邮政工作日趋规范化。

中央邮政总局局长由中央内务部副部长杨岳彬兼任。1933年夏至1934年10月，由赖绍尧、王醒才、张善初等先后继任。1934年10月至1935年春，留在中央苏区的邮政总局由汪奇峰任代局长。中央邮政总局内设秘书、巡视员及总务、财务、邮务、审计、供应等处。

红军中邮件传递工作，由设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红军总信柜承担，业务上隶属于中央邮政总局。红军总信柜主任赖绍尧。总信柜之下，在中革军委和各军团、各军、师、团政治部（处）内，均设红军信柜，配专职邮政递信员一人，形成红军内部的邮政投递体系，专门为红军部队服务。苏区邮政对红军家属实行优待。

凡红军家属寄信函及包裹，只要经红军政治机关及地方政府审验加盖“红军信件，免贴邮票”戳记，即可免费投寄。

至1932年7月，中央苏区已开通特别快递的邮路有15条，即瑞金—胜利—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瑞金—宁都；瑞金—于都—赣县；瑞金—会昌—重石—信丰（临时）；会昌—寻乌；瑞金—汀州—河田—旧县—白沙；白沙—上杭—永定；白沙—龙岩；胜利—宁都—广昌；兴国—万泰—乐安；兴国—永丰—乐安；兴国—于都—会昌；兴国—赣县。

苏区赤色邮政自建立起就设法与白区邮政保持通邮。办法是：苏维埃政府对毗邻苏区的白区邮政机构予以保护，但白区邮票不得在苏区使用；白区寄往苏区的邮件，苏区邮局可代收代寄，其在苏区内的邮资由收件人代付。苏区居民寄往白区的邮件，除按规定贴足苏区邮票外，还应贴足白区邮票，苏区邮局负责代售白区邮票。

中央苏区邮政系统的建立、统一与完善，无疑大大方便了苏区军民的信息传递与交流。

中央苏区的电信事业，最早建立于1930年9月，是利用红军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电话机，在红军高级领导机关中架设有少量有线战场电话。从1932年下半年起，苏区内部逐步建立军民两用有线电话通信业务。在瑞金叶坪（1933年4月迁沙洲坝马荠塘村）建立中央电话局，架设了从瑞金通往各省苏维埃政府驻地、一些重要县以及各中央单位间的电话线路。中央电话局使用的是一台战场缴获的磁石电话交换机。

中央苏区的无线电台设备，最早是以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缴获的一台半收发报机器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总部充分发挥被俘的国民党军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作用，于1931年1月6日建立了红军电台。红军电台的第一任政委为冯文彬，队

长王诤，报务员刘寅等。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在宁都县小布举办了一期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参加培训的有曹丹辉、胡立教等12名学员。1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并讲话。毛泽东后来还给无线电训练班上了政治课，勉励学员们要做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努力为革命战争服务。四个月后，这批学员成了红军各军团的无线电骨干。

1931年5月，红军又缴获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台100瓦功率的电台。党中央派来的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无线电技术人员，也陆续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9月中旬，江西的苏区中央局同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沟通了无线电通讯。

随着红军在战争中缴获的无线电台数量增多，同时伍云甫、涂作潮等技术人员又摸索着自行装配了若干部电台，1932年后，除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红军总部等领导机关装备了无线电台以外，红军各军团、各军甚至一些独立师、团都逐渐装备有无线电台。为培养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苏区创办了红军无线电学校（后改为红军通信学校），招收部队青年战士入校学习。

中央苏区红军无线通讯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为当时的反“围剿”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还为新中国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军工建设与防空建设

一 军工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工建设，主要是发展军需工业。最早的军需工业，创办于1927年底。那是由东固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在东固养军山创建的一个兵器修械小组。当时只有五六个人及少许铁匠工具。1928年春该小组发展为养军山修械所，有三十

多人。同年冬，修械所发展到八十多人，更名为养军山修械处，主要是修理损坏的枪支，制造少量的刺刀、长矛等小兵器。与此同时，在兴国、吉安、泰和三县交界的淘金坑，也办起一个红军兵工厂，隶属东固革命根据地，由赤卫队长徐发林兼厂长，谢云龙任经理，主要生产土枪、土炮、弹药，兼造大刀、梭镖和农具。

1931 年 9 月，为修理在反“围剿”战争中缴获的枪械，苏维埃中央军委决定在兴国县白石筹办修械厂，任命吴汉杰为厂长。同年 11 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于都县平安寨设立修械处，崔鼎武为处长，郑阿祥为党支部书记。

1931 年底，苏维埃中央军委决定，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处与红军白石修械厂、东固养军山修械处等合并，在兴国县莲塘乡创办了中央军委兵工厂（又称官田中央兵工厂）。厂长吴汉杰，后韩日升继任；党委书记先后为张健、范启明；职工委员会委员长马文。该厂兴办时有六十多人和少量锉刀、老虎钳、打铁炉等简单设备。1932 年 4 月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后，缴获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兵工厂一座，从中挑选了两部车床、一台 30 马力柴油发电机和其他修械设备，运至官田兵工厂。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从上海和沈阳动员一批从事兵工生产的熟练工人来到苏区，投入兵工生产行列。1933 年，官田中央兵工厂发展到有四百四十多人。兵工厂初办时，设有枪炮科和弹药科。枪炮科下设修理、制造、木壳、牛皮、刺刀等股；弹药科设炸弹、子弹股。

1933 年，官田中央兵工厂一分为三，分别成立官田中央兵工厂、银坑弹药厂、寨上杂械厂。官田中央兵工厂在两年左右时间里，共修造四万多支步枪，修理机枪两千多挺、迫击炮百余门，制造子弹四十余万发、手雷六百多枚、地雷五千多颗。1934

年四五月间，上述三个分厂陆续迁至瑞金县岗面，合并为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1934 年 10 月，该厂部分职工携带部分设备编入红军野战军长征，留下的职工将工厂迁至于都县黄龙乡湖山村继续生产，支持红军游击战争。

1932 年 7 月，邓小平在江西省会昌县领导成立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后，建立了第三分区兵工厂。1933 年 4 月，该厂改为粤赣军区兵工厂，有干部职工一百多人，设备有一台车床、一台柴油发动机和一些钳子等，能制造单响枪、马尾炸弹，翻造子弹，修理枪械。

红军服装厂是中央苏区军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的红军服装厂主要有红军被服总厂（设瑞金县七堡村）、红军第二被服厂（设长汀县城东门周祠和新万寿宫）、红军第三被服厂（设宁都县城）、福建军区被服厂（设上杭县旧县，后迁长汀县南阳）等。红军被服总厂有近百台缝纫机和数百名工人，主要加工单衣、夹衣、八角帽被套、绑腿等。红军第二被服厂有六十余人、二十余台缝纫机，生产军衣、绑腿、子弹带等。红军第三被服厂有百余人、十余台缝纫机，生产军服、军帽、挂包、绑腿、米袋、子弹带等。该厂 1933 年 5 月迁瑞金，与红军被服总厂一分厂合并为军委第一被服厂。

在中央苏区军需工业中，还有中央卫生材料厂、红军斗笠厂等。中央卫生材料厂归军委总卫生部领导，创办于 1931 年，厂址设在于北区（后改为胜利县，即今于都县北部地区）琵琶垅村，1932 年迁至瑞金朱坊村，厂长唐义贞。办厂初期主要加工药棉、绷带等敷料，同时加工一些中成药丸、药膏，后发展有酒精车间和制药车间、敷料车间。红军斗笠厂设长汀城。全厂有工人 108 人，管理人员 3 人。月产斗笠 6000 顶。1934 年 1 至 9 月共生产斗笠 20 万顶。产品初为夹箬尖顶，1932 年冬毛泽东视察

该厂，建议将尖顶改成平顶，将夹箬叶改为夹油纸。改进后的产品深受红军欢迎。该产品后来一直在闽粤赣边十余县畅销几十年。

上述军需工业，主要受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军事工业局领导，同时受中央国民经济部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党团书记陈云等领导同志对苏区红军兵工厂的工作也十分关心，经常深入工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军需工业十分重视，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需要，所以更加指望苏区兵工厂多出产品，支援前线。1934 年 3 月 13 日，中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关于清查修理坏枪及修械所的设置与编制的命令》：“近查各军区及各军团的留守处所存坏枪，多无适当之处置，稍坏的与毁坏的，也没有很好的清查出来分类别由各站各厂集中送兵工厂去修理，在战争激烈的当儿尤不应如此，因此特规定如下办法：（一）各留守处及各兵团供给军械处现存坏枪，应即进行清查并把零星放存的（如留在沿途兵站未送走的等），统统集中一起，将坏的与毁坏的枪支分别秘密报告本会。（二）能修理的即送就近修械所修理，不能修理的则送枪炮厂。（三）各地修械所的设置如下：1. 建宁、广昌两警备区各设一修械所，枪工四人至六人。2. 江西军区在博生设一修械所，枪工六人至八人。3. 福建军区在汀州设一修械所，枪工六人至八人。4. 粤赣军区在门岭设一修械所，枪工四人至六人。5. 石城、宁化（现均存有坏枪）两处，由总供给部直接派出枪工组修之。并由军区与警备区派人负责。（四）各地修械所，在系统上统归总供给部军需处指挥，在工作上则由军区和警备区指导。（五）各军团战线后面，不需加设庞大的修械所，如有坏枪可分别送至军区或警备区的修械所修理，师、团两级则仍照编制

设置枪工。”

1934年4月18日，中革军委又专门下达了《关于收集弹壳及铜锡等重要兵工材料的命令》：“（一）子弹壳及铜、锡等是重要兵工材料，查前线及各军区地方本有不少的铜、锡散在各处，在战斗结束后更有很多子弹壳未注意收集，致使这些便宜易得的兵工材料不能拿来使用，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现在兵工厂急需此项材料，各级首长应依照下列指示，经常积极进行。（二）打土豪或没收反革命的财产时，须清查各种铜、锡物品，悉数收集。（三）打扫战场时，各级首长应指定专人负责收集子弹壳，同时发动群众收集，用价购买，一定要做到不使一颗弹壳遗弃，各供给机关更要多负责任。（四）各县、区军事部应发动群众将存无用的铜、锡物件收集起来，酌量出价收买，最好经过相当政治工作，使群众自动的捐给公家。（五）购买铜、锡的价格，应由各县军事部与财政部共同负责估价，由财政部暂垫此款，并将收集的数目与垫款的数目报告总供给部，以便补偿此款。（六）已收集到的铜、锡及子弹壳等，应迅速交兵站或经军区送总供给部应用。”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作战略转移的秘密准备。中共中央委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负责领导军需工业。为补充红军武器弹药，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军事工业局、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红军兵工厂和各军服厂加班突击生产。1934年7月5日，中革军委军事工业局、中央国民经济部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或留存的子弹、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作价卖给国家，同时注意收集牛皮交给国家作军用。中革军委主席还于1934年7月9日亲自致电红军各军团首长，要求各部队尽一切办法多收集子弹壳。从6月到8月3个月内，全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余斤，

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09万发，白硝1.53万斤，运往中央兵工厂。红军野战军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弹药，有相当一部分是红军兵工厂自己生产的。

中央苏区还办有一些民用工业，主要是钨砂、煤炭开采业和造纸、纺织、食品等手工作坊式的轻工业。这些民用工业虽不直接为军队提供军需品，但它们的产品或用于出口到白区换取苏区急需的军需品，或直接为苏区军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事实上也是间接为红军战争服务的。

二　防空建设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根据地内没有什么防空设施，红军既未组建防空部队，也无防空武器。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时，国民党军派出十余批次飞机对瑞金县城和长汀县城进行狂轰滥炸，投弹百余枚，炸毁房屋百余栋，炸死炸伤居民数十人。幸好“一苏大会”会场未被敌机发现，安然无恙。因无防空洞，敌机轰炸时，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只好就地在树林中隐蔽。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住所后面有一株数人合抱的百年老樟树，早已空心。敌机轰炸时，毛泽东等就躲进树洞里防空。

从1933年夏开始，红军着手组建防空部队。红军特科学校开设了一个防空连，将轻、重机枪改装成高射机枪，进行对空射击训练。该连学员毕业后编入战斗部队序列，直属于红军总部领导。红军各军团在遇敌机空袭时，除组织部队迅速疏散隐蔽外，也积极组织火力对空射击。

1933年四五月间，因瑞金叶坪经常遭到敌机轰炸，临时中央政府等机关被迫迁移至瑞金沙洲坝地区驻扎。在选择机关驻地时，便于隐蔽防空成为首要条件。同时，瑞金卫戍司令部加强了

对空瞭望警戒，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始注重防空设施建设。在新建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时，就在大礼堂后面新建了能容纳千余人隐蔽的防空洞（这个防空洞至今仍保存完好）。为便于防空紧急疏散，大礼堂设计安装了16条大门通往四周。“二苏”大会召开期间，专门制定颁布了防空措施和防空纪律。1933年12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就写道：“本乡防空防毒委员会指导群众防空，注意下列各事：1. 飞机来了不要乱跑；2. 挖飞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3. 遇毒瓦斯用湿手巾封鼻，演习野营的回来说，用木炭屑装巾封鼻；4. 每村一个号炮所，都设好了，每所两个专人负责，一人外出必有一个在家，司放号炮。”① 红军主力长征后成立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于都县黄龙区（今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驻地屋后，当时也挖有防空洞。

但是，由于红军的防空部队和防空火力十分薄弱，对来袭敌机不能构成严重威胁，沙洲坝仍然不断遭到敌机轰炸。1934年7月，中央党政军等机关不得不又从沙洲坝撤离，转移到瑞金云石山地区驻扎。

第六节 支前保障

一 苏区群众支前参战

支前保障，对于红军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战争的支前保障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红军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支前保障工作完全靠发动和组织苏区群众进行。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

1930年春以前，由于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红色政权既未普遍建立也不巩固，所以在红军作战时往往缺乏组织有序的充分的支前保障工作。1930年春以后，由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分散的小块红色区域逐渐连成一块，从而为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动员根据地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攻打吉安城。9月26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准备进攻吉安的紧急通知》，对支前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1. 积极准备攻吉工作。

（1）担架队的组织：

担架队是作战最迫切的工作，必须要有系统的组织，每队设队长和政治委员各一人，每三人为一副，每副为一班，五班为一排，五排为一队，每队要负责人切实负责。

（2）前方担架队的组织：

切实组织担架队共一千八百名，分为三队，每队六百人，实行分配到各军随军到前方工作，西路组织一队，北路组织一队，中路组织一队，直受各军部副官处指挥。

（3）后方伤兵站及担架队的组织：

后方需设立伤兵站，每站内设登记科（登记伤兵多少），治疗科（为伤兵上药），给养科（为伤兵弄稀饭及开水等），输送科（筹备柴米等），每站并设站长及政治委员各一人。

伤兵站在北路的桐树坪、固江各设一站，北路总站设塘东，西路在庙前、高塘圩各设一站，西路总站设永阳。

后方伤兵站，每站设担架队一百副，每三人为一副，每副用两根竹竿，以麻绳穿长网形，以代替布的担架，应用比

较简便。伤兵站的担架队，直受伤兵站的输送科指挥。

（4）冲锋队的组织：

冲锋团务必组织三团，每团六百人，三营为一团，三连为一营，三排为一连，三班为一排。西路组织一团，北路组织一团，中路组织一团。

（5）冲锋队带的东西：

冲锋队应带长柄柴刀（准备砍铁丝网的木杆子），锄头（掘壕），马刀，挖深锄（挖壕）。

（6）冲锋队的任务：

切实与红军士兵配合冲锋前进，帮助红军挖战壕破坏铁丝网等项工作。

（7）向导队的组织：

向导队组织四队，每队五十人至一百人，须找吉安附近五十里内大小路途非常熟悉的可靠工农组织之。

（8）粮食处的组织：

关于粮食问题，北路桐树坪附近设粮食处一所，西路在石坪附近设粮食处一所，每个粮食处内设委员会管理一切事务，如筹备米柴油盐菜等。

（9）交通问题：

关于交通问题，须通知各地来前方参加作战的群众每人带干竹竿（长一丈五尺）一根，以作电杆，并派人到各处采买铁丝以作电线，指示路杆竖在大道旁边，指示工农群众不要毁坏我们自己的电杆，并告知各处伤兵站粮食处等的所在地。

……

2. 调工作人员三百名送第一方面军分配工作。

所要调的人员必须在区政府以下负过责的活动分子，略

能识写文字，对革命忠实者及进步的贫苦工农分子，接此通令后，七天内送来。以便送交前方分配工作……①

从上述通知可以看出，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动组织地方群众的支前参战工作，安排得非常周密具体。后来在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地方党和苏维埃政府除了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担架队、伤兵站、交通队、粮食处等支前作战外，还组织地方赤卫队等组织承担打扫战场、收容安置敌军俘虏；组织妇女洗衣队到红军后方医院帮助红军伤员洗衣服、帮助医院洗绑带纱布、慰劳红军伤病员等项工作。当时任红军团长的李志民，解放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兴国县人民支援红军反“围剿”的动人情景：“一到兴国，完全换上了另一幅景象。群众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地接待了我们。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的‘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歌，一面对着战士扇起来。战士们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她们东翻西找，连战士们用心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参战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担架队组织得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②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尤其是1932年6月中央劳动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1988年内部版，第148—149页。

② 李志民：《奇兵制胜》，《星火燎原》第2辑，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与战争委员会成立后，苏区群众的支前参战工作更趋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苏区所有群众，不论男女、老少，均按各人实际情况编入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交通队、侦察队、破坏队、警戒队等组织中。只要前方支前需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从各种支前组织中抽调人员出发支前。他们为红军运送弹药、粮食，抢救伤员，慰劳部队，帮助红军抢修工事，打扫清理战场，侦探敌情，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等。1932 年八九月间，红一方面军发动宜乐崇战役，仅宁都一县就动员长夫 1.4 万余人参战支前。中共兴国县委 1932 年 10 月统计，全县参加支前作战的担架队员 5024 名，救护队员 2519 名，洗衣队员 3254 名，破坏队员 2474 名，运输队员 6790 名，慰劳队员 2754 名，向导队员 1564 名。全县 16 个区支前群众达 24379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0.5% 以上。1933 年二三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毗邻战场的宁都县北部各乡居民，自动组织各种支前组织奔赴前线，人民群众还将蔬菜、猪肉、果品等送往医院，慰问伤病员。战斗中红军抓获 1.6 万名国民党军俘虏，也被送到宁都苏区得到妥善安置。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为支援红军作战，中革军委于 1933 年 11 月 4 日发出《关于征调夫子担任战地运输工作的训令》，决定建立从后方通往前线的三条运输线，要求各县要随时征调夫子支前运输，分配给各县的征夫任务是：石城、太雷两县各 4000 人，长胜县 7000 人，博生县 9000 人，洛口县 7000 人，广昌县 6000 人，宁化县、汀东县、兆征县每县各 3000 人。另外，动员随红军主力行动的长夫（随军担负运输任务时间在 6 个月以上）数目为：胜利、兴国、赣县、杨殷、公略、万泰、龙岗 7 县共 4500 人，兆征、长汀、汀东、宁化 4 县共 2000 人，西江、会昌、于都 3 县共 900 人，瑞金县 400 人，建

宁、泰宁、黎川3县共600人。以上共计长短工54400人。各县都如数完成了任务。

1934年9月10日，为准备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要求各红军野战兵团都要组织为军团各部队服务移动的后方部，各后方部应包括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等。按命令规定，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总计需要运输员3140人。这些准备随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的运输员，均从于都、瑞金、兴国、会昌、赣县等县征调。这些县都完成了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有六十多万人，占当年赣南苏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几乎是全民支前。

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解决支前民工的实际困难，于1932年9月17日发出《关于对担架员运输员的指导调动待遇等问题的命令》，规定：

一、长期运输员、担架员一月到三月的，一概随军工作，每天每人发草鞋费大洋一角五分，五天发一次，并得分伙食尾子，但其他零用钱不发。

二、短期运输员、担架员，由当地地方发动来的短夫，就近担任伤病兵和战利品，在二十天以下的，不发按日的草鞋费，但酌量发给运输时间中的所需草鞋钱。临时由自己雇用的，根据当地情形的实际需要原则，酌量发给相当的草鞋费。

三、苦工队服务时间，以原判决来定，行军时每天可发草鞋费大洋五分，驻军不发，可分得伙食尾子，其他费用一概不发。

四、长期运输队员和苦工队，由各县苏负责组织好，由

兵站转送军委分配到各军随军工作，后方及兵站医院，均不得留用此种长期运输员、担架员。

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到了紧要时期。4月23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中央少队总队部发出《关于动员运输问题的训令》。鉴于苏区经济日益困难，训令对运输员的待遇问题进行了调整，重新规定：“为实行节省，以充裕前方战争的经费，动员赤少队的运输伙食，发动各队员自带，以四天为限，过四天的由第五天起之伙食归兵站发给。由某一处运到另一处应计算路程，事先通知前头的区，将夫子准备好，以便接替或交换，来去不要打空手，这样可以减少动员次数、时间和伙食费用。草鞋费或草鞋如超过十天以上的，兵站可酌量发给，在十天以内的须发动队员自备。”尽管待遇改变，苏区人民仍然满腔热情全力支援红军作战。

二 红军的后方保障系统

除了苏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参战以外，红军部队自己还建立了后方保障系统。

1930年10月以前，由于红军流动作战时间较多，且尚未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所以红军部队自己的后方工作较差。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占吉安后，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当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吉安向北发展时，就在吉安建立了后方办事处，以毛泽覃为主任，负责统管红军的后方保障工作。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红军的后方保障主要由根据地地方党政组织及红军留守人员负责。1931年5月23日，红一方面军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胜利后，决定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机关不再随军行动，留在根据地后方。所以从此时起到第三

次反“围剿”结束，红军的后方保障工作主要由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机关负责。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有了巩固的后方，为建立自己的后方组织、做好后方保障工作创造了条件。1932 年 3 月 11 日，《红星》报第 11 期发表一篇题为《红军中政治机关要怎样去组织后方工作》的文章，指出：“过去我们红军犯了极严重的游击主义，不注意后方工作，也没有巩固的后方，以至影响到红军的作战，不能很好地配合去消灭敌人，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现在有了后方，而且有了相当巩固的后方，正当我们大大的发展革命斗争中，必须切实注意后方的工作，要认识前方与后方的工作一样的重要。最近中央局对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执行后方工作，曾有一详细的指示，这一指示是非常正确的，除了地方党固然要全部执行外，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同样要负责任，必须推动并协同地方党部和政府动员群众来执行这一重大工作，使革命战争因之而取得伟大的胜利。”

基于这一认识，中革军委于 1932 年 4 月 4 日发出《关于后方办事处统一指导所有后方组织的训令》，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委任杨立三（后高自立）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主任，倪志侠（后高自立兼）为政治委员，以统一指导和监督所有红军后方组织工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直接指导红军兵工厂（包括第一修械处、第二修械处、制弹厂）、总医院（包括直属第一院、残废院、各军团后方医院、军医处材料科）、粮食站（包括第一分站、第二分站、第三分站）、各军留守处（包括一、五军团和军委直属队留守处及被服仓库）、骑兵连、红军休养所等单位。

军委后方办事处机关设在江西省胜利县桥头区（今于都县

桥头乡），1933 年夏迁驻瑞金县大埠乡老屋家村。

鉴于红军各军团都在瑞金设有留守机关，在桥头军委后方办事处也设有各军团的办事处，重复设置，指挥复杂，1932 年 6 月 26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中革军委，通知说在瑞金设后方总兵站，以杨至诚任总兵站主任。同一天，中央政府发布命令说："各军团暨各军留在瑞金之留守机关，名目繁多，指挥复杂，查桥头既有各军团办事处，瑞金不应再有重复机关之设立，决定留瑞之各军团暨各军之留守机关限克日一律取消，归并于桥头办事处。""凡应留瑞之医院及留后方之工作人员，均统属于后方总兵站主任杨至诚同志管理，以后关于各医院、留瑞各部队之给养费用等，均统属于总兵站筹划支配。"

1932 年 7 月 22 日，苏区中央局发布《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进一步明确规定："各军团各军的笨重东西，统统运送之（至）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分各军保存，总经理部的东西亦如此办理。各军团各军在各县之红军招待处统并入红军补充团内担任训练工作，另外留一二人加入拥护红军委员会工作。""军委后方办事处，除去共有任务外，并须负建立由桥头到前方的兵站线的责任。""瑞金后方兵站，负责进行兵站线、招待处、运输与补充及建立兵站临时医院的工作。兵站线一线通桥头之后方办事处，一线通前方。通前方的暂时经会昌、高排、天心、重心，由桥头通前方的一线由军委会后方办事处负责建立。兵站医院属于临时性质。凡伤病治愈后，经过集中训练，成队的陆续的送往前方；凡接近瑞金兵站线的地方，关于给养、人员及枪弹的补充，宣传品的输送，统经过瑞金兵站线送往前方；凡接近后方办事处的，则经过桥头到前方的输送线。"

由于建立了红军的后方保障工作系统，统一了对全军后方保障工作的领导和指挥，既避免了过去那种各部队各自为政的混乱

现象，又确保了前线红军的后方保障。前线红军急需补充的大量物资和急需后送的伤病员，都通过后方办事处和瑞金总兵站所建立的运输线，及时得到前运后送。

三　红军的医疗卫生保障

（一）红军的医疗卫生领导机构

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在1931年春以前，未单独设立医疗卫生机构。红军中的医疗卫生工作（医治和安置伤病员）由各级政治机关兼管，有时经理（后勤）机关予以协助。但卫生队还是有，如红四军军部有一个直属卫生队，各团（纵队）也有卫生队。卫生队的职责，主要是医治红军伤病员，并不担负卫生行政管理职能。由于医疗卫生领导机构不健全和缺医少药现象严重，给红军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带来了一定的限制。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建立红军医疗卫生领导机构的重要性，只是苦于红军中缺乏医疗卫生人才而迟迟不能建立。他们曾多次要求中共中央尽快派一些医务人员到红军中来，以便建立红军自己的医疗卫生体系。同时，红军也设法广纳人才，动员和吸引社会上的医疗卫生人才到红军中服务。1930年先后建立的福建上杭县蛟洋红军医院和吉安县青源山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大都是当地的医生。1931年春，中央给江西中央苏区派来了贺诚、彭龙伯（彭真）、陈志方等医务人员。他们到中央苏区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于1931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军委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专门领导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和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32年10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红军总卫生部，由贺诚任部长兼政治委员。红军中军团和师一

级也设立了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红军伤病员的医疗后送体系，随着军委后方办事处和瑞金总兵站的建立，也建立和完善起来。到1933年春夏间，红军的医疗卫生领导体系已基本建立和健全。

（二）苏区地方医疗卫生领导机构

中央苏区的地方政权系统中，初期也未设医疗卫生工作机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苏维埃政府都要成立卫生部，设部长一人；城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卫生科，设科长一人。在中央，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由内务部分管卫生工作，设立卫生管理局，贺诚兼任局长。其职责是管理地方医院，预防和制止瘟疫与传染病，注意公共卫生，检查车船、公共食堂及人民住宅之清洁，考察并监督医生和药剂师，检查药品及药材之营业等。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常会，对省、县、区卫生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决定："城市苏维埃，区、县、省的卫生部（或科），目前暂不设立，在内务部之下，暂设立卫生科，但区由主席团负责。"乡一级苏维埃政府，设不脱产的卫生委员会，村设卫生小组。

这样，中央苏区在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就形成了由内务部兼管的卫生工作领导体系。但是，由于苏区当时医疗卫生人才缺乏、条件不具备等多种原因，直到1932年冬，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都未单独设立卫生科。江西仅公略、万泰、永丰、宁都、兴国等县成立了卫生委员会。

（三）苏区红军医院的建立和发展

中央苏区的红军医院，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

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的红军医院，是1928年10月江西红军独

立第二团在东固根据地三彩山坑里创办的东固红军医院，规模很小，只有一位民间郎中用草医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疗。1929 年 3 月，医院迁至东固区瑶下村，改名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规模逐渐扩大。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曾创办了一所红军医院，1929 年 1 月红四军向赣南游击时留在井冈山，被国民党军烧毁，在院治疗的两百多名红军伤病员全被敌人杀害。红四军向赣南游击时的随军伤病员，到达东固后，大部分留在东固红军医院，一部分送到于都县桥头根据地的琵琶垅村，请当地草药郎中治疗。

1929 年 3 月 14 日，红四军进占长汀城。城内有一所由英国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同情革命，支持红军。红四军入城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与傅连暲建立了联系和友谊。傅连暲不仅医治红军伤病员，还主动为红四军全体官兵每人都种了牛痘。福音医院从此成为不挂牌的红军医院。1929 年 6 月，红四军在中共闽西特委帮助下，在上杭县蛟洋石背村办起一所红军医院——闽西红军医院（亦称闽西后方医院）。1930 年初红四军离开闽西转战江西时，将医院交给闽西党组织负责。该院于 1930 年 11 月迁到龙岩县小池，改为红十二军闽西后方医院。

1930 年 10 月 4 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城。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吉安城内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医科大学的当地名医戴济民，动员他携带自己药铺的所有药品器械，加入红军，办起了红一方面军总医院，由戴济民担任总医院院长。总医院初设吉安市郊的青源山，后迁至兴国县茶岭村。下设有四个分院，分设在茶岭附近的高山密林中。医院设备十分简陋，器械和药品都很缺乏，只有少量普通西药和中草药。医务人员奇缺，一个收容 300 人的医务所只有 1 名医生，看护人员主要由临时学习了一些简单护理常识的农村青年妇女充任。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总医院先后收治了数万名红军伤病员。

为了尽快培养红军的医务人员，在毛泽东大力支持下，1932年2月，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在于都县城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由贺诚兼任校长，彭龙伯（彭真）兼任教务主任，另有两名专业教员和一名政治教员。首批学员25人，是从各部队送来的200多人中录取的。开学后正值红军攻打赣州，全体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前线救治伤员。攻赣战役结束后，经朱德批准，红军军医学校校址搬迁至兴国县茶岭红军总医院附近，以使学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便于教学和学员实习。1933年4月，第一期学员完成学习计划，其中19人通过毕业考试，分配到红军各医院工作。第二期学员近30人，其中28人于1933年8月毕业，大部分分配到红军部队中担任卫生员。第三期学员49人，第四期学员61人。各期学员都如期毕业，分赴各红军医院和红军部队工作。

1933年8月，红军军医学校从兴国县茶岭迁到瑞金，改校名为红军卫生学校，1932年夏傅连暲在长汀福音医院开办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也合并到红军卫生学校。学员总数增加到四五百人，除军医科外，还开设了保健、药剂等专业和卫生员训练班。学校的教学条件有了改善，设有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培养室和检查室，还有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等。红军总卫生部决定将中央红色医院（苏维埃国家医院）作为学校的实验医院。学校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正规的教学制度，划分基础、临床、实习等教学阶段，教学机构也日趋健全。红军军医学校从创办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时，先后共培养军医两百多名，培养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四五百人。

随着红军医务人员增多，红军的医疗卫生保障得到改善。红军总医院改为军委后方总医院。下设20余所预备医院和7所后

方医院。红军各军团和各师、各军区也分别设立了后方医院和野战医院。红军团以下至连队，后来都相继配备了卫生人员，承担部队的疾病预防和战场紧急救治任务。据1934年9月15日中革军委颁布的红军卫生机关编制表命令规定，红军军团卫生部兼军团医院院部编制52人，军团医院编制85人，师卫生部兼野战医院（收容500人）编制118人，团卫生队编制33人，各补充团、学校、工厂、军事机关等卫生所编制11人，各连队卫生员编制1人，军区卫生部兼甲种疗养院［所］（收容量150—250人）编制46人，分区甲种疗养院［所］（收容量150—250人）编制40人，军区卫生部兼乙种疗养院［所］（收容量100—150人）编制32人，分区乙种疗养所（收容量100—150人）编制29人。经过军委总卫生部和军委后方办事处、瑞金总兵站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从前方到后方各医院的伤病员后送体系，前线的重伤病员经各师野战医院（或绑带所）紧急处置后，能及时转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治疗，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红军医疗保障体系。

（四）苏区地方的医疗机构

中央苏区地方的医疗机构，新建的比较少，主要是保护、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集镇建立医疗诊所。1933年10月，中央内务部决定每个县、区内务部都要办起一个公办诊疗所，免费为工农群众看病，不收挂号费，只收药品费，要求在10月10日之前开业。

在红都瑞金，除原先已建立的红军医院外，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在叶坪朱坊村建立了中央红色医院（后改称苏维埃国家医院）。该院是1933年初毛泽东主席动员傅连暲将福音医院从长汀城搬迁到瑞金扩建的，主要为瑞金的中央机关人员服务，

同时为当地群众服务。该院院长为傅连暲，1934 年 2 月后为周月林。

（五）红军药品器械来源

中央苏区红军药品器械来源，主要有四：一是红军战场缴获；二是通过各种途径从白区购买；三是苏区内部自采自制（主要是中草药）；四是傅连暲、戴济民等医务人员加入红军时捐赠的。为加强对药品的管理和调剂，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规定所有药品无论是缴获的、从白区购买的或自制的，一律由军委总卫生部统一提出采购计划和进行分配调拨。

（六）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

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原因，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赣西南、闽西广大农村很不注意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不看医生、停尸不埋、弃婴河内、乱扔死猪死禽等恶习旧俗，极为普遍。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区的频繁战争中，这种状况更为加剧："因为死人也比较死得多些，掩埋也随便些，有的抛露好久或者任他腐烂下去。在我们苏区内，更因为白军残酷摧残和无纪律，大烧大杀，人粪马屎随便的拉，凡是白军经过或居住的地方，臭气熏人，污秽不能插足，若是当时没有用大力量去清洗干净，到了春天，不可免的要发生瘟疫的……在江西省区发生瘟疫的危险性更较大。"①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意动员组织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破除不卫生的陈规陋习，开展疾病预防工作。1932 年 1 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专门开会研究卫生防疫问题，拟定了许多具体防疫办法，要求做

① 项英：《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红色中华》第 5 期，1932 年 1 月 13 日。

到："（1）每地规定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男女大小，有组织的分组，来打扫和清洗房屋及其周围；（2）凡是一些不洁净肮脏东西，将它焚毁干净，一切臭水沟汁，要将它清洗干净；（3）用石灰水洒在污秽的地方；（4）一切腐烂的东西不要吃；（5）至于经过战争区域将过去掩埋死尸的地方，用土加盖厚些，未掩埋的腐尸，赶快的掩埋，放过死尸的地方，都用石灰水清洗过；（6）发现瘟疫的地方，病人吃的东西和用的物件，不要共吃共用，将病人很快的送到附近的医院内去（现在的红军医院）。"①

根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1932 年 5 月，中央内务部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1932 年 7 月，中革军委也发布了开展卫生工作的训令，将防止痢疾、疟疾、下肢溃疡和疥疮四种常见病，作为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1933 年 3 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又制定和颁布了《苏区卫生运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因此要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这卫生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而能治病的，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个个圩场个个城市做"。

《纲要》要求各级都要成立卫生运动组织。具体规定：每个城市和大市场都要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大的城市还要将全城分成几个卫生区，每区设立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以街道为单位每 10—15 户组成卫生小组。农村每个小乡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

① 项英：《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红色中华》第 5 期，1932 年 1 月 13 日。

会，每5—10户成立一个卫生小组。机关凡百人以上者，在政府内务部指导之下成立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百人以下者成立卫生小组。部队在政治机关指导之下，以团为单位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每个伙食单位成立卫生小组。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卫生工作负责。户与户、组与组、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部队与部队、机关与机关、城市与城市之间，普遍开展卫生运动竞赛，优胜者给予奖励。

《纲要》要求各地各单位都要规定卫生运动日。初为每月一次，后改每月两次，进而每十天或每星期一次。每个卫生日除大扫除外，还要动员大家洗澡、洗衣、开窗、晒被等。卫生运动日的第二天，由各级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小组组织检查评比。为督促开展卫生运动，区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卫生突击检查组，对各乡、村的卫生工作进行突击检查。苏区的工会、贫农团、少先队、赤卫军、妇女代表会、儿童团、俱乐部、夜校、小学等群众团体，也都积极参加到卫生运动之中。

《纲要》还对军民群众卫生提出了“七要”的规范要求，即：要通光；要通气；要通水；要煮熟饮食；要除去污秽；要勤灭苍蝇；要隔离病人。

1933年7月16日，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又制订8—12月《五个月卫生工作计划》，对苏区的卫生工作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1）以乡为单位建立卫生运动委员会，村设卫生小组，责令区内务部须于8月底前全部成立；（2）于9月中旬举行全苏区大扫除运动一次；（3）以乡为单位于9月1日起至9月7日止举行卫生运动周一次；（4）进行露尸浮厝掩埋运动；（5）不准放猪，须关猪栏中，猪栏和牛栏要在适宜地设置（依照家畜牲禽管理条例）；（6）城市的通街大道不准设厕所；（7）室内不准放尿桶，必要放时须做盖子和每日倾倒之；（8）以乡为单位设

一公共体育场，区为单位组织体育运动大会；（9）普遍的开启窗户运动；（10）反对早婚及衰弱有传染病的结婚运动；（11）于8月30日前召开全苏区卫生科长会议。

在红军部队中，根据部队的特殊情况，中革军委先后对全军卫生防疫工作多次发出训令，提出要求。如1932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在《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中要求：各伙食单位的卫生委员会须立即组织起来，并建立起经常的工作，由各级卫生机关直接指导，要具体的做到下列各事：禁止吃辣椒、水酒、生水及苍蝇息过的饮食物；禁止赤脚（不打绑腿）、裸体，晚上必须用温水洗脚；禁止随地便溺、解大便、吐痰，要自挖厕所；要经常洗澡、洗衣、理发、剪指甲、洗［刷］牙，衣服、鞋袜打湿了要搭［晒］干的；要打绑腿穿草鞋（作战部队每月发洋四角），可能时并要穿袜套；睡前要熏蚊虫，睡觉要用高铺，不要受凉、受湿；要提倡各种运动、游戏、娱乐与大扫除；凡患疟疾、痢疾、溃疡及其他传染病，必须离开部队入医院，或随卫生机关休养。无论因何项病症而不能随队行进者，均须设法收容安置，不得遗弃路上；凡到医院或随卫生机关休养之伤病战士，每餐伙食费大洋二角；凡途中到各宿营地时，各队同志及地方政府均要招待吃饭睡觉，扶助病人。

1932年12月27日，红一方面军召开了第三次军医会议，作出了卫生决议案，该决议案分普通卫生、防疫方法、卫生宣传三章，每一章每一项，都规定得非常详细，便于操作检查。如“个人卫生”项规定：（1）饮食要注意清洁与新鲜，不可过饱过急，尤不可滥食杂品、油炸物、生果及腐败等物，生水不可饮；（2）身体必勤沐浴，理发每月两次，爪甲时常剪，口齿日必洗刷，头与足每晚必洗一次，衣服须勤洗换，生皮肤病及生虱的人的衣服要煮过；（3）不可裸体赤足，要打绑腿，足跌伤了或蚊

子咬了，不要用手抓；（4）夏天不可贪凉当风睡觉，烟酒宜戒；（5）劳动休息不可过度，每天须要八小时的睡眠，暑天应实行午睡一小时；（6）患皮肤病的人，每日须沐浴及换衣衫，积极加紧医治；（7）苍蝇飞集之食物不可食，病人的用具切勿用；（8）注意运动，参加早操及游戏等；（9）面巾牙刷不可共用。

1933年7月10日，中革军委还发出《关于在红军中检查体格的训令》，责成各级卫生机关“于每年一月与七月各检查体格一次。新兵入伍、新生入学校的时候，亦须检查一次。各级军事、政治机关亦应予以帮助和对指战员的鼓动。除方面军前方正在进行体格检查外，后方机关部队及各军区部队应于接到命令之日起，即进行检验，经检验之后，对于体格不合［格］（如老弱痼疾与有传染病的），不适宜于红军工作的，分别遣送回家或介绍地方工作”。

1933年9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还发布了《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详细规定了总卫生部医政司、保健司、材料司和总务处等部门的职责任务；规定总卫生部必须经常派员深入各部队、机关进行卫生工作巡视检查。关于部队卫生状况，要求巡视员必须了解：卫生委员会完全建立了没有？在群众中的作用怎样？卫生员在群众中起了何种作用？卫生员在群众中的信仰怎样？卫生员能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泛地号召群众有组织性地进行卫生工作？群众对卫生情绪怎样？能否注意卫生？生病的人多吗？为什么生病？部队中的清洁状况怎样？各种卫生运动进行没有？有什么成绩？部队中最不卫生的有哪几点？关于医院中患者与病房的卫生状况，巡视员必须了解：被服是否常洗？头发、指甲是否常剪？是否常洗浴？是否有吃不卫生食物？是否有其他不卫生行为？病房内外是否清洁？饮食物及用具是否清洁并合于营养？病房与床榻的设置是否合于卫生（如

空气、光线的适宜、传染病的隔离……)？厕所地点与大小便器是否完满与适当？废弃物是否随时埋入深山的泥土中（如脓血、棉纱及尸体等)？看护的服侍患者是否勤快与耐心？沟渠是否经常疏通，并用消毒药撒布之？上述要求，充分说明红军部队对于卫生防疫工作是抓得很紧、很细、很实的。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领导，无论是地方还是红军部队，群众卫生防疫工作都得到了较好落实。毛泽东在1933年11月对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时了解到：这个乡各村都建立了卫生组织，“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对于不讲卫生的人，“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①] 长冈乡是这样，其他各乡村也大都如此。可见，当时中央苏区的群众卫生运动，确实是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由于群众卫生防疫工作卓有成效，较好地控制了苏区地方和红军部队的各种常见病、传染病的发生，有力地保障了红军的兵源补充和红军部队的战斗力。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321页。

第十三章

“左”倾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的推行

第一节　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转移至红都瑞金

1932 年冬，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党的白区工作方面推行脱离实际的“左”倾政策，使党在上海等白区城市的工作遭受重大损失。在此之前，顾顺章、向忠发及共青团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相继叛变，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唐山市委屡遭破坏，临时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安全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提议，“将中共中央、［中国］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即全国总工会——引者注）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在上海只留下这些机构的全权代表”。1932 年 12 月 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同意采纳王明的建议。[①] 根据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临时中央于同年 12 月 14 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报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团以及总会的其他成员，包括伊思美洛夫、波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3 页。

戈列洛夫、梅尔库洛夫[①]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②] 共产国际很快同意了中共临时中央撤离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瑞金的计划。

有计划的撤离工作从1932年底开始。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化名唐开元，于是年底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接着，中共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也于1933年1月来到瑞金。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博古、陈云，也先后离开上海，经汕头、大埔地下交通线抵达瑞金。随后，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以及董必武、林伯渠、陈潭秋、罗迈（李维汉）、吴亮平等，都相继来到瑞金。

博古抵达瑞金后，即组织进入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原在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开会。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已进入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原在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成员，以博古为总负责人，博古、张闻天、陈云为常委。张闻天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1933年5月后为罗迈）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严重为秘书长。中共中央局机关设在瑞金下霄村杨氏私祠。

新的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以任弼时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公开宣布撤销，对外仍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行文。但从此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他们一方面通知毛泽东返回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一方面在中央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福建“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

① 分别为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后王云程未去苏区。

②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2月1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线”的斗争，错误批判处理了一大批支持毛泽东、对“左”倾“进攻路线”贯彻不力的省、县级干部，以扫除其“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推行的障碍。同时，又通过加委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对前方红军作战行动横加干涉与控制。这样，就使“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节 “左”倾领导者“分离作战”错误方针的提出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敌我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围剿”苏区的中路军，占据乐安、宜黄、南丰、南城和临川等县城固守，不敢轻易向苏区进犯。其东路军和南路军则基本上按兵不动。红一方面军如若抓住这一良机，在休整补充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向东北方向发展，可诱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同时依托赣东北苏区向闽浙皖边发展，巩固中央苏区。

可是，在瑞金的博古、项英、任弼时等人，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东北路线”，同时又念念不忘夺取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而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的政治代表和军事总顾问开始加强对中共和苏区红军军事行动计划的干预，同样反对红军采用“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战术。在这一背景下，博古、项英等人反其道而行之，命令红一方面军去进攻敌人固守的乐安、永丰、宜黄县城，与敌人争夺一城一地之得失。1933 年 3 月 25 日，结束草台冈战斗后未及休整的红一方面军，又匆匆北上，进攻乐安城。由于乐安守敌预有准备，战至 3 月 29 日仍未攻克。3 月 29 日，国民党军五个师增援乐安，红军被迫从乐安撤围，改强攻为佯攻，主力改为攻击永丰县城，以图围城打援，但国民党军害怕被歼，未敢出动，打援目的未

达。方面军主力停留在永、乐间待机达两个月之久。6月4日，方面军总部乘宜黄城守敌换防之机，指挥部队攻打宜黄城，经三天战斗，虽毙伤部分敌军，终因守敌有备，又未克城，更未调动敌军。就这样，红军主力在永、乐、宜地域徘徊两个多月，毫无战绩。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自5月中旬至6月上旬利用在永、乐间待机的战争间隙，完成整编，将原来的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建制，并撤销了军部编制，改由军团直接指挥各师。这次整编，减少了层次，便利了指挥，有利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开展大兵团运动战。

在此之前，项英为便于干预前方军事，于1933年5月8日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名义，加博古、项英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政治代表的建议，决定中革军委会机关从前方迁回瑞金，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这样，博古、项英就把红军作战的最高决策权——中革军委主席之职，抓到了自己手里。他们利用手中的军事最高权力，更加有恃无恐地对前方军事横加干涉。

1933年6月13日，博古、项英以中共中央局名义，将一份关于红军夏季作战的“长电”，通过电台发给了前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这份长电，是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其主旨是从战略上主张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两条战线上“分离作战”。具体规定以红五军团为主编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方面军主力第一、三两个军团，仍在抚河、赣江之间北线活动。作战任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方军以宁化、清流为总方向，消灭敌人新编第二师以及第四十九、七十八师等部队；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不

做大的行动，主要破坏永丰、乐安、崇仁间敌军的联系，寻机歼灭抚河、赣江间敌军旅、团以下小部队。

第二阶段，东方军以清流、宁化区域向北进攻，以将乐为总方向，消灭敌人第五十六师、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则向抚河方向发展，威胁南丰、南城、宜黄、乐安等县城，策应东方军作战。

第三阶段，东方军回师江西，前出至金溪县；方面军主力向东北前进，前出至崇仁县，会合东方军，一师一师地消灭敌人，集中全力进攻抚州，进而进攻南昌。

这是一个完全脱离苏区和红军实际的军事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实行这个计划是“两个拳头打人”，“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①。

不懂军事的博古、项英等人，对国际军事总顾问在上海制订的这一计划却奉若神明，坚决拥护。他们根本抛弃弱小红军应集中优势兵力于一个主要作战方向的原则，在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进一步发挥“长电”分离作战的构想，决定“为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拟改令彭滕率三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拨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十九军、宁化独七师、十九师、二十师及长汀以北和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5页。

周恩来、朱德对“长电”所拟作战计划持保留态度，更不同意博、项的提议。6月14日，周恩来电复中央局，对中央局对前方军事行动的批评与对“长电”的意见进行申述。博、项不仅不接受周恩来意见，反而对前方军事领导人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周、朱对“长电”所提作战计划贯彻执行不力，限他们在24小时内对“长电”作出答复。6月16日，周恩来致电项英，除继续申述外，请求宽限答复时间。在此情况下，朱德与周恩来于6月17日电复中央局，不得不原则表示接受夏季作战计划的方针，6月18日又联名致电中央局，再次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为执行昨电寅项所述原则且应将兴国第六师开来前方随着三军团行动，征集资材以便不失时机的牵制敌人主力，打击敌人一个师左右的兵力好增强自己（枪弹与给养补充非常急需）。”同时指出东方军入闽作战是“酷暑远征，且多大山”，“在选择敌人方面攻清流将乐又陷于攻坚；我力量将不能与十九路军一个师的增援队决战”，主张“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①。同一天，周恩来还单独致电博、项，说明，“正因有沪电，关系全盘利害及前途，故在同意它的总路线下，须仔细考虑它提出的具体步骤是否能够达到它所预期的要求，而不致将两月时光空空过去，甚至影响到许多不对的减员与减弱战斗力。这须从敌情、地形、物质条件与我们的任务各方面加以估计”②。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5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博古、项英对周恩来、朱德一再对夏季作战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十分恼火。他们固执己见，于6月22日连续给周、朱发出两封电报，严厉斥责周、朱二人。面对如此蛮横的军委领导，周恩来只好于6月23日电复中共中央局，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①

由此可见，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同在后方的博古、项英在红军军事战略方针与行动计划上不同意见对立的尖锐程度。

第三节 东方军入闽东征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不顾前方军事领导人的不同意见，执意下达了《军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十九师为东方军……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为配合作战，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宁清归分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后东方军仍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电联络。"②

红军东方军组建后，于7月2日以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左路，第五师为右路，直属队为中路，分别从江西广昌县之头陂、东坑、下坊地域冒雨向福建进军。7月5日，抵达宁化县西部的济村、禾口、茶湖冈地域。7月6日，东方军首长根据朱德、周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页。

② 据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资料室保存件。

来指示，下达了“迅速袭取泉上，准备打击其由清流来援之敌”的命令。

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扼宁化至归化（今明溪）交通要道。泉上周围筑有高8米、厚7米的土墙，并构筑有坚固工事，环墙外挖有河沟，沟外是一片水田。泉上镇里驻有国民党军卢兴邦新编第二师第三〇七团，另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地主武装四百余人。镇内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攻占泉上，可扫除红军向闽西北扩大苏区的障碍，并缴获一大批物资，同时通过围城打援，相机消灭永安或连城方向来援之敌，乘胜攻占归化县城。

7月10日，正当东方军攻打泉上的计划顺利实施之时，处在后方瑞金的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突然绕过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电令东方军只留一个团围攻泉上，并要求从这个团中抽出一部兵力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向归化东北一带游击，巩固已占领的归化地域；令东方军主力移师至清流以南适当地点，截击清流撤退或连城增援之敌。

中革军委的这一指令，打乱了东方军原定围攻泉上的战斗部署，结果不仅会导致泉上土堡难以攻克，也达不到围城打援之目的，还解决不了部队给养。周恩来、朱德等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于7月11日致电项英，不同意改变原定作战部署：在敌未动之先以红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不妥，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指出：“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红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① 同日，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另一份给博古、项英、刘伯承的电报中，周恩来又陈述道："我意如果敌情不出意外变化，行动步骤不宜扰乱，机动亦须与正在执行的战场方针相合。目前，三军团不断获得胜利，即由于我们依一贯方针，步步实施，而敌人处于被动步骤。在这里，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是战斗中大忌。"①

博古、项英等根本听不进周恩来的意见，仍然我行我素，滥施权力，对前方军事行动横加干涉。周恩来忍无可忍，7月20日再电项英，指出："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在战术问题上须估计到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决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②

由于周恩来、朱德力排来自后方的博古、项英的干扰和东方军首长彭德怀、滕代远的果敢指挥，7月19日，东方军终于攻克泉上土堡，歼灭地主武装400余人，缴获步枪925支，轻重机枪9挺，短枪71支，迫击炮2门，各种子弹5万余发，以及大批粮食、食盐、现款和其他物资。同时还进占清流，收复大片地区，使宁化、清流、归化、建宁连成一片，胜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东方军稍作休整后，又于7月26日从宁化、清流南下连城作战。7月30日至31日，在连城朋口及莒溪歼敌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两个团，8月2日午后4时乘胜进占连城县城，8月3日再在小陶追歼逃敌第七十八师一个团。总计在南下作战中共消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② 《周恩来致项英电——对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1933年7月20日），据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保存件。

灭敌第七十八师约三个团，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军粮一千五百余担，恢复了连城、朋口、新泉大片苏区。

在东方军入闽作战过程中，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中共军事总顾问继续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军事行动指手画脚，横加干涉。7月中旬，他们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连续致电瑞金中共中央局，对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滕代远等从实际出发指挥东方军行动不满，傲慢地指责说：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不敢怠慢国际代表的指示，不顾前方军事领导人反对，继续干涉东方军行动。8月7日，周恩来再致电中共中央局并项英等，对中革军委轻率改变东方军作战部署一事提出批评。

根据前线敌我态势变化，红一方面军总部于8月15日电令东方军由连城地区北上顺昌、将乐、南平地区，发起第二阶段作战。

顺昌、将乐、南平一带地区，主要由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和新编第四旅周志群部驻守。其分布是：第五十六师师部率第一六六旅一部在南平，第一六六旅主力在洋口、峡阳、顺昌；第一六七旅在建瓯、建阳；第一六八旅在将乐。新编第四旅在邵武一带。谭启秀的补充师在水口以东地区。

为加强东方军的作战力量，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指示，对东方军的编成进行了调整：红三军团第六师（由兴国模范师改编）归还建制，增调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加入东方军，仍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另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红二十师为抚东支队，由董振堂、朱瑞指挥，配合东方军作战。

8月16日，东方军由隔川、连城、文亨等地挥师北上。原属东方军指挥的第三十四师留驻南线，巩固连城地区。19日，东方军主力进至归化，23日进占夏茂地区。25日和26日，东方

军先后进占洋口、峡阳，击溃敌第五十六师一部，缴获机枪4挺、火轮3艘，食盐7.5万公斤，现款3万余元以及大量军用品。接着，东方军所部连续进行围攻将乐、顺昌、南平的战斗，采用围城打援战术，于9月3日在夏道渡口歼敌援军第十九路军补充师1个营，击溃其2个营，缴获重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汽车2辆，汽轮8艘，子弹4船，食盐3.5万公斤。9月18日，又在芹山战斗中歼敌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俘敌400余名，毙敌200余名，缴获敌军团旗1面，步枪500余支，机枪20余挺及大批军用物资。9月25日，因国民党军对黎川县城发动进攻，中革军委决定结束东方战线的作战。东方军遂向泰宁集中，准备返回江西作战。

从7月2日到9月25日，红军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冒着酷暑远征，以高昂的斗志，克服各种困难，打了许多胜仗、恶仗，取得了“赤地千里、筹款百万”的重大胜利。但是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由于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不能集中兵力使用，使东方军打得很疲劳，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四节 红军中央军在抚赣地区日趋被动

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五军团留在抚河、赣江间活动。其主要任务是破坏敌军的联系，进行钳制性作战，配合东方军行动。

1933年8月中旬，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布训令，将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第十四师及独立第一、二、三、四团，正式组成红军中央军，由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分别兼任中央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由于红军实行“分离作战”，而且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

问和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等赋予红一、五军团和中央军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所以从1933年7月至9月间，这两支红军主力在抚赣地区日趋被动，基本处于无用状态，只进行过一些小的游击活动，仅8月31日的乌江战斗获得全歼敌第八十师的胜利。

乌江位于吉水县城东边约二十公里的恩江左岸，是个较大的圩镇。当时，国民党军企图在中央苏区北线的赣江到抚河一线，构筑一条钢铁封锁线，在恩江沿岸的吉水县城附近驻有敌第九十三师，枫坪驻有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永丰县城驻有敌第十、八十三、二十七师各一部。8月29日，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进至枫坪与永丰县城之间的乌江修筑碉堡。此时，红一军团主力正好在乌江东南约二十公里的茶口以东地区活动。敌第八十师的行动，很快为红一军团第一师侦悉。红一军团首长果断决定利用这一带地形有利于红军隐蔽部队的特点，以奇袭手段，消灭乌江这股敌人。8月30日，红一军团主力第一、二师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军团部命令第一师（不含第一团）于8月31日凌晨3时出发，经八江、桑园（今双源）绕至乌江西北，切断乌江至吉水的交通，并钳制枫坪敌军，战斗发起后由西向东攻击；命令第二师及第一师第一团，由第二师师长徐彦刚和政委胡阿林率领，经桑园从正面向乌江之敌展开攻击；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委聂荣臻带领军团指挥机关随红二师跟进。当天部队展开后，适逢大雨如注，雷电交加。红军各部利用这一恶劣天气，出敌不意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对乌江之敌形成四面包围。至当日下午7时许，经四小时激战，敌人除一小部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共消灭敌军四千余人，其中被击毙一千余人，俘虏两千多人，俘虏中包括敌第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和团营级军官多名，缴获步枪两千多支，枪重机枪五十二挺，迫击炮八门，无线电台两部及大批弹药和军用品。

红一方面军由于实行“分离作战”，东方军和中央军天各一方，各奔战事，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未能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进而对国民党军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有了充裕的时间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而红军却没有利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有利时机，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动员各方面力量，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必然使红军在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第十四章

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一节　第五次反“围剿”前的敌我态势

一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不久，蒋介石于1933年4月25日在南昌科学馆召集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会议，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强调“相机应变，知己知彼”，鼓励部下着力研究“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同年5月初，蒋介石偕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来到江西崇仁县城，召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军官包括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开会，大肆叫嚷：“中国的大患不在东北而在江西。江西的‘共匪’是中国的心腹之患，如不剿灭，将死无葬身之地。有匪无我，有我无匪。如再侈言北上抗日者，即以抗命论罪。”[①]蒋介石回到南昌后，于5月13日至17日在南昌召开政治训练会。5月21日，重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总

---

① 宋瑞柯：《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攻纪略》，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转引自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20辑，1991年12月，第226页。

管“剿匪”指挥之职。

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赣、闽、粤、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筹划对红军和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会议确定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策略方针。蒋介石根据柳维垣、戴岳等人提出的“堡垒政策”建议，在南昌行营内设立了碉堡专课，专门从事碉堡设计、指导事宜，随后颁布了具体实施办法。

为深入研讨新的“剿匪”战略战术，从1933年7月开始，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白鹿洞等地举办“军官训练团”，用两个多月时间分批训练参加第五次“围剿”的排长以上国民党军官。蒋介石手书“军人魂”三个大字高悬在海会寺团部辕门上；委任心腹干将陈诚为军官训练团团长，并不惜重金聘请赛克特等数名德国、意大利军官前来充任军事顾问；以“军学泰斗”、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总教官。蒋介石在牯岭饭店对全体教官和顾问说：“这次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蒋介石师承曾（国藩）、胡（林翼），练军兴学，强调“礼义廉耻”，精研“山地战术”。他亲自授意编写了一本《“剿匪”手本》，以及《“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等，军官人手一册。每期开训，蒋介石都亲临讲堂，对军官们耳提面命，极力鼓吹“新精神”，叫嚷“不成功，便成仁”，灌输反共思想和“剿匪要诀”。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洗脑”的学员共有7598人。结业前每人发佩一把刻有蒋介石题签“军人魂”三字的短剑。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采取了一些新的策略和手段：政治上，加强法西斯统治，确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原则，颁布《整理保甲方案》，在接近根据地的地区加紧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严密控制居民言行，使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紧密结合，推进和巩固军事“进剿”的成果。经济上，大举外债，加征捐税，发行“关税库券”，以充作内战经费；加强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邮电和交通封锁，企图“车干塘水捉鱼”，困死、饿死苏区军民。蒋介石称“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以后对于匪区封锁的种种办法，一定要严切实行，这一点比和土匪作战还更重要”，“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程度，所以凡属要紧的地方，无论隘路碉卡围塞岔路，如果有点怀疑封锁不严密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想种种方法去检查防范”。①

军事上，为适应与红军进行山地作战，蒋介石下令对部队进行整编，师以下撤销旅一级建制，每师直辖三个团，并在师、团两级增设侦察队，扩充运输队。军事力量方面，在保定等处招募新兵，扩编十余个师，并从各省抽调部队入赣，同时购进大批新式武器装备部队。

南昌行营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一、二、三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及税警总团，担任对中央苏区的主攻。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第一、二、三纵队共9个师又3个旅，以一部在莲花、酃县一带“围剿”湘赣边境永新、宁冈两县之红军；主力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湘鄂赣边境构筑封锁线，逐步围歼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孔荷宠部和湘赣苏区红军主力蔡会文部；另以一团维护岳阳、长沙后方安全；待将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主

① 蒋介石：《“剿匪”战术的要点》（1933年6月12日），转引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训处编《扫荡》旬刊第24期，1933年10月30日。

力消灭后，全路军再向赣南推进，协助北路军“进剿”。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第一、二、三军共11个师又1个旅，于赣粤边境之上杭、武平、寻乌、信丰、大余等县及赣州城间构筑绵密之碉堡群，防止红军南进或西渡赣江，并逐步向前推进，合力围攻赣南红军。空军5个队100余架飞机，部署于南昌、临川、南城一带，分别担任通信、补给及侦察轰炸，协助地面部队进剿。此外，还有十九路军6个师和1个旅驻守福建，防止红军东进。

国民党军“围剿”江西苏区的军队，计达53个师又8个旅（不含福建十九路军所部）和5个航空队，总兵力50余万人。此外，国民党军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练新兵150—200个团，以不断补充其“进剿”军主力。

二 红军反“围剿”的动员和准备

中央苏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对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早有察觉和准备。从1933年6月开始，中共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领导苏区军民，着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准备工作。

一是整编和扩充红军。1933年6月前完成了由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的整编工作。整编后，红一军团辖第一、二、三师（第三师后划归红九军团），红三军团辖第四、五、六师，红五军团辖第十三、十四师（第十四师后划归红九军团），方面军直辖第二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为发展壮大红军，从1933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提出了“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口号，开展了大规模扩红运动，使红军总兵力增加到12万人。同年10月，还新组建了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红七军团辖第十九、二十、二十

一师，红九军团辖第三、第十四师。

二是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1933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全苏区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提出了“粉碎敌人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村苏区土地”、“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①。7 月 30 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训令》，要求在 1934 年 1 月前完成 20 个充足的新编师，并使每师有一个充足的补充团、建立 16 个独立师。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支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围剿”。10 月 18 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政府“用尽全部力量来进行战争的动员”，“务使苏区每一工农，都要了解粉碎五次‘围剿’战斗的意义，来热烈的踊跃的进行参战工作”②。按照这一要求，各省、县、区、乡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都将战争动员列为会议的重要内容，并在全苏区军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

三是建立了从后方通往前线的三条后勤运输线，确保红军作战物资的补充和伤病员的后送。这三条运输线是：从瑞金、太雷、石城经建宁、泰宁至黎川为第一运输线；从瑞金、长胜、博生到广昌、南丰、康都为第二运输线；从胜利、兴国、龙岗至永丰、公略、万泰为第三运输线，划定赣、于、信、安、会、武等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6—277 页。

②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02 页。

县担任西南线运输任务，连、清、新、汀、永、杭等县担任东南线运输任务。同时征调三万六千余名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随红军主力行动，支前作战。

第二节 红军反"围剿"错误方针的推行和李德的到来

一 红军反"围剿"错误方针的推行

从中央苏区军民以上反"围剿"准备工作情况和以往反"围剿"斗争历史来看，中央苏区军民对即将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具备胜利条件的：从敌我力量对比看，第一次反"围剿"时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时是6∶1，第三次反"围剿"时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是6∶1，而第五次反"围剿"是4.2∶1，敌我兵力对比虽然悬殊，但比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却好得多；从红军反"围剿"的物资准备看，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之时，正是中央苏区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充裕战争物资的时期，也是中央苏区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的全盛时期；从红军的后勤保障看，与前四次反"围剿"战争相比，红军后勤保障体系更趋完善有力。因此，只要方针政策正确，领导指挥得当，夺取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是有可能的。

然而，中共中央"左"倾领导者们偏偏在指导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策略方针方面出了重大问题，犯了严重错误。

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军事作战行动决策权力，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在项英、博古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手中。曼弗雷德·施特恩对中央苏区军事行动提出的方针策略，大都严重脱离苏区实际。项英、博古等对曼弗雷德·施特恩的指示和建议却言听计从，总是

“挟天子以令诸侯”，贯彻执行不遗余力。他们凭借自己掌握着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大权，既反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成功运用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又不分析研究敌人即将实行的新的“围剿”策略，强令红军分成东方集团军和中央集团军，实行“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口号，实行消极防御、同强敌打阵地战、拼消耗等错误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局即陷于被动境地。

二　李德的到来

1933 年 9 月底，共产国际派任的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这就使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指令更具威权，贯彻执行得更加彻底，使错误的战略方针贯彻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中，加剧了被动局势的恶化。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译为 O. 布劳恩），俄文名字瓦格纳。德国人。1900 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19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在德共中央从事过情报工作，曾两次被捕入狱。1928 年越狱后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 年春毕业后，他以奥地利公民的身份携带护照由苏军总参谋部派遣，以旅游名义来到中国，从事营救苏军情报人员鲁格夫妇的特别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于 1932 年 11 月来到上海，苏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指令他在行动和财务上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代表处领导。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在莫斯科时就与他相识。博古不懂军事，便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代表埃韦特请求派瓦格纳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同年 12 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代表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

亚特尼茨基书面报告了瓦格纳（埃韦特称之为“邻居”）的到来，并说“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①]。1932 年 12 月 31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致电共产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指示说：“瓦格纳应去苏区。行前发给他每月 200 元的薪金和去苏区的旅费。在那里他应从当地朋友们[②]那里领取薪金。”[③] 这样，瓦格纳便被认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德。1933 年 4 月，共产国际又给中共中央派来一位军事总顾问，他就是美国共产党员曼弗雷德·施特恩，这样李德又受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节制。

1933 年初博古等从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李德亦打算以传教士身份秘密前来中央苏区，但因未能及时办理前往广东的护照而耽搁了行程，便留在上海收集、研究中央苏区军事资料，为其充当军事顾问作准备。1933 年 3 月 5 日，李德就关于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坦率地认为，国际上包括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红军力量估计过高，有不少夸大宣传之处。同时他认为：“即便在组织了正规部队并以老苏区为根据地的地区，红军也还未完全摆脱游击战的思想和作战方法。这就使得红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一些新的地区和防御较差的城市，但也很容易很快失守。他们回避决定性的战斗，不去强攻设防的据点。在这方面已有明显的转

---

①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2 号报告》（1932 年 12 月初），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4 页。

② 即中共中央机关。

③ 《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1932 年 12 月 31 日于莫斯科），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8 页。

变，但还远远不够。”①

由此可见，李德从一开始就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略战术不屑一顾。

1933 年 9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为李德办理了公开由上海前往广东考察的护照，随后便由“红色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前往汕头，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彭年亲自护送。李德身穿紫红色短袖风衣，胸前佩挂银质十字架，俨然如奥地利基督教牧师。行前，中共上海中央局专门用密电通告瑞金。博古将迎接和护送李德进入苏区的任务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邓发又将此重任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卓雄。卓雄受命后从长汀河田出发，星夜带领全副武装的小分队十余人，赶到大埔县青溪交通站，接到这位外国“神甫”。经六七个夜晚，走了几百里山路，经永定、上杭抵达才溪。在才溪等候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按中央命令将军区部队中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组织一个战斗团，迎接和护送李德于 1933 年 9 月底安全抵达瑞金。

李德到瑞金后，博古专门召集在瑞金的中央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开了个欢迎会。作为共产国际直接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受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斯特恩的节制，使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建议在中共和中央苏区得到切实贯彻执行，是李德的主要职责。共产国际对李德的职权亦作了限定（即“没有指示权力”）。但是，博古却将李德视为“太上皇”，擅自决定由李德主管红军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同时负责部队训练和后勤组织；还决定李德可参加中央及军委的

① 《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 年 3 月 5 日于上海），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0 页。

各种重要会议。所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接受他的指导和监督。为便于李德工作、生活和安全保密，博古指令有关部门在瑞金下肖村中央局驻地对面的一片田埂中，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幢两室一厅的房子（人称“独立房子”），供他居住和办公。军委还专门调来精通俄文的伍修权、王智涛充当翻译。在生活方面，给予优厚的特殊照顾，并由组织出面物色了一位在团中央局工作的广东姑娘肖月华做他的妻子。

这样，在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就将红军的最高作战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这个既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红军特点，又毫无红军战争实践经验的外国革命者，这就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埋下了祸根。

第三节 红军反“围剿”开局失主动

一 震惊于黎川之失，发起硝石、资溪桥攻坚战

蒋介石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9月下旬开始。他抓住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福建和江西分离作战、中央苏区北线防御兵力薄弱之机，下令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

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是其北路军所辖33个师又3个旅，而北路军中的主力又是以陈诚为总指挥、薛岳为副总指挥的第三路军，共有18个师又1个补充旅，其任务是在第一、二路军配合下，依托碉堡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作战。第三路军以14个师1个旅编为第五、七、八纵队，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另以4个师1个旅编为守备队，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在抚州附近地区，还布置有第十三、三十六、八十五师为总预备队。9月25日，国民党北

路军之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九十六师，分别由南城、硝石向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黎川县城进攻。

黎川位于赣东之闽赣边界地区，东连福建光泽、邵武，南达福建建宁、泰宁，西通赣东南丰、南城，北出赣东金溪、资溪，是沟通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系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防守黎川县城的红军兵力，只有闽赣军区教导队七十余人和一些地方武装，兵力十分薄弱。此时，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军东方军正在围攻将乐、顺昌；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中央军还在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中革军委仓促电令东方军迅速从将乐、顺昌地区北上泰宁地区，以图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再会合抚河以西地区的红军部队，与敌在抚河会战。但都远水难解近渴。面对敌军进攻，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只好指挥部队掩护城内机关和人员物资撤离县城。9 月 28 日，国民党军进占黎川城，在中央苏区北线撕开了一个口子，切断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

黎川失守，诚然可惜。然而，红军只要采取适当措施调动敌人，在运动中予敌重创，不仅可以收复黎川城，还能为下一步反“围剿”作战创造条件。黎川失守当天，周恩来、朱德致电博古、项英，建议待东方军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主力突击飞鸢敌之侧背，并以二十师突入金溪、浒湾之间，以调动敌于运动中给以各个消灭。可是，博古、项英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越过方面军总部，直接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火速离闽返赣，收复黎川。10 月 2 日，李德制订了红军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命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钳制驻守南城、南丰之敌。朱德和周恩来认为硝石敌军已筑有坚固碉堡阵地，不易攻取，

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建议东方军和中央军两军主力必须迅速靠拢，创造条件后再与敌主力决战。项英却电复说中央军无论何种情况都不能过抚河，反对两军主力会合，继续执行“分离作战”方针。

10月6日，东方军在北上黎川途中，在黎川县东北的飞鸢，不期与敌北路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十八旅遭遇，激战后将其两个团击溃，歼其一部。敌另一个团退守洵口，同敌第十七旅一个团会合。7日，东方军第四、五、二十师向洵口之敌发起猛攻，歼敌三个团（欠一个营），俘敌旅长葛钟山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余人，缴枪一千一百余支。

飞鸢、洵口遭遇战意外获胜后，红军本应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变化，迅速创造和捕捉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更多敌人。博古、项英和李德等人却不听朱德、周恩来建议，坚持命令东方军进攻硝石。而国民党北路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已料定红军必攻硝石，早已命令驻守硝石的第二十四师收缩兵力，构筑强固工事，迎击红军进攻；同时命令其驻黎川三个师和南丰、南城之敌各约四个师，随时准备驰援硝石。10月9日，东方军开始进攻硝石，连续攻击五日不克，伤亡千余人。13日，敌第九、十一、十四、九十四师，由南城进抵硝石；第九十、六十七师等部进驻新丰街；第八纵队一部兵力由黎川向硝石开进。东方军已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中革军委这才下令东方军停止进攻硝石，撤出战斗。

东方军从硝石撤出战斗后，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按照蒋介石训令，迅速调整兵力部署，命薛岳率部进占资溪桥，首先完成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尔后吸引红军进攻，企图将红军歼灭于资溪桥、硝石地区。10月17日，薛岳率第九、十一、十四、九十四师等部，由硝石地区推进至潭头，次日先头部

队进占资溪桥。周浑元亦同时以第六师第十八旅驻守黎川，自己亲率第五、九十六师和第六师主力，开至资溪桥地区，归薛岳指挥。这样，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二十公里宽的地区，国民党军就集中了七个师又一个旅兵力，构筑堡垒，准备与红军决战。

博古、项英和李德等人不总结硝石战斗失利教训，亦不察敌军兵力部署新的变化，仍然按预定计划调集红一、三、五军团主力，并以红三军团为主攻，发起资溪桥战斗。10月22日，红军开始向资溪桥发起攻击。薛岳、周浑元十分谨慎，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很少出击。红军连续进攻四日，未能牵动国民党军，自己反遭重大损失，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被迫下令停止战斗。

二　拒绝突击东北方向，坚持在敌堡垒群间强攻硬拼

鉴于硝石、资溪桥两次战斗失利，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滕代远曾于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多次提出红军应集中兵力，脱离敌堡垒地带，向东北方向突击，依托赣东北苏区活动，进而威胁苏、浙、皖等国民党心脏地区，调动国民党军北进，在无堡垒地带实行攻击。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建议。可是，博古、项英、李德等人拒绝采纳这一建议，"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于1933年10月14日致电博古、李德等人，对中央苏区红军行动提出建议："（1）创造新局面，恢复行动自由。（2）改变敌人主攻方向，把敌军从中央苏区引开。（3）实行运动战，以赢得时间。（4）突破进攻者内线，击溃赵观涛或樊嵩甫纵队。（5）争取同我赣东北军队实行积极配

①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合。这些行动计划是第一部分。时间约两周。兵力是东方军主力。"①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这个建议，尽管与彭德怀等的建议相比较为保守，应该说也是可行的，比博古、李德等坚持进行硝石、资溪桥战斗的愚蠢计划要好。但是，博古、项英对共产国际的这个计划表示拒绝。10月20日，博古复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答复说："由于计划是建立在放弃内线作战和绕过敌人翼侧镶嵌推进的基础之上的，军事委员会不能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军事委员会认为，现在保存我们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我们的主要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将我们85%的有生力量绕过敌人翼侧推进和放弃内线作战，这种战术是极其危险的。"博古还报告说："瓦格纳同志只是解释了你们的电报，但没有积极坚持执行这个电报。"②

博古、项英、李德等顽固坚持要红军在敌军堡垒群间寻战。资溪桥战斗后，他们指挥红军主力在南丰、南城、黎川和金溪之间敌堡垒地带左冲右突，强攻硬拼，先后于11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浒湾、八角亭战斗，11月17日至19日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每次战斗红军均遭受重大损失。其中浒湾战斗红三军团伤亡七百余人，红七军团伤亡三百余人；大雄关战斗中，红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均负伤，第二师政治委员胡阿林负重伤后牺牲。

博古、项英、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们对于红军一次次失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10月14日），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7页。

②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页。

利，根本不愿从失败中总结吸取教训，反而将失利责任推给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领导，把浒湾战斗失利责任强加给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军团长萧劲光身上，下令将萧劲光撤职，调往建宁总部审查。后来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责任。可是，“左”倾领导者又以黎川失守为理由，指责萧劲光犯了“退却逃跑”错误，将他打成了“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蛮横地将萧劲光公审、判刑。11月20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就10月中旬战役失败问题致信红军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强调说：敌人的堡垒“不是不可征服的障碍，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①]。

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于1933年11月中旬命令组建了红军西方军。西方军由红军工人师（欠一团）和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三团等部组成。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任西方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西方军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的西北战线，阻挡敌北路军第一路军的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由于陈毅灵活机动的指挥，西方军以游击方式与敌周旋，牵制了敌军部分兵力，阻止了敌军在西北战线的推进速度。

第四节　“福建事变”发生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不同处置

一　十九路军的媾和要求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震惊一时的“福建事变”（亦称“闽变”）。

---

①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旬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1992年，第117页。

十九路军曾于1931年参加过“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调防上海。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官兵进行了著名的“淞沪抗战”。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极为不满，1932年6月将其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十九路军驻防福建后，所部分驻福州、厦门附近和漳州、龙岩等地，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处于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及粤军陈济棠势力的夹击之中，处境困难。

1933年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发表致19路军呼吁书”，呼吁十九路军响应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三条件下，与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共同反日反蒋。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为改善生存环境，权衡再三，遂于1933年6月主动通过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女士，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取得联系，建议“通过廖夫人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进行谈判”，并表示“同意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193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通过绝密电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报告了这一重要信息，并表示“我们将谨慎行事”。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得悉远东局提供的上述情况后，于1933年6月24日致电共产国际驻上海政治代表埃韦特，指示说：“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3页。

战线，而现在谈判会成为陷阱。建议您不要与任何人直接进行谈判。您应当从中国同志们那里获得信息。如果他们与什么人进行谈判，那么他们只能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进行。在各种重要情况下，他们都应与您商量，而您也应告知我们。总的来说，您应该只限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保持联系。”① 1933 年 7 月 2 日，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回电表示：“我们认为，19 路军司令的建议是不严肃的。我们已建议［中共］中央谨慎行事。”②

很显然，早在 1933 年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就希望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十九路军领导人也主动要求与红军合作反日反蒋，但却遭到共产国际反对。

1933 年 7 月至 9 月间，彭德怀、滕代远率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给了十九路军沉重打击。严酷的现实使十九路军领导人更感与红军停战合作之迫切。由于共产国际驻华机构不愿与十九路军直接接触谈判，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便在 9 月 22 日红军东路军围攻福建延平期间，派出陈公培为代表，携带蒋、蔡于 9 月 16 日写给朱德、毛泽东的信，直接来到延平，求见彭德怀。蒋、蔡致朱德、毛泽东信函称：“贵党及红军同胞，夙以反帝倒蒋为职志，此即证明贵党与敝军团在政治上有共同的目标，在军事上有提携之必要，特此委托陈公培同志与贵党为军事合作的磋商。敝军同志甚希望贵党及红军同胞予以最诚意的接谈。此致朱玉阶、毛润之两先生，钧此致意，蒋光鼐、蔡廷锴。九月十六日。”③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45 页。

② 同上书，第 447 页。

③ 此为彭德怀、滕代远于 1933 年 9 月 22 日 19 时抄录转告项英、朱德、周恩来的电文保存件。

彭德怀于22日当天即将蒋、蔡求和一事电告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接彭德怀电报后，立即于同日18时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提出与蒋、蔡代表接触会谈意见。随后周恩来又第二次致电军委项英代主席并彭德怀、滕代远，说："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吾常笑之为军阀的清客。如军委同意本二十二日十八时电办法，可由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①

彭德怀、滕代远接周恩来电报后，于22日21时就与蒋、蔡谈判之条件及所用之名义，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请示。9月23日8时，项英复电朱、周、彭、滕，同意派袁国平与陈公培谈判。彭德怀遂遵令热情接待了陈公培，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②。

这一史实说明，对于与十九路军的停战谈判，中共和红军领导机关的态度是积极的，并且有违共产国际意愿。

二 反蒋停战协定的签订与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报告了十九路军向中共提出的谈判建议具体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遂不再反对中共与十九路军接触谈判。1933年9月27日和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分别从上海和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对与十九路军谈判方针作出指示。其要义，就是要求中共对十九路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②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的合作不要过于真诚认真，而应立足于尽量对其利用并从内部瓦解之。9月27日从上海发出的电报告诫中共：“始终存在着19路军不执行停战条件的很大可能性”，因此“同19路军的谈判应尽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特别是在与签订停战协定有关的军事问题上”，在谈判时“我们应该争取得到最多的东西”①。9月29日从莫斯科给中央苏区的电报更明确地指示说：“对19路军的策略应该是：（1）把游击队放在它的后方。（2）通过进行初步的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3）要表示出不同它的部队作战的愿望，并在它最近归还的土地上自由确定边界……我们应该推迟同19路军算账的时间。”②

对于共产国际关于与十九路军谈判合作的指导方针，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不能不执行。

1933年10月间，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一行经闽西抵达瑞金。中共中央局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派出潘健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正式谈判。由于十九路军领导人对与中共和红军合作确实抱有诚意，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基本满足了中共和红军方面的要求。1933年10月26日，双方代表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为：“（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各在该线不得控制主力部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本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如民众抗日反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608页。

② 同上书，第514—515页。

帝同盟，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四）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定本协议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五）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六）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七）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八）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九）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协定。（十）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存照。”①

潘汉年、徐名鸿代表各方草签协定后，双方即互派代表，开始履行协定内容。红军方面派驻福州的代表是潘汉年、黄火青；十九路军派驻长汀的代表为陈小航。11月27日，十九路军代表陈小航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在长汀谈判，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规定了连城、龙岩、上杭、永定等地双方驻军地域范围；恢复通商并准许双方商人自由买卖；建立由龙岩到新泉和龙岗至金砂两条交通干线等。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电反蒋；22日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设首府于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公推李济深为主席，以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11人为

① 《红色中华》第149期第4版，1934年2月14日。

政府委员，下设各政府机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改了年号，换了国旗，组了内阁，建了新党，并发表了宣言和政纲，提出了“反对以法西斯为灵魂的国民党”、“反对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等主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得到福建省各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一时震惊神州大地。福建事变的发生，在蒋介石阵营也引起极大震动。据博古于1934年1月1日从瑞金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电报说：“蒋军第七纵队司令吴奇伟已派代表到福州，开始同我们的代表就互不侵犯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并表示了反蒋意图，他把密电码交给了我们的代表。同时蔡廷锴告诉我们的代表，蒋军中央纵队副司令、陈诚的助手薛岳也有这样的意图。”① 中共中央已指示驻福州的代表与吴奇伟和薛岳方面接触，准备与他们谈判。

三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对执行协定的不同态度

中共和红军方面，对于协定的执行是严肃的。193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说：“19路军不愿意公布我们同它签订的协议，更希望不要急于拿出关于购买武器、交易量、交换各种商品的各种协议的证据。为了避免关系破裂和改善我们的军事状况，同时利用我们的战绩在斗争过程中得到较好巩固的情况，也为了工农的利益，我们满足了这些要求。”②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政治代表埃韦特，却以草率的态度对待协议的履行。他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甚至连中共中央驻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2页。

上海的代表也不通知，就擅自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名义，接受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其他外国报纸记者采访，通报了中共和红军与十九路军签订的秘密协议和互不侵犯协议；在通报中对一些重要问题又犯了许多错误，对许多问题的阐述都与中共的意见背道而驰，如将蔡廷锴领导建立的新党组织和参与事变的社会民主派，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等。①

埃韦特的这一举动，令中共中央处于非常被动和困难的境地。1933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此提出意见。可是，埃韦特却于同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辩解说："接受记者采访是因为需要尽快不失时机地在报刊上进行鼓动宣传以建立联系才发生的。谈话中所犯的错误可以通过逐步地说明党的观点加以纠正……为了我们的利益，需要以这种谨慎的方式向群众、哗变的士兵和 19 路军作出最低限度的通报。认为这个举动本身和所公布的立场可能导致关系破裂，这种意见是不对的。"② 1934 年 1 月 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回电中共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批评意见，认为埃韦特的"这种行为是绝对错误的"，并表示坚决谴责这种行为，要求中共中央与埃韦特一起"寻找纠正这种错误的方式方法"③。

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心急如焚，十分害怕红军与十九路军联手对付国民党军队，担忧红军进至苏、浙、皖地区，在其心脏地域捅上一刀。为迅速镇压事变，蒋介石一面派人对十九路军一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52 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3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54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些将领游说，收买拉拢；一面从江西抽调北路军九个师，由沪宁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入闽对十九路军进行“讨伐”，其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队，暂取守势。

福建事变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毛泽东向博古等人提出，红军应抓住这一机会，组织有力兵团突击至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彭德怀“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①。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三、五军团侧击由江西入闽之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之后方，截击敌之联络运输。张闻天也认为应该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军事同盟，互相支援配合作战。这些建议和主张，都是打破蒋介石“围剿”、支援十九路军的良策。

但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的上述建议与主张，都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当十九路军同红军仍在媾和谈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于1933年11月6日从上海给中央苏区发来电报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在12月份的作战行动中，以第五、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组成一个集团军在抚河以东活动，相机北上东乡、进贤地区，打击敌北路军后方联络线；以第九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担负苏区北线防御任务；由第三军团、二十二师等部队组成南方军，并以三军团从赣江上游

①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良口地区渡过赣江先在西北方向发起战役，然后与二十二师一起向西南面的粤军出击；红一军团亦同时在万安地区西渡赣江，同三军团一起在西北方向采取行动。①

很显然，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上述建议，对于中央苏区来说，完全是南辕北辙，完全脱离中央苏区实际。

当蒋介石调集重兵入闽讨伐十九路军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不仅不要求红军组织有力兵团，向入闽讨伐的蒋军出击，以援助十九路军；相反却建议红军设法让十九路军在邵武地区与蒋军发生冲突，希图他们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②。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甚至主张红三军团以援助十九路军为借口，保持住漳平、屯岗（音）地区基地，以便将来便利红军在东北战线作战，同时封锁十九路军向广东撤退的道路；还要求红军加快瓦解十九路军之第四十九师，将该师士兵争取到红军方面来。

朱德、周恩来出于对革命事业、对苏维埃高度负责的责任心，于12月10日积极主动部署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团村截击南进的国民党军第八纵队，以牵制蒋介石在福建的“讨伐”作战。团村战斗，红军毙伤敌近千人，但红军亦伤亡巨大，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和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师长吴高群牺牲。之后，周恩来、朱德再次要求集中红一、三、五、九军团及红七军团一部，在闽赣边东山、德胜关间与敌决战，以求歼敌一两个师，以援助十九路军。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94—59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但是，博古、李德等迫于共产国际压力，没有同意周恩来、朱德请求，而是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11月6日电报指示要求，于12月20日下达了《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将红军主力第一、三军团及四个独立团编成西方军，命令他们西进，向赣江边的永丰地区突击；只留红五军团和红七军团及少量地方部队编为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游击；将第九军团及两个独立团编为中央军，在东方军左侧活动。结果，西进的一、三军团不仅反攻未成，反而因进攻固守碉堡的敌军而遭重大伤亡。东方军和中央军也毫无成绩。

为加强对前方红军作战行动的控制，使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战略战术意图能更好地得到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旨意，1933年底，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决定再次撤销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和领导机关从前方撤回瑞金，合并到中革军委机关。前方红军的军事行动，由中革军委（主要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直接指挥。

1934年1月初，蒋介石亲抵闽北建瓯前线，指挥入闽“讨伐”的军队向十九路军发起总攻。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仍持一种“坐山观虎斗”的超然态度，于1934年1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由红五军团、红七军团等组成的东方军和第九军团互相靠近行动，防备蒋介石军队调过头来进攻主要苏区，并坚持要红一军团抽出一个师和两个独立团西渡赣江，在南昌至九江铁路线地区开展作战行动。①

---

① 《施特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此时，博古、李德等对十九路军的可能失败已预有唇亡齿寒之虞。1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由广昌头陂地区再次东进入闽，与红五军团一起组成东方军开展行动。这一措施尽管为时已晚，对十九路军也是一种援助。

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对援助十九路军仍持消极态度。1934年1月12日，远东局致电中央苏区，分析说："19路军这个名义上独立的军事力量，有四种垮台的途径：（1）失败和向南京投降。（2）归并到闽东南受日本人鼓励的匪帮里，很明显，这些日本人是日本介入的先行者。（3）加入粤军。（4）寻求投奔红军的途径。"远东局强调："为了能在这个过程中赢得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防止出现另外三种前途，我们3军团应该选择永安这个最合适的地区作为作战基地。7军团应从沙县进行增援，还需要你们已在一些战线上采取的游击战。我们在这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不帮助19路军继续称为独立的因素，而要拖长同南京的实际斗争过程，以赢得时间把19路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获取它的武器。"① 同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再次致电中央苏区，补充说："福建目前的政权，最近必定要垮台。即使19路军主力采取军事行动，也无法阻止目前的迅速垮台、福建部分军政首领向南京的投降和另一些首领转到广东人方面……19路军的垮台和南京同它的斗争，不仅使我们能够而且也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最大的努力，去把19路军的部队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或使其脱离（19路军），去获取武器，解除或动摇敌对部队的武装，歼灭地主武装，以及给予向前推进的南京军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队以重大的打击。”远东局还在电报中要求中共“必须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更加有力地揭露福建军政首领的消极投降主义政策、他们同广东和南京的谈判和妥协、他们过去和目前的背叛行为和他们的整个政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最好是更广泛和更详细向士兵和群众说明红军同19路军签订的协议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指出同19路军签订协议，是在争取实施协议、继续同南京作斗争，同红军实行军事合作和把19路军争取到红军方面来等方面向后者施加影响的一个手段”。①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此时没有完全按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行事。红三军团没有进驻永安城，而是于1月12日发起围攻沙县战斗，至1月25日攻克沙县城，毙伤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十二师及地主武装七百余人，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一千五百余支，炮八门，子弹十万八千发，炮弹两万余发，以及大量物资。

四　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

沙县战斗胜利仅仅是局部胜利，不能从根本上援助十九路军。在蒋介石“讨逆军”猛烈攻击下，1月15日福州陷落。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主力被迫退守闽南漳州、龙岩一带。十九路军一些将领在蒋介石的收买拉拢下，纷纷倒戈投蒋。1934年1月下旬，十九路军土崩瓦解。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逃往香港，其余残部被蒋介石收编。历时两个多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

1934年1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驻中共政治代表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

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书面报告中，将十九路军的失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19路军的投降政策”促使该部的撤退和部分部队转向南京方面；二是认为中共中央过于信守对与十九路军达成的协议进行保密的诺言，而没有广泛动员苏区群众和士兵去瓦解和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到红军方面来。[①] 这完全是推卸责任，倒打一耙。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才在福州陷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在1934年2月14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149期，全文公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十九路军签订的三个“外交文件”。

红军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次极好机会，就这样被葬送了。

从上述史料和福建事变全过程可以看出，中共对福建事变的处置确实存在不当之处乃至存在错误。对此，中共和中革军委领导毫无疑问负有责任。但出现这些不当与错误，原因与责任都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说，共产国际对这一错误的发生应负相当的责任。

第五节 博古、李德推行节节抵抗消极防御方针和“短促突击”战术

一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与“全苏二大”召开

福建事变发生期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15日

---

①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1934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至18日在瑞金沙洲坝乡大埠村一幢清代寺庙中召开。召开这次全会从1932年12月开始酝酿，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并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批准。全会通过了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代为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补选了部分中共中央委员，选举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秦邦宪、康生、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邓发、朱德、顾作霖13人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选举李竹声、王稼祥、刘少奇3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使王明“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但因毛泽东、朱德都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王稼祥、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也在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大会对于动员苏区全体军民积极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了中央政府各人民委员部（委、局）人民委员（部长、主任、局长）。会议期间改组了中革军委，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二　国民党军队发动新的进攻

蒋介石平定“闽变”后，又将入闽“讨逆”的国民党军16个师1个旅零2个团编为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总司令，协助顾

祝同的北路军、何键的西路军、陈济棠的南路军，形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合围之势。1934 年 1 月下旬，蒋介石下令其各“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分三路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新的进攻。

其部署是：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下辖第二、第五路军和总预备队，共 16 个师另 1 个旅、2 个团，其任务是由福建沙县进攻归化、清流、泉上，企图占领石城、瑞金；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总指挥兼第三路总指挥，下辖第一、三、六、二十、二十六路军和总预备队，共 25 个师另 2 个旅、1 个支队和 3 个团，其任务是由黎川向建宁苏区进攻，企图占领建宁、广昌和博生（今宁都）县。此外，北路军中还分出一支部队由薛岳为总指挥，由永丰县经过苻田沙溪，目标是占领兴国县。

1934 年 1 月 22 日，蒋介石由闽北建瓯回到南京。1 月 25 日，陈诚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率领北路军主力，向建宁方向推进，寻求“荡平”中央苏区的突破口。

1934 年 1 月 29 日，因得到国民党军已向中央苏区发起新的大举进攻“紧急敌情消息”，正在召开的“二苏大会”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由毛泽东在大会上向代表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大会提前于 2 月 1 日结束。会后，出席大会的红军各部队领导人紧急赶回前线，准备迎击敌军新的进攻。

三 博古、李德推行节节抵抗消极防御方针和“短促突击”战术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苏区推进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中央苏区红军的作战行动问题，于 1934 年 2 月 1 日给中央苏区发来电报指示，其要旨就是要中央苏区红军坚持在内线作战，组织红五、七、九等军团和地方游击部队分头在北、东、南三个方向

阻击敌军进攻，主力红一、三军团则在泰宁重新发起对金坑方向设防敌军的进攻行动，以打破敌北路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①

而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们，头脑还算比较清醒。1934 年 2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从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驻中共政治代表埃韦特和军事总顾问施特恩，以及中共中央发来一份电报，提醒说：“我们觉得，我们指挥部的计划和措施，特别是在最近，几乎一直像是被敌人强加的，造成了对我们部队的多余的重新部署，由于经常转移使它们失去了积极参加战斗的能力。似应争取在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段歼灭敌人，不要试图在全线同时打击敌人。其实大家知道，我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在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该充分利用我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侧翼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而游击队同时从后方进攻敌人。重要的是要在歼灭敌人某一集团军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②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博古、李德等人，表示原则上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2 月 1 日电报指示，但是不同意红一、三军团在泰宁发起对金坑方向设防敌军的进攻作战，而主张“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时候，同 6、9 军团一起给以打击”③。而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2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4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7—59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9 页。

③ 《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1934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5 页。

月11日的电报建议，则没有很好采纳。

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采取的反“围剿”作战方针，是实行阵地战、堡垒战，节节防御，步步对抗。李德还抛出了一个“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李德解释说，所谓“短促突击”，就是主张在敌人修筑碉堡、步步为营向苏区推进的情况下，要求红军针锋相对地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隘口要道等地构筑碉堡，派驻守备部队，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红军就乘其立足未稳予以出其不意的短促突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这一所谓的新战术，李德在中革军委所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加以鼓吹，博古则强令红军部队在反“围剿”战争中推行。

李德是个不懂中国红军战争规律和特点的“图上作业家”，只凭当时很不精确的地图指挥红军作战。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达到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是根本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①

在国民党强大军力的进攻面前，红军指战员按照博古、李德等的指挥和战术，虽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败仗接踵而来：

1934年1月25日，敌北路军第五纵队罗卓英部四个师进攻

① 《伍修权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

黎川和建宁两县间的横村、樟村，负责阵地防御的红五军团因防线太宽、兵力薄弱，战斗失利，被迫后撤。

1月27日，红一、九军团和红三军团第四师，对进攻战略要地邱家隘、坪寮等地的敌第七十九师进行“短促突击”，由于援敌赶至对红军进行钳击，红军反击失利，不得不向南撤退。

2月9日，红九军团在小公鸡山及熊家寨对进攻的敌第九十四师实行“短促突击”，因弹药用尽战斗失利，红一、九军团被迫向广昌方面撤退。

2月15日，红一、三、五、九军团以“短促突击”战法，分别与敌战于凤翔峰、司令岩、芦坑等地，因兵力分散等原因，未能获胜。

2月24日，敌东路军第十纵队攻占沙县，红七军团伤亡四百余人。

2月25日，红一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三甲嶂与敌人三个师激战三天，付出重大代价，仅击溃敌人一个师。

3月7日，福建将乐县城失陷。

3月8日至3月17日，红军第一、三、九军团先后在五都寨、寺前、东华山、白舍、马鞍寨、石下寨等地，与敌北路第三纵队主力“短促突击”，战斗失利，只得向广昌方向后退。仅南丰县三溪圩一战，红三军团就伤亡三千余人。

3月19日，泰宁县城被敌东路军占领。

3月23日，归化县城失守。红七军团和红三十四师损失五百多人。

四　红军将领对“左”倾军事领导的批评

鉴于战局的连连失利，红军将领们对李德的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和指挥开始持怀疑态度，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

极为忧虑。

1934年4月1日深夜，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福建前线就作战方针等问题，给中革军委写信，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点名地提出尖锐批评。他写道："我们每一次接受军委电令，差不多完全没有一点思索的时间，甚至（连）请向导，下命令的电话都没有办法执行，战略决心迟疑也因为如此，甚至以超强度行军都不能赶到。"他呼吁："每一战斗或战役均应（有）准确的时间估计，予前敌各首长，以可能余裕时间以最大的机动余地。"他强烈要求军委放弃"短促突击"战法，对这种战法"主力不应再留恋，这种留恋在任何方面会达到无谓的牺牲"。他还要求应尽量改善前线红军指战员的物质生活，要加强侦察情报工作和瓦解白军工作，并建议军委组织几个强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破坏敌后联络线，牵制分散敌军兵力，以游击战战胜敌人。①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于1934年4月3日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他严厉批评了"短促突击"的战术，强烈要求军委改变目前这种"分路阻敌"打堡垒战的战术，"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以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②。林彪开始是反对"短促突击"战术的，但两个多月后即6月17日，他忽然又写了一篇鼓吹性的《论短促突击》文章，"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③。

---

① 《彭德怀关于作战等问题给军委的信》（1934年4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1992年内部版，第154—155页。

② 转引自黄少群《中区风云——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③ 《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都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提出过批评意见，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奏效。博古、李德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实行那一套已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有害的错误指挥。

第六节　广昌会战失败和筠门岭、建宁失守

一　广昌会战失败

对于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战争连连失利，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亦感到十分担忧。1934 年 3 月 25 日，他们从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驻上海政治代表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我们觉得，中央和全党未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重性，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御和粉碎［敌人］第六次‘围剿’（即第五次‘围剿’——引者注）。必须动员和集中党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任务。要击溃敌人一个进攻的集团军，以便有可能进行以后的积极作战行动，使敌人失去主动性。我们觉得，在黎川地区打击陈诚集团军是最有利的，不过你们应该从具体情况出发决定这个问题。”①

这时，红军防线已被迫退到广昌、建宁一线。敌东、北两路与西、南两路，已对中央苏区形成紧缩合围之势。蒋介石命陈诚调集 11 个师兵力，沿着盱江两岸，分成东、西两个纵队，准备向广昌进攻。

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面门户，距瑞金不到 150 公里，战略地位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9 页。

十分重要。中革军委早在1933年冬就组织力量在南丰至广昌间修筑了堡垒工事，准备保卫广昌。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在黎川地区与敌陈诚集团军进行决战的提议已不可能实行，根据敌军进攻态势，博古、李德遂决定集中红一、三、五、九军团在广昌与敌决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就是保卫中国革命”、“将广昌变成中国的马德里”、“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等动员口号。

国民党军投入广昌会战的兵力是11个师，其部署是：以第五纵队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担任主攻，由罗卓英指挥；第三、第八纵队和第九十七师共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担任助攻，由周浑元指挥。两个纵队进攻正面约五公里，采取梯次配置，夹盱江交替筑垒推进。第七十九、第九十八师工兵营随河东纵队跟进，准备随时在盱江架桥，保障两岸部队机动。陈诚亲率特务团、迫击炮营（欠一个连）、山炮营、别动队等部，随后跟进。

红军投入的是第一、三、五、九军团的全部兵力共九个师。为确保李德对此次会战的绝对指挥权，博古、李德以中共中央名义决定在广昌前线设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亲任政治委员，李德一手操纵指挥，实际上成为司令员。周恩来则奉命在瑞金留守中革军委视事。

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坚决反对广昌会战。彭德怀曾在广昌前线面见博古、李德，再三陈述“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①。可是博古、李德只相信“自己构筑

①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的永久工事”，决意进行广昌会战。他们命令彭德怀派一个团在广昌城构筑“永久工事”，与广昌城共存亡。

1934 年 4 月 10 日，广昌会战打响。敌河东、河西两个纵队各五个师，轮番向红军阵地进攻。红一、三、五、九军团也分成河东、河西两路，全面抗击，节节抵御。敌军猛烈的炮火，将红军所谓“永久工事”炸得七零八落，守卫在堡垒内的红军战士，多数壮烈牺牲。至 4 月 20 日，敌河东、河西两个纵队分别推进到距广昌城 15 公里的地带。

为保卫危在旦夕的广昌城，红军野战司令部命令红一、三军团西渡盱江，进入广昌城西北一线高地，阻止敌河西纵队前进。26 日，野战司令部下达了固守广昌城的作战命令。27 日和 28 日，敌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守备广昌城的红一、三军团与敌人苦战、血战一整天，阵地一个个被敌突破。4 月 27 日深夜，博古、李德固守广昌城的梦想破灭，被迫下令撤退。4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城。

广昌会战历时 18 天，红军虽毙伤国民党军 2626 人，但红军却伤亡 5093 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 1/5。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因伤亡过大，战后被撤销番号。红三军团伤亡 2705 人，占全军团总人数的 1/4。面对如此惨重损失，彭德怀十分愤慨，当面斥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二　筠门岭、建宁失守

广昌会战正酣之时，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于 4 月 21 日失守。

筠门岭位于会昌县南部，与福建武平县交界，距红都瑞金仅百余公里，地势险要，战略地位同样十分重要。驻守筠门岭的是粤赣军区红军第二十二师三个团。该师是由粤赣军区地方

部队升级新组建起来的，战斗力较弱，而面对的是国民党粤桂军六个师。4月初，为配合北线国民党军向广昌进攻，粤桂军第一、二纵队向筠门岭发动进攻。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二师“死守筠门岭”。红二十二师官兵在师长程子华（后周子昆）、政委方强率领下与进攻之敌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4月21日放弃阵地，撤退至筠门岭至会昌城间的站塘、李官山一线。

筠门岭失守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于4月下旬从瑞金来到设在会昌县文武坝的粤赣省委和粤赣军区司令部，一方面养病，一面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他亲自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打电话，询问筠门岭战斗情况，表扬红二十二师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指示他们把主力抽下来，总结经验，休整部队，改变过去那种死守硬拼的战术，组织小部队深入敌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同时做好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群众协助部队作战。粤赣军区和红二十二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逐渐取得了游击战争的新胜利，使中央苏区南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

与毛泽东相反，博古等“左”倾领导者们却抓住筠门岭失守不放，指责红二十二师是“退却逃跑”，将师政委方强关进国家政治保卫局审查。该师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团政委商辑伍等一批干部被开除党籍，有的送交军事法庭受审，有的被枪毙。

国民党军在攻占筠门岭、广昌城后，又立即部署东路军和北路军会攻建宁城。

博古、李德等这时仍没有从广昌会战失败中吸取教训，也听不进红一军团首长的正确意见，仍像组织广昌会战那样，命令红一、九军团由广昌尖峰、白水（今赤水）镇东进建宁，会

同在建宁地区的红五军团（欠第十三师）、红七军团，组成东方集团，负责保卫建宁城；命令红三军团和第十三、第二十三师及独立第四团，组成中央集团，在广昌县南部活动，阻敌南进。东方集团军首长林彪、聂荣臻于5月4日给中革军委写信，力陈红军应抛弃与敌拼消耗的阵地战法，尽力选择有利地形，捕捉运动歼敌机会，以求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他们的建议同样遭到博古、李德拒绝。林、聂只好按照军委意图，组织保卫建宁的战斗。

1934年5月12日至5月16日，红军东方集团军在建宁城外与进攻之敌激战五天五夜，虽毙伤部分敌军，但自身也付出重大代价，阵地一再被敌突破。5月16日，敌八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会攻建宁城。红军被迫于当日10时左右放弃建宁城，向宁化地区转移。建宁城遂陷于敌手。

与此同时，在江西永丰地区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六纵队五个师，至1934年5月1日，也先后占领永丰县南部的沙溪、藤田和龙冈。

至此，国民党军已占领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一线。中央苏区大片领地丧失，面临的形势日益恶化。

第十五章

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第一节　战略转移的决策与秘密准备

一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决策

广昌失守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严厉批评。5月3日，博古、李德、朱德等回到瑞金。随后，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广昌战役失败教训。张闻天在会上愤怒批评广昌保卫战“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①]，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②]，认为广昌会战的直接指挥者应对失败负责。

红军反“围剿”决战一次次失败，苏区土地不断丧失，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恶化。博古不得不于1934年5月下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反“围剿”形势进行讨论。

---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②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对今后红军反“围剿”作战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是红军主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争，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二是坚决“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对于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这两种可能性，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认为“不应把［中共］中央指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他主张红军应留一部分主力在苏区组成游击兵团保卫苏区，而“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①]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都各自将上述意见报请共产国际审议。

1934 年 6 月 16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埃韦特和中共中央：“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指出：“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游击运动，在苏区内，机动能力非常有限的军队的处境，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来电指示说：“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1）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

①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4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8 页。

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现在四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电报还指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①

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实际上同意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在必要时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并且要求中共中央从现在起就需要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

二 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指示，博古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博古没有在会上提出讨论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问题，也没有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电报指示。在讨论中毛泽东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44页。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中说：“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的“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可能指的就是共产国际6月16日致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

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①]。

博古、李德等对突围转移的事情虽然秘而不宣，但却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各项秘密准备工作：

（一）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进行秘密筹划

“三人团”具体分工是：博古、李德负责制订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为便于“三人团”秘密筹划，博古派中央书记处成员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让中央书记处成员项英到于都去主持赣南军区和赣南战地委员会工作，同时着手筹备建立赣南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因对李德的指挥有意见，被撤换职务，派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也无权过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计划。

（二）抽调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根据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中关于“用自己的一部分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创造和建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仍以红七军团建制，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共中央随军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第一，“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

①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

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第二，“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第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单个部队”；第四，“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其后方去”。①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计划是：第一步，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以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南平之间的闽江地域，并在红九军团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经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在有利条件下，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地区敌人；第三步，8月下旬后，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建广大游击区及苏维埃根据地。

根据上述计划，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由福建连城地区回到瑞金休整，部队改编为第一、二、三师，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全军团共六千余人，装备有一千二百余支枪和六门迫击炮。在出动前，中央为红七军团赶印了一百六十余万份宣传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口号》等。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在红都军民热烈欢送下从瑞金出发。7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宣言》，为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制造舆论与声势。

红七军团按预定计划东进福建，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

---

①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1934年7月），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7月下旬进占闽中大田县城，随后获得尤溪口和樟板湖战斗胜利，缴获一批物资，歼敌两个连，俘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7月30日晚在红九军团掩护下偷渡闽江成功，胜利完成第一步计划。

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本应按预定计划乘敌防备不严之机迅速北上浙西、皖南。但是，中革军委为求能调动更多的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走回援，突然改变计划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在福州地下党组织策应下相机袭取福州。红七军团得令东进，8月7日进抵福州西北部，当晚发起攻打福州的战斗。由于福州地下党组织力量太弱，敌人预有准备，红军攻城三日未克，只得撤退。

1934年8月中旬，红七军团由桃源地区北上闽东游击区。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协助下，安置了伤病员，取得了攻占罗源县城、歼敌千余人的胜利。尔后继续北上浙西，一路势如破竹，于9月3日进入闽北苏区。红七军团领导人原拟利用闽北苏区有利条件，逐步向外发展，连接闽东，创造大块苏区，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可是中革军委却要求红七军团迅速北上浙西，破坏敌之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扰乱敌根本重地后方，后又要求以浙西遂安为中心建立新苏区。为执行这一任务，红七军团在浙赣边和浙西地区来回游击活动，虽歼灭了一些敌人，但对敌之后方交通线未能进行大的破坏，反使自己处于敌军包围的困境之中。为避免更大损失和寻求新的发展，红七军团决定向皖南前进。不料中革军委又于9月24日致电红七军团，批评他们向皖南前进是“逃避”斗争，强令红七军团返回浙西遂安地区。可此时浙西敌情更趋严重，红七军团只得转向皖赣边，10月7日前后在转移途中与中共皖赣边特委和皖赣边红军部队会合。10月中旬，部队在皖南地区得到休整补充。10月底先遣队冲过敌

人两道封锁线，进入赣东北苏区德兴重溪，部队仅剩两千五百余人。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

（三）组织红六军团西征

红六军团是湘赣苏区主力红军，1933年6月由湘赣、湘鄂赣红军部队合编组成。下辖第十六师（由湘鄂赣红十六军改编）、第十七师（由湘赣红八军改编）、第十八师（由湘鄂赣红十八军改编）。组建后未成立军团部，暂由第十七师师部代行职权。

共产国际在1934年6月16日来电指示中，提到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在不得已情况下可“向湖南方向撤离”。为给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探路，同时为保存红六军团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23日给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下达训令，命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为中央红军主力将来向湖南西部转移探路，并建立落脚点。训令还规定了西征的路线、地域和行动计划。

西征的红六军团由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任中央代表，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并由任弼时、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全军团辖第十七、十八两师，共9758人。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破遂川县衙前、五斗江敌军封锁线，8月中旬抵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后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8月23日到达湘西南陵东北地区。随后再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旬在界首渡过湘江，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10月24日终于到达印江

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第三师（原红二军团）会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历时八十余天，行程五千余公里。

（四）在“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下，大力扩大红军，补充兵员

早在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发出通知，要求在5、6、7月扩大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269名。9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局、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等5个单位，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苏区在9月间动员3万名新战士上前线。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18204名。这样，从这年5月中旬到同年9月间，整个中央苏区共动员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亦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都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

为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21日发出命令，在兴国县古龙岗新组建红军第八军团；同时在瑞金县武阳新组建红军中央教导师，专门担负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10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迅速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5000人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五）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

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于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谷的借谷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决定向苏区群众借谷60万担。这两次筹粮计划都胜利完成。为补充红军武器弹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委托中央书记处成员、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陈云，专门负责苏区军工生

产和军需供应。红军各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和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卖给国家。从1934年6月到8月，全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斤，子弹壳1.8万斤，子弹14.09万发，白硝1.53万斤。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0680床、棉花8.6万余斤、军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江口外贸分局还突击从赣州购回8万余元的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隐蔽保存在石城县烂泥垅秘密金库的金银财宝全部取了出来，以供军用。

（六）组建赣南省

自筠门岭失守后，粤赣军区和粤赣省所辖地域日益缩小，仅剩会昌、西江、于都、登贤等县苏区。为适应这一变化了的情况，中革军委于1934年5月17日发布第18号命令，对中央苏区各军区、军分区设置作了调整，增设了赣南军区，任命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书记处成员项英兼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赣南军区下设两个作战分区，其任务是钳制赣州的国民党粤军，发展边境游击战争，并保持与河西湘赣苏区的联系。军委命令将原属粤赣军区指挥的独立第六团划归赣南军区指挥。为与赣南军区的军事任务相适应，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赣南军区的辖区内设立赣南动员区，项英兼任赣南动员区主任。中共中央还向赣南动员区派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负责的扩红突击队，分别到赣南动员区各县，开展扩红突击工作。6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决定在赣南动员区的基础上，成立赣南战地委员会，项英兼主任，刘英及所辖各县县委书记为委员。赣南战地委员会办公机关设在于都县城。

1934年7月，鉴于粤赣苏区不断失陷，同时为适应即将实

行的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决定在赣南战地委员会辖区内设立赣南省。组建工作从7月下旬开始，由项英负责。8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陆续向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调派干部。中共赣南省委书记由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循仁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宣传部长潘汉年（后杨尚奎），白区工作部长张谨瑜（女），妇女部长刘莲仔。赣南省苏维埃主席钟世斌（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王孚善。省苏维埃政府下设各工作部门也迅速建立，工作人员大部分从粤赣省调来。少共赣南省委和省职工联合会等群团组织也相继建立。赣南省设立后，省委机关设在于都县城天主堂右侧平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县城北门外何屋，赣南军区机关设在县城北门外舒屋。

赣南省设立后，粤赣省并未宣布撤销，粤赣省党政军领导机关亦未撤销，只是工作人员大部分调至赣南省，只留下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邓学林等少数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继续领导会昌、西江以及门岭、寻乌、安远等县党政领导机关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到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以后。

（七）在军事上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为突围转移争取更多的秘密准备时间

蒋介石在进攻建宁得手后的第三天，即1934年5月18日，便电示其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要求加强碉堡工事，防止红军西走。6月21日，何键又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传达蒋介石关于湖南、广东两省联合“剿共”的指令。同时，蒋介石指示南昌行营调整军事部署，从1934年6月开始兵分六路，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六路进攻的部署是：

1. 以北路军第八纵队六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

2. 以第六路军第七纵队四个师由永丰县龙冈向兴国县古龙

岗方向推进；

3. 以第三路军第五纵队四个师首先进占广昌头陂等地，而后集中第三、第五纵队和东路军第十纵队共九个师，由宁都向广昌的白水镇、驿前、石城的小松、琴江镇方向推进；

4. 以东路军第二路军六个师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

5. 以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于都方向推进；

6. 另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伺机出动。

六路进攻的总兵力为31个师，总目标是：攻占红都瑞金。在加强地面进攻的同时，从6月开始，国民党军队飞机加强了对红都瑞金的轰炸，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大学附近，多次被敌机炸弹击中。为安全计，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等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只得从沙洲坝西移二十多公里，转移到瑞金梅坑、云石山等地。

针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新的六路进攻，李德通过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分成六个作战方向。红军六路分兵部署是：

1. 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六十一团、第六十二团、赣江独立团，在兴国、泰和两县交界老营盘一线，抗击向兴国推进之敌北路军第八纵队六个师进攻；

2. 以第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在永丰县龙冈以南地区，抗击向兴国县古龙冈方向推进之敌第六路军第七纵队四个师进攻；

3. 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广昌县头陂等地抗击向宁都县推进之敌第三路军第五纵队四个师进攻；

4. 以红三军团（欠第六师）、红五军团（欠第十三师）在广昌县南部白水、驿前和石城县小松、琴江镇一线抗击向石城县推进之敌第三、五、十纵队共九个师的进攻；

5. 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在长汀县南

部抗击由朋口、连城向长汀城方向推进之敌东路军第二路军六个师进攻；

6. 以红二十二师在会昌城和筠门岭之间抗击由筠门岭向会昌、于都方向推进之敌南路军陈济棠部三个师进攻。

各个战线上的红军部队，与进攻之敌浴血苦战，都打得非常被动、艰苦，被迫节节后退，苏区日益缩小。

在北线，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的红三军团，在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一军团第十五师配合下，先后在广昌南部的高虎脑、万年亭等地，顽强抗击国民党军九个师的轮番进攻，给敌以重创，红三军团自身也伤亡四五千人（其中包括团以下干部近千人）。在此期间，打得最为惨烈的是高虎脑战斗。

高虎脑位于广昌县赤水（苏区时称白水）之南。继7月22日大寨脑战斗之后，国民党军继续向南推进。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迫退守高虎脑一带阵地防御，主阵地由红五师第十三团守备。南进的国民党军北路第三、十两个纵队六个主力师，从8月5日拂晓开始，从左、右两翼进攻高虎脑核心阵地。红军充分利用特殊地形，打退敌人六次轮番进攻。8月6日，敌两个纵队又向高虎脑阵地猛攻。红军与敌激战终日，击溃敌军八次冲锋，整个阵地火光冲天，血海翻飞，尸横遍野。8月7日，红军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守卫主阵地，但工事被毁，子弹打光，遂退出战斗后撤。此役，红军毙伤敌军四千多人，自身也阵亡1315人。8月30日，国民党军队推进到石城县北部的桐江、小松一线，距石城县城仅几十公里。

在宁都方向防御战中，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各一部，先后在头陂、新安、白水（赤水）、大寨脑等地阻击国民党军七个师进攻。敌人攻势强大，红军被迫节节退却。8月初，国民党军推进

到广昌与宁都边界地带。

兴国方向，红军在陈毅、袁国平指挥下，在沙村及其以北地区连续十多次进行反击战斗，部队伤亡两千多人，未能阻止敌军推进。8月28日，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向老营盘进攻。陈毅在指挥作战时腿部中弹负伤。不久，老营盘失守。

在汀州方向的防御作战中，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遵照朱德指示，在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下，采取运动防御、诱敌深入方针，在长汀南部的温坊战斗中，仅以伤亡700人的代价，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24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800余支（门）、子弹44万发。但这次战斗的局部胜利，改变不了红军整体上的被动局面。

在南线，由于红二十二师领导认真执行毛泽东指示，采取积极的游击战术，并实施对国民党粤军的统战工作，加上陈济棠部持观望态度，战事较少，相对来说较为平静。

红军六路分兵节节抵御，迟滞了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速度，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赢得了一定时间，但严重消耗了自身的有生力量。

第二节 战略转移前的直接准备工作

1934年9月上旬，红军总部获悉国民党军即将向瑞金发动全线总攻情报。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已十分危急。中央“三人团”遂决定将原定于11月突围转移的时间，提前到10月进行。为此，“三人团”制订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具体行动计划。其要旨是：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编成红军野战军，准备在10月下旬从南线突破国民党粤军封锁线，经湘桂边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鄂川黔边创造

新的根据地。

根据这个计划，“三人团”在仍然保密的情况下，从9月中旬开始，开展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一）命令各条战线红军在坚决抗击敌人进攻的同时，尽量减少部队伤亡，爱惜和节约使用兵力

9月10日，中革军委还发布命令，要求各军团必须在10月1日前组织好野战军后方勤务机关，加强运输队建设。9月15日，中革军委又公布《卫生机关编制的命令》，对各军团和各师、团卫生机关建设提出要求。

（二）确定干部走留名单

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中央和省级机关及红军部队中的女同志，由中共中央妇女部提出了一个30人的名单，然后组织她们体检，身体合格者随部队行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随军转移人员名单，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无须体检。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使得大家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博古等人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时，带有很强烈的宗派观念。博古利用这个机会，将那些他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尽量留下来，比如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瞿秋白、贺昌、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等等。起初，甚至连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也以他们生病、负伤为由，不想将他们带走，在周恩来力争下，博古才同意让毛泽东、王稼祥参加突围转移。当然，有些人是确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

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瞿秋白曾向张闻天表示希望“走”，张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没有同意。

（三）对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游击斗争，作了一定部署

1934 年 9 月 13 日，中革军委发布《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要求：“第一，留在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第二，在中心区域及边区的军事部之名义不变”；“第三，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即将军事部改为第一所述的组织”；“第四，无论在任何区域的军事指挥系统，都是依照各该军区、作战分区、县、区、乡游击队或其军事部的系统进行工作，以便统一指挥”；“第五，在改组时各该上级机关应协同所在地党政机关妥为审查分配一切干部的工作”；“第六，各军区，各作战分区，各级军事部于接到此命令时，即着手改组；在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和边区，限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改组完毕”。[①] 命令规定：各级军事部改组后，以县、区军事部长为县、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在乡则以乡苏主席兼游击队长，乡支部书记兼政治委员。9 月 19 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向中央苏区各省、县苏维埃发出《战区工作指示信》，对敌占区及即将为敌所占区域的游击战争发出指示，提出要求。9 月 30 日，中革军委还发布《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要求地方红军部队能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还亲自组织编写了《关于游击队动作

① 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资料室保存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司字第四十四号》（1934 年 9 月 13 日）。

的指示》，共分3章49节，计3万余字，以中革军委名义铅印成册，下发给苏区各县、区游击司令部。

（四）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赣南省的于都县、登贤县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秘密侦察路线

中革军委还派出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带领一个分队，秘密潜往湘粤赣边界地区，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情况，为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选择行军路线。

（五）开始舆论宣传动员

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奉命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发表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比如大踏步突击到敌人后方作战等形式，来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暗示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10月3日，《红色中华》第240期发表了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署名的《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苏区群众拿起武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六）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各军团和各师政治机关要做好部队长途行军政治动员工作的训令和指示

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副主任贺昌联合署名，下达指令，要求“在‘迅速整理补充配合友军与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的口号之下，进行部队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①。

---

① 《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1934年10月9日），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七）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领导苏区游击战争

（八）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最高法院突击审判处决了一批在押犯人

其中，包括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在内。

（九）与南线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开展秘密谈判

陈济棠系地方军阀，曾经三次通电反蒋。他深知蒋介石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又打又拉，居心叵测。在第五次“围剿”中，陈济棠虽被封为南路军总司令，却一直力图偏安广东，稳居“南天王”宝座。他不想在江西替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所以两三年来他基本上将战线稳定在武平、寻乌、安远、信丰、赣县、南康、大余一线，未更多地向苏区腹地推进。1934 年 4 月进攻筠门岭得手后，蒋介石曾传令“嘉奖”，赏洋“劳军”，并令陈济棠再接再厉，直捣会昌城。但陈济棠却以交通运输困难、机械无法运送、待公路筑成后遵命而婉拒。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领导人，早就看出陈济棠对蒋介石存有二心，从 1933 年冬起，曾多次建议中共中央对陈济棠部展开统战工作，利用该部控制的港口向苏区转运共产国际援助红军的武器、药品等物资，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早有与红军谈判媾和意图。特别是驻守南线的红二十二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国民党粤军周旋，接连歼灭粤军出来骚扰的小股部队，击毙敌营长朱省亚，全歼会昌周田“铲共团”后，粤军将领更感到与红军交战不利，便暗中派人前往红军部队试探媾和。陈济棠部的高级参谋杨幼敏，曾亲自将三万发子弹从筠门岭送往驻会昌的红军部队。眼看蒋介石从北、东、西三面步步向瑞金

进逼，陈济棠猜测红军将迅速放弃赣南苏区，便迫不及待地想和红军谈判。

1934 年 9 月间，陈济棠通过红军将领罗炳辉在广州做生意的一位亲戚的关系，派出一名姓李的密使来到瑞金，向红军递交他提出的建议双方进行停战谈判的密信。通过交谈和阅读密信，周恩来和朱德都认为陈济棠要求和谈是有诚意的，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与陈济棠部谈判，力争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为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突围转移创造条件。于是，朱德致信陈济棠，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并说明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

1934 年 10 月 5 日，中革军委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两人为总代表，携带朱德的亲笔介绍信，前往寻乌县罗塘镇，与国民党粤军总参谋长杨幼敏等秘密会谈。通过三天三夜紧张谈判，最后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事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 40 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用陈部护照。①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谈判期间，周恩来密电何长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潘汉年接电后，向粤方代表作了巧妙的解释，消除了对方的疑虑。话别之后，何、潘即离寻乌，返回会昌。此时，红军主力已在于都河北岸集结休整，准备突围转移了。

---

①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7—328 页。

第三节 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集结于都河流域

一 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

1934年9月17日，博古就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一事，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该电文如下："［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①]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波戈列洛夫[②]。9月17日。"[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收到博古9月17日请示电后，进行了研究，于9月30日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回电，答复如下："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对南京的决定性行动只能在前面的湖南机动作战结束后采取，这意味着，首先歼灭何键的军队，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但是在湖南作战的时候，应该同时完成其他一些任务：第一，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第二，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

① 原文如此。

② 秦邦宪，即博古。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四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第三，我们认为把目前在汀州——连城地区活动的部队留在福建而不调往湖南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军团应该组成独立的南方军，其任务是在厦门方向或者在东北方向进行机动作战，也是为了在闽赣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请确认电报是否收到和解密。"①

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并提醒要在撤离的同时在中央苏区及闽浙皖赣等苏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迷惑敌人。

二　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集结于都河流域

博古在向共产国际发出突围转移请示电的同时，中央"三人团"已经开始突围转移紧张的直接准备工作。1934 年 9 月 28 日，中革军委按预定计划，电令在福建长汀县南部作战的红九军团将防务阵地交给独立第二十四师，撤退至长汀县南部钟屋村休整，并补充新战士一千六百多人。9 月 30 日下午 3 时按中革军委命令继续向长汀城移动。

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批准后，中央"三人团"正式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行动。突围转移行动的第一阶段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机关撤离红都瑞金，野战军全体部队撤离战场，开至贡江（于都河）沿岸集结休整补充，做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6 页。

好突围转移的出发准备。中央机关和红军各军团集结情况如下：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军委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中央纵队）：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中央领导成员陈云、刘少奇、凯丰等分别任红五、八、九军团中央代表。10月10日晚至12日晚，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云石山、九堡等地出发，开往贡江（于都河）北岸集结。10月13日，两个野战纵队抵达于都县后，分别驻在于都县城东北的古田村至岭背、禾溪埠和高陂、麻地、黄龙（今黄麟）一带。军委总部机关和博古、周恩来、朱德等总部领导住在古田窑塘村。毛泽东已先行于9月下旬从瑞金云石山来到于都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住在于都县城北门外何屋。10月初，毛泽东奉命返回瑞金处理中央政府各部门善后工作，10月10日离开云石山回到于都县城何屋。中央组织局临时将他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三梯队。该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和运输大队以及附属医院组成。

红一军团：原在兴国县高兴地区抗击敌人，10月6日19时30分接军委电令后，即将防务交给红五军团，10月7日晚全军团秘密移至兴国县东南的竹坝、洪门地域，8日晚开始经于都县仙下贯，10月11日抵达于都县东北部的段屋、宽田地域，军团部设在段屋铜锣湾。该军团第十五师原在石城县南部作战，10月9日也从驻地出发，于16日抵达宽田地域归建。10月12日至16日，全军团在集结地域休整补充，进行思想动员。

野战军 10 月 10 日至 20 日行动日程表①

日期 / 兵团	10	11
军委纵队	从晚上出发，由田心向麻田圩前进。干部团晚上由九堡向宽田进	从晚上出动，并应到达宽田。从晚上出动，并于到达岭背圩后，即配置训练
Ⅰ K	从九日晚上，由江背洞、社富、溪原于 7 号晚转移到集中地域（见图）15D 从晚上出动，由固村、回龙转移到黄石罐地域	在集中地整理、补充及军政训练。15D 从晚上出动并应到达翰林头、半裁地域
Ⅲ K	在宁都南之第一作战地区，进行整顿和军政训练	同上
Ⅴ K	在兴国北面之现阵地，即在拉石寨以南及城隍以南之现阵地继续抗击周敌。如敌前进时，则转移到文溪村西至水寨脑之后方地域	同上
Ⅷ K	从晚上由水南南路及石桥地域，转移到银坑、桥头地域	从晚上出动，由桥头、银坑转移到杰村、澄龙、社富地域
Ⅸ K	三师在桃黄隐蔽、休息、整理，并于当晚向武阳围前进。二十二师主力仍于站塘，其 65R 则在茶梓地域肃清铲匪	三师由晚上出动，到达会昌之北塘坊［珠］兰埠、木西坝地域。二十二师同上
中央纵队	在梅坑编队。教导师在瑞金附近进行军政训练	同上
	1. 与五、八军团用无线电联络 2. 与其余的则用电话联络	同上

① 此表，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提供的档案原件刊印，表后“1”项中所述“石、兴、会、雩路线图”及“赣南路线图”均缺。1934 年 10 月 12 日 8 时 30 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纵队，通知：“将该表规定野战军全部行动，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纵队仍于今十二号晚移动。”

续表

日期 / 兵团	12	13	14
军委纵队	从晚上出动，由宽田转移到古田圩，于岭背渡河	仍留原地配置休息，并开始架设雩都到小溪的长途电话。干部团编入纵队，余同上	仍在原地并进行补充侦察。在宁、会河会合处[①]即龙古嘴[②]到孟口地域准备渡河，完成一周粮食的准备
Ⅰ K	同上 十五师归还主力	同上	完成一切准备，工兵及侦察部队进行补充侦察，并准备由龙古嘴到龙江口[③]地域渡河
Ⅲ K	晚上由原地出动，到达葛坳、曲阳、上脑地域	晚上由现地出动，到达三贯、水头圩、车头圩地域	完成一切准备，工兵及侦察部队进行补充侦察，并准备由孟口（不含）到三门滩（不含）地域渡河
Ⅴ K	同上 如敌前进时，则退至兴国北之牛形、象形及至西面之杨山地域	同上	同上。但在敌人大力压迫下可放弃兴国，转移到兴国以南地域
Ⅷ K	在集中地整理、补充并进行军政训练	在原地动作同上	同上
Ⅸ K	三师及二十二师均同上	三师及六十五团同上。二十二师在分区部队掩护下，转移到麻州地域	完成一切准备，三师准备于会昌以北地域渡河，而二十二师准备于安远河之长沙圩附近渡河
中央纵队	晚上由梅坑出动，到达麻地圩、富陂、黄龙。教导师则于当晚转移到西江地域	中央纵队应完全集中到麻地圩、宽田、黄龙地域	在东江口（不含）到洛口塘（不含）地域，进行补充侦察及准备渡河
	1. 与3K、5K、8K无线电联络 2. 与其余的用电话联络	1. 与5K、8K无线电联络 2. 其余的用电话	同上 各军团负责代表到总司令部受领命令

① 指宁都河（梅江）和会昌河（贡水上游）合流点，位于今于都县城东北约4公里处，该地今名白口。

② 应为龙舌嘴。下同。

③ 未查到此地名。据红一军团行动地域判断，似指今于都县城以东18公里、无名小河与贡水汇合处。

续表

日期 / 兵团	15	16	17
军委纵队	完成渡河准备，发下进攻命令	从晚上渡雩都河并应到达新陂地域	从晚上由原地转移到小溪地域
Ⅰ K	在原地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从晚上于规定地域渡雩都河，并转移到梓山、里仁、梨村、梨邦桥地域	从晚上由原地出动，转移到金竹、仁风圩及塘村地域
Ⅲ K	从晚上出动，由原地域转移到古樟村、铺前岗、三门滩，并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从晚上于规定地域渡雩都河，并应到达新陂（不含）、罗家渡、大平（含）地域	从晚上出发，转移到牛岭坳、牛岭及图岭地域
Ⅴ K	转移到兴国以南约于增高山、竹坝、山田地域进行运动防御	从晚上由原地出动，转移到杰村、社富、溪原地域，掩护队应位置于兴国之南	从晚上转移到雩都以北地域，进行补充
Ⅷ K	在原地	从晚上由原地出动，转移到水仓前、石口、观音庙地域，并准备渡河	从晚上由雩都（不含）、三门滩间渡河，并转移到大平、长罗、罗家渡地域
Ⅸ K	在原地	在原地完成准备	从晚间渡河，全部转移到桂林间、茶梓、河石地域，六十五团即归还主力
中央纵队	在原地，但国局第一营集中于新陂	应从晚间转移到东江口、洛口塘地域的东岸，准备渡河	从晚上于东江口、洛口塘间渡河，转移到梓山、梨村、梨邦桥。国局一、三两营应集结金竹
	1. 与3K、5K、8K用无线电 2. 与其余用电话 3. 代表联络	1. 5K、8K及中央纵队无线电 2. 其余用电话	1. 与5K无线电 2. 其余的用电话

续表

日期 / 兵团	18	19	20
军委纵队	从晚上转移到图岭地域，并附两个迫击炮连及爆破连给三军团，附一个迫炮连给一军团	从晚上转移到合头地域	原地准备南移
Ⅰ K	主力在原地向金溪、新田之敌进行侦察，并向新田、重石间及石背圩方向派出别动队	从晚上接近敌阵地，即进至金溪、金竹背以东及以北地域，唐［塘］村为1K与其他后续队之后方分界线	进攻金溪、新田之敌，以求达到石背圩、林罗背（含）地域
Ⅲ K	主力在原地向韩坊、固陂、大桥头之敌进行侦察，并向固陂、韩坊间与别室[①]方向派出别动队	从晚上接近敌人阵地，到长渡坝、白室地域，牛岭为三军团之后方分界线	进攻韩坊、固陂之敌，以求前出到平［坪］石、林罗背地域
Ⅴ K	转移到零都地域进行整理，并准备渡河	从晚上于零都、三门滩间渡河，并到达罗家渡、新陂、小溪及大平地域	在原地向零都河岸南派出警戒，并准备晚间南移
Ⅷ K	晚上移到长罗、大平及牛岭坳（不含）地域	晚移至王母渡、立赖圩之间河的东岸，侦察敌人的渡河点，并准备渡河	为协助3K攻韩坊，于晚间由王母渡、立赖间西渡，目的是在前出到大龙地域
Ⅸ K	在原地，但向龙布、重石之敌派出侦察，并于其间派出别动队	从晚间以一个师迫龙布，一个师进至金沙、水口并侦察龙布、重石之间到牛犬山的道路	进攻龙布之敌，目的是在前出到重石、竹背间的道上，并钳制重石之敌

① 似指白室。

续表

日期 兵团	18	19	20
中央纵队	从晚上移到乱石、上坪、大平圩（含）地域。国局一、三两营归还本队	从晚间移到仁凤［风］圩、金竹及牛岭、唐［塘］村（两不含）地域	准备从晚上南移
	同上	1. 均用无线电 2. 与1K、3K、中央纵队加徒涉［步］	1. 与一、三军团用野战电话 2. 其余的用无线电

红三军团：10月7日9时30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在石城县南部作战的红三军团："甲、三军团到十二号止，应在目前第一个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在这时期应完成部队的整理。乙、在这时应加强军政训练，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与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丙、三军团全部约于十二号晚出动，并于十四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即集结于于都东北之水头圩、石溪圩、车头圩、禾田及仙露观〈即仙下贯——引注〉地域）。十五日晚，三军团全部应准备备战前进。"①

红八军团：10月8日晚撤离兴国县古龙冈西北战场，9日在古龙冈集结，随后经于都县北部之平安、桥头、银坑南移，12日拂晓抵达兴国县南部之杰村、澄龙、社富地域集结补充。

红九军团：10月8日拂晓抵达瑞金县武阳。10月10日，全

① 《朱德关于红三军团应在目前集中地域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934年10月7日），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编《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军团进抵会昌县珠栏埠地域再次休整和补充新兵，红二十二师归建。

红五军团最后撤离战场。10月7日红一军团撤离兴国县高兴战场后，红五军团奉命接替防务，留在高兴地区阻击敌人。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10月16日，军委电令红军独立第三团从于都县赶赴兴国。17日，红五军团将防务交给独立三团，随即撤出战斗，边行军边补充新兵和物资，经兴国县社富于19日晚到达于都县城北部集结待命。

至10月17日，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已经全部在贡江（于都河）流域集结休整，补充完毕。红军在集结期间，除进行政治学习动员外，补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10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决定将江西补充第二团、第八团补充给一军团，江西补充第三团、第四团补给三军团，江西补充第五团补给五军团，于都补充第六团补给八军团，于都补充第一团补给九军团。以上总计给各军团补充新战士约9700人。

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将士及机关人员共86859人。据统计各部人员分别为：

红一军团：原有17280人，在于都补充2600人，合计19880人；

红三军团：原有15205人，在于都补充2600人，合计17805人；

红五军团：原有10868人，在于都补充1300人，合计12168人；

红八军团：原有9022人，在于都补充1900人，合计10922人；

红九军团：原有10238人，在于都补充1300人，合计11538人；

军委纵队（红安纵队）：4693 人；

中央纵队（红章纵队）：9853 人。

参加突围转移的野战军，共有步枪 29153 支，轻重机枪 651 挺，迫击炮 38 门，各种枪弹 137 万发。此外，还有中央兵工厂、造币厂等拆卸下来的大量机器、辎重以及石印机等，甚至一些破铜烂铁和擦拭机器的破布，也都被打包装箱，带着突围转移。军委第二纵队（即中央红章纵队）9853 人中，大约有 2/3 都是人拉肩扛笨重机器和破铜烂铁的挑夫运输人员，光挑子就有 3000 多副。①

为保守军事秘密，中革军委于 10 月 13 日重新规定了各军团、各师代号：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第一军团为“南昌”，第一师为“广昌”，第二师为“建昌”，第十五师为“都昌”；第三军团为“福州”，第四师为“赣州”，第五师为“苏州”，第六师为“汀州”；第五军团为“长安”，第十三师为“永安”，第三十四师为“吉安”；第八军团为“济南”，第二十一师为“定南”，第二十三师为“龙南”；第九军团为“汉口”，第三师为“洛口”，第二十二师为“巴口”。师的下属单位也由各军团自行确定代号。各军团及所属部队统以此代号与红军总部及相互间联络。

三　苏区人民全力支援野战军突围转移

红军野战军在于都等地集结休整期间，苏区人民倾其所有，全力支援红军突围转移。突出地表现在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抽调夫子、捐木架桥等。

---

① 《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 年 10 月 8 日），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编《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61 页。

在红军集结地于都县，苏区人民组织了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品，热情慰问红军指战员；妇女们组织了许多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衣服。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军区集中全力，动员和组织于都河沿岸群众，协助红军在于都城东门渡口、龙石嘴、赖公庙、龙门山、孟口等处架设五座浮桥。为支援红军架桥，于都县城居民几乎把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木，都捐献出来。根据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指示，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与该会船排部的同志一起，组织苏区内所有的船只集中于都，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浮桥架设工作从每天下午4时开始，下午8时架通，次日凌晨拆除，不留痕迹。苏区船排工人们与红军工兵部队全力配合，每天都及时将浮桥架好，为红军夜渡于都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配合红军主力能安全集结和突围转移，苏区人民在中革军委和各级党政军组织指挥下，紧密配合红军，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确保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

第四节 红军野战军踏上长征路

一 夜渡于都河

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编成左、中、右三路行军纵队：左纵队以红一军团为前锋，红九军团殿后；右纵队以红三军团为前锋，红八军团殿后；中路纵队为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为总后卫。整个行军队形，就像抬轿子，左、右纵队就像两根杠子，抬着中间的军委一、二纵队前进。

10月17日傍晚，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开始夜渡于都河。

具体情况如下：

左路前锋红一军团：从17日傍晚起在于都县梓山乡的长口、山峰坝和花桥等地渡过于都河（贡江），经磊石、禾丰（即梨邦桥）、上坪，19日军团直属队和各师进抵仁风、金竹和安远县的唐村等地域宿营，20日抵达安远县双芫等地域，并向信丰县金鸡、新田之国民党粤军阵地侦察。左路后卫红九军团，18日晚在会昌县珠栏埠至会昌县城间渡过于都河（贡江），接着又在桂林江至渔翁埠间渡过安远河（濂江），19日进抵安远县茶梓，20日军团主力到达安远县龙布休息。

右路前锋红三军团：从17日傍晚起从于都县杨梅坳、禾坑塘、步前岗等地出发，在于都县孟口至三门滩间夜渡于都河，经于都县南部之新陂、小溪、马岭，21日晨抵达赣县之小坌、长演坝地域。右路后卫红八军团，18日晚从于都县仓前、五龙圩等地出发，在三军团渡河地点孟口至三门滩间渡过于都河，19日抵达于都县罗家渡、大坪和赣县长洛间休息，20日进抵赣县王母渡、立濑圩。

中路军委第一野战纵队：17日傍晚从古田、岭背等地出发，在于都县孟口至龙舌嘴间（军委总司令部等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李德等中央领导人在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夜渡于都河，18日在新陂宿营，19日进抵小溪畚岭地域，20日到达安远县合头休息。军委第二野战纵队，18日傍晚从于都县公馆、黄龙（今黄麟）等地出发，在于都县花桥至洛口塘之间夜渡于都河（贡江），19日进抵于都县里仁、黎村、黎邦桥地域休息，20日进至仁风、金竹、牛岭、唐村地域。

野战军总后卫红五军团：20日傍晚从于都县城至步前岗等地出发，在于都城至塔脚下间夜渡于都河，21日在于都县新陂、小溪、罗家渡、大坪地域宿营。

至10月20日，整个野战军已按计划全部进抵突破封锁线战斗打响前之阵地。

二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10月1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正式下达了关于野战军攻占信丰县古陂、新田地域的战斗命令。根据命令，21日夜至22日晨，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战斗正式打响。

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东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其兵力部署为：李振球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驻信丰县古陂，第二团分驻信丰县新田、金鸡，第三团和教导团分驻安远县重石、版石，第六团驻赣县王母渡；第二师教导团驻信丰县安息；第四师驻赣州；第五师驻南康县和大余县新城；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独立第二旅驻安远县城；另在大余县城驻有第一军教导团和特务营、别动队，在广东南雄县新田、乌迳驻有一个团，在南雄县城驻两个团和一个警卫旅，还配备有一个飞行大队。整个封锁线构筑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在防御线的最前沿，布置有当地反动靖卫团和“铲共团”把守。陈济棠称这条封锁线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因何长工、潘汉年代表红军与粤军谈判达成的秘密停战协议，尚未贯彻到粤军驻赣南部队，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突破封锁线战斗于10月21日上午10时许打响。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向信丰县白室（即别室）守敌发起攻击，当晚全歼该敌。战斗中红四师师长洪超被流弹击中牺牲。23日凌晨，红四师乘胜一举攻占信丰县古陂镇，守敌大部被歼灭，残敌逃向安

息。担任右翼后卫的红八军团，也于22日随红三军团后侧跟进，在赣县王母渡击溃守敌，西渡桃江。

与红三军团发起攻击的同时，左前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也于21日下午4时向信丰县新田守敌发起进攻，歼敌三百余人。当晚10时毙伤金鸡守敌两百余人，占领金鸡圩。10月22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向信丰县西南全速追击，将溃退途中的粤军教导团拦截于信丰县石背山隘，毙俘敌各三百余人，缴获大批辎重。担任左翼后卫的红九军团，紧随红一军团后跟进，扩大战果。

被红军左、右前锋击溃的各路粤军，纷纷逃至信丰县安息，与原在安息的守军会合，兵力约万余人，阻击红军。23日凌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协同向安息守军发起强攻，毙敌千余人，因敌增援部队赶到，未能攻占阵地。为争取时间突破封锁线，中革军委电令红一、三军团停止强攻，各派一部兵力牵制安息和信丰县城守敌，主力绕道坪石、铁石口、大塘埠一带，抢架浮桥，西渡桃江。

10月24日，随红一军团衔尾跟进的红九军团推进至安息时，被粤军一个团袭击，牺牲百余人。军团部指挥红三师第七团坚决反击，将敌击溃，占领安息圩，随后西渡桃江。同一天，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在信丰县小河口渡过桃江。担任野战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也于同一天在赣县窑下一带西渡桃江。

至此，整个野战军全部渡过桃江，胜利突破了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向赣粤边界推进。10月26日，左前锋进入广东南雄县界址、乌迳一带，沿赣粤边界南侧向湘南推进；右前锋红三军团抵达信丰县油山，随后进入大余县境内，击溃大余县青龙驻敌，向崇义县上堡等地急进。这时，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急令驻赣州、南康和驻南雄、韶关的部队，由北、南两个方向向大余县逼近，企图夹击红军后续部队，并派飞机轰炸。红军展开英勇反

击，红八、九、五军团和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迅速在大余县新城至南雄县乌迳一线渡过章江。

10月30日，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和红八、九、五军团全部离开大余县境，由大余县横江、左拔一线进入崇义县，翻越大山，全部离开赣南，经湖南城口、汝城一线继续西进湘南。

从此，红军野战军全部突围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三 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

突围西征的中央红军野战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已令其主力后撤至大余、南雄及粤北一线，以防红军进入广东。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正分散各地“清剿”，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各路部队还远在赣南，湘南地区只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敌军兵力空虚。因此，突围西进的红军野战军于1934年11月5日至8日从汝城、城口间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又于11月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继续向湘桂边推进。

红军野战军入湘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湘南道县地区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西进红军为抢渡湘江，与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展开空前惨烈的激战。八万余人的红军部队损失惨重，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余人。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部队所剩无几，只得撤销建制。殿后掩护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留在湘江东岸，全师覆没，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

按中共中央“三人团”原定计划，红军渡过湘江后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已看出红军意图，急调20万兵力在湘西南及黔东布置一个口袋阵，企图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途中。博古、李德没有察觉到国民党军部署变化，仍按原计划

命令红军往敌人口袋里钻。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红军应立即转兵黔东，跳出敌人包围圈。在1934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1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获得通过，会上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胜利渡过乌江，1935年1月7日进占遵义城。

在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的积极推动和周恩来的支持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军事上的统治，党中央改由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不久，即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的鸭溪、苟坝一带，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而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改前段时间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艰难处境，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大雪山，1935年6月12日与从川陕苏区长征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红军主力全体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后，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战胜了张国焘反对北上、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穿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终于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十六章

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

一　中央对开展红军游击战争的布置

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团”在筹划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对红军主力撤离后如何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也作了安排和布置。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战区工作指示信》，中革军委发出《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和《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联合发出《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等。此外，在组织上也作了相应安排。

1934 年 9 月初，仍在赣南省委指导工作的项英，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回瑞金。9 月 7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再次任命项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10 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以下简称中共中央分局）。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五人组成，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龚楚任参谋长。中央军区司令部下设作战科（科长郭如岳）、情报科（科长严重）、交通科（兼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科长连得胜）；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下设组织部（部长史犹生）、宣传部（部长李翔梧）、破坏部（部长袁血卒）、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兼〉）、秘书处（处长林中伯）；中央军区卫生部部长王立中，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张凯。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苏区还成立了少共中央分局，李才莲任书记。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机关领导人员，还有原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周以栗（患肺病长期住院休养），原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原中央土地部部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二苏大会后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原中央财政部部长（1933 年冬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原福建军区政治委员（长征前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患肺病长期住院休养），原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原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1934 年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周月林等。因中央政府办事处之下只成立了几个专门委员会，所以上述同志中多数人都未安排具体领导职务。此外，毛泽覃及其即将分娩的妻子贺怡，毛泽东和毛泽覃的岳父贺焕文、岳母文杜秀，周恩来的岳母杨振德等一些领导人的亲属，也都留在中央苏区。

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有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下辖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约两千人、枪；还有七个红军独立团

归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独立师和独立团（含各省军区所辖独立团）总兵力约一万六千余人。加上各县独立营、游击队等，武装人员总人数约三万人。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前住在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和突围转移初期负伤的重伤员，共约两万五千余人，也留在苏区继续治疗。

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后，原中央苏区所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五个省及瑞金、西江等直属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留守红军部队，均转为受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领导。它们的具体情况是：

江西省：中共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组织部长刘球贤，宣传部长（不详），妇女部长谢玉钦；少共省委书记钟效培。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副主席徐达志。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政治委员曾山（兼），参谋长薛子政，政治部主任黄志超。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突围长征时，江西省仍辖有兴国、胜利、博生（宁都）、洛口、石城、公略、万泰、永龙、乐宜崇（联合）等较为健全的县级党政军领导机关，1934 年 11 月又成立了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

福建省：中共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省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吴必先，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1934 年 10 月红九军团撤离福建苏区出发长征时，中共福建省委仍下辖有长汀、汀东、龙岩、代英、新杭、新汀杭、汀西、永和浦、兆征等中共县委。

闽赣省：中共省委书记赖昌祚，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时，中共闽赣省委仍辖有建宁、宁化、清流、归化、彭湃、泉上等中共县委。

粤赣省：中共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在 1934 年 8 月调至新设立的赣南省工作，留守粤赣省的中共粤赣省委书

记刘晓和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等，在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转移时也奉命随军行动，只剩下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邓学林、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许承芬与中共会昌县委书记陈长林等一起，在会昌县领导游击战争。

赣南省：中共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钟循仁兼任军区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共赣南省委辖有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寻安会、信康赣、于西七个中共县委，1934 年 11 月又在杨殷、赣县苏区新成立中共杨赣特委，同年 12 月在小溪新成立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委（后称中共赣粤边特委）。

直属县：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后，原直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的瑞金、西江两县党政组织，改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直属县。193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转移到于都县宽田地区后，又以宽田为中心新设瑞西县，成立中共瑞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同年 12 月，为加强对上述三县游击战争领导，中央分局决定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和瑞西军分区，将原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调任中共瑞西特委书记，中央军区任命刘连标为瑞西军分区司令员。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规定，与中央苏区毗邻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三个苏区的中共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闽北分区委，亦受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直接领导。

湘赣省：中共省委书记陈洪时，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副主席萧行麟；湘赣军区总指挥彭辉明，陈洪时兼任政治委员。

湘鄂赣省：中共省委书记陈寿昌（1934 年 11 月陈寿昌牺牲后由傅秋涛代理），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何振吾（1934 年 11 月后邓洪），副主席张金楼；湘鄂赣军区总指挥

徐彦刚，政治委员陈寿昌（1934年11月后为傅秋涛）。

闽浙赣省（含闽北分区）：中共省委书记万永诚；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副主席余金德、徐大妹；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方志敏，政治委员曾洪易。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祝维垣，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

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于1934年10月13日在瑞金云石山乡马道口村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军区于10月22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宣布成立。这些机构成立后都设在瑞金云石山乡马道口村原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内，1934年11月上旬迁驻于都县宽田乡石含村、龙泉村，同年12月底又迁驻于都县黄龙乡（今黄麟乡）井塘村。

中共中央书记处赋予中央分局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红军野战军安全突围转移，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成果。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指出：为着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主力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后去进攻敌人，创建新的苏区，以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于主力红军周围，使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的行动的方针。”“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①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中共中央在《训令》中指示中央分局和留守红军："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与独立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与扩大自己"，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敌人，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要求"党应该时刻依照环境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组织与工作方式"，"县区的党与各个组织，应该立刻缩小机关，派遣大部分干部及非必需的工作人员到游击队及地方工作中去"；"被敌占领的游击区域的党的领导机关，应该立即转入游击区域去，组织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要在游击区群众中建立党的支部，"使游击队的活动与群众斗争配合起来"；同时"必须在所有的地方党部中进行秘密工作的准备……组织秘密支部干事会与分区委"，"必须审慎地考察与选择干部，不让反革命分子与政治上动摇分子混入秘密组织"，等等。[①] 这些都是对的。

但是，中央在《训令》中又不切实际地要求中央分局和留守红军要"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②]，而没有要求中央分局和留守红军准备应付艰苦复杂的环境，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导致中央分局后来在对斗争形势的估计判断过于乐观，不能适时地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苏区游击战争受到惨重损失。

中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分局交代任务时，还要求留守红军必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突围转移，将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中央分局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持的阵地。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7—158 页。

② 同上书，第 158 页。

二 留守部队掩护野战军安全突围

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成立后，首先坚决执行了中央所赋予的掩护红军野战军安全突围转移的任务，督率留守红军接替主力红军的全部防务，迟滞各路敌军向前推进，以确保红军野战军在于都河流域集结休整和突围转移的顺利进行。具体接防、阻滞情况如下：

东线战场：从1934年9月底开始，红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独立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在长汀之南，阻击东路河田之敌李延年纵队前进，使红九军团从容退出阵地，开往瑞金、会昌集结。直至1934年11月3日，中革军委才致电项英，指示："目前已无使用二十四师抗击李纵队之必要，而应灵活使用。"①

北线战场：红军独立七团、独立十一团和赤水、石城、太雷等县地方武装，从10月7日开始，先后接替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师防务，在石城县南部阻击敌第三路军第三、第五纵队和敌东路军第十纵队向瑞金推进，使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师先后安全撤出战斗，开向于都集结。10月9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独立第七团首长，要求："在陈敌由石城向南前进时，独七、独十一两团则向坪山及石城河南岸，沿石瑞大道节节抗退。"② 10月13日，朱德又致电项英："石城方面独立七团应活动在石城、头陂之线，扰乱敌罗、樊两纵队向头陂集中"，"独十一团目前仍应

---

① 《中革军委关于敌占长汀、宁都后中央军区应采取的行动给项英的指示》(1934年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② 《朱德关于红十五师转移作战方向和独七、独十一团作战任务致彭绍辉等电》(1934年10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在石城以南游击阻敌，严密封锁消息。”① 驻守于广昌与宁都交界地区的江西军区独立一团和宁都（博生）、洛口、宜乐等县地方武装，担负阻击敌北路罗、樊纵队向宁都推进之任务。

西线战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10月13日致项英电令中要求：江西军区“独二团在古龙岗以南及敌人左翼，独三团在古龙岗以南及敌人右翼积极活动，并严密封锁消息，以掩护我八军团的集中与移动。当十八号我五军团将由兴国向雩都移动时，独三团应于十七号移至兴国以南及东南，接替五军团的任务，并率领地方部队积极游击于兴国之敌两翼侧。当兴国、古龙岗两敌对向筑堡时，独二团应活动在古龙岗、兴国之线，破坏敌之筑堡”②。10月18日，在兴国抗敌的红五军团依令撤出阵地向于都转移，当日朱德又致电红五军团首长董振堂、李卓然和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指示：董、李应以军委名义直接调动独三团、独十三团，限明十九日到达兴国城东南及西南地域，担任游击及迟滞敌周浑元纵队南下的任务，并要求项英：“项应严格督率各独立团遵守命令时间。”③

南线战场：赣南军区独立六团和独立十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直接配合野战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独立十团在门岭、会昌县以东地域，独立十五团和独立十六团在门岭、安远县之间和会昌县站塘、麻州地域阻击粤敌前进。10月22日红军野战军

---

① 《朱德关于改变中央苏区各独立团行动部署致项英电》（1934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② 同上。

③ 《朱德关于红五军团转移到雩都地域并调独三、独十三团到兴国阻敌南下致董振堂、李卓然并项英电》（1934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突围战斗打响前夕，中革军委又致电中央军区项英，要求责成赣南军区率领各地方独立部队深入到敌人撤退区域，“发动群众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扰击粤敌撤退”，“消灭铲匪”、后送野战军突围战斗的重伤病员等。①

为保证野战军和中央机关能安全集结和突围转移，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还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领导苏区军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全套机关名称都被暂时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被留下在苏区坚持斗争的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各部门工作。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仍照旧执行。《红色中华》报继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旧是扩红、征粮、优待红军家属等。这些措施有效地迷惑了敌人。到10月下旬，北路敌军占领宁都县城后，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东路敌人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在中央苏区。据蒋介石南昌行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在全国解放后回忆，蒋介石直到1934年11月中旬，才彻底弄清中央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

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红军和苏区民众采取的上述措施，在各个战场上有效地阻击、迟滞着三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解除了野战军集结休整及突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使野战军从容进抵湘南地区。

三 中央苏区的最后失陷与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下旬末，国民党军已得知中央红军主力已突围

---

① 《中革军委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给项英的指示》（1934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西进。蒋介石除将其北路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调去追击红军野战军外，其余二十余万兵力仍留在中央苏区周围，从北、东、西三面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10月14日，北路敌第六路军第八纵队占领兴国县城；10月26日，北路敌第三路军罗卓英部占领宁都县城；11月1日，东路敌第九师、第十师占领长汀县城；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为敌东路第十师所占；11月17日，北路敌第七十九师进占于都县城；11月23日，东路敌第三师李玉堂部占领会昌县城；11月26日、30日，福建清流、宁化两座县城也相继陷落。至此，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

国民党军进占中央苏区各县城和交通要点后，加紧构筑碉堡封锁线：一条是广昌—石城—瑞金；一条是广昌—宁都—瑞金—会昌筠门岭；一条是长汀—瑞金；一条是兴国—赣县江口—于都；一条是兴国社富—杰村—于都水头—马安—兴国江背洞。这样，就将中央苏区分割成几大块。敌人在每大块之间又构筑纵横的封锁线，企图将留在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围困在狭小地区内，进而分区“清剿”。

当红军野战军西进抵达湘南，国民党军已占领宁都、长汀后，中革军委于1934年11月3日致电项英，指示中央留守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一、一般的应放弃从正面的防御而应利用敌人前进的迅速和筑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游击战争。二、目前已无使用二十四师抗击李纵队之必要，而应灵活使用。在敌人一师以内行动的方向，二十四师行动的方式主要的应该是游击战争的方式，不过是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行动。三、江西、闽赣和福建军区应在敌人复杂的封锁线外行动。江西军区在石城、宁都、兴国以北行动；闽赣军区在汀州东北地域；福建军区在汀州东南及西南地域行动。四、现在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应由

梅坑转移到宽田地域。”[①] 中革军委的这一指示，虽然未要求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应迅速转变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将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但已明确指示留守红军一般地应放弃原来的正面防御战术，而应抓住时机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和敌军侵占苏区的行动部署，于1934年11月初率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撤离瑞金云石山马道口村，转移到于都县宽田地区的龙泉村和石含村。此时，陈毅等一些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已非常严峻，他们主张中共中央分局等领导机关和留守红军迅速改变斗争方式，组织苏区军民和留守部队灵活开展游击战争。然而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虽然意识到局势严峻，但他对前途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如同中共中央10月8日训令所说，待主力红军突围到了湘西，在那里打几个胜仗，就可将围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吸引到那里去。苏区军民只要能坚守两三个月，到那时来一个胜利的反攻，就可以一举恢复苏区。因此，他在完成掩护野战军安全突围转移任务后，虽然不再要求留守红军采用阵地战法，却不敢跳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留守红军划定的“三角地区”，更不敢将红军部队分散在各地灵活开展游击战争，而是仍然要求留守红军和各地党政机关人员，沿用苏区那一套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照旧地开会、发文件，照旧地扩红、征粮，照旧地组织大兵团打正规战。当东路国民党军第三师两个旅由瑞金向会昌孤军冒进时，中

---

① 《中革军委关于敌占汀州、宁都后中央军区应采取的行动给项英的指示》（1934年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批准了红二十四师领导提出的作战计划，于11月22日集中红二十四师三个团和福建军区独立团及瑞金、会昌两县地方武装，在瑞金谢坊湾塘岗设伏，歼敌半个旅，击溃敌半个旅。这次战斗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后的嚣张气焰，鼓舞和兴奋了苏区军民斗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同志的盲目乐观情绪。在这期间苏区各省、县、区广泛开展的群众游击战争，虽然点多面广，但谈不上灵活机动，仍属消极防御性质，这也是这些群众游击战争最后均遭失败的根本原因。

1934年12月中旬，项英从中革军委电报中得知，红军野战军已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改向贵州北部遵义地区前进。这时，他真正意识到局势已十分严重，几经考虑，终于接受陈毅等的建议，在于都县宽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分局会议，决定转变战略思想，改变斗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会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迅速采取一系列实行战略转变的措施：

一是向苏区干部正式传达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内容，加强机关、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军区政治部编写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印发给部队排以上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学习，公开地深入宣传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重大意义，以及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广大干部战士认清形势，坚定革命信心；同时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着重反对“失败主义”和右倾逃跑现象，努力巩固部队。12月29日，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召开瑞金、瑞西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项英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报告，分析了粉碎敌人“清剿”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提出了粉碎敌人“清剿”的若干措施。

二是调整了党的组织领导机构，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

加强领导。12月底，派张鼎丞回福建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新成立的中共瑞西特委书记，领导瑞金、瑞西和西江三县游击战争；另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任中共省委书记，调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原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任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书记；派少共中央分局的李鹤鸣到胜利县领导游击战争；调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赣县、杨殷苏区，任新成立的中共杨赣特委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原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李乐天和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少共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长刘新潮（刘建华）等，在于都县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信康赣雄军分区（后改称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以李乐天为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率独立营七百余人，挺进到信丰县油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三是加强对游击战争的布置和领导，对苏区、敌占区和敌人后方等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为了提高游击队负责人的游击战术水平，中共中央分局在宽田举办了数期游击训练班，中央军区建立了若干条通往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以便及时掌握敌占区情况。

四是组织各地群众坚壁清野。中央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机械设备，在1934年11月间就秘密埋藏于宽田、上堡一带山区。1935年1月，又将中央被服厂的百余台缝纫机等设备，埋藏于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深山密林中。同时动员群众将水源破坏，将粮食和砻、碓、风车等碾米用具分散隐蔽。

五是疏散红军伤病员和老弱病残人员。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时，留下两万五千余名红军伤病员在中央苏区。1934年12月28日项英在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由十月二十日到

现在出（院）四千余人，残废与重伤已分散到群众家里，瑞西地区还有八九千轻伤病员，赣南河南共有一万以下，杨赣二千以下，兴、胜之间千余人。”① 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将这些一时难以伤愈出院的伤病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中。赣南省和于都、瑞西等省、县党政机关，对妥善安置这些伤病员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工作。留在苏区的红军家属，如毛泽东的岳父母贺焕文夫妇及儿子毛岸红（即毛毛），林伯渠、邓子恢、刘伯坚、陆定一、古柏等人的儿女，傅连暲的妻儿，邓颖超的母亲等，都分别妥善疏散到白区或群众家中隐蔽。

上述措施，对开展和坚持苏区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共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仅仅是局部的。项英在总结这一阶段斗争经验教训时说：“虽然我们放弃了过去的阵地的防御战，转为运动战，由正规作战逐渐转向游击战争，在战术上采用游击队的动作，但在基本上没有认识当时整个斗争的实质，不能彻底转为纯粹的游击战争，还保留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还偏于单纯的消极防御，更没有从各个时代的特性与变化来认识当时游击战争的实质及其战术的特点。”② 如1935年1月间项英和中央军区组织的洋陂战斗、牛岭战斗，使红军游击队伤亡千余人，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负重伤，留守红军部队元气大伤。

四　中央分局和中革军委对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团行动的指导

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的行动，在1934年11月3日以

---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②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页。

前，一直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1934 年 11 月 4 日，中革军委致电项英并红七军团及闽浙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指示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以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方志敏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军委在电令中明确宣布："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区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电达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① 据此电令，中共中央分局与中央军区正式建立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团的领导关系。自 11 月初至 1935 年 1 月中旬，项英根据中革军委要求和闽浙赣苏区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多次向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团领导发出电令，作出指示。

按理，红十军团和闽浙赣省委、军区能就近得到中央分局领导，应该于斗争有利。但是，由于项英对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团情况不熟悉，对野战军撤离后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团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了解，又不耐心征求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意见，却又喜发号施令，对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团的领导必然脱离实际，甚至作出错误的重大决策。1934 年 11 月 18 日项英以中央军区名义对红十军团的行动等问题作出的指示，就是错误的。项英在致方志敏等的电令中，要求"十军团决全部立即从玉、常间挺出铁道以北，首先活动于开、遂、衢、常间，并［以］一部积极破坏铁道，威胁衢州。调动围攻闽浙赣敌人，集结主力，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为此，他不仅不同意将闽浙赣党政军领导机关向闽北苏区转移，还在电报中

① 《中革军委关于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及领导关系致项英等电》（1934 年 11 月 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2 页。

指示："为了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决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并指示："军区、省委仍留闽浙赣苏区，不应移闽北；由你们选定军区司令员，以独［立］师为基干，继续领导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苏区。"①

对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电令，闽浙赣苏区省委、军区和红十军团只有坚决执行。仅经过六天仓促准备，11月24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粟裕等率红十军团军团部暨第二十师（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已先向浙皖边出击）撤离闽浙赣苏区首府葛源，向皖南出击，12月10日抵达皖南歙县汤口，与第十九师会师。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战斗中失利，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重伤牺牲。随后，红十军团在皖南地区辗转活动半个多月，行动困难，在皖浙边创造新苏区计划难以实现。得知这些情况后，项英以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名义致电红十军团，要他们由皖南改向浙南行动。于是，红十军团领导决定，部队先回赣东北老区作短暂休整。不料，部队在返回赣东北途中遭敌重兵拦截，除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和军团参谋长粟裕率先头部队安全返抵德兴老区外，军团主力两千余人与敌血战七天七夜，大部牺牲、被俘，少部冲出重围。军团长刘畴西、第十九师师长王如痴和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亦先后被俘，后在南昌被国民党杀害。1935年1月20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了红十军团失利和闽浙赣苏区情况，但他将红十军团失利原因，归咎于主要是红十军团领导"决心犹豫，

① 《中央军区关于十军团之行动任务及组织军政委员会等致方志敏等电》（1934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避免作战，常失时机，影响士气极坏”[①]，而根本不检讨自己的领导责任。

在这期间，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发现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曾洪易，存在严重的右倾逃跑思想，对闽浙赣苏区的游击战争造成严重妨碍，遂决定撤销曾洪易所任职务，并在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留守红军中开展反对曾洪易逃跑主义斗争。

红十军团失败后，由于电报联系中断，自1935年2月初起，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无法再对闽浙赣苏区游击战争实施领导。

第二节 中央苏区各省和中央直属县初期的游击斗争

一 江西省群众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撤离苏区时，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领导留守红军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红军野战军安全突围转移的同时，于1934年10月18日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署名文章，对苏区即将开展的群众游击战争作出布置，向苏区军民指出：“我们大部分的中心区域将要变成为战区，辽阔的战线将要在全中央苏区展开起来，我们将要在各方面与敌人进行最残酷的国内战争了！”他号召苏区群众：“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区，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我们的主力红军更容易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依靠着我们广大的群众游击战

---

① 《项英关于十军团、闽浙赣及闽北的情况致朱德、周恩来电》（1935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争，来胜利的保卫我们的苏区。”①

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不久，江西省党政军领导机构按中央规定，合并成立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山为主席。同时对全省地方武装进行整编，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省级机关工作人员和省属红军部队，全部撤至宁都县北部的小布、安福山区。11月，省军政委员会又决定在公略、万泰、兴国三县接邻地区成立中共公万兴特委，派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达志（徐牺牲后由胡海接任）任书记。同时，在兴国、胜利两县接邻处，新设兴胜县。

1934年10月26日宁都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后，曾山和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率红军游击队两三千人，在宁都、永丰两县边界山区与敌周旋，几次被围，损失严重。12月底，曾山在宁都小布树陂村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从宁都突围到吉安东固去，会合后再去追赶主力红军，或突围到湘西去与贺龙部队会合。三路突围结果，仅曾山所率一路到了东固。其余两路均被敌人包围打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负重伤后脱险。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因腿伤行走不便在小布岩背脑英勇牺牲。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刘球贤、少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李美群、省保卫局长娄梦侠等被俘。他们在南昌被国民党杀害。

曾山所率的两个独立团转移到东固后，与中共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率领的游击队会合，1935年2月下旬又与罗孟文率领的中共杨赣特委和红军独立十三团在泰和县老营盘会合。经研究，他们决定分头突围到赣粤边去，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游击队

---

① 项英：《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1934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68页。

会合。突围中，部队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知潮、少共江西省委书记钟效培等或亡或伤。仅曾山率省委机关少数人突围到吉水县境。为保存力量，曾山安排大家埋掉枪支，分头疏散隐蔽。他自己于1935年5月间秘密前往南京、上海寻找党组织。

江西苏区所辖各县，都按中革军委第44号命令相继组建了县、区游击司令部和独立团、独立营或游击队。其中博生（宁都）县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230支枪，活动于宁都县西南的青塘山区。这个县的安福、梅江等区乡干部，也分别组织起10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于深山密林中，打击骚扰敌人。洛口县以党政机关干部和池布、前山等9个区的游击队为基础，组建起300多人的县游击队，在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长胜县以县政治保卫队和县党政机关人员组成的县独立营，有300多人、60支步枪、14挺手提机枪。该县各区乡游击队有20多支，总计游击队员5000多人。兴国、胜利以及新设立的兴胜县所辖独立营，分别有300多人。石城和太雷两县苏区失守后，两县党政机关人员分别编成县游击大队，后来又合并成立石太游击师，在石城县南部与敌人斗争。苏区江西省所辖的永丰、公略、万泰、乐安、宜黄、崇仁和广昌等县，在红军主力撤离前就已失陷。这些县都各自组建了独立团或独立营，有的组建了挺进游击队，挺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上述各县游击武装，坚持斗争到1935年春夏间，先后都遭到失败。只有乐宜崇挺进队中的100余人，突围转移到湘赣边区与谭余保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坚持斗争。

二 福建省群众游击战争

1934年11月1日长汀城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前，福建省党政

军机关及福建军区所辖独立第十九、二十团共四千余人，全部转移到长汀县南部四都山区，坚持斗争。1935 年 2 月，毛泽覃受中共中央分局委派，率一连红军从于都县南部突围转移到四都与中共福建省委会合，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此时，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在保安十四团钟绍葵部配合下，向四都山区发起进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拒绝毛泽覃等人的正确建议，仍坚持以大兵团方式作战，结果红十九团、二十团先后被击溃。1935 年 4 月上旬，陷于国民党军重围之中的省委机关部队，被迫在长汀县西南边境的腊口分水坳分散突围。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部在武平、会昌边境山区梅子坝与敌激战，万永诚、龙腾云英勇牺牲，部队官兵大部阵亡。毛泽覃率部突围到瑞金县黄蜡口（今黄田坑）山区，4 月 26 日因叛徒告密遭袭击英勇牺牲。省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吴必先所率领的突围人员在长汀县濯田之鸡冠峰被敌包围，全部被打散或被俘、牺牲。

在此期间，苏区福建省所辖长汀、兆征、武平及上杭、新泉、永定等县游击武装，也各自为战，坚持游击斗争。1934 年 12 月底，张鼎丞受中共中央分局委派回到福建与省委取得联系后，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身份，带领部分人员前往杭、永地区，领导游击斗争。途经上杭县通贤障云岭时，他会见上杭、长汀、新泉三县领导人，建议将三县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中共新汀杭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三县武装也合并组建新汀杭游击纵队。随后，新泉独立营挺进游击队和池溪、新朋游击队共两百多人也从新泉到障云岭会合，在这一带坚持斗争。回到永定后，张鼎丞一方面将永定县分散各地的几支游击队集中整训，成立永东游击司令部；一方面派人与在闽西南坚持斗争的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独立红八团、红九团取得联系，1935 年 3 月在永定县下洋的

月流，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闽西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的游击战争。

三 闽赣省群众游击战争

闽赣军区于1934年10月下旬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对全省各县独立团、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队和军区直属部队进行整编，统一编成了闽赣独立第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四个团，各县另组建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月，中共中央分局对中共闽赣省委主要领导人进行了调整。2月至3月，中共闽赣省委和闽赣军区率领武装部队和机关人员，在闽赣边境地区与敌周旋，后转入归化、泰宁与将乐三县交界的龙西山，坚持斗争。

1935年5月上旬，闽赣省机关和军区第一团转至尤溪、永泰、德化、仙游四县交界的紫山。这时，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等人，在艰苦环境下思想动摇，对革命丧失信心，于5月8日分批将部队六百余人拉下山准备投敌。途中，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等人，识破了宋清泉等人的叛徒居心，夺路突围，后被打散。钟循仁、杨道明等隐姓埋名，削发为僧，隐藏于永泰县闇亭寺等寺观，直至全国解放。被宋清泉等人拉下山的队伍，于5月11日在仙游县度宽被国民党军第九师缴械。

1935年4月间在沙溪战斗中与闽赣军区失去联系的红十七团和十八团，由十八团团长邱尚聪、政委温含珍率领，返回宁化、清流、归化地区坚持斗争。7月，这支队伍与闽西红九团会合。此后，他们在龙岩、连城、宁洋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原中共闽赣省委常委黄道和少共闽赣省委书记曾镜冰等人，突围转移到闽北山区坚持游击斗争。

四　粤赣省群众游击战争

粤赣省原辖会昌、寻乌、安远、门岭、西江、于都、信康七县。1934年5月，西江县划为中央直属县；7月，于都、登贤（原信康县改称）两县划属赣南省。

1933年秋冬，寻乌、安远两县苏区相继被国民党粤军侵占。两县党政机关合并成立中共寻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武装力量分别编成寻乌挺进营和安远游击挺进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粤赣军区也派出军区政治部主任罗屏汉，带领挺进游击队深入兴宁、平远、寻乌、龙川等县边区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留在苏区的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邓学林、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许承芬等，与中共会昌县委书记陈长林等一起，领导会昌县军民开展游击战争。11月23日会昌县城失守后，会昌县游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和各区游击队千余人，转移到会昌县西南龙车山和高兰山区，坚持斗争。1935年5月，游击队被国民党军打散，邓学林、许承芬、陈长林等被俘牺牲。

五　赣南省群众游击战争

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时，赣南军区辖有独立第六团和一个教导营，约有两千余人、枪，战斗力较强。野战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奉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分局命令，率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从于都城赶到小溪地域，指挥军区部队配合野战军的行动，做好突围野战军的伤员后送工作。野战军离开赣南后，军区又指挥部队乘胜跟进到安远、信丰地域，巩固刚收复的苏区。独立第六团曾一度收复安远县城，缴获大批物资。

1934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从兴国经江口向于

都县城进攻。赣南省党政机关被迫从城内撤出，先后转移到于都城南的里仁孝堂排、黎村烂泥垅和小溪左坑。于都县党政机关也从县城转移到县东潭口、梓山山区。在这期间，除独立第六团等骨干部队在安远、信丰肃清地方靖卫团、恢复巩固苏区外，军区教导营和于都独立营等部队，不断骚扰于都河南岸构筑碉堡的国民党第七十九师部队，使敌人至1935年2月中旬才构筑完成这一带的封锁线，从而掩护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在宽田、井塘活动期间的安全。

1934年12月间，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四个师从粤北返回赣南，重新占据信丰、安远、大余、赣县（赣州）等县，并向于都、会昌苏区“清剿”。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也构筑了从兴国经杰村、南塘、江口至于都城的碉堡封锁线。1935年2月，赣南省党政机关和赣南军区部队已被敌人封锁在于都县南部的禾丰地区。这时，项英、陈毅率中共中央分局机关和红二十四师也来到禾丰。此后，赣南省机关部队在中共中央分局统一指挥下，开始了分散突围行动（详情后叙）。

赣南省党政机关所在的于都县，在1934年10月下旬就成立了游击司令部，组建了独立团，下设于东北、于西北两个游击司令部分部，另设于东南办事处，分别建立了数百人的骨干游击队。本月，县独立团改编为中央军区直辖独立第三团后，于都县又组建了一个独立营。这些游击武装和独立第三团及赣南军区教导营紧密配合，不断骚扰侵占于都苏区的国民党军队。1934年12月，经中共中央分局批准，在于西北地区新设立于西县，同时组建了于西县独立营。两个月后，该独立营在与国民党军激战中被打散，少数人突围到达信丰油山。于东南办事处工作人员和于都县独立营，也于1935年4月在于都县南部的畚岭山区被国民党粤军打散，县委书记钟先灿牺牲，少

数人突围到了赣粤边。

登贤县原有一个独立营，另有一个茶梓区独立营。他们紧密配合红二十四师等红军部队作战。1935 年 2 月根据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共赣南省委指示，登贤县党政机关人员和两个独立营一起整编，成立挺进队，共三百七十余人，由县委书记陈梦松、县苏政府主席钟家瑶率领，挺进到被粤军占领的安远、信丰边界地区游击。他们坚持斗争到 4 月间，后被敌人打散失败。

赣南省所属的杨殷、赣县两县苏区，合称为杨赣苏区。1934 年 11 月，中共赣南省委在这块苏区成立了中共杨赣特委，同时设立军分区，组建了红军独立第十三团，全团六百多人，有轻重机枪二十余挺。两县在区、乡游击队基础上，分别新编了独立营。特委和军分区领导独立第十三团及两个县的独立营，采用灵活战术，先后取得里仁、龙坪、大都、江口棺材岭等战斗胜利，毙伤敌人数百名。1935 年 1 月后，南面粤敌余汉谋部和北面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对杨赣苏区进行夹击，苏区全部沦陷。红军独立第十三团和两县独立营在敌重兵包围中东冲西突，连连受损。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负伤后离职隐蔽休养，代理特委书记赖福林、特委副书记王启生等 16 人不幸被俘，后被害于敌人狱中。

六　中央分局直属各县群众游击战争

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后，瑞金、西江两县改为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直属县。1934 年 10 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局又决定以于都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这三县是中共中央分局必须最后坚守的“三角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2 月，中共中央分局决定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和少共瑞西特委，调中共闽赣省委书

记赖昌祚任中共瑞西特委书记；同时设立了瑞西军分区，刘连标为司令员；并组建了独立营，赖绍尧为营长。项英曾于1934年12月28日亲自召集瑞金、瑞西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布置该地区的游击战争。

红都瑞金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前，瑞金县即成立了县游击司令部和县独立营。瑞金县党政机关和独立营撤退至县西部的铜钵山寨脑、朱坑。瑞金县游击司令部一分为二，分别成立瑞金河（绵江）河东、河西游击司令部。河东司令部以汀瑞边大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活动；河西司令部以九堡铜钵山为依托，与红二十四师及红军独立七团、十一团等部队紧密配合打击敌人。1935年1月，瑞金独立营在黄竹坳与敌人打了一仗，获得胜利，得到中共中央分局通报表扬。与瑞金毗邻的西江县苏区，于1934年11月陷落，县游击司令部率县独立营和各区游击队，先在西江镇西部山区活动，1935年2月间转移到东边白竹寨山区，不久失败。

1935年2月上旬，国民党军集中三个师兵力，对铜钵山和瑞西县进行“清剿”。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十一团及瑞金、瑞西两县游击队，同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斗争。3月，根据中共中央分局指示，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率领特委独立营及瑞金县游击队向汀瑞边界突围。突围中，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中共瑞西特委保卫局长钟天禧英勇牺牲。瑞金县党政领导人杨世发、杨世珠等被打散。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后，转移到罗汉岩、丝茅坪地区，后在汀瑞边坚持游击战争。

瑞西县党政机关人员和独立营数百人，在中共瑞西县委书记马德明率领下，突围到达汀瑞边的白竹寨山区坚持斗争，后被敌打散。5月，马德明被俘，英勇就义。

红军野战军撤离苏区后，中共中央分局领导的各省、县、区群众性游击战争，前后历时八个多月。这些群众性游击战争虽然

大多数都失败了，但它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近二十万兵力，支援了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表现了苏区人民忠于革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第三节　中央分局领导机关和留守红军“九路突围”

一　中央书记处的“二月电示”

由于国民党军加紧对苏区进行分区“清剿”，1935 年 1 月底，中共中央分局面临的局势变得更加危急。此时，赣南省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已被国民党粤军三个师包围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的仁风地区；中共中央分局与湘赣、闽浙赣、闽赣、江西等苏区的联系均已中断，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也被压缩在方圆仅二三十公里的黄龙（今于都县黄麟）井塘地区，如不迅速突围，有全军覆没危险。

在这紧急时刻，项英对于中共中央分局等党政机关的行动方向迟疑不决，曾于 1935 年 1 月 27 日、1 月 30 日、2 月 1 日、2 月 4 日和 2 月 5 日，连续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请求中共中央迅速给予明示。

1935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终于给项英和中共中央分局发来“万分火急”电报，指示说：“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问题，认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斗争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

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①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指示，经研究，项英、陈毅首先安排身患肺结核病的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和原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年老体弱的何叔衡，原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怀有身孕的中共中央分局直属机关政治指导员张亮（项英之妻），2月9日离开分局驻地井塘村，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经瑞金武阳和福建长汀，往上海方向突围转移；原中央红色医院院长、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受陈毅委托，先护送一批中央重要文件前往武阳地区隐蔽，然后与瞿秋白等一行会合转移。瞿秋白一行行至长汀县水口时遇敌围击，警卫排被打散，何叔衡英勇跳崖牺牲，瞿秋白被俘后在长汀城英勇就义，张亮、周月林被俘、判刑，仅邓子恢等人突出重围后到达永定与张鼎丞等会合。

1935年2月9日，项英又电告中革军委：“我们等中央决议，请急电告，以便执行，如再迟不能应付新的情况。”并告知军分会拟以“周建平（屏）及龚楚或杨英为委员，请批复”。②同时，分局和办事处机关人员开始销毁、隐蔽文件档案资料。为避免被国民党军封锁包围，两三天后，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分局和办事处机关人员离开井塘村，在会昌县白鹅附近南渡贡水（于都河），转移到于都县南部禾丰（又名“梨邦桥”、“梨板桥”）地区，与赣南省机关部队会合。

---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年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② 《项英关于拟以周建屏等为中区分会委员向中革军委的请示》（1935年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1935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给中央分局发来详细电报指示："放在你们及中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的、顽强的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不足是最大危险。因此必须首先把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及全体同志心目中，并向广大群众解释明白。"

关于中央苏区在游击战争中应该采取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中央明确指示：

（1）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配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枪弹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2）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决。（3）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的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人去。湘南游击区也应派部队去加强它，但不应以庞大部队远出，而应以相当部队依傍着中区配合发展。（4）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突击运动及勉强使用纸币目前都不适宜了。（5）极大的给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要能独立存在。分局和办事处等庞大

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合部，在赣南、闽西一带转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6）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7）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都应该设法去建立。①

1935年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就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又给项英和中共中央分局来电补充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分局在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下列问题："（一）行动前必须将行动的任务及目前的形势在干部中、在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解释与动员。在时间上许可时，应尽可能的给部队以相当休息训练与补充的时间。（二）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任何笨重的东西、行李都不应拿，以便利于迅速的运动。一切供给均应取之于活动地区。（三）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的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十人。（四）苏区干部除分散到游击队去的外，应有一部分派回到被占领区域去，可能时最好是自己的家乡，隐藏在群众中，进行与建立秘密工作。（五）白区干部应尽量分散到白区，特别是邻近白区去。游击队携带的多余的干部，应留给地方党加强他们的领导。（六）对所有干部应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七）必须周密地建立秘密的交通网。（八）在游

① 《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年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254页。

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的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知道利用一切开始时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①

中共中央18天之内的四道电示，特别是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通过电报向中共中央分局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央分局和留守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斗争意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而且为中央苏区留守部队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终于下定决心实行战略转变。

二　九路突围

根据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项英、陈毅立即在于都县禾丰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对部队突围作出部署，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县南部的近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分成九路，从禾丰地区陆续出发，分散突围。2月19日和21日，项英两次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情况和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计划。

“九路突围”情况如下：

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善，率兴（宁）龙（川）寻（乌）安（远）挺进营四百余人，经会昌、安远县边界向寻乌县方向突围。2月19日遭国民党粤军一个团截击，部队被打散，王孚善率五十余人突围到广东梅县地区，又遇敌阻击遭到失败，王孚善下落不明。

---

① 《中共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年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中共中央分局组织部长陈潭秋和原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突围到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后经河田、朱畲、才溪、紫金山，抵达永定县，与张鼎丞、邓子恢等会合。

中央政府办事处保卫局长汪金祥，率领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到寻乌县南部和广东蕉岭、平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李天柱、孙发力率红二十四师另四个连，任务是依靠寻乌县南部原有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经安远、会昌两县边界，2月25日抵会昌县南部清溪，遇国民党粤军独四师堵击，伤亡惨重。汪金祥、李天柱率剩下的二三十人突出重围，到达寻乌县南部。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石衡中、史犹生，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前往湘南，收容野战军红三十四师失散部队，发展湘南游击区。2月25日，红七十一团在信丰县极富地区与国民党粤军交战后，安全抵达油山，留下两个连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余部由龚、石率领继续向湘南进发。但部队抵达湘粤边境郴县时，龚楚带一营人叛变投敌，余部留在湘南开展游击斗争。

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徐洪、政委张凯率领独立三团，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在该地坚持游击战争。该路在2月25日渡桃江时被敌截为两半。团长徐洪在突围途中牺牲。团政委张凯与一起突围的陈正人，率一百多人抵达安远、寻乌南部山区，与周建屏、李天柱会合。原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罗屏汉率游击队六七十人，也前来与张凯会合。5月，李天柱因自己擦枪走火牺牲。陈正人、周建屏被安排离开寻乌，秘密经汕头转赴香港治病并寻找组织。随军突围的原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周以栗在安远县牺牲。

毛泽覃率一个连突围到福建长汀县四都，与福建省委会合。

1935 年 4 月，毛泽覃率一支游击队返回瑞金黄蜡口（今黄田坑）山区活动，被叛徒出卖牺牲。

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奉命率领独立七团，前往闽赣省委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开展游击战争。2 月下旬，他们在瑞金西部突围时，队伍被打散。李才莲率余部转到闽赣边，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所率部队会合。再次突围时，李才莲牺牲，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围到了汀瑞边山区。

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等，率领独立六团及省委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两千余人，留在于都南部山区坚持游击战争。3 月上旬往赣粤边突围时，部队在畚岭地区与国民党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遭遇，激战后部队被冲散。刘伯坚和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德胜等在安远县塘村鸭婆坑受伤被俘，3 月 21 日在大余县城被国民党粤军杀害。梁柏台在突围时亦受伤被俘，押往大余县城后遇害。钟世斌在信丰县金鸡被俘后逃脱时牺牲。蔡会文、阮啸仙和陈丕显率部于 3 月 6 日冲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牛岭、马岭封锁线。阮啸仙在信丰县上小埂被流弹击中牺牲。蔡会文率余部两百余人与国民党粤军激战后，经定南县转至信丰县，4 月上旬抵达油山。

项英、陈毅、贺昌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最后突围。他们将全团编为四个大队，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3 月 9 日下午，贺昌率第三大队先行，袁血卒率第四大队跟进掩护，当晚渡过濂江（安远河），抵会昌县晓龙天门嶂时，遇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阻击，部队大部分牺牲或被打散，一部分人被俘。贺昌于 3 月 10 日晨在归庄壮烈牺牲。随队突围的红二十四师政委杨英亦

牺牲。师长周建屏率少数人突出重围到达安远、寻乌县南部，与张凯等会合。袁血卒率少数人突出重围，后辗转抵达上海。

三 项英、陈毅上油山

1935年3月9日傍晚，项英坚持向中共中央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后，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随后，与陈毅一起，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两个大队，从于都县南部上坪山区出发，摸黑向东突围。是时天空漆黑，大雨倾盆，濂江河水猛涨，部队渡河受阻。陈毅只好率部于当晚返回上坪。项英所跟队伍走错道路，与陈毅失去联系，又遭遇国民党粤军阻击。天亮后，项英亦率部分人员撤回上坪，与陈毅会合。

这时，上坪山区已被国民党粤军四面包围，红军队伍很快被打散。陈毅在上坪山上巧遇原中共信丰县委书记曾纪财。曾纪财对赣粤边情况非常熟悉。陈毅曾于1930年夏秋间在信丰组建过红二十二军，并在那里创办过红军学校，他的前妻肖菊英（1931年牺牲）亦是信丰县城人，所以他对信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项、陈与曾纪财商议后，毅然决定改变原定突围计划，转而突围到赣粤边去寻找李乐天、杨尚奎等所率游击队。于是，项、陈召集剩余人员开会，安排他们分散向赣粤边突围转移。随后，项、陈二人由曾纪财带路，换上便衣，半夜从上坪出发，在赣县王母渡附近偷渡桃江，一路颠沛，于3月底辗转抵达信丰县峙山蛤蟆岭，后又安全转移到廖地村上了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

九路突围，损失惨重。牺牲了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瞿秋白、贺昌和何叔衡、阮啸仙、刘伯坚、周以栗、梁柏台、钟世斌、毛泽覃、李才莲等重要干部。大部分突围部队被打散失败，突出重围的不到三分之一。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

事处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和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蔡会文、周建屏、陈正人等重要干部安然无恙。陆续突围抵达赣粤边、闽西南、汀瑞边和湘粤赣边的红军部队，也还有约两千人。这些革命力量得到保存，为今后各地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赣粤边、闽西南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一　赣粤边游击区

按照中共中央分局的统一部署，自 1935 年 3 月至 1937 年秋，突围转移到赣粤边、湘粤赣边、汀瑞边和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在上述地区顽强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红军游击战争。

赣粤边游击区包括信丰、大余、南康、赣县、龙南、全南、定南和广东南雄等县，以信丰油山、大余北山和梅山为中心。这个地区除全南、定南两县外，其余各县早在 1926 年就分别建立了中共组织，1928 年春在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信丰、南雄等地先后爆发过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革命武装，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1932 年春国民党粤军侵占赣南，信丰、赣县、南康三县桃江以东地区先后被粤军所占，与大余、南雄、龙南等县一起，成为红军游击区域。1933 年 9 月，苏区中共粤赣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信康赣县委，以半公开活动方式，领导信康赣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1934 年 6 月，为加强对赣粤边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央又决定成立以李乐天为主席的赣粤边军政委员会，其活动范围包括信、康、赣、余、雄和龙南、全南、定南等县。1934

年12月底李乐天、杨尚奎等率七百余人的游击队挺进信丰油山后，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1935年3月底至4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蔡会文、陈丕显等所率突围部队先后抵达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此时，聚集在这一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已达一千四百余人。

4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县大岭下村召开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与信康赣雄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听取了李乐天等关于赣粤边情况汇报。项英、陈毅在表扬特委和军分区率部胜利抵达油山并站稳脚跟的同时，也诚恳批评了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人中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在游击区照搬照套苏区工作方式的错误，要求大家认清形势，迅速转变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会上，项英、陈毅决定：派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率部分部队，到信丰县与安远县交界处接应中央苏区突围失散人员；同时派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部前往南雄县北山待命。会议还决定将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信康赣雄军分区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仍以李乐天为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杨尚奎为特委副书记，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刘新潮（刘建华）为少共特委书记。

大岭下会议只开了一天，因敌情变化，第二天，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等率领特委和军分区机关及直属武装人员，从油山转移到大余县北山，在帽子峰下的长岭村，继续召开赣粤边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这是一次对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近七十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形势，研究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项英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特别强调：不要认为中央苏区丧失了，革命就失败了，要坚决反对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要坚定地

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他还强调指出：要彻底转变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地执行政策。陈毅也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对大家说："我们要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坚持下来，同敌人斗，积蓄和保存力量，保存一部分干部，适当地利用机会发展，改善装备，扩大游击队，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条件，将来应付大的事变，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还说："我们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盲动主义，也反对悲观失望。我们的正确路线是：保持干部，保持游击队，保持政治旗帜。插一杆红旗在山上，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敌人以打击，打破敌人的'围剿'来壮大自己。"① 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斗争方针；决定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强调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硬打强敌，要采取袭击动作和打圈子等方式反击敌人的"清剿"。

长岭会议根据当前敌情和赣粤边的实际情况，对游击力量的部署进行了研究，决定将赣粤边分为五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游击区：即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信南区、上（犹）崇（义）区；将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四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1）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向崇义、上犹县边境和湖南的汝城、桂东县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已进军湘南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及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2）赣粤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国兴率一个大队到崇义县的文英、古亭一带发展游击区，把北山游击区与湘南游击区连成一片。（3）一个大队到

①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5—516 页。

大余县中北部的洪水寨、娘娘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4) 一个小队到南雄县西部山区活动。(5) 一个小队留在北山随特委活动。(6) 黄成则、张日清率一个小队到“三南”(龙南、全南、定南) 扩大游击区。项英、陈毅分别化名为“老周”、“老刘”,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赣粤边特委领导人一起,随特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后,各游击队分头行动。此时,国民党粤军3个师在地方保安团配合下,对赣粤边游击区开始了严密封锁和大规模“清剿”。项英、陈毅和特委、军分区司令部在北山驻地棚洞村被敌发现,遭到突然袭击。项英、陈毅等安全脱险,一部分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在突围中牺牲,损失重大。此后,项英、陈毅、李乐天等决定进一步缩小机关,分散部队,只留下侦察班和特务班在身边,同时告别房屋,选择在大余、南雄两县交界处帽子峰西侧深山老林,搭竹 (草) 棚,住山洞,建立秘密营地,通过秘密交通线,与各地游击队联系,领导指挥游击战争。在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各地游击队隐蔽和保存了有生力量,并且采用各种灵活机动战术打击敌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粤军制订的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

1935年10月13日,已经叛变投敌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带领一队国民党粤军,伪装成红军游击队,从湘南窜到赣粤边游击区,诱迫赣粤边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后,又由何长林带路来到北山。北山游击队被龚、何诱骗集中在龙西石开会而遭围歼,牺牲三十余人,仅八九人突围脱险。随后,叛徒龚楚、何长林又率领国民党粤军“抄剿”项英、陈毅驻地,幸亏游击队侦察员在与龚、何相遇时识破叛徒阴谋,机智报警,项、陈等得以迅速转移。

“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李乐天等率特委机关离开北

山，转移到信丰县油山游击区活动。1935 年 12 月底，特委书记李乐天不幸牺牲。项英亲自兼任特委书记，与陈毅一起，领导游击队紧密依靠群众，使叛徒阴谋破产，并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粤军发动的长达半年之久的移民并村、封坑搜山，企图饿死冻死游击队的更残酷“清剿”。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粤军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进攻，撤走了驻大余、信丰等地军队。项英、陈毅正确分析形势，抓住有利时机，领导游击队主动出击，积极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扩大发展了游击队和游击区域。从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7 月，赣粤边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又粉碎了国民党蒋军第四十六师对游击区先后发动的三次残酷“清剿”。

二　湘粤赣边游击区

湘粤赣边游击区，亦称湘南游击区，包括江西上犹、崇义和湖南桂东、资兴、郴县、汝城、宜章等县。1935 年春，由方维夏、陈山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余部百余人，张通领导的独四团另一个连，分别在桂东、新田等县活动。由龚楚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余部百余人，亦抵达桂东东西边山地区。

1935 年 4 月，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按照长岭会议决定和项英、陈毅意见，率领赣南省突围部队及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余部一起编成的两个大队约三百余人，从北山经崇义、上犹，来到湘东南汝城、桂东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设法与方维夏、陈山、张通等领导的独四团部队及龚楚所率部队取得了联系。不久，原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政治部主任游世雄也遵照项英、陈毅指示，率领赣粤边游击区北山游击队百余人，由南雄县进入湘南，与蔡会文部会合。

4 月下旬，蔡会文在崇义县与桂东县交界的赤水仙召开各游

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分局长岭会议精神，研究了如何开展湘南游击战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以陈山为书记，李国兴任组织部长，方维夏任宣传部长，蔡会文、龚楚（不久，龚率部分人员在郴县投敌叛变）、游世雄、罗荣、张通、王赤等为委员；同时决定将各部游击队合编为湘粤赣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罗荣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支队部设在赤水仙，支队下辖七个大队，共七八百人。

赤水仙会议后，各游击大队根据特委和支队部的部署，抓住湘南敌军力量空虚有利时机，在东边山、西边山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寻找机会打击消灭敌人，取得一连串胜利。同时，特委和游击支队组织八个工作团，分赴湘粤赣边各县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经过半年多努力，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游击区的游击战争得到蓬勃发展，游击支队力量也发展到有约千人，各县党组织所辖地方武装也普遍恢复建立起来。这期间，中共湘粤赣边特委和游击支队通过秘密交通线与中共中央分局项英、陈毅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获得项英、陈毅的指导，还与在湘赣边武功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共湘赣省委取得了联系。

湘粤赣边红军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令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1935 年 11 月，国民党从广东、湖南、江西调集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十余个保安团、“铲共队”，共五万余兵力，对湘粤赣边游击区进行残酷“清剿”。敌人将“清剿”重点放在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活动的东边山、西边山，以近三个师兵力，将蔡会文率领的游击支队领导机关及主力包围在东边山朱冠山一带。突围中，游击支队大部壮烈牺牲，蔡会文、陈山、周礼等领导人各率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分散行动。蔡会文率支队直属队转移到东边山崇

义县上堡乡石坝子村。12 月 4 日因坏人告密，国民党粤军副师长彭霖生率一个营兵力分两路突然前来石坝子搜村。面对敌情，蔡会文不顾个人安危，命令分队长刘荃禄和警卫排长各率一部兵力分头突围，自己亲率通讯班十余名战士坚守村中掩护，一边打一边往村后高山纸棚撤退，吸引敌军火力，后又趁机转移到丫山山口田棚稍事休息。由于连续几天断粮，大家又饥又累，蔡会文派一名战士下山买粮。不料这名战士一下山即被俘叛变，带领敌人前来偷袭。蔡会文为掩护战士们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将蔡会文手脚捆住，中间穿一根竹杠抬着回去请功。抬至牛岭埂上，蔡会文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对敌人破口大骂。恼怒的敌人残忍地用刀将他的喉咙割断。蔡会文壮烈牺牲。

蔡会文牺牲后，王赤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桂东、崇义边境活动，游世雄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桂东、汝城边境活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三　汀瑞边游击区

汀瑞边游击区亦称闽赣边游击区。在这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有：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和特委委员钟德胜率领的瑞金游击队；刘国兴率领的武阳游击队；张开荆、张悌、彭胜标、胡荣佳等领导的桃古游击队。

赖昌祚、钟德胜等于 1935 年 4 月率中共瑞西特委直属队及瑞金独立营部分人员，从瑞西铜钵山区突围到汀瑞边丝茅坪。5 月，赖昌祚主持在丝茅坪召开主要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瑞西特委委员钟德胜、杨世珠和游击队的部分领导人。赖昌祚在会上清醒地分析了面对的严峻形势，要求与会者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的紧急指示，以适应新形势下斗争的需要。会议制定了“保存力量，分散行动，以待时机”的

行动方针，游击队在敌情特别严重时化整为零以保存自己，在时机有利时化零为整，打击反动势力。在斗争方式上，紧紧依靠群众，建立秘密联络点，逐渐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同时选择群众基础好的山区，创造条件建立游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边界游击战争。会后，赖昌祚率一部分武装留在罗汉岩地区活动，钟德胜率三十余名游击队员转移到大柏地一带开展斗争。不幸的是，1936 年 10 月，赖昌祚隐蔽在罗汉岩养病期间被叛徒杀害而牺牲。

武阳游击队由武阳区、下州区 2 支游击队合并组成，刘国兴任队长，原有一百多人。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连续进攻和“清剿”，游击队伤亡损失惨重，至 1935 年 6 月只剩下刘国兴、刘明生二人。但他们没有悲观气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联系失散战友，秘密潜入乡村屋场联系群众，逐渐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1936 年底，游击队又恢复到二十余人。

桃古游击队是由彭胜标、胡荣佳领导的桃古区游击队及张悌领导的兆征县独立营余部和张开荆领导的瑞金游击队余部组成。他们坚持在瑞金、长汀两县边界山区开展游击斗争。1936 年 11 月，为加强对游击根据地领导，在长汀县猪仔崠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汀瑞县委，由胡荣佳任书记，彭胜标任副书记；同时决定将游击队改名为汀瑞游击队，由胡荣佳任队长，彭胜标任政委。

1937 年 1 月，钟德胜率领瑞金游击队转战观音崠地区时，与胡荣佳、彭胜标、张开荆等领导的汀瑞游击队取得了联系。4 月，两支游击队在猪仔崠胜利会合。随后，钟德胜又通过地方党组织关系，与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取得联系。三支游击队更增添了斗志，增强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继续分散活动，又紧密配合，连连取得战斗胜利，迎来了全国抗战爆发。

四　闽西南游击区

1935年4月，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和谭震林等率部突围到闽西永定县与张鼎丞、邓子恢、方方等会合后，陈潭秋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苏区留守红军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经过讨论，会议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的安全与团结”[①] 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为了更好地实施对闽西南地区的统一领导，会议将原先成立的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称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仍以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郭义为任党务部长，朱森任参谋长，方方任政治部主任。整顿建立了永定、永东、杭代、龙岩、新长杭五个中共县委，成立了闽西南交通站。会议还决定把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之红军游击队划分为四个作战分区：第一作战分区由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组成，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活动范围是龙岩、连城、宁洋三县地区；第二作战分区由红九团第一、第三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吴胜，政委谢育才，活动范围是永定、平和以及广东大埔、饶平各县边区，并负责打通与闽粤边游击区红三团的联系；第三作战分区由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邱金声，政委邱织云，活动范围在龙岩、南靖、漳平三县

①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页。

边境地区；第四作战分区由红二十四师百余人、卓林大队以及永东、杭代、新汀杭等县独立营组成，在永定、上杭地区活动，由张鼎丞、谭震林直接指挥。

会后，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分散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由人护送，秘密前往汕头治伤（后转往上海、苏联）。游击队依靠群众，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半年多时间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两次“清剿”。1936 年 1 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地区的局势和从地下党获悉的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决定将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称为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各县游击队改称为抗日义勇军。从 1936 年 2 月至 1937 年 3 月，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三次大规模“清剿”。两年中先后五次反“清剿”胜利，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大了游击区，恢复发展了党组织，抗日讨蒋军也发展到两千余人。

第五节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 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

1936 年 12 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从“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于 1937 年 2 月 10 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多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努力在闽西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首先决定将原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改名

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将闽西南抗日讨蒋军改名为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名为人民抗日义勇队。军政委员会一方面派出方方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一方面在闽西南地区广泛开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和平宣传运动，主动向驻闽西南地区的国民党粤军和地方当局发出和平谈判呼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迅速高涨。经过努力，1937 年 7 月 10 日和 7 月 29 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出邓子恢、谢育才前往龙岩，与国民党粤军代表谈判，终于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协议。8 月底 9 月初，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和人民抗日义勇队，改编为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赣粤边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也及时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干部会议，分析形势。由于未得中央指示，会后项英以个人名义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战争斗争高潮》文章，印发给干部学习讨论。7 月底，项英、陈毅又从一本香港出版的进步杂志《新学识》中，看到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中，引用了 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所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摘要，从中了解到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项英又以个人名义，撰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他明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国共合作则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战的主要力量；国共合作必须严格遵守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个原则，即在特区和红军中保持党的领导权，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保持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项英在文章中提出，特委和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合作抗日，在上述三个条件下争取与国民党地方当局

谈判；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力求公开开展群众工作，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①] 这篇文章对于帮助游击队干部战士统一认识、转变思想，开启赣南乃至江西国共合作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8月20日又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国民党驻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诚恳表明特委和游击队为争取民族解放、挽救国家危亡，愿意停止对国民党敌对行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战，停止进攻游击区，与游击队谈判，合作抗日。随后，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游击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但是，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制造“油山‘共匪’要求投诚”等谣言，写信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特委和游击队给予坚决回击，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和游击队抗日救亡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内战、反对合作抗日嘴脸。同时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有关合作抗日指示，正确认识国共合作形势，纠正和克服麻痹思想和关门主义倾向。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的合作抗日主张和诚意，终于触动国民党地方当局有识之士。8月27日，国民党大余县长兼“江西省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彭育英派人给项英、陈毅送来“咸秘代电”专函，要求红军游击队派员接洽谈判有

①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540页。

关事项，并表示愿意通电湘粤赣边国民党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封锁，以示诚信。9月3日，陈毅复函彭育英，陈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重要意义及红军游击队的态度，驳斥国民党当局污蔑游击队的言论。9月4日，彭育英函复陈毅，同意派代表谈判，并约定双方先在南雄县钟鼓岩接触商谈。9月6日，陈毅按照约定来到钟鼓岩，彭育英也由大余县政府秘书鲁炯雯陪同如约来到钟鼓岩。双方会面后，就正式谈判的时间、地点、议程等作了具体安排。

9月8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到达大余县池江，与彭育英派出的全权代表鲁炯雯，在池江区署进行正式谈判，初步达成七项合作协议：（1）由大余县政府电告江西省三、四、八行政区各县停止武力进攻游击区；（2）释放共产党员和政治犯；（3）不得歧视共产党；（4）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军，听候中央建制调遣抗日；（5）红军原有政训及指导人员不动；（6）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由项英、陈毅负责召集；（7）其他未决事宜由大余县政府派员陪同陈毅前往赣州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

池江谈判成功后，陈毅来到大余县城再次与彭育英见面，并治疗腿疾。9月12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来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及第四十六师代表谈判。谈判中，陈毅对国民党报纸的恶意宣传和驻军第四十六师代表发表的谬论，进行了义正词严地驳斥和坚决斗争，并向赣南国民党驻军及地方当局提交了《合作抗日意见书草案》，提出七款谈判条件：国民党地方当局停止进攻游击区；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及其辖区内群众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动，竭诚拥护中央政府领导之抗日救国大计，双方停止敌对宣传活动；由赣粤边特委负责集中所有游击队听候政府当局派员点编，点编之

一切经费由政府完全负担，点编后如同西北红军一样改编为国军开赴抗日战场并与国军待遇一律平等，服从政府指挥，但改编后部队军政干部仍由共产党特委推荐经军政当局加委；立即无条件释放关押的共产党人和一切政治犯；尚留在赣粤边的中共中央分局可以负责集中江西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但政府当局需提供便利，并要求将赣粤边特委与当局谈判经过转知朱、毛；撤离并解散游击区内所有“铲共团”，另组新的人民壮丁队维持秩序治安；保证抗日救国之言论自由减轻人民负担，保护游击区人民利益，说服人民群众按章正当纳税以充实抗日经费等。国民党方面也提出相应条件。经过反复协商，国民党方面基本接受陈毅所提条件，双方达成了进一步协议。

赣州谈判后，陈毅返回信丰油山，向项英和特委汇报谈判结果。9月20日，项英由油山前往大余县城，会见彭育英。21日，项英、陈毅复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会见第四行政区专员马葆珩和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并再次举行谈判，就红军游击队集中点编等问题达成补充协议。9月24日，项英为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问题而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南方其他游击队集中改编及赣州谈判的遗留问题。

项英在南昌期间，见到了八路军驻南昌办事处代表顾建业，并且与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取得了联系，通过博古致电毛泽东，终于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直接获得了党中央指示及《国共合作宣言》等若干重要文件。9月28日、29日，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致信浙南游击区刘英和江西各地红军游击队，告知国共合作抗日及游击队改编事宜，宣布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10月上旬，项英从南昌返回赣粤边，立即召开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研究有关改编问题。

与此同时，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分局前往湘赣边、皖浙赣边，陈丕显前往汀瑞边和南雄等县，罗绍曾前往湘南，杨尚奎前往兴国县，刘新潮（刘建华）前往寻乌县，寻找红军游击队和地下中共组织，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指示，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事宜，通知游击队按时集中整训，听候改编。

项英、陈毅等离开赣粤边后，赣粤边等地红军游击队在中共赣粤边特委副书记杨尚奎领导下，从10月上旬开始陆续下山，在大余县池江集中整训，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

二　新四军的组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加快了步伐。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南方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的“新政策”。9月下旬，中共中央驻宁代表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张冲等谈判，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新军形成初议，10月2日正式达成协议。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公布了叶挺为军长的任命。

奉中共中央指示，项英为接洽新四军成立事宜，于1937年10月12日离开赣粤边，经南昌前往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正确地肯定了中共中央分局和南方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决议》说：“政治局听了项英同志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报告之后，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

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①《决议》还说："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②

1937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新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至此，中共中央分局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历史使命。

随后，项英根据中央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指示，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主席身份，随同中央派往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离开延安返回武汉、南昌，与叶挺等一起组建新四军军部，正式开展了新四军组建工作。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全军计有 10300 人。下辖第一、二、三、四支队，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分别编入第一、第二支队。其中赣粤边和湘南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一部；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三团；汀瑞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团第二营。湘鄂赣、闽浙赣、闽东、湘赣等地的红军游击队分别编入第一、第三支队。鄂豫皖、豫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4 页。

② 同上。

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奉命离开大余池江，经赣州、樟树等地开赴皖南集中。3月，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三团离开闽西，开赴皖南。4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离开南昌到皖南岩寺集中，奔赴抗日前线。

从此，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南方红军游击健儿，走出深山老林，以新四军的勃勃英姿，纵横驰骋大江南北，开创抗日战争新局面。

结　语

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历史地位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波澜壮阔，曲折复杂，艰苦卓绝，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军事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①

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544页。

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①。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许多同志，认识到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但是党内仍有许多同志在1927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仍旧把党的中心任务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毛泽东说：“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②

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红军不仅打败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攻，而且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崭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局部地区（苏区）成为执政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开始真正为全党所确认。尽管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后来党在领导中央苏区军事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但党对于领导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深刻认识和坚强决心，自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成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三大法宝。

二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使中国工农红军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③中国工农红军这支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创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074页。

的人民军队，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十年武装斗争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前来赣南游击时，全军只有三千六百人。加上留在井冈山的红军部队，总人数也只有五千余人。到 1930 年 8 月就发展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辖有第一、三两个军团，兵力近四万人。到 1934 年 9 月，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到拥有第一、三、五、七、八、九军团，兵力最多时达十三万人，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最强大的红军部队。

这支部队经过三湾改编、赣南“四整”和古田会议洗礼，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优良的政治、军事素质和过硬的作风。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这支部队先后粉碎了国民党近百万军队的进攻，大量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战功卓著，军威显赫。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军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主力部队仍拥有十余万兵力，其中参加长征八万六千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一万六千余人。

这支部队不仅在中央苏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支柱作用，而且“朱毛红军的经验”还被推广到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许多根据地红军的建设和发展。长征到陕北的南方各苏区红军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留在中央苏区浴血坚持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红军部队，也集中改编成立新四军。这两支由红军发展而来的抗日劲旅，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最坚强的武装力量。

在创建、巩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中，红军的兵种构成和武器装备，也得到发展和改善。1929 年 1 月红四军初入赣南时，只是单一的步兵，三千六百人中只有一千五百支枪。全军只有少量的机关枪和数门没有炮弹的迫击炮，更没有电话机、收发报机等现代通讯设备。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增

多，红军的装备不断改善。1930 年秋以安源煤矿参军的工人为主，建立了第一支工兵部队。1931 年 1 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无线电设备，在宁都县小布建立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随后，又建立了专门的炮兵部队，通信兵部队也逐步建立起来。1929 年 1 月红四军初入赣南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医院，伤病员只能寄放在地方治疗。后来，红军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医院，还创办红军军医学校，自己培养医务人员，逐渐建立了红军医疗保障系统。红军教育也迅速发展。至 1933 年，先后办起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红军无线电通讯学校等，初步形成了红军军事教育体系。

红军的战斗力不断提高。1929 年 2 月 11 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战斗中一次消灭敌人八百余人，算是当时最大的胜仗。1930 年 10 月以后，红军基本上实现了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敢于面对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乃至四十万敌军作战，一次战斗可以歼敌一两万人。除了善打运动战、伏击战以外，红军还进行过城市攻坚战尝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又在装备简陋的情况下，经受了阵地战的严峻考验，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这支坚强的人民军队，仅在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就先后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余万人，消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使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

红军的军事领导和指挥系统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从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到红军各军团、各师团直至连队基层组织，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到各省军区、军分区直至县、区军事部，从红军主力部队到地方红军师、团和地方赤卫军、赤少队，不仅组织机构健全严密，而且指挥灵活，调度自如。这些与红军初创时

期相比，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着许多我国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第一”：我国人民军队的第一支工兵部队、第一支炮兵部队、第一个无线电通讯队、第一支防空部队、第一所正规的红军大学、第一所军医学校、第一所无线电通讯学校等，都在中央苏区创建；1930 年冬，红军第一次实现了由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开始了人民军队发展建设的新阶段；1931 年 11 月 7 日，在瑞金叶坪举行了我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次正规的阅兵典礼；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向人民军队指战员颁发勋章，通过并正式颁布了第一个拥军优属条例；在红色区域第一次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1933 年 6 月 30 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确定并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 8 月 1 日为我军建军节，在瑞金第一次隆重开展了建军节纪念活动；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我国人民军队军旗式样，等等。

三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规律和人民军队建设在探索中获得了宝贵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框架雏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0 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刚开始领导革命战争时，却没有战争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战争中探索和学习领导战争的经验，善于通过战争发现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提供了绝好的实践舞台。正如毛泽东所说："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的作战原则就形成了。"① "全部红军的作战原则"包括：认识和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等。这些"全部红军的作战原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国共产党对这些规律的认识，是通过领导红军战争主要是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探索和总结得到的。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11月写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两篇马克思主义经典军事著作，既是对十年红军战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十年红军战争规律最深刻的认识。

通过中央苏区革命战争实践，毛泽东等还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初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深刻认识到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探索和总结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保障战争供给、改善人民生活的经验。这些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怎样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工农红军，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极宝贵的收获，初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其主要的内容包括：

（一）确立了红军的性质和建军宗旨

明确规定中国工农红军是为工农民众谋利益的新型革命军队，真心实意为工农大众谋利益是红军唯一的宗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②] 古田会议决议案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③] 朱德在1931年7月写的《怎样创造铁的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63—64页。

③ 同上书，第86页。

军》一文中也明确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① 毛泽东、朱德等为红军规定的这一性质与宗旨，成为我国人民军队永不改变的建军宗旨和永远保持的本质特征。

（二）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这一建军原则。"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② 1929 年夏红四军党内军内曾经围绕着红军应由个人领导还是由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同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致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中明确批评了那种削弱红军中党的领导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精神，在古田会议上重申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朱德于 1931 年 7 月明确指出红军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③。此后，红军总政治部多次强调红军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实践表明，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实现，最重要的必须坚持三条：一是要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建军宗旨永不改变，确保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军队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二是必须在军队中建立严密而健全的党的组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66 页。
③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 页。

织系统，使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可靠的组织保证；三是必须大力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始终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党指挥枪，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必须永远忠于党，成为我国人民军队必须始终坚持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建军原则。

（三）确立了红军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

红军成立伊始就重视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连以上各级都设置了政治主官（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部队发布命令时须由军政主官共同连署；营以上部队专门设置了政治工作机关。红四军还编制有专门的宣传兵。1929 年 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进一步强调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先后颁布多个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对红军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作出了具体规范。1934 年 2 月 7 日至 12 日，在红都瑞金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不仅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将政治工作提升到人民军队生命线的高度，而且系统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经验，确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具体的工作方法。红军的政治工作（包括瓦解敌军）原则和方法，成为我国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毛泽东 1938 年 11 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自豪地说：十年来，“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①]。苏区时期红军政治工作传统，成为我国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4 页。

（四）确立了在红军中实行军队民主制度，同时注重加强纪律性，反对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 古田会议决议案重申在红军内部必须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坚决废止肉刑，废止辱骂士兵，强调要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进步和生活，等等。这些军队内部民主制度的实行，十分有利于增强部队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

在确立红军中实行军队民主制度的同时，注重加强纪律性，反对极端民主化。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 年夏红军到闽西游击时又增加了两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革命军队最基本的纪律。毛泽东在强调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的同时，十分注意反对红军中的极端民主化现象。古田会议决议案强调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 页。

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强调反对极端民主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①。朱德也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强调红军必须“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因为“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须而制定的”；指出“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②。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成为我国人民军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五）确立了加强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原则

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强调说：“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因此，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朱德还说：“现在革命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单凭红军的英勇冲锋固然不够，单凭红军已有的战争的经验也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必须特别加速战术方面的进步，预备在全国范围内作战，并且要预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③ 为此，红军特别注重按照实战要求加强部队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还十分注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每次大战之后，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
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组织官兵进行战斗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注重军事教育，组织官兵系统学习军事知识，提高官兵整体素质，从而使部队战斗力得到不断提高。

上述对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和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与经验，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构架。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紧密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上述经验和理论，并使之有了进一步地发展。

四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创建和保卫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和以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固的前进阵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在全国先后创建了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东江、琼崖、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闽东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革命根据地首推中央苏区。中央苏区不仅地盘、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中枢，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以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雏形。它的建立，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次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绝好机会。通过领导和管理这个新型红色政权，中国共产党初步摸索和总结了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知道党应该怎样领导国家政权，怎样治国安民，怎样实施行政决策，怎样团结全国民众，并初步总结了其中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通过创建、领导和管理苏维埃共和国国家

政权的尝试，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认识了中国革命中战争与建设的关系及其内在规律，学会了治国安民、治国安邦的领导艺术，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从而为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纠正王明“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中央苏区这个坚固的前进阵地，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才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五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治政、治国的领导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领导骨干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领导骨干，都是在中央苏区成熟起来的。时年平均仅31岁。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都瑞金工作过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担任国家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政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兵团、各大军区、省军区副职以上职务，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首任驻外大使职务的同志，总计在140人以上。还有，全国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有9位（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贺龙、林彪），10位大将中有7位（陈赓、粟裕、张云逸、萧劲光、罗瑞卿、黄克诚、谭政），当年都在红都瑞金工作过，都是中央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徐向前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此外，在1966年以前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

61.4%的上将、59.3%的中将、32.3%的少将，当年都曾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苏区担任重要军政领导人。至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担任新中国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红军将士，就更多了。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历史时曾说：在中央苏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①。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②

六　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培育形成了伟大的苏区革命精神

在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不仅领导建立了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在创建、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领导根据地军民培育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反对‘本本’，执政为民，艰苦奉献，廉洁奉公，争创第一，英勇无畏，敢于胜利”为主要内涵的伟大的苏区革命精神，培育形成了红军不畏强敌、不怕艰险、勇于牺牲、敢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② 同上书，第548页。

胜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优良传统。这种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党的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又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源泉。它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航天精神等，亦有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在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和数万名红军将士，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为了伟大的苏维埃事业，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曾亲历中央苏区十年烽火的陈毅元帅，在1936年冬游击战争最艰苦之时慨然赋诗云："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① 革命先辈们豪气入云的崇高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强大、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努力奋斗！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的辉煌业绩与珍贵经验，将永载史册！

① 陈毅：《梅岭三章》，陈昊苏编《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主要参考文献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开始出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5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

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吴烈：《峥嵘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红色中华》影印合订本。

《斗争》影印合订本。

《红星》第 1—66 期。

《青年实话》影印本。

《石叟资料》（陈诚文库）微缩胶卷第 1—21 卷。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共福建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闽西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瑞金革命纪念馆保存资料。

后　记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犹如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地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大树参天植自根基，江河万里流有源头。新中国之“源”，人民共和国之“根”，就是78年前在江西瑞金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值此举国欢庆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寻“根”溯“源”，重温当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艰辛历程，缅怀革命先辈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有着特殊的意义。

正如斯大林所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保卫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历史，主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军事斗争史。深入研究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史，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艰辛历史，揭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军事斗争中初步形成的光辉历程，铭记中央苏区军民为创建、保卫苏区英勇斗争的辉煌业绩，从而激励人们大力弘扬苏区革命精神，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念，增强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战胜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

建设造成的巨大冲击，加强我国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繁荣强盛努力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史学工作者对于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地、全方位地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其中，自然包括对中央苏区军事历史的研究在内。稍感遗憾的是，除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外，迄今未见有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史专著问世。2009年，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心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组织编写出版一套中央苏区史研究丛书，并将《中央苏区军事史》一书列入其中。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举措。

很荣幸，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心将撰写《中央苏区军事史》的重任交予我承担。我虽从事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史料征集、研究工作近30年，对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历史有所了解，但毕竟军事历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要求，而我亦非军事史研究专家，加上时间较为急迫，所以接受任务时还是颇感忐忑。然而想到自己身为赣南老区党史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史，广泛宣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苏区军事斗争中建树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苏区革命精神和红军光荣传统，乃自己义不容辞之职责与义务，因而也就接受了这一任务。经过数月面对键盘的紧张敲打，现此书终可付梓了，令我释然。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中共赣州市委和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对我的关心与支持；要感谢我工作长达24年之久的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及我的同事们，使我得以对中央苏区史研究有

便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要感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余伯流研究员，他是我尊敬的师长，在中央苏区史研究乃至党史工作方方面面都给予我热心指导与帮助；要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主任黄修荣研究员，是他送给我一套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使我在本书涉及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福建事变、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准备等重大历史问题方面，有许多新史料披露和新观点阐述；要感谢党史、军史界诸多的同仁们，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和便利了我对本书的撰写；要感谢赣南师范学院领导和该院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心的朋友们，是他们为本书的撰写出版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书的按时出版提供的支持与便利。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郑禾香女士，是她长期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家庭和我的生活，使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我所珍爱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我的所有党史研究成果，都应该有她的一份功劳。

受本人学识水平限制等原因，本书定存有许多不足甚至舛误之处，敬请智者指正。

凌步机

2009 年 6 月

中央苏区研究丛书

中央苏区军事史

ISBN 978-7-5004-8029-7

9 787500 480297 >

定价：53.00元